

2009.12
第二辑

2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2010/1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CO., LTD.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
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 论孙中山的强国思想
- 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孙蒋关系研究
-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孙中山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论
- 最后的奋斗：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
- 孙中山与上海帮会的关系和影响
- 政治法统、挪用与纪念日的演变
- 宋庆龄在德国
- 大革命失败后的邓演达与宋庆龄
- 宋庆龄研究回顾与展望
- 我家与宋庆龄的关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 第2辑 / 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80678-308-5

I. ① 孙… II. ① 孙… III. ① 孙中山 (1866~1925)
—人物研究—文集 ② 宋庆龄 (1893~1981) —人物研究—
文集 IV. ① K827=6 ②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19215号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

主 编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书籍装帧 张 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5 mm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8-308-5/K · 147
定 价 40.00元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第二辑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编审委员会

顾 问： 鲁 平 金冲及 许德馨 张 磊 姜义华 林家有
 沈渭滨 熊月之 吴景平 盛永华 郭岱君 林孝庭
 宋曹琍璇

编委会主任： 秦 量

副 主 任： 马玉成

编 委： 黄亚平 邹 镭 陈亚玲 陆柳莺 刘金驰 朱玖琳
 宋时娟 孙娟娟 廖大伟（特邀） 邵 雍（特邀）
 刘国友（特邀） 王锡荣（特邀） 沈海平（特邀）

主 编： 黄亚平

副 主 编： 朱玖琳 宋时娟

目 录

专题研究

- 001 孙中山：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人 / 沈渭滨
- 022 历史回眸——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再审视 / 谢俊美
- 043 另眼看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关系 / 邵铭煌
- 061 近代上海城市对于宋庆龄的意义 / 熊月之
- 071 宋庆龄与第三党 / 李玉贞
- 103 宋庆龄眼中的蒋介石 / 朱玖琳
- 125 简述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推行“科学研究”的尝试（1949—
1966） / 任冉冉

学术述评

- 137 锲而不舍，深化拓展——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浅见 / 张 磊
张 苹
- 144 两岸盛会，共求新突破——“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学术研讨会综述 / 黄明同
- 160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研究现状述评与展望 / 郭 骥

回忆口述

- 172 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 / 周和康

档案选编

- 206 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 /
李玉贞译注
- 221 中国福利会藏宋庆龄与爱泼斯坦等往来书信选译 / 沈海平
编注 甘庆元译 鲁 平 刘懿芳校
- 261 宋耀如海外书信选译 / 黄亚平 朱玖琳 宋时娟译注

史料辑存

- 298 《申报》孙中山奉安史料汇编（中） / 任冉冉编

后记

Contents

Monograph

- 001 Shen Weibin, *Sun Yat-sen: the First Man to Propel Chinese Culture's Modern Transformation*
- 022 Xie Junmei, *A Glance Back at History: Reconsideration on Sun Yat-sen's Three Great Policies—Alliance with Soviet Russia,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Help for the Peasants and Workers*
- 043 Shao Minghuang, *Another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un Yat-sen, Soong Ching Ling and Chiang Kai-shek*
- 061 Xiong Yuezhi, *Significance of Modern Shanghai for Soong Ching Ling*
- 071 Li Yuzhen, *Soong Ching Ling and the Third Party*
- 103 Zhu Jiulin, *Chiang Kai-shek in Soong Ching Ling's View*
- 125 Ren Ranran, *Brief Description of Soong Ching Ling's Attempt to Promot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1949—1966)*

Review of Academic Activities

- 137 Zhang Lei, Zhang Ping, *Perseveranc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Superficial View on Sun Yat-sen Studies*
- 144 Huang Mingtong, *For New Breakthrough: Summary of Cross-strait Seminar on "From Confucius to Sun Yat-sen—Chinese Culture's Inheritanc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 160 Guo Ji, *Review and Outlook of Researches on the Book Collection in Shanghai Museum of Sun Yat-sen's Former Residence*

Oral History

- 172 Zhou Hekang, *Soong Ching Ling's Housemaid Li Yan'e as I Know*

Selected Archival Materials

- 206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of Soong Ching Ling and the Soviet Diplomats in China (1942—1945)*
- 221 *Letters between Soong Ching Ling and Israel Epstein Collected in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 261 *Charles Jones Soong's Letters Selected from Overseas*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 298 Ren Ranran,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 from the "Shun Pao Daily News" on Sun Yat-sen's Grand Funeral (Part II)*

Postscript

孙中山：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人

沈渭滨

[内容提要]

中华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博大精深。儒学自孔子首倡，到宋明理学已趋于极致。失去了继续发展变革的内驱力，也难以应对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与社会转型的需要。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面临历史转折的关口。近代志士仁人对中华文化转型所作的努力，都无力使中华文化更新，难以形成理论体系。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孙中山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孙中山不是儒士而是近代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家。他对传统儒术“治国、平天下”的推陈出新，主要在儒学的“外王”即方法论层面，儒学之“道”即“内圣”层面，并不因三民主义理论出现而丧失其普世价值。孙中山不是儒学的道统继承者，不是新儒家；三民主义也不是新儒学。它是应对近代社会需要的政治、社会学理。但三民主义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它应对社会转型的文化张力，显示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从此再也不可能以原生态的面貌出现，只能以切合近现代社会需要的政治、社会理论形态面世了。这就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发展趋势和路向。

[关键词]

孙中山 三民主义 中华文化 儒学 近代文化转型

一、中华文化面临历史性转折

中华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儒、释、道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文化

体系。儒学与儒家思想,自孔子首倡以来,历二千多年发展变化,到宋明理学,已趋于极致,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内驱力。这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方面,从儒学发展的历史看。

孔子儒学来自民间。其核心观念是“礼”,而礼之最大者惟“祭”。孔子根据文王、周公一脉相承之“礼”,批判贵族奢侈腐败的“非礼”行为,批判的依据是“礼”的历史真实。所以儒学的本性是批判的。孔子又根据“祭”的本义,认为祭的原始是缘于人类的孝悌本性,推而广之就是“仁”、“忠恕”。这是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准则。所以儒学的原旨又是教化的。孔子把“礼”(政治制度)与“仁”(社会关系)合二而一,主张“克己复礼”,回到“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这种貌似倒退、实质前进的儒学原旨,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大一统国家,并使中华文化在社会道德统序上赓续久远,存亡继绝。

儒学又是发展的。儒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孔子儒学既是在对王官之学的批判中逐渐确立其自身的学术地位;又是在教育、讲学的辩难、传承下得以弘扬光大。孔子死后,继起者为墨、道两家。儒家学说既有与两家对立的一面,又有相近相通的一面。正是在相斗相通的争鸣中,儒学得以学派的繁盛。据《韩非子·显学》篇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导致孔门后学一传再传,学派繁多复杂,后世所称的思孟学派、荀子之学,即是其中脱颖而出者。

两汉时代,儒学定为一尊。既没有了百家争鸣、互补短长的学术环境,又失去了批判现存制度、学术独立的本性,儒学开始成为维护大一统君主制度的工具而逐步僵化。虽然,汉初道家兴起曾对汉儒以道释儒或以儒释道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整体而言,两汉儒学转向了内向式的注释经典的发展路径,形成了经今古文之争。当然,两汉儒学除经生的解经方法外,出现过如董仲舒、马融、郑玄等一批儒学大家。他们的儒学思想,自成格局,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而运用于社会;主张成善抑

恶的“性三品”说而平议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恶论；承阴阳五行之说而倡“天人合一”，以阐幽发微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应对关系，被后世誉为“汉代孔子”。

魏晋时代，儒家受道家学说影响，儒士引老庄入儒，崇尚清谈，儒学因之别开生面，儒家发生变动。其中，排击汉儒，以《易》、《老》注经而自成新学的，是王弼。他和晋韩伯康所注的《周易》，保存在《十三经注疏》之中。^[1]调和儒老、蔑视礼法，崇尚虚无、清谈的，就是“竹林七贤”。嵇康调和儒道。阮籍《达庄论》，阐“无为”之可贵。这种儒道奥援现象，正如梁启超《儒家哲学》所说：“儒家自身，本来有类似道家的话，两汉时代未能发挥，到了魏晋，因为发生变动，才把从前的话，另外估定一番。”^[2]由此可知，儒学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自有学术渊源可循；不同学术思想的影响，自是学派发展变化的内在驱动力。这种流风，一直影响到隋唐。

隋唐时代，佛教大兴。隋代儒家，调和儒、佛，颜之推、王通，是为代表。唐代纯粹儒家，均不及佛学和文学家显露头角，用梁启超的话，“不过是二三等脚色。专就儒学而论，唐代最无光采。”^[3]但梁氏提醒我们，华严宗佛学家宗密法师即圭峰所著《原人论》和唐末李翱所著《复性书》，却是宋学之先驱。所以唐代儒学，仍不失其启迪新知、另辟蹊径的开拓功能。

两宋时期，是儒学大放异采的时代。一方面，长期动乱、民不堪命之后，社会趋于安定，休养生息，重文轻武，学术得以繁荣；另一方面，私家讲学渐成风气，门徒聚集，道统赓续。更重要的是儒佛融通之后，社会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要求儒家别出心裁、另创新说。于是，北宋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著《太极图说》，邵雍（谥康节）成“象数之学”，张载（横渠先生）著《易说》，程颢（学者称明道先生）著《定性书》，程

[1] 《十三经注疏》，十三部儒家经典的注疏，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其中《周易》用魏王弼、韩伯康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南宋以后开始合刻，历明清均有刊本。清代学者阮元据宋本重刊，写有校勘记。

[2] 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文萃·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3] 《饮冰室文萃·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第139页。

颐(称伊川先生)著《易传》,各立学说,聚徒讲学,后世称之为“北宋五子”,奠定了宋学基础。宋学不同于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多以阐释义理性命为主,故有理学之称。传至南宋,朱熹、陆九渊集其大成,汇为朱、陆两大学派。朱学祖述伊川,讲求涵养用敬,格物致知,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陆学踵武明道,讲求义利之辩,发明本心,提出“宇宙便是吾心”,与程朱一派对立。两派主张各有不同,辩难互有消长。其后,程朱之学立于官府,尤其朱熹《章句》、《集注》为八股取仕的张本,朱子之学得而大倡。

明代中叶,浙江余姚王阳明,继承陆学而有所发展。力主“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不同意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朱熹讲格物,是教人对天下万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即用已有知识考求万物至极之理。阳明认为,应本孟子所说“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去“慎独”、致知。朱熹认为致知过程,先要知,然后能行。阳明认为人有良知,自能行,已有行,自有知在,主张“知行合一”。所以,“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既是王学“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宗旨的发微,又是王学有别于朱学的两大要点。王学起于浙而盛于赣。发展到明末清初,学者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流于衰微末路。

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极致。清初诸大儒,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黎洲)、顾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颜元(习斋)等虽各有建树,但都围绕程朱、陆王学说发挥,跳不出宋明理学的樊篱。孙奇逢宗王学而不非难程朱;黄宗羲发扬王学而改其末流空疏置悟之弊;顾炎武敬程朱而有所修正,倡经世之学并在考证方面成就显著;王夫之学无师承,非朱非王,却自成一家。他在史学上成就卓越,学术上却接近程朱;颜习斋则无论程朱、陆王一概予以反对,斥为与孔孟之学门径相异。但他虽排斥宋明理学最力,于汉学传注考据亦表菲薄,其学卒不显于清世。至于死后谥“文正”的清初大儒陆陇其(稼书),更以程朱为正统,斥陆王为异端而深受朝廷青睐。及至清代文字狱大兴,文士避祸惟恐不及,纷纷钻到古纸堆中,整理经籍和考据之风大盛。乾嘉考据之学兴起之后,儒学再无学术上的创新学派出现了。

笔者不治学术史,上述梳理亦多有拾人牙慧之处。之所以不揣冒昧,贻笑方家,是为了说明自宋明理学之后,儒学已陷入无所休止的性理之争和进到考据之学的阶段,虽日趋精微,却无整体创新。在笔者看来,儒学实际上已经僵滞,失去了发展变革的内驱力。

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应对社会需求的互动关系看。

儒学作为自然经济时代的学术体系,他的产生、发展是和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孔子儒学是奴隶制经济转化为封建制经济的产物。秦汉以后,分封制削弱到消失,小农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文化上道教、佛教昌盛,形成多元文化格局。儒、释、道融会,奠定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体系,儒学历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自在情理之中。两宋起,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明中叶起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物欲增长,于是专讲天理人欲的宋明理学随之而兴。程朱理学更定为官方哲学,朱子的《章句》、《集注》钦定为科举取仕的解经、诠释依据。利之所趋,程朱理学历宋元明清而不衰。陆王心学也因其对程朱批评辩难中,得到儒士的认同而广为流传。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社会面临二千多年来从未经历过的变局。异质文化的不断涌入,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晚清中国的社会形态变化,在在都要求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如何应对变化了的现实。但是,大多数儒生仍热衷于琐碎诂订的考据和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少数学者虽有糅合中西学问而有所更张,但终因西学知识的浅薄且深受传统学术的羁绊,产生不出新的理论体系。美国学者列文森曾对当时中国儒学的未来命运作过推测,他认为:儒学如果坚守它那套传统而不去回应发展了的历史,它真有可能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1]确实切中了儒学的困境和要害。

儒学当然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但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论和社会道德统系。说儒学自宋明理学后趋于僵滞,当然不是说中华文化

[1] [美] 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列文森的原意是指责共产党把孔子学说比喻为博物馆的陈列品,笔者在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没有发展前途。但是儒学需要历史性的转型以面对变化了的中国之需求,却是中华文化在鸦片战争后共同的命运。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部的吏治败坏、专制统治和外部的鸦片入侵、西学东渐,就已对中华文化提出了挑战。但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沉闷困顿,一如龚自珍《己亥杂诗》所描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已经看出了知识界与现实世界断裂的不堪局面,呼吁不世人才之出,冲破万马齐喑的可悲可哀状态。确实,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不能再在原地踏步,需要抓住历史机遇,推进近代化转型,以应对社会需求。

二、近代志士仁人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探索

近代志士仁人,对冲破传统文化与近代转型之间的瓶颈,曾作过努力与探索。曾国藩的“经世致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梁启超的“新民说”,都在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局限和政治识见的制约,都难以形成近代化理论体系,也无力使中华文化更新。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使中华文化在应对千年变局的历史机遇中,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而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根本上是程朱理学一脉。鸦片战争前夕,曾问学于当代理学大家唐鑑,做过孟子所倡“慎独”之说的“研几”功课。在“日省自身”的心性修养上,虽不如同时受学的倭仁,但在与太平军作战、保卫清王朝的实践中,却主张儒学原旨的“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倡导实学,对咸同之间的学术界有过开风气的作用。不过,整体上仍跳不出儒家原有的藩篱,自不能成为更新学派。

张之洞总结洋务派实践,在《劝学篇》中,概括出“中体西用”思想,以西学之用,辅中学之体,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学术上并没有创新,道术上却为嫁接异质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借鉴的途径。

康有为宗《公羊》之说而立“孔子改制”之论,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祖师,以为其维新变法制造根据。由此,康倡言因时而变的“通三统”和“张三世”之说。“三统”者,谓夏、商、

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三世”者，曰社会变革循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递进。时当据乱世，应以君主立宪之政体救弊政而改制。其另一著作《新学伪经考》，则承集阎若璩、刘逢禄等怀疑古文经典之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乃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之学无关。所以，始作伪、乱圣制者，出自刘歆；而布行伪经，纂孔统，则成于郑玄，历二千年，竟无一人敢违、敢疑者。其实，且不说《新学伪经考》非其自创而剽窃川人廖平，^[1]已属贪天之功。即使助康氏参与纂书之康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也不以此说为然，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称其“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认为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缘皆在其凭主观自信，蔑视客观事实，“必欲强之以从我所致”。^[2]弟子之评，可知其学术上牵强附会、主观武断，自难以服众，更遑论改造旧学，促成转型了。

与上述诸子的文化背景、政治识见不同，孙中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士，而是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系统训练、立志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家。所以当1895年与康有为相识时，康有为要他具门生帖，拜己为师，很瞧不起他。其实，孙中山在西学和对西方政体、社会民生方面的认知上，远比仅有声光化电浅薄知识、未在域外生活过的康有为强了百倍；中学方面，自1893年赴香港求学起，就一直延聘国文老师，学习中国文化，不仅研读过中西合璧的四书五经^[3]，而且认真读过马史班书^[4]，了解历史的兴亡因革。“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5]虽不比康有为旧学专精，但知识结构的中西融通却远胜康氏，称得上是当时风流人物乃至反清革命阵营内，中西学问兼备的通才。中华文化面对千年变局的转型，正是需要这样的人来抓住历史机遇。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既承袭了中国固有的学

[1] 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13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文集》本，第70页。

[3] 邵元冲：《总理学记》，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4页。

[4] 据1895年11月6日《镜海丛报》刊《是日邱言》称：孙“壮而还息乡邦，而不通汉人文，苦学年余，遂能读马、班书，撰述所学。”见黄明同等著：《孙中山的儒学情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5]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理,又规抚了西方学说之适用于中国实际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成了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人。历史往往以诡异莫测的方式完成它的逻辑发展过程。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不是由精深儒学的儒士来实现,而是让一个被儒士瞧不上眼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充当第一推手。这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

三、“三民主义”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于“三民主义”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内涵,笔者已在拙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中有所叙议,此处不赘。本文拟补充两点:(一)三民主义在哪些方面对传统思想推陈出新,以应对近代中国社会需求;(二)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先说第一点:

1.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利用西方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传统的种族旧说,创造性地运用于反清革命的纲领。所谓“民族”,一般是指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狭义的民族概念,是指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文化上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关于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

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民族”一词,更没有“民族主义”说法,只有“夷”、“夏”的区隔,如“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等。所谓“夷”,是指居于中国之外的种族,即“非我族类”之人^[1];所谓“夏”,就是“中国之人”^[2],“夏,谓中国也”^[3]。历代儒士,一直将偏居于中国之外的种族列为“四夷”。这在社会经济生活、思想文化尤其是礼制服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之间,自有其识别、区隔的意义。但也铸就了“天朝自大”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态。

孙中山生当清季,自小深受太平天国反满复汉斗争影响。及长,对清政府内而专制腐败,外而妥协卖国,目历身受。自确立“决覆清

[1]《春秋左传·成公四年》。

[2]《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4页。

[3]《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廷”之志后，大倡反满复汉，鼓吹革命排满，以应对当时普遍存在满汉矛盾的紧张心理和民怨沸腾的社会需要。从形式上看，清朝统治两百多年了，满汉矛盾已不像清初那样尖锐，正在逐步缓和。但是异族统治，尤其是清军入关后对汉人的残暴屠杀，以及清代文字狱等，永远在汉族士大夫心灵中刻上了一道道抹不去的伤痛；异族政府对百姓的苛捐杂税和政治压榨，也在社会下层民众中激起着日益增长的怨愤与不满。孙中山就是借用反满复汉的社会心理，唤起历史记忆，揭示现实矛盾，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可以说，反满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比之民主、宪政，民众更听得懂也更能引起共鸣。既然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从各自的文化心理和现实处境中有强烈感受，那么反满也自然成为最能动员革命激情的批判武器。不过，1905年以前的反满复汉宣传，仍带有狭隘种族主义色彩。学理上的思考并不深沉，更多的是对清王朝异族统治专制腐败的实感。这就使他容易接受西学并较快摆脱传统的囿限而注入民主主义时代内容。1906年，孙中山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作了明确解释，指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并把这八个字的纲领，倡之为“民族主义”。

经此解释，可以看出：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排满，已经超越了传统典籍“夷夏之辨”的旧说，明确地把民族关系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又把压迫民族中统治阶层与一般人民区分开来；他一心向望的“恢复中华”，也不是“光复故物”式的回归，本质上是要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满族在内的近代民族国家。于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革命的一个理论，既对旧说推陈出新，又促成了中华文化在民族问题上的近代转型。

[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

2. “民权主义”，主要不是来自传统儒学“民为邦本”的思想，而是直接得自西式教育中有关欧美国家制度的知识。作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民权主义的核心是要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

二千多年的儒学和儒家思想，一个重要原旨就是重民养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一类的言论，充斥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儒家典籍中。这类言论，或作为训诫君主善待庶民，调适君民关系，以凸显儒学的教化功能；或用作对统治者残暴无道、苛虐百姓的抨击抗议，以尽儒学的批判本性。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有良知的儒者或思想家，有过将君民政治地位颠覆倒置的言论和主张，即使像严复，直斥秦以来的君王皆为“大盗窃国者”，但在现实政治主张上，仍认为不可“弃吾君臣”。他在《辟韩》一文中称：“然则及今而弃我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3]连一个讲进化论的近代思想家都如此，更遑论治旧学的硕儒了。

孙中山读过儒学经典和马史班书，当然深知“民为邦本”的儒学原旨。但在推翻清王朝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他在1903年就已说过：“我们必要倾覆满清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4]1906年在对同盟会16字政纲中“创立民国”一纲的解释时说：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5]

这样，由1905年《〈民报〉发刊词》所揭出的“三大主义”之一的“民权主义”，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未来的国家名称叫“中华民

[1] 《孟子·尽心下》。

[2] 《尚书·五子之歌》。

[3] 严复：《辟韩》，转引自李泽厚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页。

[4]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6页。

[5]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国”；国民平等皆有参政权利；国民公举大总统，没有了皇帝；国民公举议员组成议会，废除了一人君临天下的帝制；制定宪法人人共守，废除了君主、皇帝“朕即法律”的专制统治。简言之，从政治地位、政体建构、法律制度上保证中华民国是一个民有、民治的国家。所以“民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旧学“民为邦本”的拓进，真正把儒学“重民养民”思想中君民关系，推进到“主权在民”的高度，以适应“平民革命”需要。从此，儒家思想中关于“民为邦本”的学说有了崭新的意义，而“民贵君轻”之说，也就成了历史陈迹。

3.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对同盟会十六字政纲中“平均地权”的理论表述。这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超越同时代思想家和革命者最突出、最具光彩的部分；也是孙中山作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推手的最重要贡献之所在。

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思考过程看，这个问题触发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而欲在中国“防患于未然”的解决方法，则既包含着西方庸俗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资源，又有着中国传统学说中有关“均贫富”的思想主张。所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最初的核心思想“平均地权”，既不是亨利·乔治“单税社会主义”的翻版，也不是历史上土地改革方案的重现，而是糅合中西、自成一格的理论。

孔孟儒学在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既承认贫富差别，又要避免差距过大而造成社会脱序，主张行“仁政”以均贫富，达到长治久安。孔子对弟子冉求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孟子告诫梁惠王治国之道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2]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中，对孔子均富思想有所发挥：“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以丛生，故其制人之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

[1]《论语·季氏》。

[2]《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1]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世纪社会里,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制。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则缺田少地。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土地兼并,既造成农民破产,又加剧贫富分化。土地问题成为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安定与否的根本问题。

孙中山生于农村,自小懂得稼穡艰难,深知贫富差距源于土地私有之故。他读过《四书》,对孔孟的“均富”论必有所心悟;他了解历史上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提出的“不纳粮”、“均贫富”口号和土地分配方案,并和梁启超、章太炎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2]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熏染和历史启示下,孙中山结合西方社会主义土地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理论。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的核心,不是采取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而是以核定地价、原价归地主所有,涨价归公,由国民共享的办法,来消灭贫富差距^[3],以“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结人足”^[4],避免政治革命后再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所以,民权主义既与儒家“均富”思想有内在联系之处,又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超越了儒学肯定土地私有的原意。这种不剥夺地主土地原价而把土地增值的财富进行全社会分配,以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做法,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顾及了地主的利益,不失为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方案。孙中山坚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又宣称自己终究是个温和的革命家^[5],原因就在于他用非暴力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实行

[1] 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转引自黄明同等著:《孙中山的儒学情结》,第14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 事见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6页。

[3] 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的最初理念,一是“土地国有”以防止兼并;二是主张“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借以达到均田目的;三是大乱后荒田不治时可“举而夺之”;四是主张赋税之“取于佃耕者,率参而二”。这一理念与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关于“平均地权”的解释,即核定地价、原价归地主所有,涨价归公,由国民共享已有所不同。参见拙文:《“平均地权”本义的由来与演变——孙中山“民生主义”再研究之二》,《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4]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5] 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年2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第116页。

社会改革之故。

由上可知,“民族主义”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指归,符合民族独立的历史需求。“民权主义”以创立民主共和的国体政体为目标,反映了政治革命的追求和社会被统治阶层的公意。“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达到土地增值的财富归全民共享,应对了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趋势。后来,孙中山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内涵,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既体现了儒学“以民为本”的真髓,又推陈出新地构成了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孙中山“三民主义”对儒学的推陈出新,我以为主要不是在“道”的方面,而是在“术”的部分。儒学原旨或曰儒学最高目的是“内圣外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内圣的功夫可谓儒学之“道”,外王的功夫就是儒学之“术”。虽然,儒学的道、术是联为一体、相互依存的,道中有术,术中有道,但诚如梁启超所言:“道字本来可以包括术,但再分细一点,也不妨事。道是讲道之本身,术是讲如何做去,才能圆满。儒家哲学,一面讲道,一面讲术;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事,一面教人如何做去。”^[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把儒学的“外王”之术,推向了适应近代需要的层面。其中,儒学“外王”的“治国”之术,被赋于近代民族国家和创立民国政体的内涵,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新意;“平天下”的儒学原义,转变为平均地权以均贫富的民生主义,成为解决社会民生和避免贫富差别的社会主义理论。

明乎此,就可以划定三民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条界线: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包含对儒学全部的推陈出新,因而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主要指应对社会需要的方法论层面的转变;二、儒学的“道”并没有因三民主义理论的出现而失去普世价值。甚至“术”的一部分内容如“齐家”、“慎独”、“知行”、“善恶”等,也因与“道”相系而自有教化意义。因而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并没有因制度、社会层面的近代转型而可以一笔抹杀、彻底打倒,尤不应把它与三民主义等同起来。

[1] 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文萃》本,第103页。

三、孙中山作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不能因此推断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也不是新儒家。他毕竟作为民主主义革命家而确立其历史地位的;他所倡立的三民主义理论,也决非新儒学派,它毕竟是一种融会中外,应对现实需要的政治、社会学理。

再说第二点: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可以从三民主义内涵的逐步完备来说明。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内,任何一种学说或理论,都有一个从提出到逐步完整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由创说者自我完善;也可以由他人予以诠释、阐发,即集众人智慧而成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样经历着提出、发展到定型的过程。难能可贵的是,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孙中山亲自完善而不是依靠集体智慧。所以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 “民族主义”在1905年提出到1906年首次阐述,它的基本内涵如前所述:是“要建立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包括满族在内的近代民族国家”,以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纲领。1911年武昌首义,全国响应。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反满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孙中山不失时机,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宣言时,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于是民族主义从最初的“驱除鞑虏”提升到“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阶段,更加适合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的国情。

在对外关系上,同盟会十六字政纲中没有反帝纲领。但是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尤其自武昌首义后,一度在向欧美寻求外交支持却处处碰壁的亲身经历中,深感中国独立之必要。1912年,他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同盟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2]隐约寄寓着反帝立场。1919年11月,在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把反帝作为

[1]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2] 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39页。

“立国的基础”，已经明显有所表示：

“我们中国虽然已经推翻了满清专制政体，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可是我们的立国的基础还没有巩固。……中国还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事事都受世界列强的干涉和压迫。我们全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要大家齐心参加革命，才能使中国得到独立、自由和平等。”^[1]

1924年，孙中山在中共帮助下，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称：“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宣言》指出第一方面的内涵是反帝争民族解放；第二方面是承认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革命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3]

于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经由最初狭隘种族主义色彩的“反满复汉”——以汉族为主体包括满族在内的近代民族国家——五族共和——以反帝求民族独立解放与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与时俱进，逐步提升，前无古人，后资借鉴，成为中华文化在民族问题转型中第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

2. “民权主义”理论构架，在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已基本形成，即从人民的政治地位、国家的政体建议和法律制度上保证民国是一个“民有”、“民治”的国家。但由于中国没有近代民主的传统，如何建设民主共和国，孙中山不得不殚精竭虑加以充实完备，使民权主义从最初表述，形成为切合中国国情、可操作、可持续的方案。

首先，他在国民的政治地位上，强调“主权在民”的理念。指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4]据此理念，提出了“权能区分”说，即权在民众，能在政府。民众有如阿斗，政府有如诸葛

[1] 孙中山：《与留法学生的谈话》（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5页。

[2]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6、119页。

[3]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6、119页。

[4] 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页。

亮。人民把一切权力交给政府,才能造成一个代表民众利益的全能政府而管好国家。政府官吏,“不过为公仆之效能者”^[1]。权能区分,有如历史上“选贤与能”政治理想之新修正,改变了君主专制政体中的君、臣、民三者的根本关系,确立了民国政府官吏仅是人民公仆的地位。

为了防止官吏滥权和人民有效监督政府,孙中山坚决丢弃了西方现行的“一般民权”,提倡国民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的“直接民权”,^[2]规定从国家最基层的县级地方自治中施行。“直接民权”作为“主权在民”、“权能区分”的有效保障,根本否定了儒学传统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说,推进了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

其次,在政体建构上,孙中山接受了武昌首义后各省代表会议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在承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体制下,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并统率军队之权,经议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有任命政府各部部长及派遣外交使节之权^[3],以实现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的需要。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民权主义”从理论倡导变成了实际政体。尽管《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非孙中山手订,但它符合孙中山一贯主张实行总统制以组建政府的原意。

民国初年,孙中山根据“民智未开”的国情,及时修正了原先提出的建国程序:“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4],变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5],并规定了各该时期主要任务。“军政时期”以武力统一全国,奠定民国基础为指归^[6];“训政时期”以在县级地方自治施行“直接民权”为目的^[7];“宪政时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8]。

[1] 孙中山:《讨伐曹錕贿选总统檄文》(1924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6页。

[2] 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99页。

[3]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见刘星楠遗稿:《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附录,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246页。

[4]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298页。

[5]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6]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7页。

[7]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7页。

[8]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7页。

建国程序的规定,使以“创立民国”为核心的“民权主义”,成为一个可资持续发展、形成民主共和国的完整过程。这样,从临时政府到宪政政府,组成了环环相扣、依次递进的系统工程,完整体现了孙中山“主权在民”、“宪政国家”的民权理论。

再次,为了最终成为宪政国家,孙中山结合西方三权分立体制,糅合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独创了“五权宪法”的理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凝聚着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理念和国民共同遵守的规则。所谓“五权宪法”,是在承认欧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加进中国历史上行之有效的考试、纠察制度,形成五权独立、相互制衡的法制体系。这是孙中山的独创,显示了中华文化在历史转折中,中西兼容以我为主的独特魅力,也是孙中山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成文法的大胆创新。“五权宪法”说的提出,使“民权主义”从“主权在民”的核心理念,到政体建构中一系列规制,有机组合成有法可依的一个整体,对后来者建设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国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供了足资参考借鉴的范式。

3. “民生主义”内涵的逐步完备,最值得注意。如前所述,民生主义的提出,最初是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土地问题,以实现社会财富全民共享为指归的。民国初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把防止资本家垄断的流弊列入民生主义,并将之称为“社会主义”^[1],这就是后来“节制资本”的发端^[2]。土地问题加资本问题组成了民生主义的两大基本内容。按照孙中山的阐述,“节制资本”包含私人资本和发展国家资本两大方面。节制私人资本是为了防止私人大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实行垄断,但并不对中小资本加以限制,相反,予以积极扶植与鼓励;发展国家资本,则规定影响国计民生的工厂企业如银行、铁路、航运等不能私人占有,收归国家,由国家经营。经营所得利益,由全民共享,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共产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上乘”,是高级阶段;“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

[1]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23页。

[2]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0页。

义”则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图”^[1]。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反复阐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2]，“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3]。

把内涵“节制资本”在内的民生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目前中国惟一可以实行的“要图”,表明了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确实包涵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因为社会财富的全民共享,毕竟是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环。至于后来国家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并以官僚资本的畸形发展摧残民族资本,那是承继者的不肖,不是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理论的错失。

土地问题上,孙中山以“平均地权”作为早期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但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一直是他思考的重心所在。早在1899年同梁启超讨论时,就已有土地国有,“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4]的思想。1902年在与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时,又强调“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5]。不过,在提出“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内涵时,并没有涉及这一主张。但是,“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成了孙中山关于土地问题的归宿。直到晚年,在中共帮助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孙中山才真正把“耕者有其田”作为土地问题的纲领确定下来。他说:“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6]。他甚至宣称要仿效俄国“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7]但是,作为一个温和的革命家,孙中山毕竟没有效法俄国强行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而是通过联络农民与政府合作,“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解决”^[8]。可见,

[1]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16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08—509页。

[2] 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6月30日前),《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60页。

[3]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76页。

[4] 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之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

[5] 章太炎:《定版籍第四十二》,朱维铮校点:《馥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4页。

[6]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9页。

[7]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1924年8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6页。

[8] 《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8页。

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耕者有其田”与“平均地权”的温和主义思想是如出一辙的。

发展经济,是解决民生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民生主义理论得以最终实现的根本保障。孙中山一贯注意把发展经济作为振兴中华的大经。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作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批评洋务派“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1]起,到民国初期积极从事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一直环绕着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行思考和实践,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后来因忙于政事、军事斗争,不能旁顾,但素志未减。直到1919年稍得休整,即把历年思考,汇为成帙,著为《实业计划》一书^[2]。书中关于港口建设、铁路系统、制造业和民生工业的布局,相互配套,互为联动,规划周详,体系完整,构成了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宏伟蓝图,体现了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博大胸怀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雄心壮志。

通过上述简要梳理,可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最初提出,到晚年的重新解释,经历了充实、发展、定型的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必须指出,“三民主义”作为近代政治、社会理论,不是儒学的一个新学派,但本质上又与儒学有着内在联系。它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学说相比,在理论形态的完整性、系统性上,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更适应社会需要。且不说“民有”、“民治”、“民享”,既承袭了儒学“民贵君轻”的价值观,又将之推进到“以民为本”的高度,彻底颠覆了旧说中君民的位势,已经不再是儒学原生态的学理。单就儒家关注的“礼”即政治体制而言,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五权宪法”学说,比之儒学恢复“三代之治”,是一个顺应世界潮流的历史进步。众所周知,儒家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外王”的极致功夫。所谓“齐家”,就是家族制度的齐一问题;所谓“治国”,就是管理国家

[1]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页。

[2] 《实业计划》最初发表于1919年《远东时报》六月号,1921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英文本,10月出版中文本。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47—411页。

即政治体制问题；所谓“平天下”，根本上就是社会民生和风俗改良问题。“齐家”要维护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治国”要维护以君主为“天子”的统治地位；“平天下”要在维护社会财富级差等级基础上，调适有度，以及将社会风尚保持在古礼允许的规范内。儒学的外王之术，在孔孟所处时代，由于礼崩乐坏，贵族奢侈而又非礼，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回到“三代之治”，是进步的。孔子死后，历代儒士祖其法而泥其古，则有点不识时务。特别是到了千年变局的近代社会，再不因时更张，那就是倒退了。

康有为的高明，就在于看到了这一点。维新派在儒学之“礼”即政治制度上，有所更张。他们鼓吹民权，并以孔子改制为名，把孔子塑造成改革家，附会西方君主立宪，主张君民共治，怂恿光绪帝“开制度局”以议新政。根本上仍是“中体西用”，维护君主地位。无论在学理上、操作上，远逊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体系，更遑论“五权宪法”对儒学礼制的近代化改造了。

在民族问题上，康梁一再吹倡满汉矛盾已经缓和，反对革命排满，并同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展开大论战。尽管梁启超也搬运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但不敢如同孙中山那样区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号召用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尤其不敢实行民族革命以创建五族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新国家^[1]。

在民生问题上，康梁反对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认为土地国有论是煽动流氓、乞丐的工具，而且在政治上、财政上仅靠地租收入，不足以供国家财政支出。他早年虽曾与孙中山讨论过土地问题，但最终没有能形成像孙中山那样丰富的有关民生问题的系统理论，更不要说“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了。

经此比较，就可明白，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确实比之前人和同时代思想家高出许多，是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孙中山作为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是无可疑义的。著名历史学家杨国强先生，在为拙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所作的序言里，有如下

[1] 关于梁启超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笔者在拙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中有所评议，见该书第341—343页。

一段话，深得我心。他写道：

“近代中国以古今中西之争亘贯百年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产生过许多出众的思想和议论。但据我私见，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则只有两个：一个是五四前八十年里的三民主义，一个是五四后三十年里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当然超越了三民主义。然而同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义仍然有它耐读耐想的地方。”

笔者本人曾对广州一位研究孙中山的专家说过：“就孙中山的思想和他的革命实践来说，无论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就是因为他是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的第一人。如果没有三民主义理论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深刻影响，显示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不再以原生态出现，而是以近现代政治、社会理论体系的形态成为发展趋向，那么，中华文化真有可能僵持在儒学情结里，不能回应时代变局的需要了。孙中山是第一人，后来者踵武其后而有所超越。中华文化必将生生不息，光跃于世界。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黄亚平）

历史回眸

——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再审视

谢俊美

[内容提要]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三大政策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产物,既有复杂的国际背景,更有国共两党革命斗争的需要等诸多因素。它的实行促成了国民革命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由于国共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政党,秉持主义不同,致使三大政策最终未能完全实行。

[关键词]

联俄 容共 扶助农工 国民革命

“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下简称“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晚年革命生涯中最富重大历史意义的部分,三大政策不仅对当时的中国政党政治,而且对此后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均产生过重大影响。数十年来,不少中外学者曾对三大政策,尤其是“联俄”、“容共”进行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本文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孙中山本人的有关言论、著作及时人的有关记载,就三大政策提出的背景、实行情况以及孙中山去世后这一政策的演变再作探讨。

一、“联俄”既是列宁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产物,也是孙中山反思革命屡遭挫折、对苏俄革命经验的借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最为激烈的时期。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介入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等是推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和动因。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到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围攻,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中。当时苏俄政权处于“岌岌可危的孤立状态”。为了打破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鉴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处于低潮,列宁和他领导的共产国际希望通过支持亚洲各民族解放运动,予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以打击。十月革命前,列宁曾与孙中山彼此致意,十月革命后也与孙中山偶有书信联络。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直予以关注,知“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领袖”。^[1] 1919至1920年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侵略中国的种种特权。苏俄政府的宣言,给了中国人民以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将苏俄视为朋友。孙中山说:“俄国与中国今为对等之国家,彼对于不平等条约有共同之目的,成为中国之友邦也”。有一次,孙中山在回答国民党部分干部有关“联俄”一事说:“此次俄人与我联络,……乃俄国自动也”。^[2]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标志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初步确立,并直接促成了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宣言表示苏俄完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再次确认1920年9月苏俄对华宣言原则,准备放弃帝俄时代对华的一切条约及强行夺取的权利;中东铁路由中俄协商共管,苏俄无意使蒙古脱离中国,为了防止白俄,俄军不必立时撤退。但宣言中,越飞为了迎合孙中山,又同意“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3] 这些都是孙中山所欢迎的。宣言中的这一措辞实际上“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义”。对于宣言的内容,中共事先并不知情,待看到了这些内容,亦只是将其看作是一个具有外交辞令的文件,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它竟成了国民党

[1]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2]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抨击共产党密函》(1923年12月3日),黄彦编注:《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反共分共的依据,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祸害”^[1]。

如果说苏俄希望通过对孙中山以及亚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来摆脱岌岌可危的孤立处境的话,那么,孙中山当时也迫切需要苏俄的支持和援助。孙中山曾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十多年过去了,“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这都是“由于革命没有成功”。^[2]“军阀、官僚、政客朋比为奸,播弄政潮,无时或已,以致内乱频仍,政变迭起,国几不国,行将见吾党艰难缔造之功,为之断丧殆尽”。^[3]在近代政局的变动中,孙中山始终是一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对他手拟的《实业计划》、《建国大纲》,尤其是有关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西方列强的资金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表示冷淡。华盛顿会议,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倒是苏俄政府邀请他派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国内与四周政敌所进行的军事、非军事斗争,也迭遭挫折,他曾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和支持,但列强总是支持他的政敌。孙中山“设想到将来如能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动辄遭受挫折”。^[4]“联俄”可以使中国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5]当时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几乎失去了一切”,而国民党内背弃他的人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49人联名通电要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和刺激更是不小。可见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提出,固然有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时势所逼而成”。^[6]

孙中山的“联俄”政策除了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外,还包括“师俄”,借鉴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反思和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重组革命力量。他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关键在于有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有一支党所掌握指挥的军队,“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

[1]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95页。

[2]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25—26页。

[3] 《改造中国国民党宣言》,《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52页。

[4]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88—191页。

[5]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88—191页。

[6]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88—191页。

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1]“其革命主义之所以能彻底,及其党之组织与纪律,与其为国民利益而奋斗之方策,必多真知灼见”,皆为中国所“借鉴”。^[2]“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此事“可为我们模范”。^[3]他检讨了国民党当时的情况,承认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党务日渐退步”。^[4]指出“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太不齐”,“热心党务,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人固然不少,但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的,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5]他说:“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苏俄)”,“要取法俄国注重党的纪律”。“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孙中山特地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组织训练员,帮他培训国民党的干部。

在总结过去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孙中山先于1922年9月4日,在沪召集国民党部分高级干部会议,解释他“联俄”以及“容共”的新政策,获得一致的赞成。继而于1923年10月在广州召开为期七天的国民党恳亲大会,“商讨党务兴革”,决定“以俄为师”^[6],着手改组国民党。“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此次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来改造国家”。^[7]会后组成了由他委派的包括胡汉民、邓泽如、林森、汪精卫,新加入国民党的李大钊,以及鲍罗廷等人在内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的

[1]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48—50页。

[2] 孙中山:《复赵世炎等说明国民党改组要义并望党员身体力行函》(1924年2月6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67页。

[3]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98页。

[4] 孙中山:《对广州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代表的演说》(1923年10月16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33页。

[5]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25—26页。

[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3年七至十二册,第519—520页。

[7]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的开会词》(1924年1月20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89页。

改组事宜。^[1]

孙中山在借鉴苏俄革命成功经验中,发现国民党宣传工作很不够。“因为国内大多数人民不明白民国的道理,不了解本党的主义,……所以,本党在中国革命,从前的破坏成功,现在的建设不能成功”。今后要重视革命理论的宣传,宣传“本党之主义,使世人都明白本党之主义,来倾向本党”。认为“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2]为此,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专门设立宣传部,负责对党内外革命宣传。

孙中山主张“联俄”,主要是想通过苏俄的援助,借鉴苏俄以党治国、以党领军的成功经验,来实现他的革命理想,而并不是要在中国移植苏俄的共产主义制度。他一再向苏俄声明“反对对华宣传和移植共产主义”的主张。^[3]1924年2月,清华大学学生施滉访问孙中山,问孙中山,“联俄”是否意味着中国推行“俄国的主义”,孙中山断然加以否决,他说:“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主义”。^[4]孙中山对苏俄共产主义制度的断然决绝态度,客观上为日后国民党右派反苏、反共提供了口实。

“联俄”政策确立后,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军官学校,苏俄政府不仅提供了枪支弹药和经费,而且还派来了许多军事顾问和教官。其中有不少人还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如鲍罗廷先后担任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位高权重;加仑将军任高级军事顾问,参与东征和北伐的军事谋划。此外,还有人担任外交顾问、参谋团主任、航空局局长、交通总监、舰队总监、兵工厂顾问等,他们均为国民革命作出了贡献。苏俄对国民党的这些支持和帮助,对国民党的振兴以及国民革命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5]

[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3年七至十二册,第532页。

[2]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26—32页。

[3]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458—459页。

[4] 引自林友华著:《林森评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5]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89页。

二、“容共”、国共合作既源于孙中山“唯我独革”、“一党专政”的思想和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是中共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

“容共”始于国民党改组前,与“联俄”相连,这一政策的制订与孙中山“唯我独革”、“一党专政”的思想,以及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关。

1922年5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处境极为孤立。8月中旬,孙中山回到上海,当时“只有中共对他表示好感”。中共表示要与孙中山合作,公开谴责陈炯明的叛变行为,并处分了支持陈炯明的中共广东地区的负责人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等人,“这些使孙中山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1]随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中共为什么要同意与孙中山合作?这与中共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认识有关。中共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既然反帝是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内的所有各政党团体的共同要求,那么实现国共合作完全是可能的。国民革命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虽有许多“毛病”,但是环顾全国,除了国民党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可以联络。所以,从中共成立初期,就“表示将支持孙中山的民主的民族革命”,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通过支持国民党,可以使国民党进一步革命化,以期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2]

孙中山之所以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除了现实的困境外,还与他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看法分不开。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并非俄国首创,中国早已有之。“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古代所

[1]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81—182、218页。

[2]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63、218页。

遗留之小理想者哉!”^[1]“至于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后为英国戈登所破坏,故今日无从考证”。^[2]

孙中山深信他的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家”的“一个最完美的主义”^[3],认为三民主义包括了共产主义。“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4]，“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5]。认为“俄国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么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是最恰当的了”。又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一个部分。”^[6]为了消除国民党内部分干部对“容共”的疑虑和对国共合作的反对,孙中山还进一步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

孙中山从俄国革命的成动、俄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的表现,对共产党抱有好感,他说俄国之所以能抵抗强敌,全靠俄国全体人民和共产党员之奋斗。“俄国当革命之时,国内有许多党并立,如社会民主党、民主革命党等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产党。”^[8]

孙中山认为中共并非苏俄的傀儡和工具,他们加入国民党,“欲打破民国之现状”,“共产派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他们的加入,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之内无新旧分子之别”。^[9]因此,我

[1] 孙中山:《在广州与日本记者松岛宗卫的谈话》(1924年2月),《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78页。

[2] 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年1月21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12—113页。

[3]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30页。

[4]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抨击中国共产党密函》(1923年12月3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56页。

[5] 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年1月21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11、113页。

[6]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41页。

[7] 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年1月21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11、113页。

[8]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48页。

[9] 孙中山:《就国民党改组原因致海内外同志书》(1924年3月),《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87页。

们应欢迎和赞同共产党员的加入。

孙中山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他的口号是“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帜下来”,反对在国民党之外有他党存在。“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他对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事,……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革命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外面”。^[1]

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还含有将共产党纳入和消融于国民党内的意思,他对于刚刚成立的共产党还心存轻视,认为共产党员“毫无凭籍”,“不值得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认为共产党还不配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只是因为有求于苏俄,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想以此来约束和控制共产党。^[2]孙中山的这些言论表明他对“容共”、国共合作还有所保留,对国民党内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右翼势力具有不小的影响。

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共产国际的推动有关。国共合作最早是由列宁提出的。列宁的这一主张源自于他的这一思想: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可以与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在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列宁向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询问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两张均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列宁指出:“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3]

列宁指出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的看法是带有预见性的。从国民党方面来看,相当部分的国民党老党员和海外党员,担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担任部分领导职务后,将会使国

[1]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88页。

[2] 孙中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的谈话》(1924年10月),转引自杨奎松:《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152页。

民党的领导权落入共产党手中,因而表示反对。国民党“一大”后,因一部分老国民党员失势落选,这种反对声浪变得更加高涨。还在1923年12月,国民党酝酿改组前夕,邓泽如等十一人就密函孙中山,抨击共产党,说此次共党“加入吾党,乃有组织有系统的加入,……决定利用我党之方法,其大前提则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陈独秀实欲籍俄人之力,怂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被共产党所指挥”,“奸人谋毁吾党,其计甚毒,不可不防”。^[1]而国民党改组半年后,当年积极主张“容共”的张继便和邓泽如、谢持等人,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建立党团组织的作法,称其是“党内有党”,要求加以取缔。^[2]不少国民党高级干部担心实行了国共合作,将会使国民党陷于更多的政敌的反对和包围之中;这些对国民党都是非常危险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3]汪精卫也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当时孙中山非常需要许多革命力量来支持和参加国民革命,他既要“联俄”,也要“容共”,深知中共与共产国际的上下级特殊关系,所以,对于党内这些担心和这股反共声音逐一加以劝解和排除,指出中共之加入本党的原因,“在于灼知中国今日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状,非国民革命而无由打破”,“当国民革命之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主义是从,其原有之共产主义固不因之抛弃,而鉴于时事之关系,初不遽求实现,故与本党亦无所冲突。至加入本党之后得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一支部,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故其党员之跨党,与元年(指1912年)以来国内政党党员跨党为风气者异其旨趣,且本党为代国内各阶级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之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加入本党之始,曾以此意陈之”。孙中山指出,若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导致国民党

[1]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抨击中国共产党密函》(1923年12月3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57—59页。

[2] 详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2—80页。

[3]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46页。

“分裂”和有亡党之虞，这“类于杞忧”。至于中共对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施以告诫，俾知对于本党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此不能施以恶意。以此之故而被以‘党团作用’（意指分裂破坏、党内有党——引者）之称，实为过往”。“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此在中国共产党为当然之事”。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所以，国民党内这股反共势力尚不敢放肆猖狂，其“容共”、国共合作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尚能大力开展进行。不过鉴于党内这股反共势力，孙中山迫于压力，还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了国际联络委员会。该会的任务之一，“即在务期了知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之关系”^[1]，成为事实上监视和掌控共产党的机构。为了安抚这股反共势力，孙中山竟然说“国民党系我所创之民国唯一之大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等一派。……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称赞反对国共合作的冯自由、张继等人是国民党“之前辈有力家”、“器局雄伟之政治家”，将反对“联俄”、“容共”、国共合作的张继、冯自由、谢持等视为国民党内的“稳健派”，徐谦、谭平山等为“急进派”，他与汪精卫、胡汉民等是“综合派”；三派“皆为国民党而努力”。他甚而警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若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2]孙中山的这些表态，实际上对反共势力起了鼓舞的作用。在他生前，国民党内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暗流虽涌动不绝；但碍于他的声望，尚不敢肆虐。待到他去世后，西山会议派、蒋介石等就大肆破坏国共合作、公开反苏、反共、镇压工农。

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共实行合作，中共党内同样存在许多“困难”，领导层内分歧严重。有的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混合”而不是“联合”，部分党员担任国民党领导职务，担负指导工作，

[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党内共产派问题之训令》，《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97—201页。

[2] 孙中山：《在广州与日本记者松岛宗卫的谈话》（1924年2月），《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82—183页。

易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产生“争夺地盘与权势”^[1]而引起国民党员的不满。正如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国焘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会说:“这些身家不清不白的人是来干什么的?!是帮闲?!是小偷?!还是抢劫?!至少会被人认为是来挤掉那些老国民党员的地位。这样,名为国共合作,事势的演变,将是国共交恶”。^[2]担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有“融化在国民党内”之虞,极易丧失独立性。“如果共产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指导,……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呢”?!^[3]他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一切通过国民党,主张国共可以组成联合战线。认为国民革命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4]

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二大”,会上通过了可以与所有的民主派和革命团体合作,但拒绝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有关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马林决定共产党员必须全部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8月初,马林从莫斯科来到北京,旋赴上海,再次提出中共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仍遭拒绝。马林坚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根于他对共产党存有偏见和对国民党存有好感。马林认为孙中山不仅可以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而且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错误地认为“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甚至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共的存在不特是没有意义,反会在国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调的破坏者”^[5]。他过高地估计国民党,“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的、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政党,孙中山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民族意识强”,“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什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共产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

[1]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28、220、219、224—225、247页。

[2]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28、220、219、224—225、247页。

[3]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28、220、219、224—225、247页。

[4]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28、220、219、224—225、247页。

[5]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28、220、219、225、247页。

里去学习民族自觉”。认为孙中山根本不会同意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的联合战线。为了安抚反对他主张的人,他还讲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所谓好处。他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1]在马林的高压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于同年8月17日,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勉强通过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同意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同意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可以担任要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标志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独立性,后来中共中央在“三大”上,由陈独秀提议、经会议批准,通过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内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2]此举的原意本来是要表示陈独秀他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安抚一下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人,想不到此举后来却成了国民党右派用来反共的一个借口。

“容共”、国共合作就是在上述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下促成的,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为推动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24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占了3位,17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占了7位,两者合计中共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在国民党“一大”中常委中,中共占了1位(谭平山),8名中央部长,共产党员占了两位(谭平山、林祖涵〈伯渠〉),若加上大权在握的鲍罗廷,中共在国民党中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情况既显示了共产党在领导国民革命中的突出地位,同时这种反客为主的局面也使国民党右派忧心忡忡。

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所幸中共还多少保持几许清醒。国民党

[1]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28、220、224—225、247页。

[2]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28、220、219、225页。

“一大”后,中共中央也赓续召开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应是积极支持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样才能达到推进国民党革命化的目的,有利于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会议强调中共工作的重点主要还是自身的发展。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除了开展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外,还应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1]这些部署为后来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独自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为向农村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借鉴苏俄革命成功经验和中共大力所促成的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反清革命斗争,主要是依靠会党、策动新军和吸收国内青年学生和海外留学生,基本上将工农排除在外。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和护法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不是依靠自己有限的革命力量,就是依偎于军阀之间,仍然把工农大众摆在一边。因为缺少民众的支持,所以迭遭失败。自从与苏俄接触后,孙中山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中看到人心向往、人民的支持对革命成功至关重要。“俄国之所以能抵抗此强敌(指英、美、日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全靠乎全国人民与党员之奋斗”,俄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在反思苏俄成功经验的同时,检讨自己过去的不足。“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下去,吾党终无成功之希望”。^[2]表示今后定要效法苏俄依靠人民。

孙中山深受俄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启发,意识到“人心是立国的大根本”^[3],人民是党的力量的源泉。“吾党本身力量者,就是人民的心力”。“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力量,要用人

[1]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47页。

[2]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48页。

[3]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41页。

民心力奋斗”，“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础，最为足靠”。^[1]工农是人民的主体，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基础，就必须依靠工农大众。中国的工农处于社会最下层，生活最为困苦，国民党要想取得民众的支持，国民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本”，“中国要进步，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不可依赖一人一部分，用孤力去做”，“请全国人民都同心协力去做，那才容易成功”。^[2]

如何来扶助农工呢？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正从事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民工人的特殊阶级，为农民工人而奋斗，亦即农民工人自身而奋斗。孙中山认为扶助农工，首先要大力吸收工人加入国民党。他说：扶助农工就是为了改造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建成一个群众革命先锋组织”。“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3]其次，要感化人群，唤起民众。认为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国家的统一、永久的和平，“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悟和真正的群众性改革外，别无他途可寻”。为了唤起民众，孙中山在改组后，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加强宣传“本党之主义，使世人都明白本党之主义，都来倾向本党”。^[4]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孙中山认为唤起民众，还必须重视青年学生。“我们国民党人从辛亥革命到现在经过了多少困难，……老的老了，奋斗的时代太久了，觉得我们的党也有些衰老了，党要改组，就是要革命党再年轻起来，……青年来加入，来续党的新生命。党没有青年加入，就要中断的”。^[5]

[1]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46—49页。

[2]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76页。

[3] 孙中山：《在上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的谈话》（1922年8月下旬），《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4页。

[4]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论改组国民党及召开“一大”》，第32页。

[5] 孙中山：《在广州与北京大学学生王昆仑的谈话》（1923年1、2月间），《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22页。

孙中山认为要扶助农工,就是要取法现在的苏俄,“从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人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认为仅依靠工人还不够,还必须仿效苏俄的作法,“要工人与农民的合作”。^[1]但是如何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前后并无明确的论断,只是说确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权,增进农民工人的生活为要。孙中山虽从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中看到工农大众对革命成败的重要性,但由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大多来自中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不能代表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利益,孙中山“否定阶级斗争之说,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并无阶级的显明分别”。^[2]因此,他的扶助农工政策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只是在中共的推动下,他的这一政策才变得轰轰烈烈。

孙中山主张“扶助农工”目的虽旨在推动国民革命,但扶助农工本身却有助于社会进步。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全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因此,两党在这点上有相近之处。不过,中共追求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铲除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又是两党的不同之处。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组织工人俱乐部,成立工会,开展反帝反军阀统治斗争,先后发动和组织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以及上海的五卅运动。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共“三大”全会又接受毛泽东的提议,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地主剥削、维护农民权益的斗争。

在中共的大力推动下,全国的工农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1925年5月广东有22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拥有会员20余万人。到北伐前夕,湖南农民协会会员达11万多人,全国农会会员高达980万人。同年5月,

[1] 孙中山:《在广州与清华大学学生施滉等的谈话》(1924年2月9日),《论改组国民党与召开“一大”》,第173页。

[2]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41页。

全国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成立了由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全国的工会有了统一的领导。到北伐前夕,全国加入工会的工人高达280人。^[1]工农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26年3月,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后,全国工农运动随着北伐进军的节节胜利而走向高潮。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也日益嚣张,一年之后,国民党蒋介石终于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国共由合作而走向分裂。

四、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未能完全实行的历史反思

“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自己一手制定的,如果说这三大政策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开始实行,那么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前后大致实行了三年多。国共由愉快的合作开始,最后却以流血而结束,这一结果值得进行历史反思。

先谈“联俄”。孙中山当初提出“联俄”政策是在国内外求援受阻、陈炯明叛变、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先前他在国内企图借助军阀之力,在国外借助列强之力开展斗争活动。他曾派朱和中到德国,马素到美国,廖仲恺到日本,进行外交活动,但均无结果。在实行“联俄”政策后,孙中山对“联俄”也并不专注,始终对英、美“示好”,抱有幻想。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的同月,还发表了另一篇和平宣言,主张在全国未统一前,由直系、奉系、皖系及他所依附的西南军阀划疆自守、裁兵、借款,认为借款最好由英国承担。1923年2月,他出席港督举行的宴会,盼与英国交好。次月,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商用英款开港,并表示愿与港英政府合作。此后又由他的秘书陈友仁宣布他的外交政策,希望能得到英、美的财政援助,用英、美的技术专家致力于建设。^[2]他的这些示好动作,英、美并不领情,英、美一直对他采取敌视的态度,企图搞垮他的政权,这使他大伤脑筋。当时

[1]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34页。

[2]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7页。

孙中山在国际绝少朋友，既然苏俄对他示好，不应加以拒绝，于是遂确定“联俄”。

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后，大批苏俄军事顾问和军官来到广东帮助国民党。孙中山对鲍罗廷更是信用有加，因而引起国民党内一部分干部的不满，对俄人在国民党中央大权在握心存疑虑。“彼所谓助我党者，计不过万余支枪耳，然盘踞吾党最高之党权、政权、军权，所得代价，实过太巨”。^[1]蒋介石、张秋白等一批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访问苏俄后，对苏俄的印象并不好，认为苏俄决非中国所依靠的国家。认为苏俄并没有平等对待中国。1919至1920年加拉罕曾代表苏俄政府两次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侵略中国的种种特权，但数年过去了，苏俄没有兑现，这使中国人非常失望。非但如此，与沙俄时代相比，苏俄有过之而无不及，“中东铁路之不平等，甚于俄皇之时”，并以日本对朝鲜方式强占中国外蒙古。一方面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又拒绝从外蒙古撤军，也不宣布废除《俄蒙密约》，这些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鲍罗廷作为孙中山聘请的顾问，以“客卿专政”，位居于国民党高层，党政大权独揽，专横跋扈，早已引起国民党内一部分元老的妒忌。他常以老殖民主义口吻教训国民党人。有一次他同谢持、张继谈话，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立”之类的话，引起元老们的不满。廖仲恺被刺后，他认为胡汉民嫌疑最大，在未有证据的情况下，竟然要派特委去拿办审讯胡氏，后遭特委拒绝，逮审胡氏才未成为事实。后来仍将胡氏逐出广州，派往苏俄。^[2]鲍罗廷任事专横和国民党元老们对他的不满，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联俄”的基础，西山会议派公开弹劾他，而他所信赖和依靠的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3]待到1927年蒋介石公开反共，宁汉合流，他终被解聘。8月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国民党认为系苏俄指示，下令驱逐所有在华的苏俄顾问。至此，孙中山制订的“联俄”政策宣告结束。

[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一至六册，第336页。

[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5年七至十二册，第781页。

[3]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340页。

再说“容共”。“容共”政策是由孙中山一手排除党内反对势力，“独断”^[1]制订的。这一政策的制订，除了前面所述的原因外，亦与“联俄”分不开。因“联俄”而不能不“容共”。“容共”不成，根于国共属于两个性质不同的政党。不论孙中山如何解释他的三民主义，但共产主义运动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根本是两回事。国共两党的宗旨不同，信仰和价值观的取向也各异，一个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开展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要实行三民主义，否认中国存在阶级，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国共两党合作期间的矛盾是非、冲突隔阂其源盖出于此。国民党历来成份复杂，有左右派之分，虽说同属一党，但信仰的主义不尽相同。吴稚晖是一个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却一直允许他自由活动。1923年，他曾慎重其事地问陈独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约在什么时候可以成功？！”陈氏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吴氏听了这句话“惊骇地说：那么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陈氏向吴氏解释说：“所谓中共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会寿终正寝。”吴氏对陈氏的解释非常“不满”。^[2]吴氏对共产党的疑虑和不满多少反映和代表了国民党内一部分干部的心理，反共的国民党员除胡汉民、戴季陶外，尚有冯自由、马素、邓泽如、林直勉、谢持、林森、邹鲁、张继等一批人。前曾提到，早在国民党酝酿改组时，冯、马、邓等人就对“容共”表示反对，不许共产党跨党，亦不许国民党加入中共，国民党“一大”半年后，张继与谢持、邓泽如等借口跨党问题弹劾共产党，指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孙中山逝世后四个月，戴季陶就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阐述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革命；指责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搞破坏活动。戴氏的这两本小册子实开全面反共的先声，为稍后国民党实行全面反共制造舆论。

1925年11月，由林森领衔，谢持、张继、邹鲁、居正、石青阳、冯

[1]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383页。

[2] 张国焘著：《张国焘回忆录》（上），第250页。

自由、石瑛、覃振、张知本、茅祖权、沈玄庐等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干部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顾问鲍罗廷解除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等七个提案，稍后又在上海设立中央，掀起了一股防共、逐共的浊浪。

在中共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批判，并对参加者分别给予开除党籍、警告、严重警告等处分。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能阻止这股反共的势力的发展。蒋介石有感于革命大权旁落，为了夺取国民政府军事领导指挥权，先后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即以行动镇压国民党中的中共和苏俄势力，将防共、反共从会议弹劾扩大到军事、党务等各个实际部门。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采取退让政策，致使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活动步步得逞。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工农运动高涨，中共力量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27年4月，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57,900多人。对于共产党的迅速崛起和在国民党内反客为主的形势，国民党内反共势力日夕不安。他们惊呼再此下去，“恐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1]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公开屠杀共产党人。7月，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反共，中共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汪氏下令讨伐，和平分共变成武力反共。至此，国民党完全抛弃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继续采取消灭共产党的方针，对中共进行围追堵杀长达22年之久，直至1949年被中共领导的革命击败为止。

关于“扶助农工”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前，国民党虽也开展过工人运动，但规模和影响均不及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一大”后的农工运动“大体由共产党主导”。^[2]但由于国共两党对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分析判断不同，因而在扶助农工的政策上严重分歧，这就严重限制了这一政策的实施。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否认中

[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一至六册，第337页。

[2]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第134、139、140页。

国有阶级差别，三民主义的土地政策主张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方法，采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办法是所有私人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照价征税，亦可照价收买。国家可以将公有之地和照价收买之地，配售给农民，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但中共的土地政策则是主张通过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资产直接分配给农民和工人。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中规定“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但实际做法并未如此。对农村，虽提出消灭地主剥制，但实际上推行的是减租减息。国共合作后，又于1925年提出过“耕地农有”口号，但实际作法仍是减租减息，次年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则提出“二五减租”。可见两党在土地政策上并不相同。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根据共产国际要求在北伐时期推动土地革命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展土地革命。由于两湖地区国民党左派“势盛”。^[1]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允许佃农有永久使用土地权，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于是湘、鄂、赣地区开展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土地革命引起国民党内，尤其是北伐军人的恐慌，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来自农村地主、商人家庭。这一土地政策，直到蒋介石在南京、上海等地镇压共产党，武汉国民政府迫于两湖地区军人和富农的压力，才有所收缩。由于陈独秀的“消极退让”，国民党对农民协会的活动采取严加限止，直至取缔。湘、鄂、赣三省被屠杀的工农群众多达万人以上。^[2]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随着国民党的反共而成为历史。

一般史书都认为，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所以未能完全实行，归因于孙中山的去世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的消极退让错误。其实，这两点均未说到要害处。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国共分别属于两个性质不同的政党，各自秉持的主义不同所致。此外，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实用主义，“为在策略上迎合中共和苏俄所要建立的统一战线”的需要。他虽实行三大政

[1]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第134、140页。

[2]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第134、140页。

策,但“并未改变其素所抱持的三民主义”。^[1]国民党的立场并未真正站到工农大众一边,其所代表和维护的始终是资本家、地主等有产阶级的利益,这才是“三大政策”不能完全实行的症结所在。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宋时娟)

[1] 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第139、140页。

另眼看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关系

邵铭煌

[内容提要]

宋庆龄与蒋介石均为孙中山倚为左右的亲密同志，又有密切的姻亲关系。孙中山在世时，蒋宋维持良好的公谊与私情；孙中山去世后，两人渐行渐远，最后竟演变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世人徒呼奈何！对于蒋宋关系的研究，大陆方面成果可观，惟多偏重对立面的论述。台湾方面则长期略而不论，作品有限，有待急起直追。本文主要根据台湾保存档案，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收藏，试图从另一种角度探讨孙宋蒋三人在民国史上的关系，并从影像中探索新风貌。特别珍贵者，从一些纪录片中捕捉到宋庆龄与蒋介石夫妇三人一同出现的形影，即使瞬间数秒，历史意义尽在不言中，弥补文献记载不足之余，亦可说明政治立场歧异，并不致完全累及亲情。蒋介石与宋庆龄政见各有坚持，惟都以孙中山为中心。1949年12月以后，二人分处对峙局面，终生不通闻问。关于他们言行的研究，应扩大视野，跳脱以往偏重矛盾面的探究。另外，蒋介石日记中可能还有关于与宋庆龄的记事，值得发掘。寄望两岸学者一起努力。

[关键词]

孙中山 宋庆龄 蒋介石

1952年2月16日，蒋介石批阅公文，得知秘书长王世杰新增特别费十二万元示惠，甚不以为然；对于王秘书长除领特支费外，另自开销私人日用经费几加一倍的作法，认为私心自用、败坏风气，殊表痛心，致午休不能安眠，夜间仍失眠。不过当天晚上在宴客后，他还是观看一部影片“菲律宾游击战”，甚受感动。廿三时就寝，但直到凌晨一点才

昏沉睡去。那一夜,蒋介石梦见孙中山,特在日记中写下梦境:“久不梦见总理,今晨未醒之前,忽梦总理对余额上接吻。其形状亲爱逾昔,但其所躬居之屋,湫陋不洁。彼指隔室曰:夫人在世有病,汝愿见否?余答曰:不见○,即醒。”^[1]

蒋介石身经百战,忧劳国事,日记中常见关于梦境的记载。他相信梦可能隐含兆示的现实意义。在他心目中,孙总理志气高尚,生活简朴。总理明示他去探望海峡对岸的夫人宋庆龄之病,他却拂逆总理旨意。回到现实世界,宋庆龄身处大陆。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朝夕研讨反攻大陆之道。两人政治立场分明,遑言相见?但其中也透露出蒋对宋的宿怨,依然未能释怀。纵使孙中山冥冥之中有意调和,也只好知难而退。蒋宋之间,矛盾重重。看过蒋日记者,都了解他对人的怨恨情绪,常会在日记中表露无遗。就目前所见,蒋曾痛责宋为“无耻败类”,是在1956年10月29日:“朝课后,记事,召集希圣、少谷等研讨共匪纪念总理诞辰之把戏,加以非正式痛斥,并加以反击之宣传方针。最堪痛愤的,乃是无耻败类的‘宋庆龄’为虎作伥也。”^[2]为了纪念孙总理冥诞事,蒋竟痛愤到直呼“宋庆龄”其名,这是异常的表现。

蒋宋既为孙中山倚为左右的亲密同志,又有密切的姻亲关系,最后却演变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孙中山在天之灵,徒呼奈何!对于他们关系的研究,大陆方面成果可观,惟多偏重对立面的论述。台湾方面则长期忽略,作品有限,尚待急起直追。本文主要根据台湾保存有关档案,特别是国民党党史馆的收藏,试图从另一种角度探讨孙宋蒋三人在民国史上的关系,并从影像中探索新风貌。

孙宋蒋的悲欢离合

孙中山倡导革命救国十余年后,1908年,蒋介石二次赴日本,如愿进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即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运动。同盟会会员黄郛,以留日军事学生

[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2月1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6年10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组成“丈夫团”秘密团体，取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蒋介石也是团员之一。1910年，陈其美又为他引见孙总理，被许为不可多得的人才。^[1]

民国成立以后，蒋介石与孙中山关系逐步增长。孙中山在为共和国奋斗过程中，需要各色豪杰之襄助。蒋介石一路追随，不时展现勇毅气概与军事才略，渐受到孙中山赏识和器重。其自述说：自十九岁加入同盟会，然与总理个别谈话之始，乃在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在此以前，总理未尝单独召见，有所垂询，而他也未曾独求见于总理，惟以普通党员之一人自待而已。蒋介石素怀远大抱负，希冀有一番非凡作为，但血气方刚，心浮暴躁，常与长官同僚相处不睦，一不得志便挂冠求去。孙中山爱其才，循循善诱。蒋介石曾坦称：“余之言行，皆中师之所教也。”

1912年1月，蒋介石自认为做了一件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采取制裁行动，委人除掉老同盟会员、光复军司令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陶氏在同盟会革命期间因故不满，攻讦孙中山侵吞华侨捐款，假革命私肥；辛亥革命后，又暗助他人与陈其美争夺沪军都督职。蒋介石自信此举是出于为革命为国民党之大义，毫无求功、求知之意图。时任大总统的孙中山阅报始知陶成章遇刺消息，次日电令沪军都督陈其美“严速究缉”。蒋介石遂避祸日本。事隔多年之后，他还在日记中提起往事，谓：“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孙中山是否察知此一内情，则无由证实。

袁世凯继任民国大总统之后，违法失政。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讨伐，不敌失败。孙中山及参与举事的国民党干部多被通缉，纷纷避走海外。蒋介石奉命留守上海，注意形势，掌握契机。孙中山亡走日本后，重整旗鼓，谋划“三次革命”，继续讨伐袁世凯。经近一年筹备，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尚在筹组之初，蒋介石率先于1913年10月在上海由张静江介绍，宣誓

[1] 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

加入,服从孙中山领导,为国内最早入党者。

随着政治情势演变,蒋介石和孙中山关系在1914和1915两年间有明显进展,二人在日本接触会面的次数增多。以1914年为例,5月底蒋介石奉命在沪上谋起讨袁,不意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侦悉,遭袁政府通缉。蒋应陈其美电召,早一步东渡日本。居留日本约两个月,会见孙中山至少五次,有单独拜会,有与同志一起会见,时间从二十五分钟到一小时半,应是商议策划东北讨袁军事。

蒋介石衔命赴东北策划讨袁军事期间,欧战爆发。他眼见俄国在中东路绵密动员,曾上书孙中山陈述欧战趋势及倒袁计划。关于倒袁工作的进行,他主张“以统一各省革命计划,确定全盘整个之方案,集中一点,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是为今日第一之急务也”。回到日本后,会见孙中山次数更加频繁,当与讨论此一计划有关。从日本外务省档案来看,蒋介石自8月16日至30日,半个月中有十二天与孙中山见面,一天会面两三次的有五天,还有一天连见四次者。经过密集商讨,他奉派回上海筹设中华革命军总部。其军事才略,在此次会谈中益见发挥。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野心明朗化,孙中山讨袁行动亦趋积极。蒋介石数次往来日本、上海。据数据显示,从3月至11月间,共访晤孙中山十九次,平均一个月会面两次。其中11月之行,与运动12月初上海肇和舰起义有关。

当此之际,宋庆龄也在孙中山身边,协助秘书工作,进而谱出一段恋情。他们不顾同志与宋家父母反对,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结婚。宋庆龄看似浪漫举止,为宋氏家族蒙上一层淡淡哀愁。唯一让宋庆龄感到温暖的,是还远在美国求学的小妹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站在反对一方,反而同情二姊私奔的勇气。这时两姐妹关系显得分外亲密。然而,事过境迁,十二年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宋家都表赞成,独宋庆龄一人因不能容忍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志的行径而持反对立场。

孙宋蒋三人会面始于何时,似一直不为人所注意。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的监视记录,以1915年11月3日在东京孙中山寓所最为可能。是日记载:“下午三时七分,蒋介石来访,三时十五分离

去。”^[1]时孙宋租屋而居，还是新婚燕尔，蒋氏造访，三人会面，喜气洋溢。孙宋热恋，惊动一时。蒋躬逢其盛。其日后追求宋美龄，不无起而效尤之思。后来，他和宋庆龄在孙中山左右，同心协力辅佐孙中山讨袁、护法、北伐等革命运动。蒋介石往来广东、福建、上海之间，经常造访上海莫利爱路孙中山寓所，与宋庆龄晤面机会增多。如1922年6月，陈炯明之变，蒋奉命赴广州护卫孙中山，同返上海后，在孙寓工作一段时间。12月初，宋子文在孙寓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蒋和宋美龄都参加，首次谋面，暗结日后姻缘。

孙宋蒋最后一次会面，在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等人邀请，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由大元帅府乘永丰舰北上，宋庆龄随行。道经黄埔军校，蒋介石校长登舰迎接。孙中山巡视军校一周，检阅学生演习，赞勉有加。蒋校长设宴饯行。宴毕，傍晚6时，离开黄埔，登舰航向香港。在黄埔军校时，孙中山有感而发，与蒋校长有一晤谈。兹摘录如下：

孙先生：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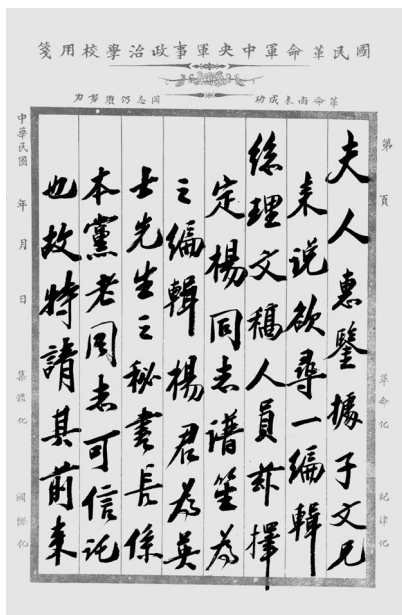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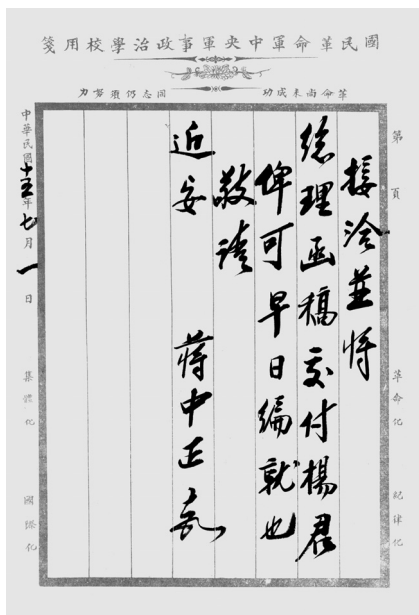
蒋校长：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孙先生：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2]

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巡礼黄埔军校，也是与蒋校长最后一次谈话，宋庆龄在侧，当亦耳闻。孙言谈中表达对生死问题的坦然豁达，充满对建校建军的成就感，更透露出后继有人的安慰。回顾6月16日，

[1] 俞辛醇、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472页。

[2]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出版1985年11月第三次增订版，第1256—1257页。



军校开学典礼，孙宋蒋同台校阅学生军，不过半年光景。如今一别，三人聚首，终成绝响。所幸，黄埔军校师生不负孙中山期望，在日后国民革命过程中，秉持三民主义，发挥革命精神与力量，为国家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惟当北伐告成，蒋介石偕夫人率同各集团军司令趋谒西山碧云寺，致祭孙总理之灵，宋庆龄置身国外，未能一同告慰，实一大憾事。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与宋庆龄仍维持两年的和善关系。姑举1926年7月1日蒋致宋的一封信为例说明。信谓：“夫人惠鉴：据子文兄来说，欲寻一编辑总理文稿人员，兹择定杨同志谱笙为之编辑。杨君为英士先生之秘书长，系本党老同志，可信托也。故特请其前来接洽，并将总理函稿交付杨君，可早日编就也。”^[1]蒋闻获宋要编辑孙总理文稿，即代为物色适当人选，可见其贴心。惟从事后他对宋美龄爱慕、追求观察，也不无讨好意味。

蒋宋关系交恶，在1927年4月。斯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清党”决议，蒋介石奉命执行，造成党内分裂，国共之间结下不解怨仇。共产党自此严厉批判蒋介石为“反革命

[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分子”。宋庆龄、何香凝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批蒋介石违背孙总理遗志，并呼吁国共继续合作。对于宋庆龄的声讨言行，蒋不保持缄默，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长信，回复宋庆龄。这封信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信笺书写，不曾公开过，特录出以为证：

夫人大鉴：

中正此次赴沪，未克访晤，于心欷然不安者久之。近由南京得夫人铅印之传单，其文句污蔑本党与政府实非夫人态度之所应出也。中正以为污蔑本党与政府，乃非污蔑现在当局，实为污蔑本党之总理，未知夫人思及之否？观夫人之传单，不仅污蔑总理，而且污蔑夫人之本身，请夫人再一详察。

此传单之文句与语意所指为“反革命国民党领袖之欺叛性格，从未有如今日之无耻暴露于世界”。是谁为欺叛？谁为无耻？“叛徒们既背叛了国民革命，便免不了堕落成帝国主义的工具。”此叛徒们为谁？背叛国民革命者为谁？堕落成帝国主义的工具又是谁？今中正于此不能不以党员之资格为夫人答之。反对收回国权者是为卖国，即为国民革命之叛徒。受苏俄帝国主义之欺骗而自暴弃其国家之人格者，即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反对国民党、国民革命者，即为欺叛之徒。其他吾不忍多言矣。请夫人再深思之。

吾知此电文必非夫人所拟，亦非夫人本意之所出。然而以夫人之名义而复自承认其电文是夫人，在总理所产生本党之历史而竟有此事，是诚不仅为夫人个人惜，抑且为吾总理哭也。中正知而不言，则不仅不能对总理在天之灵，抑且无以对本党与党员诸同志，并无以对我革命之良心。请夫人详审之。知我，罪我，不尽欲言。^[1]

二人都以孙中山为后盾，隔空激烈交锋，势同水火。孙中山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建国大纲》赠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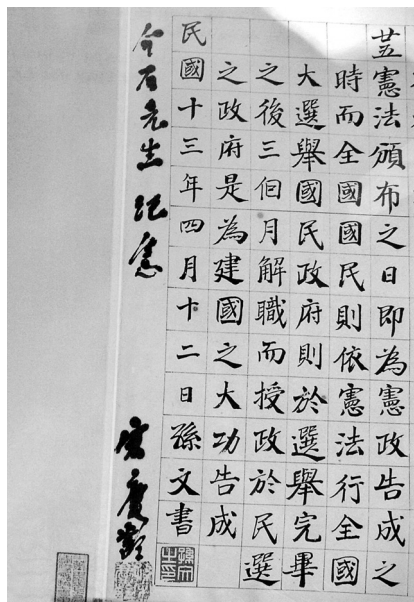
1924年1月20日起，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1]《蒋介石致孙夫人宋庆龄函》，据推断，应书于1927年8月1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档：135/12。

告党务改组工作完成,国共合作正式展开,共策北伐统一大业。是日上午,孙中山以总理身份主持开幕典礼,讲述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下午大会中,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孙中山先指定林森说明,继又亲作详细说明。略谓:本次大会目的有二:一为改组国民党;二为建设国家。而建设国家,尚有两个应研究的问题:一、立即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政府;二、先将《建国大纲》表决后,四出宣传,使人民了解其内容,结合团体,要求政府实现。大会照案通过孙中山亲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为建设国家的规划方案。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两天,1月18日,孙中山手书一份《建国大纲》,送给“科儿玩索”。4月2日,另书写一份,赠送“贤妻庆龄玩索”。^[1]4月12日,又书写一份,用来宣传推广,宋庆龄特在卷尾题写跋语,谓:“先生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实为施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基础而图国家长治久安之至道也。兹特将先生亲笔稿付石印,以供先覩之快,并作民国开创之宝典焉。”^[2]孙科版的《建国大纲》,早年曾经在台北复制过多份流传,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亦保存孙治强妻林伦可女士赠送的一册。

最特殊的一件,是由台北“国史馆”保存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卷轴(52×303公分),不仅有蒋介石书题:“总理手书建国大纲”,卷末还有宋庆龄亲题:“介石先生纪念”字样。观其内容,当为4月12日的推广版本,只是不见宋庆龄的书跋。蒋介石生前将它交给蒋经国。蒋经国再送给“故宫博物院”,最后转存“国史馆”。



[1] 余齐昭著:《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44—245页。

[2]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4月版,(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宋庆龄将孙中山墨宝赠送蒋介石，自有所期勉，两人之和善关系不在话下。惟究竟何时赠送？值得细求考证。据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记载，1926年6月20日上午，蒋介石在黄埔“看建国大纲”，是否即为宋庆龄赠送者？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广州的革命政府历经东征、平乱，已奠定基础。1926年1月1日起，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展革命新局。宋庆龄于是月7日抵达广东参加。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及《继续北伐完成革命》等要案。16日，选举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蒋介石与宋庆龄均当选为执行委员，蒋且为九位中央常务委员之一。次日，黄埔军校举行第三期学生毕业典礼，蒋校长致词约一小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校党代表汪兆铭及全国大会代表俱出席观礼，女宾则有宋庆龄与其妹美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汪夫人陈璧君等人。29日下午，宋庆龄造访蒋校长。^[1]目前没有文献说明两人会面的内情，但可以推测，宋眼见蒋已进入党内权力核心，又统领校军，很有可能以《建国大纲》作为赠礼，期许他承担建国重任，实现总理志业。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非常行动，化解一场他认为欲去他而后快的阴谋，随后展开反制党内敌对势力的措施。蒋之声势水涨船高，排除一切阻力，迈向北伐统一的目标。6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行出师北伐案》，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颁布北伐部队动员令。6日，蒋受中央全体会议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9日，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两年之间，即扫除军阀，完成国家统一工作。

惟蒋介石日记之公开，终于为此一件赠礼揭开谜底。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11日下午，蒋回到上海，即进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爱庐”，与夫人宋美龄安置家具，并在三楼辟祈祷室，默谢上帝。^[2]2月14日上午11时，蒋访孙夫人。宋庆龄送他“总理手写之建国大纲，甚

[1] 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

[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6年2月1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珍贵也。”^[1]宋庆龄选在抗战胜利、国家复元时刻赠送，意义格外重大。蒋非常珍惜，所以装裱成卷轴，传之子孙。由此推究，1926年北伐前夕，他观看的《建国大纲》，应为刊印版本。

庐山有情

蒋介石性喜亲近大自然，享受风光景色。蒋介石钟爱江西庐山风景，自1926年至1948年，除抗战八年之外，蒋介石共十八次往游江西庐山，留下不少他与夫人宋美龄的身影。庐山别墅成群，最美的老房子首推“美庐”，为欧式风格建筑。这幢别墅并不是宋家购赠，而是1903年由英国兰诺兹勋爵建造，1922年转让给巴莉女士。巴莉与宋美龄私人感情深笃，1933年夏将别墅让与蒋介石夫妇居住，继于次年赠送宋美龄。

1947年10月，蒋介石偕夫人到庐山共度六十岁生日，尝谓：“庐山秋景，令人留恋无穷，未知何日能卸除职务，优游终老于此耶。”^[2]次年8月10日至18日，避暑庐山，在庭园中一块卧石上亲题“美庐”，勒石为念，以志深情。8月14日日记载：“朝课后，游览庭园，独在背波（坡）新台上朝餐，记事，批阅公文，近午在园荫中草地上假眠，闲观石刊美庐，纪念也。”^[3]翌日又载：“朝课后，游览庭园，随时指示石刊‘美庐’，甚感兴趣。”^[4]随侍的中文秘书周宏涛说：“这是蒋公夫妇在大陆沦陷前，最后一次勉强带着轻松心情到牯岭避暑。”^[5]蒋介石夫妇于18



日下山，次日，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厉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及外币。如今，岭上的“美庐”刻石犹在，只是由于政治因素而遭破坏的痕迹依稀可见。

[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6年2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7年11月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8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8年8月1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5]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9月版，第53页。

民国以来，庐山成为政治名山，似始于1926年冬。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克南昌，次日，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迁至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这时，蒋想约宋美龄到庐山一游，并透过宋子文与宋庆龄兄妹邀请，可惜未能如愿。蒋介石自1922年12月初，在上海莫利爱路孙中山寓所一场社区基督教晚会，与宋美龄首次谋面结缘，已经5年。虽然蒋后来说：“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1]但仅止于心理上的爱慕。蒋实际展开追求宋美龄行动，是在1926年7月北伐前后。盖因宋美龄的身世与学养不凡，蒋也已取得相当政治地位。根据蒋介石日记，6月30日记载：“中午，往访宋氏大三姊妹。”大三姊妹即为宋蔼龄与宋美龄。7月2日日记又载：“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可见蒋已对宋美龄有迷恋之思。

北伐军克复江西，11月8日蒋在南昌郊外阳灵观，乃致电宋庆龄，邀请三姐妹一同到江西南昌叙谈，电文谓：“广州宋部长勋鉴：转孙夫人玉鉴：江西克复，东南可平，先生在天之灵，可以告慰大半矣。夫人如驾来，请由海道为便，到沪时，中再派专员迎迓，并请孔夫人与三妹同来一叙为盼。”^[2]11月23日，又函谓：“赣州、吉安宋部长子文，转孙夫人大鉴：接子文兄函电，始悉夫人由陆路来赣，闻之不胜歉惶。中又以诸事未妥，不能来赣亲接，未知途中情形如何？更念。刻特派邱处长鸿钧前来迎迓也。”^[3]蒋名为邀请三姐妹同游，实则意在宋美龄，已由心动化为行动，展开追求。

当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迁都武汉。11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宋庆龄等各部部长、中央委员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启程北上，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时粤汉铁路尚未通车，孙科一行由韶关入赣州经吉安等地，于12月2日抵达南昌。蒋介石在总司令部设宴招待，席间决

[1] 192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上海接受访问，说明认识宋美龄已有五年。据此推算，应在1922至1923年之间。董显光著《蒋总统传》，认为两人初次会面是在陈炯明叛变之后，地点在上海孙中山总理寓所。

[2] 秦孝仪编订：《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6卷，台北，1984年10月，第310页。

[3] 秦孝仪编订：《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6卷，第323页。

定到庐山召开会议，共商政治军事问题。12月4日，蒋介石与各委员乘火车到九江，换乘肩轿，到达牯岭，第一次登上庐山。政府要员一起下榻“仙岩旅馆”。

最初两天，蒋介石偕各委员游览牯岭风景名胜。12月6日晚，在“仙岩旅馆”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人员外，还有部分驻赣的北伐军将领，如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六军军长程潜及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会议谈及迁都问题，及整理军事、政治、财政，对湘鄂赣闽各省的建设等问题，并没有作出重大决定。12月8日，宋庆龄先行离开，蒋介石亲送至九江，乘水上飞机前往武汉。很可惜宋美龄未能如其所愿来晤叙，主要原因应是国民党同志眼中的“蒋夫人”陈洁如也在牯岭，为了避免尴尬，自以缺席为妥。但蒋对宋美龄的追求，随着北伐军事进展，日益积极。一位新蒋夫人逐渐浮现，另一个蒋夫人则在消退之中。

蒋把这一段过程，清楚的记录在日记里：如3月间“想念美妹不已”，5月间“终日想念美妹不置”，6月间在上海“与三弟谈至半夜”，7月初与宋美龄游览乡间在小饭馆进餐“殊觉别有风味也”，9月下旬与宋美龄密谈时“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以及蒋订婚后写下的感想：“人生之乐，以订婚时为最也。”蒋宋婚姻最后决定者，为宋母倪珪贞。10月初，蒋介石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日本“有马温泉”，拜访养病中的宋母。在日本，蒋致电宋美龄，谓：“近日无论昼夜，心目中但有三弟，别无所思矣。”^[1]蒋介石一天接连三次趋访宋母。蒋介石自记说：“见外姑，状甚愉快，惟目注视，未免令人惭愧。”宋母爽快地面允他与宋美龄的婚事。蒋本来打算在日本举行婚礼，为宋母阻止，而颇感怅惘。蒋没有说明为何想在日本举行婚礼的理由，也不得而知宋母反对的原因，恐怕这都与12年前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往事有所关联。

1927年12月1日下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戈登路“大华饭店”举行世纪婚礼，到贺观礼来宾千余人，民众争睹于道，极一时之盛。英法租界当局抽派警卫，加强防护。经过一年余追求，两人终成

[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10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眷属。宋庆龄却坚决反对蒋宋结合，以缺席婚礼表达政治上的对立态度。

牛兰换不回经国

蒋介石有过四段情缘，只与元配毛福梅生育一子经国，自然关爱备至。他奔走革命之际，除延揽名师教导之外，也不忘督课写字、学英文、求学要诀与为人之道，后来安排到上海，学习新知。1925年10月，经国在国共合作气氛下，远赴苏俄留学。不意两年后，国民革命北伐过程中，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中止联俄容共政策。北伐军事完成后，复因苏俄侵华阴谋揭露，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政治情势变化使身处苏俄的经国，举目无亲，度过一段人质与劳动的悲苦岁月，直到1937年4月才返国。经国负笈异域后，父子间偶有书信往还。蒋思念爱子亲情，不曾间断，在日记中常不经意透露出来。如1926年6月13日，与张人杰等人谈党事时，接到经国自俄国来函，看后喜其大有进步，交给宾客传阅。次年2月1日，为旧历年除夕，蒋写信给经国、纬国，说：“不胜想念之至。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我二子亦如是否？”1928年7月9日，蒋见冯玉祥之子洪国自俄归来，欣喜之余，想念经国，记道：“闻经儿已入列宁堡军事政治大学，甚能用功。今日见冯公子，如见我经儿也。”1931年11月28日，记称：“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

宋美龄深知蒋介石爱子心切，常向他提及营救经国回国之事。1930年10月31日，蒋日记记道：“余为国何能顾家，惟无以对先慈爱孙之心耳，虽然，排除赤化，保障国本，亦足以慰先慈于地下矣，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11月1日，孔祥熙太太宋蔼龄到武岭，与蒋夫人一再劝蒋营救经国。蒋甚感动，日记记道：“孔姐与妻念念不忘经儿，其情至矣。吾重违其情，惟以不宜操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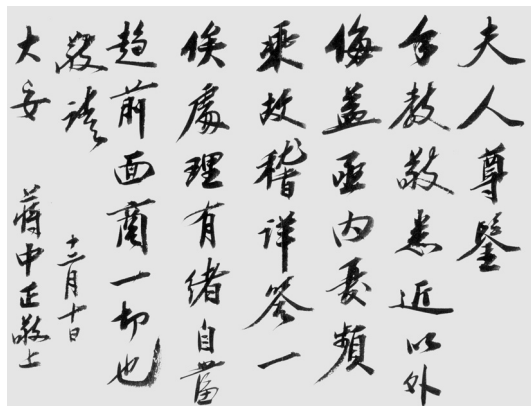
舐犊情深。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只要父亲蒋介石顾念私情，经国有一次很好的回国机会。当时发生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工作的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被捕判刑入狱事件，引起各方关注，奔走营救。

牛兰夫妇原在上海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利用租界区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交付的各项任务。1931年6月,牛兰夫妇及家人以共产党嫌疑罪名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此一事件引起舆论广泛注意。国民党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要求引渡。8月9日,牛兰夫妇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移解南京后,夫妇绝食抗议。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次世界性运动。

牛兰夫妇被捕后一个月,宋庆龄回国奔母丧,8月13日到达上海,也展开营救行动。12月,她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蒋坚拒,在12月16日日记中记道:“孙夫人欲释放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之后嗣,岂余所怀耶。”宋积极奔走,仍无功而返。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扰乱治安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再改判无期徒刑。

在国民党党史馆保存一封蒋介石写给宋庆龄的信,谓:“夫人尊鉴:手教敬悉。近以外侮益亟,内忧频乘,故稽详答。一俟处理有绪,自当趋前面商一切也。”信署明日期为12月10日,应即针对牛兰案而发。蒋严拒宋庆龄以经国回国为交换条件,同时作爱子将被杀害的最坏打算。但望子归乡的心情,则一日未或已。其后,由于日本侵略威胁,中苏关系显露和缓契机,蒋循外交途径,争取让经国回国。1934

年8月15日,日记载:“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皆能继余业也。”9月2日,日记谓:“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



见。”终于促成经国回国的是驻苏大使蒋廷黻。他在1936年10月上任，行前蒋约见他，想必交付交涉经国回国的任务。据蒋廷黻大使回忆说：赴莫斯科就任前，蒋夫人曾告诉他说，委员长希望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够回国。^[1]可知蒋经国的回国，系经由外交管道交涉，蒋夫人亦居其功。

浮光掠影

浮光掠影，通常用来形容时光暂留乍现。在此借用为捕捉宋庆龄与蒋介石夫妇三人一同出现的形影，即使不过几秒，珍贵的历史意义尽在不言中，亦可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1936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是月31日，也是蒋介石委员长五十大寿。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举行第二次大检阅。先是中国童子军总会成于1934年11月1日，蒋介石兼任总会会长后，甚为关注童子军之组织训练。童子军团先后成立者凡二千三百八十余团，登记之童子军达二十二万余众。至是，为考核童子军成绩，乃举行大阅，参加者计有苏、浙、赣、闽、粤、湘、鄂、豫、冀、鲁、晋等省，及京、沪、平津、广州、青岛等市，共三十一省市，约一万一千人。蒋委员长演讲“巩固统一与复兴民族”，谓：“童子军的地位，就是中华民国最高尚的国民，你们当前的责任，就是要挽救国家，收回主权，复兴民族。”^[2]

在一段纪录像片中，宋庆龄与宋美龄连袂出席，跟随盛装的蒋介石总会长步向会场。三人身影只出现数秒。十年来，因政见歧异与政治矛盾，多少影响宋庆龄与蒋介石夫妇的和谐关系，



[1] 蒋廷黻口述、谢钟琰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初版，第203页。

[2]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三，第335—336页。台北版。



但姑不论动机为何，宋庆龄愿意出席童子军大检阅活动，便是一项善意表现。

两个月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震惊各方。宋美龄展开营救丈夫行动。宋庆龄也反对采取轰炸西安的政策，主

张释放蒋介石。事变第二天，她从银行提款，电话通知孙科安排飞机，并约好何香凝，准备联袂飞往西安，直接说服张学良、杨虎城。^[1]在蒋介石面临生死关头，宋庆龄伸出援手，其中或有政治因素，也不能抹煞出于人道与亲情之深切关怀。

日本全面侵华，促成国共捐弃前嫌，携手共赴国难。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基于持久战略迁至大后方重庆。宋庆龄一度避居香港，1940年3月30日与宋美龄同机飞抵重庆。4月21日，蒋委员长到成都视察，23日主持中央军官学校举行第十六期毕业典礼及第十七期开学典礼，勉励官生认清使命，共同为主义而牺牲奋斗，切实力行军人读训与党员守则。宋庆龄也应邀参加观礼。在相关文献与照片中，不见她的踪影。然而在一段纪录像片里，瞥见宋家三姐妹出席的画面。即使一瞬间，亦弥足珍贵。在抗战御侮大前提之下，不乏三姐妹一同现身于重庆救难及慰劳将士的场合，但发现并抓住瞬间即逝的影像，有时需要点运气。

1944年6月20日，美国第33任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 Henry Agard），以美国总统特使身分，访问中国。次日夜八时，蒋介石偕夫人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受邀与会者百余人。蒋介石致欢迎词，华莱士致答词，要谓：此次大战之后在东方必须做到三件事：解除日本武装，环太平洋各国相互谅解合作，东方各弱小民族获得自治。如此则牺牲许多生命，尚为值得。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连续会谈3天，6月24

[1] 《骨肉深情：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姐妹情》，环球网：<http://taiwai.huanqiu.com>。

日离开重庆，飞赴云南昆明访问。宋庆龄也出席招待会。纪录片显示，她就坐在蒋主席左侧，席间也有互动。众所周知，宋庆龄好烟，但外界鲜见她抽烟照片。在此正式外交场合，捕捉到她请蒋主席，向隔坐的宋美龄索烟。蒋居中为她传递烟盒。短暂画面，透露一丝温情暖意。



结 语

蒋介石与宋庆龄纵使政见不一，各有坚持，惟都以孙中山为中心。孙中山不在，二人理应相互扶持，共为实现孙中山未竟志业而精诚合作，于国于民皆有大利。可惜，二人因政治因素而分道扬镳，1949年12月以后，二人更分处对峙的局面，终其一生，不通声息。关于他们的研究，应扩大视野，跳脱以往偏重矛盾面的探究，一味的数落反使历史研究显得无趣。寄望两岸学者一起努力。

上述提及华莱士访华之后二周，7月5日，蒋介石召集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高级干部与欧美友好数人，约六十人，为夫人将赴巴西养病饯行茶会。会中顺便辟谣，日记谓：“最近对余个人之品格的流言蜚语、敌党阴谋之所在，坦白直告，毫无隐讳。此次谣言之深刻广泛，非如此必不能止息也。余妻乃继述其对余人格之信仰，亦极有力也。随后觉生、季陶各院长各述其感慨，而后散会。”^[1]可见这件事伤害之大，蒋日记进一步表明：

妻接匿名信甚多，其中皆言对余个人谣诼、诽谤之事，而惟有一函，察其语句文字，乃为英国人之笔。此函不仅诋毁余个人，而乃涉及经、纬两儿之品格，尤以对经儿之谣诼为甚，亦以其在渝有外遇，且已生育孽生，已为其外遇之母留养为言。可知此次蜚语，不仅发动于共党，而且有英美人为之帮同，其用意非只毁灭我个人之信誉，且欲根本

[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7月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毁灭我全家。幸余妻自信甚笃，不为其阴谋所动，对余信仰益坚，使敌奸无所施其挑拨离间之技俩。可知身修而后家齐之道乃为不变之至理，安可不自勉乎哉！^[1]

蒋夫人宋美龄接着说明：谣言已经遍传重庆，但这些谣言不可能让她低首弯腰。她也不会询问谣言是否真实，完全相信蒋委员长之正直、品格和领导。他们结婚已经17年，共历所有危险，所以了解蒋委员长性格的每一面。她希望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诽谤。中伤蒋的流言，在重庆社交圈传开有一段时间，自也传入宋庆龄耳中。此时，她站出来声援蒋介石，将是一幅多么感动的画面。或许有，只是未加以探究而已。另外，蒋介石日记中可能还有关于与宋庆龄的记事，值得发掘。如1943年3月12日，蒋介石带领纬国，前往重庆黄山，探访宋庆龄住处。宋以水煮蛋款待，蒋介石甚感，特记道：“此故乡宁波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1946年2月，蒋重返上海，访视住在靖江路45号的宋庆龄，嫌寓所狭小，特别嘱咐黄仁霖为宋另觅大屋。^[2]

政治之外，更见温情，追求真相。本文寄予厚望。

（作者为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责任编辑：孙娟娟）

[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7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2] 参见朱玖琳：《宋庆龄眼中的蒋介石》。

近代上海城市对于宋庆龄的意义

熊月之

[内容提要]

宋耀如本不是上海人,他之所以在上海发展事业,不光由于教会的安排,更由于上海特定的中外文化格局适合他的发展。宋耀如六个子女都在教会学校读书,都到美国留学,日后都各有成就,也与上海特点的文化格局有关。宋庆龄能够称为杰出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战士,与她青年时期在上海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关。宋庆龄留学美国以前,上海已是中國风气最为开放的城市。宋庆龄在中西女塾读书时期,是其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也是上海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澎湃时期。正是在这种氛围影响下,宋庆龄养成了自立、自强、爱国、民主的素质。宋庆龄作为重要人物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主要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她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揭露、谴责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高举抗日爱国旗帜,支持抗日战争;谴责国民党镇压、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努力保护、营救爱国民主人士;投身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得力于两大因素,一是其孙夫人的身份,使得想加害于她的国民党当局有所顾忌;二是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特殊的政治环境,为宋庆龄的政治活动提供了行动便利。世界眼光、民主精神、宽广胸怀、刚正、勇敢、坚韧、看似纤弱实则坚强,宋庆龄身上闪射出来的这些夺目光彩,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正相契合。

[关键词]

宋庆龄 宋氏家族 近代上海 租界

宋庆龄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很长时间生活在上海,很多重要活

动发生在上海,最后安眠在上海。一部宋庆龄传记,大半部写在上海城市地图上。宋庆龄伟大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上。那么,上海对于宋庆龄的成长有些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上海城市文化对于宋庆龄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一、特定的中外文化格局孕育了宋氏家族

宋氏家族是一部令许多文学家想象力都黯然失色的传奇故事。那么宏大,那么绚丽,那么曲折,那么深刻,那么令人荡气回肠!这部历史活剧,只有近代上海这一奇特的舞台才有可能上演。

1886年,宋耀如自美国留学回国,没有去故乡海南,没有去先前中国对外联系重镇广州,没有去被割让的英国殖民地香港,也没有去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却来到了上海。这固然是出于美国监理会的安排,但归根结底是由当时上海在中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当时的上海,已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有中国最大的租界,居住着远比其他城市为多的西方人。当时的上海,已是基督教在华传播活动的中心地,更是美国监理会在华活动的主要城市。1848年,监理会传教士秦右(Benjamin Jenkins)、戴乐(Charles Taylor)等已到上海活动。1860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的到来,更打下相当坚实的基础。他创办了《教会新报》(后改《万国公报》),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最重要中文杂志,在中国官绅中有广泛的影响;创办了面向中国富庶家庭的中西书院,成效显著。美国监理会花了多年心血,将宋耀如培养成受过高等教育的合格神职人员,就是要让他到上海这样关键的地方发挥关键的作用,实现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难怪,宋耀如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教会不同意。宋耀如想到日本去拓展教务,教会也不同意。

刚刚回国的宋耀如,基督教背景,“一身洋鬼子的西服,留着油光可鉴的西式分头”^[1],服饰发式都与众不同,中国话不流畅,上海话听不懂,中国饭也吃不惯,被人视为“洋鬼子”。这样一个另类,如果是

[1] [美] 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73页。

在内地城市,无论如何是很难混下去的,保不准教案发生,连性命安全也成问题。但上海不一样。这时的上海,开埠已经四十多年,已是一个洋气四溢的城市,风气开放,兼容并蓄,儒教、佛教、基督教并行不悖,西洋人、西洋货、西洋菜、西洋建筑随处可见,西洋话随处可闻,洋泾浜英语早已风行。学习英文的日校、夜校已经多如米铺,广方言馆、约翰书院的学生,已经等不到毕业就被洋行挖去。

此时的上海,已是为数不多的欧美归国留学生的创业中心,“海归”天堂,诸如曾在美国俄亥俄州建阳学院留学的颜永京,此时正在约翰书院教书;此前在耶鲁大学法律系留学的唐国安,也于此前一年(1885年)因清政府中断留学计划而提前回国,在约翰书院教书。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此前也主要在上海活动。那些算不上是留学生、但有海外游历经历的人,如王韬、唐廷枢、唐廷植等,这时也都活跃在上海。

教会为宋耀如选择了上海。上海这座另类的城市接纳了宋耀如这一另类的中国人,为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了这一前提,有了这一城市特别的场景,以后的剧情才可能延展:与倪珪贞结婚,创办印刷厂,从事实业,暗中资助反清革命,陆续送六个子女留美。

从宋耀如回国,到宋庆龄留学回国,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开头二十年,这三十多年间,是上海城市史极为开放、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特点凸显的时期。在清末,清政府管不了上海,上海事实上成为反清宣传基地,思想活跃、风气开放、文化繁荣,这正是宋耀如事业开展、宋氏姐弟成长的时代。到了民初,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还是其他人当总统的北洋政府,谁也治不了上海,又都离不开上海。上海既混乱,又富有,也开放,这都为宋氏姐弟接受教育、张扬个性、施展才华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

特定的中外文化格局孕育了上海宋家,或者说,宋氏家族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产物。

二、特别的城市文化氛围造就了宋氏姐妹

宋氏三姐妹,性格、志趣各有特点,差别很大,但以下四点相同

的：聪明、自信、独立、坚强。

这些特点既得自遗传、天赋，更与后天的教育有关，与健全的人格养成有关。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位老师。受美国文化影响，宋耀如对女儿教育很重视。即使她们在美国留学，也经常会写长信教育她们，寄剪报传递信息。倪珪贞的传教士家庭背景、教会女塾的教育背景、天足、会弹钢琴，这些，都与宋氏姐妹容易接触、接受西方文化有关，也与她们健全的人格养成有直接关系。追根溯源，倪珪贞的这些素养，与近代上海特别的城市文化氛围有关。

在宋庆龄出生以前，上海至少已存在过7所女学。1850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Eliza Gillette)创办了裨文女塾(今上海市第九中学前身)，地址在西白云观(今方斜路)，开始有学生20人，以后逐渐增多。1871年裨治文夫人去世，学校由美国圣公会和公理会管理。185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琼司(Emma Jones)在上海创办了文纪女塾。1853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南市开办明德女校(今上海市蓬莱中学前身)。186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ohn M. Farnham)夫妇，在南市开设清心女塾。1881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创办圣玛利亚女校，由原文纪女塾与裨文女塾的一部分合并而成，黄素娥为首任校长，设址梵皇渡圣约翰书院之后，开始时招生40余人，以后陆续增加。1908年添设师范科，添设图书馆。188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办女童学校。1892年，林乐知和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女传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共同创办中西女塾。

宋庆龄出生以后，到她留学美国的1908年，上海又有一批女学问世，包括1897年美国南浸礼会开办晏摩氏女学；1898年经元善等人开办中国女学堂，这是国人在上海自办的第一所女学；1902年创立的爱国女学，由爱国学社所办，创办人有蔡元培、蒋观云等；1902年创立的务本女塾，创办人为上海地方士绅吴馨。

这些散布在上海各处、规模或大或小、历史或长或短、风格各异的女学的开办，对上海地区女子教育的开展、社会风气的开新，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倪珪贞是在15岁(1883年)进入裨文女塾读书的，

三年后(1886年)毕业,在校期间,精算学,嗜西琴。她与宋耀如结婚时,1887年,19岁,刚走出校门一年,青春年华,聪明活泼,知识新颖,思想新潮。这些素质,对于她的儿女健全人格养成,潜移默化,沦肌浹髓,胜过任何老师。假如倪珪贞生在内地偏僻乡村,能具备这些素养吗?假如倪珪贞是一个缠着小脚、无知无识、因循守旧的女子,她的那群孩子能像后来那样聪明能干、叱咤风云吗?

宋氏三姐妹中,葛龄属现实主义,庆龄属理想主义,美龄属权力主义,故各有爱财、爱国、爱权之说。这与三人在兄弟姐妹中的位置有关(通常老大稳健,老二智慧,老三机灵),更与她们成长时期的社会影响有关。

宋庆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主要是她在中西女塾读书时期(1902—1907),她10岁至15岁。中西女塾,当时校舍位于西藏路汉口路,是一所专向富裕人家女子开放的贵族式女学。宋庆龄入学时,创始人海淑德已经去世,继任校长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女传教士连吉生(Helen Richardson)。中西女塾走的是精英教育路子,学生人数不多,开办时只有5名学生。1900年,才有第一批学生毕业,凡三人。1903年,学生有两个班级,一班14人,一班16人,总共30人。从连吉生手订的章程看,学校以十年为期,有三门课是自始至终每年必修的,即英文、算学与圣道(宗教)课,到高年级开始有地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等课程。章程规定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但入教与否由各人自主,不作硬性规定。学校学费昂贵,住宿学生每月学费5元,伙食费5元,学琴、笔墨纸砚另外收费。学校管理严格,暑假、寒假、节日、不同季节每日上课、下课时间都有具体规定,不同年级课表排得清清楚楚,升级、留级也有明确规定。章程规定学生年满十三岁必须住校,十二岁以下住校与否听便。章程对于学生衣着、床上用品都有统一要求:

学生铺陈,皆须照本塾式样名目,新制全套,专留塾中应用,直至不再入塾,方可携归。其式样名目开列如下,若能亲自来塾,阅看一过,更妙。

计开:大红绒毯一条;被头一条,长六尺阔四尺半;褥子一条,长

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漂白粗花旗布被单二条,长七尺阔二幅;漂白粗花旗布褥单二条,长六尺阔一幅半;红花洋布被面一条,长六尺阔二幅;漂白洋布枕头套三个;告布褥子一条,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告布枕头一个;漂白洋纱帐子一顶,门面长五尺,横头长四尺半,帐顶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1]

重英文、重宗教、重科学知识、重独立人格,中西女塾这些特点,对于宋庆龄素质养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依据章程,宋庆龄可以从1905年起住校,但她入校便住读了,5岁的宋美龄入学中西女塾幼儿班时,曾与姐姐同住一间寝室。^[2]住校,离开父母生活,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

宋庆龄就读于中西女塾时期,也是上海社会极有活力的时期。那一时期的上海,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澎湃,日涌日激,长盛不衰。1902年,南洋公学发生学潮,一批学生退学,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先是拒俄运动波澜壮阔,影响全国。然后是苏报案发生,震动世界。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拒俄运动在上海落实为反抗沙俄的实际斗争;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暗杀活动成为其特点;万福华在上海刺杀王之春未遂。1905年夏天,抵制美货运动轰轰烈烈,持续数月;冬天,矛头直指租界当局的大闹会审公堂的事件又起风潮。1906年,因抗议日本排斥中国留学生,姚宏业等一批留学生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姚因遭受挫折而投水自杀,轰动一时。1906年以后,地方自治、要求立宪的运动已由舆论变成行动。1902年以后,革命、民主已成热血青年的口头禅,张园的反清演说已成上海政治生活中一道亮丽风景线。宋庆龄本人对这段时期的活动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她就读的中西女塾与爱国学社近在咫尺,与张园相距也就步行一刻钟路程,抵制美货、大闹会审公堂的游行就发生在她学校的周围,可以想象,那些事件、演说、学说,一定会对她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大她4岁的葛龄,已比较理智;小她4岁的美龄,还比较懵懂。宋庆龄一辈子以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主义、民主主义著称,其根子

[1] [美] 林乐知译编、任廷旭述:《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上海广学会1903年版,第十集。

[2]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就扎在中西女塾读书阶段。晚年,美国记者斯诺问宋庆龄当年为什么要嫁给孙中山,她回答说: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自白。

三、特有的城市历史成就了宋庆龄的卓越功勋

宋庆龄作为重要人物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主要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新中国建立以前。在那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宋庆龄发出独特声音或起了重要作用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揭露、谴责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诸如,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公开谴责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1927年4月,鉴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1927年7月,鉴于汪精卫叛变革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国民党决裂。1927年8月,为了公开与国民党决裂,拒绝家人帮助,避地苏联。1929年8月,发电报给柏林反帝大同盟,严厉谴责国民党背叛革命,在上海以传单形式散发此电报;怒斥戴季陶受蒋介石旨意就传单事对她的责问。

其二,高举抗日旗帜,支持抗日战争。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后,亲临抗日第一线,慰问十九路军;筹设临时医院,救助伤员。1936年,促成与安排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医生到陕北根据地。1938年,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1941年,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斥责当局破坏团结抗战,制造皖南事变。出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支持抗日战争。

其三,谴责国民党镇压、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努力保护、营救爱国民主人士。1931年12月,赴南京面斥蒋介石杀害邓演达。1932年底,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大批爱国志士

和进步人士。1933年3月至4月,积极营救被捕的廖承志、陈赓等人。1933年6月,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杀害杨杏佛。1936年冒着生命危险,主持鲁迅丧事,站在送葬队伍前列。1937年7月,到苏州监狱探视沈钧儒等七君子,迫使当局释放了七君子。

其四,投身世界反法西斯运动。1929年3月,在柏林出席反法西斯国际大会。1932年至1934年积极参与营救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活动。1933年9月,参与筹备并出席在上海秘密举行的远东反战会,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讲。

宋庆龄从事这些活动,屡经风险而终无大碍,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她的孙夫人身份,二是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前者诚如西格雷夫所说:

遗孀的丧服保护了她,但也使她如坐禁闭。她能够以他人做不到的方式冒险陈词。她曾激励过同时代的人们,但是当她们身遭杀戮时,她虽欲干预但又无能为力。她完全可以在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里过着富裕的流亡生活,了结此生。但她没有这样干。^[1]

至于后者,由于近代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行政系统多元化、人口高度异质化的移民城市,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互不统辖,各自为政,造成诸多治安缝隙,宋庆龄有效地利用了这些缝隙。比如,1927年8月,她秘密前往莫斯科,其手续是由美国友人、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普罗梅帮助办理的,也是在普罗梅的护送下离开上海的。离开的情形:

(8月22日)是日早上3时30分,宋庆龄由雷娜·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利爱路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她们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2]

美国人、苏联人、中国人、外交官、汽车、机动舢板诸多元素集合在一起,这在其他城市是很难想象的。1930年代,宋庆龄与众多欧美

[1] [美] 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657页。

[2]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第366页。

国际友人的联系,包括萧伯纳、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伊罗生、罗森堡等,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对红军的支持,对新四军的支持,都是利用了上海复杂的政治环境。她将廖承志开列的叛徒名单转交给共产国际。她将左尔格获得的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的情报,转送给苏区,使得红军能够从容应对,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这些在隐蔽战线进行的斗争,也都是利用了上海城市管理多元、社会复杂的特点。

上海哺育了宋庆龄,成就了宋庆龄。宋庆龄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深厚的感情。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八一三事变,野蛮侵略上海。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上海各界人民奋起抗击,谱写了悲壮的抗日史诗。奋不顾身投身抗日洪流中的宋庆龄,对这一抗争予以极高的评价,视为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十二年后,她在上海的一次大会上说道:

我相信,每一个在这儿的人,都会记得,日本军阀曾经怎样夸口说:中国军队不能抵抗三个月。然而每一个人却也知道,尽管敌人疯狂地轰炸和海军用大炮来掩护进攻,只是在上海,我们就曾经和敌人战斗了三个月。保卫未曾设防的上海,怎样会可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民曾经准备了牺牲,这便形成了一个警告。必须承认,这一警告的重大意义正逐渐地加强,因为中国人民在今天已经处在一种更其不可征服的地位。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力量。此外,我们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在亚洲统治的基础,他们的势力正在崩溃中。^[1]

宋庆龄对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怀有深深的敬意。1949年7月1日,她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文章中,特别突出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特点:

[1] 宋庆龄:《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1]

世界眼光、民主精神、宽广胸怀、刚正、勇敢、坚韧、看似纤弱实则坚强，宋庆龄身上闪射出来的这些夺目光彩，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正相契合。

近代以前，如果选一位最能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人物，非徐光启莫属。近代史上，如果选一位最能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人物，宋庆龄最为合适。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朱玖琳）

[1] 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宋庆龄选集》上册，第461页。

宋庆龄与第三党

李玉贞

[内容摘要]

迄今对宋庆龄流亡苏联和德国（1927年9月—1929年4月）期间的研究，给人的印象是她拥护苏联和中共特别是后者的土地政策。本文作者在俄罗斯看到的几份文件，如邓演达致宋庆龄的信，他的报告和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安排，揭示了宋庆龄以国民党左派身份讲话的弦外音——她和陈友仁、邓演达等同时为筹划第三党性质的政党，先是公开后是秘密而发出的声音，并与国内同道谭平山等互相配合。这个想法和做法一度得到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才有1927年《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的发表。邓演达更进一步，直言不讳要在全民革命阶段取代中共来领导中国革命，为此必须建立第三党。随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激化和苏联外交的窘境，莫斯科和中共态度变化了，宋庆龄指望像当年孙中山一样得到莫斯科援助的期望无法如愿，便到了柏林“极其秘密”地继续工作，与邓演达一起寻求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道路。1930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记载的便是他们的探索结果。虽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为迎合斯大林而针对自己的同胞炮制了第三党的冤案，污蔑其为蒋介石和刽子手的“走狗”，可向忠发本人苟且活命出卖同志，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了。但该“委员会”坚持下来，几经更名后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共产党一道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这本身就是对共产国际极左路线的鞭笞。历史的轮回在启迪我们，第三党的教训毕竟是深刻的。

[关键词]

宋庆龄 邓演达 斯大林 向忠发 第三党 共产国际

笔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发现了被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ГПУ的简称)截获的一封邓演达致宋庆龄的长信及其它相关文件,对照《邓演达研究与资料》^[1]、《上海农工党专辑》^[2]、多卷本《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3]、和其它著作^[4],看似零星的文件早已链接成一个有机体并且轮廓清晰,在等待研究者揭开。这便是宋庆龄与第三党的关系。

宋庆龄在苏联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发表了许多热情的讲话,这已广为人知。但鲜为人知的,是她在苏联和德国期间(1927年9月—1929年4月)还围绕组建一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党,俗称第三党,而进行的工作。本文试图粗浅探讨她当时的思想状况,揭示她的工作先是公开后转秘密的原因;同时从有关方面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入手,分析斯大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继江浙同乡会、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炮制的又一起把宋庆龄放到被“批判”地步的“第三党”冤案。这段故事时间跨度小,但给人的启迪并不小。

一、宋庆龄前往莫斯科

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宋庆龄赴苏。上一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国共合作的北伐以“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号召,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广大社会阶层的参与。众所周知,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在世时的重

[1] 黄振位、梅日新、黄济福编:《邓演达研究与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2]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农工党专辑)》2007年第4期(总125期)。

[3] 该书全名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下用)由俄罗斯现代史料研究与保管中心(现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下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编。本文作者翻译了其第1卷,书名为《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台北,199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书名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编》,遗憾的是该书有很多错误译法,为确切起见,本文作者直接引用俄德学者书的俄文版。

[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陈丕士著:《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美]彼得·兰德著:《走进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

要决策,“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是他制定的。

关于“联俄”,1923年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中已经向世人表态:苏维埃制度和苏式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他的“联俄”仅仅是学它的“方法”,即以党治国的“党国”经验,和以党治军的“党军”建设。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掌握了党权和军权,翅膀丰满,不再需要苏联援助时,便挥刀向昔日的战友中共、其同情者和群众,接着便卷起了孙中山“联俄”的旗帜,宣布断绝与苏联的往来。

宋庆龄不赞成分共,她的理论很简单,容共是总理的一种政策,现在要变更总理的政策,她不能赞成。国民党中央的陈友仁,何香凝也持同样态度。^[1]

关于“扶助农工”,涉及的是孙中山对待工农运动的政策。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早期的中共选择了十月革命没收有产者财产的道路,但孙中山和廖仲恺等认为此路不通。1923年11月邹鲁起草《广东田土业佃保障条例》,便是对鲍罗廷立即颁布类似苏俄《土地法令》建议的直接拒绝和响应。^[2]继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之后,1924年12月孙中山在天津致函张作霖,再次清楚表态:联合苏俄是一回事,共产主义是另外一回事。^[3]直到1927年7月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国共的分歧一直是“摠下葫芦瓢起来”。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崇拜者,他的秘书、战友,她跟随孙中山,做着他的事业。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是,凡孙中山说的她都拥护,凡孙中山做的她都支持。分析她在这个时期的活动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那就是她受的是西方教育,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妇道观念,她一般只打理丈夫的生活起居,支持他的活动,但并不干预他的政务。陈友仁的儿媳陈元珍曾对笔者说,她认为把这个时期的宋庆龄描述为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者是不切合实际的。笔者认为此说应予考虑。五卅运动期间痛斥帝国主义暴行有她的声音,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妇女运动中有她的足迹,北

[1] 陈公博所著《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版)第96页还有这样的话:“孙夫人在平日和我谈话,极不满足于共产党,但到了要分共的时候,非常犹豫”。

[2] 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86页。

[3] 信件往来的详情见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145,第82—86页。

伐劳军第一线有她忙碌的身影。但是在国共分裂前,她并没有走到国民党政治的前台。

宋庆龄、谭平山等为形势担忧,有关各方筹组新党。1927年4月,蒋介石建立个人独裁政权的倾向越来越暴露,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或被称为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如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而奋斗到底”。^[1]同时,邓演达和谭平山秘密就组党问题多次商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并“向知识分子同志中做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2]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之宣传。

此事的大背景是那个时期国共对于土地革命不同的政策。国民党人邓演达起初觉得毛泽东在湖南的做法值得仿效,但后来发生了改变。谭平山之所以想另外组党,乃因身为国民党农民部长,到毛泽东十分活跃的湖南农民运动第一线考察后,没有得出激情昂扬“好得很”的印象,反而在1927年5月发出布告,称“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需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3]为纠正农民运动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他提出的一些主张(如把没收地主土地的范围限制在拥有一定数量者如20、30、50、200亩以上者),被激进者称为“耕者无其田”。谭平山怕“第一,大规模的征发没收恐引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没收的结果,将是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徐特立和周恩来都认为谭平山的担心不无理由。^[4]中共认为谭平山“可耻”。^[5]谭平山则并不服气,看到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接二连三的指示使形势越发不可收拾。况且斯大林本人也承认自己不了解中国国情,从中国寄回的材料把他弄“糊涂了”,“不只是你们有点让我糊

[1]《上海农工党专辑》,第8—9页。

[2]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67页。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15—416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71页。

涂了,而且我……可能也把你们全都弄糊涂了。”^[1]一语“糊涂”,却致多少生灵涂炭。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期望斯大林或共产国际提出什么可行的方针。谭平山这才想摆脱共产国际,独立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

然而,被鼓动起来的农民表现着强烈的自发性,仅湖南一地“有组织、有农协会会员册可查的就有518万,能影响的人数在千万以上”。国民革命军将领谭延闿的女婿被要求捐巨款,谭氏闻之忙托人说情。^[2]“逮捕、监禁、审判、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惩罚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至于“以革命的名义”为破除所谓旧习俗而采取的“毁庙宇、打菩萨……逼寡妇改嫁”等做法,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踏上去踩的做法,使湖南农民运动一发不可控制,因无绅不劣,死伤者的数量无法统计。那些把农民协会当成“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的口号,则激起相当大部分农民的不满。^[3]而“谷米阻禁”,本是乡村中农民的一种狭隘心理,不让本地粮食外运,以保证买到价格便宜些的粮食,但它阻碍了商品的市场流通,农民无法购买非本地出产的商品,如食盐、布匹等,湖南的做法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却“无异于切断了经济的动脉”,^[4]许多乡村经济凋敝,生产无以为继。

国民革命运动中出现了复杂局面。有人主张分共,如蒋介石、汪精卫;有人要求改革国民党,如共产党人谭平山、陈独秀,国民党人宋庆龄、邓演达。1927年马日事变后邓发表《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指出真正要革命的国民党的信徒,必须把青天白日旗抓在手上。^[5]亮出了撇开国共两党另外组党的意图,他的特点是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合作。

四一二事变后,邓演达曾往访被共产国际称作左派的汪精卫,试

[1]《斯大林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2卷,上册,第849页。

[2]直荀:《马日事变的回忆》(1928年5月30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439页。

[3]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216、217、219页。

[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2册,第219页。

[5]全文见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145—147页。

图说服他,但没有结果。^[1]张国焘认为邓演达是可以争取的左派,邓演达的苏联政治顾问杰罗尼也有这样的意图。^[2]宋庆龄、谭平山等人鉴于这种形势,加快了组党。

远在苏联,斯大林感到武汉政府高层已经被“充分利用”,成了被挤干的柠檬,现在需要“做些努力掌握国民党的外围使之对抗高层”。^[3]

近在身边,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认为在国民党里“邓演达是唯一的左派”。想以他“为中心提出改组军队和撤换国民党领导的纲领,把反对派组织起来”。^[4]罗易心目中依然固守着斯大林的国民党左派政权模式。鲍罗廷离开中国前的“一段时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当时各种脱离共产党的人,左右倾者已经有一半以上,谭平山便主张与邓演达联合起来,重建中华革命党。^[5]鉴于国内开始白色恐怖,无法开展工作,经鲍罗廷帮助,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离开汉口,经香港前往苏联。鲍罗廷像这时的斯大林一样,已经没有了主意,他明知让邓演达取代汪精卫已经不可能,也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安排,^[6]多半想从长计议到莫斯科再说。

邓走后,国共人士于7月初自行聚集,谭平山分别与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讨论组党。因陈独秀不行了,国民党也不行了,建立一个新党领导革命势在必行。总政治部的干部和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都赞成邓演达另外组党的想法。^[7]

8月15日邓演达到莫斯科后,苏联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仪式,^[8]说明斯大林等对邓演达寄以很高希望,还在坚持他组建国民党左派政府的设想。

宋庆龄高调亮相政坛。7月14日宋庆龄在武汉发表了著名的《为

[1]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2册,第257页。

[2]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2册,第264页。

[3]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7月8日,索契),*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2卷,上册,第844页。

[4] 《罗易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电报》(1927年6月24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2卷,上册,第806页。

[5] 《上海农工党专辑》,第10页。

[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65页。

[7] 《上海农工党专辑》,第5页。

[8] 马烈著:《邓演达》,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162页。

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斥责那些背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人，说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所以她决定不再参预国民党政策的执行，从政坛上“暂时引退以待今后更贤明的政策出现”。^[1]她的高调表态震动了国内外舆论，这时她的思想是复杂的。^[2]声明发表两天后，她在武汉的寓所就遭到搜查，不得不秘密前往上海。

二、宋庆龄到达莫斯科 酝酿中的中国革命领导机构

事实上她起初并不想直接流亡苏联，但是没有别的选择。^[3]她到苏联有明确的意图——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继续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希望像当年孙中山身处绝境时一样，得到苏联援助；况且这也是一个机会去替亡夫访问苏联。斯大林批示向她和同行的陈友仁及其子女提供费用，命令苏共中央的叶努基泽周密地为他们安排活动，这时莫斯科的基本路线依然是尽最大可能“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并与共产党组成政府”。“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不变。^[4]

9月7日宋庆龄一行到达莫斯科，沿路受到的热情欢迎给她留下美好印象，使她体会到苏联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支持和普通人之间质朴的友谊。

宋庆龄与邓演达等筹备另外一个革命领导机关。这是宋庆龄等在国外活动的第一阶段。在莫斯科，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共同商讨成立一个组织作为临时性革命领导机关。在他们的想法中，这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团体，可以与共产国际合作，可以与共产党合作。邓演达联络何香凝等，邀请他们共同组建新党。^[5]

[1]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8页。

[2] 朱玖琳在其《宋庆龄眼中的蒋介石》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见她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举办的“蒋介石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感谢她展示了未刊稿。

[3] [美]彼得·兰德著：《走进中国》，第379页。

[4]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20（特字第98）号》（1927年8月18日）；《会议记录第124（特字第102）号》（1927年9月15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74—75、113页。

[5] 《上海农工党专辑》，第6页。

就组党而言,当时有些迹象表明国民党左派似乎还有潜力。八一南昌起义期间建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25名委员中有不少国民党左派。主席团7人中也有宋庆龄、邓演达(此时他已经在赴莫斯科路上)、张发奎3人。^[1]之所以把并不在场的何香凝、邓演达和宋庆龄选入该委员会,再次证明在这个时期国民党的旗帜还没有被中共和共产国际丢弃。而且8月1日《中央委员宣言》的发表者都是国民党员或跨党的中共党员,^[2]它表明了反对武汉中央的立场,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至于其政治主张,则是“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以及“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3]这“平民利益”恰恰是后来谭平山和邓演达的主张。

上述文件之所以有国共人士签名,乃因为它强调的是“平民利益”,并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但事态很快变化,上述文件的签名者谭平山的境遇开始恶化。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于1927年8月7日召开会议,是谓“八七会议”,会上批判了谭平山“拒绝赞助土地革命”的错误做法,^[4]确定了继续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会上确定的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是“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组织”。共产国际也认为“国民党当前的任务,须要有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必须更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的工农与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同时,要保持国民党左派中的动摇分子留在革命队伍中,使之不至于退出”,此决议中“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5]的提法,诠释着一个多星期后邓演达在莫斯科时受到的热烈欢迎。

[1] 共产党人有:谭平山、叶挺、贺龙、吴玉章、林伯渠、张国焘、恽代英、李立三、郭沫若、苏兆征、张曙时、彭湃、徐特立等。《江西日报》,1927年8月3日,引自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用“盛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2] 据《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167页)使用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的消息,这个宣言的发表者计22人。

[3]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166—167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71、280—282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73页。

正在酝酿中的第三党是否与共产国际期望中的那个左派国民党是一回事呢？答案是否定的。

事态继续朝左的方向急速演进，过去建立苏维埃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一个多月后，到9月19日，中共改变了方针，中共中央在其《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明确要立即建立苏维埃，理由是一些中共党员“打算创造秘密的革命国民党的组织，或稍为团结左派分子，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1]从中读出的不仅是有关方面对“左派分子”活动情况的了解和承认，并且有对他们的失望和“不耐烦”。

同样，共产国际也“不耐烦”，并在莫斯科策划着。就在中共上述决议做出的同一天，共产国际便指示其代表罗敏纳兹“在国民党左派的思想完全失败和新的革命高潮出现的情况下，那就必须建立苏维埃了”。至于罗敏纳兹对起义时机和地点的选择，莫斯科此时还不清楚，但是要求其明确“是打着苏维埃的旗号还是国民党的旗号去建立”。^[2]

宋庆龄、中共、共产国际演出一段“三岔口”。上述中共9月19日决议发表时，宋庆龄到达莫斯科仅仅十多天。她在那里时时处处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现，^[3]受到热烈欢迎，给人的感觉是她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支持。

然而，一段时间里却出现了各唱各调的现象，这壁厢是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频繁活动，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那壁厢在国内，中共要立即建立苏维埃，认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了。对于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而对于那些“零星散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只认为是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可以在每次斗争中，使他们来赞助我们及革命的民众”。^[4]这个《决议》中已经丝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页。

[2]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25（特字第103）号》（1927年9月22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3卷，上册，第127页。

[3] 如她在1927年9月6日“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8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370页。

毫没有让国民党左派掌权甚至联合他们的意图了。第三方面则是,中共上述决案通过后的半个多月,斯大林便于10月6日指示罗敏纳兹立即动手在广东组织苏维埃,提出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农会和农村”,组织广州工人纠察队,教会他们使用武器,在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里设立契卡和革命法庭。像谭平山那样的动摇分子,一定要清除,给他一个名誉头衔。^[1]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又在“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乌托邦的幻影——广州苏维埃,以其取代武汉汪精卫政权和南京蒋介石的政权。^[2]

各方博弈活跃,好像是在唱“三岔口”或“四岔口”。

讲到宋庆龄此时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坚定性时,不少论者和年谱编制者经常引用下面这段话:“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所以她主张尽快用“革命的办法”解决中国问题。^[3]那么这个“办法”是否就是中共和共产国际所述立即建立苏维埃和继续前阶段的土地革命政策呢?答案是否定的。她及其同道立即宣示而且努力争取的是领导中国革命,眼下立即要做的是“以革命手段”中止武汉和南京的“职权”。后来她做的是探讨不同于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走另外的道路去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

问鼎革命领导权的尝试。1927年10月22日,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在高加索一起商讨问题。^[4]虽没有更多材料说明他们商讨的细节,但几天后他们于1927年11月1日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二事不仅从时间上密切衔接,而且佐证了商讨的内容。

《宣言》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两点,一是宋庆龄等“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二是高举起“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立即着手筹备召

[1]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149—150页。

[2]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149—150页。

[3] 全文见《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9—52页。关于宋庆龄这个声明发表的前前后后,见“盛年谱”上册,第358—360页。

[4] 《邓演达研究与资料》,第355页。

集中国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起,本会职权即行撤销。

然而上引中共9月19日决议中“零星散乱”一词对于宋庆龄等人这个《宣言》事实上是一个凶兆,已经命定他们承担“革命领导之机能”的愿望成了泡影。事实上任何一个方面——中共、共产国际和国民党——都没有承认其“领导”地位。

不过当时这个《宣言》对于国内彷徨的人,对于正在组建第三党的谭平山像“号角晨钟”。^[1]但事情迅速演变,《宣言》发表后不到半个月,谭平山便被中共开除出党。^[2]理由是与邓演达秘密试图组织第三党,其性质是“主张取消中国C·P·”,他“向知识分子中”做的工作被定性为“反对中央另组第三党之宣传”,甚至到了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谭平山的罪状还有一条即“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3]继1927年7月14日辞去国民党农民部长一职后,这是谭平山政治生涯中又一个重要转折,第三党的秘密筹建在国内受阻,但没有停止。

不过,同情第三党的人数却在增加。继南昌起义后又有秋收起义,口号越来越激烈,到12月11日发生了广州起义,它遵循的是《共产党宣言》关于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信条,提出了与十月革命一样的口号“一切权力归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组织机构也仿效苏维埃政权,部委领导称“委员”,如张太雷是人民海陆军委员。起义者要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要在“两点钟内赤化广州城”。当时做法是“杀尽一切地主豪绅”,^[4]起义者被要求“尽死力鼓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

[1]《上海农工党专辑》,第7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82—483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82—493页;《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解释谭平山被开除的理由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

[4]广东暴动时提出的基本纲领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0页。

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1]起义当天便就地杀死了15名军官。^[2]几个月前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左派”将军张发奎和北伐名将黄琪翔、李福林、朱晖日等联合镇压了起义,成了“杂种们”、“王八蛋们”,他们杀死的起义者达4 000名,一些女工被活活烧死,军阀们“亲自枪决劳农国家——苏联的(副)领事”。^[3]是年8月1日联合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国共人士至此彻底分道扬镳。

这年4月上海建立了苏维埃性质的市民代表会议并行使职权,但遭蒋介石屠城,上海街头被害者尸骨未寒,血雨腥风中又是一大批平民死伤,广州苏维埃政权昙花一现,两天后就消失了。共产国际代表被召回苏联。许多起义的参加者逃亡香港。又一批国共人士在考虑中共的路线是否正确。1928年初张国焘、陈独秀在香港讨论过摆脱共产国际,以原来的同志为基础“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问题。还有的人也在寻求不同于中共的另外一条道路,叶挺便是其中之一。早在北伐期间他就反对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认为“不能这样开展农民运动,这会破坏北伐”,农民运动领袖来请领指示时,叶挺拒之门外。^[4]中共决议认为叶挺在广宁不准农民大杀土豪劣绅,表明他“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5]到广州起义时,叶挺不赞成总的方针,被认为是“临阵脱逃”^[6],但是叶挺最后还是选择了有别于中共的道路。

在香港他们得到彭泽民的帮助,彭是中共的老朋友,同时也是第三党的最早发起人之一。1927年7月14日在会上得知汪精卫要分共,他便愤然离开会场,当机立断将情况告诉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等,并资助他们秘密逃走。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邓演达一同被国民党

[1]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1927年11月28日),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资料》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2] 林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15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76、578页。

[4] 《工农红军司令部第4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的速记记录》(1927年9月14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3卷,上册,第103页。

[5] 《中央通告第13号》(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99页。

[6] 向忠发说叶挺参与讨论广州起义的计划,但临阵脱逃,我看这与谭平山的影响不无关系。见“向忠发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2月11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3卷,上册,第293—294页。

“永远开除党籍、通缉归案严办”，这才到了香港。广州起义后来到这里的共产党人靠他的帮助，有的转赴上海，有的到了苏联。

三、宋庆龄的微妙处境

宋庆龄在莫斯科的微妙处境，由三个因素构成，一是她同蒋介石之间的私人来往函电被公布；二是公布函电的决定竟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做出的；^[1]三是做出这个决议的时机——广州起义失败之后。

莫斯科的态度。莫斯科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最直接的解释，是广州起义失败后蒋介石于1927年12月13日宣布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并要求撤走苏俄领事馆。显然贵为“国母”的宋庆龄在莫斯科眼中是一个重量级的砝码。广州起义前后她正准备回国。蒋介石说广州起义是苏联“代理人”“在广州进行大屠杀”，并说宋庆龄因受到胁迫才做出不回国的决定，希望她早日归来“为党做更多的贡献”。宋庆龄严厉斥责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告诉蒋是她自己决定留在苏联的，并以此向他表示抗议。^[2]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信中并没有一句颂扬广州起义的语句。纽曼和罗米纳兹奉召回苏联之际，正是蒋介石、宋美龄新婚燕尔之时，莫斯科是否有意离间蒋介石与宋庆龄的关系，并在世界舆论面前造成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的印象以对其施加压力也未可知。蒋介石同宋庆龄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方法予以判断。

以上可以称为宋庆龄在莫斯科活动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自“左爷”向忠发派性大发，第三党被定性，宋庆龄离开苏联前往德国。

筹划建立第三党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已如上述。问题在于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一度支持过邓演达、宋庆龄等的活动，否则绝对不可能有《莫斯科宣言》的发表。但是广州起义的失败，共产国际

[1]《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2号》(1927年12月23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 上册, 第192页。

[2]《宋庆龄书信集》上册,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8、11—12页。

内部的分歧,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博弈,加上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忠发、苏兆征、李震瀛特别是向忠发^[1]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左性大发等种种因素,“江浙同乡会”的案子还没有平反,^[2]中国人又针对自己的同胞制造了另外一起冤案。这就是为第三党定性。作为该党筹建者之一,宋庆龄的处境也因之发生了微妙变化。

斯大林因素很重要。国共分裂后,斯大林急于推卸由于自己“糊涂”而造成的种种恶果,便把陈独秀当了所谓中国革命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替罪羊,中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使本党创始人、党的领袖、总书记长时间里蒙受着奇冤,斯大林的做法在中共党内开创了“总书记反党”的恶劣先例。

1927年莫斯科11月7日红场事件^[3]激怒了斯大林,他担心托洛茨基或其它“错误”思潮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山大学的年轻人,也怕为自己在中國问题上的错误决策负责,便剪除政敌,把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广州起义的失败,共产国际丢了面子。^[4]蒋介石公开反苏,这年初,鲍罗廷夫人鲍罗廷娜被张宗昌扣留达5个月,^[5]苏联对华外交陷于相当尴尬的局面。

令斯大林担忧的还有来自中国的报告,称在国内一些地方,许多知识分子已经退出共产党,甚至有人要建立自己的新政党如谭平山,^[6]谭的行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影响,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也有一些

[1] 向忠发于1927年10月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与苏兆征、李震瀛组成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是共产国际扶植的中共第一任也是仅有的一任纯血统的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2] 这个案子直到1928年夏季由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兼苏联工农监察院人民委员部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干预才得到平反。РГАСПИ, 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43,第2—6、46—48页。已经发表的论文有:李永昌《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几个问题》,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4期。

[3] 中山大学的中國学生钦佩托洛茨基的热情革命语句、渊博的知识和杰出的口才,得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打压后,许多人为托洛茨基抱不平。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庆典后忽然有一大队人涌到红场,手持拥护托洛茨基的标语,喊着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

[4] O·A·密特凯维奇在1928年1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说,广州起义后许多工人或脱党或回避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或根本不参加党的会议,工会干部要么逃跑要么失业。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281页。

[5] 鲍罗廷夫人和苏联外交官40余人是1927年2月28日在“列宁纪念号”船上被山东督军张宗昌拘捕的,直到1927年7月才获释,其他人更晚些。

[6]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281页。

学员收到关于第三党的材料,而且呈增多之势。^[1]斯大林担心形势发展下去不利于“加强”中共组织,因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在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好像名为“真正的共产党”,为首者还有前总书记陈独秀,特别是据探报,心向“真正的共产党”者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人(于树德,前中共北方区委成员;李求实,1926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鼓动部部长;杨匏安,广州的活动家,一度是国共间的经常的联系人)。^[2]斯大林便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致电中共,不要急于立即组织起义,而要广泛动员群众为新的起义做准备,为此务必“加强党的组织”。^[3]“加强”的含义很清楚。

向忠发请共产国际替天行道。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向忠发便开始发力,^[4]共产国际对宋庆龄的态度也开始微妙变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左更加保险,不会犯错误。所以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索洛维约夫函询向忠发,求证关于第三党的信息时,后者通过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武兆镐(俄文化名彼得拉舍夫斯基Петрашевский)^[5]证实了以下情况:这些组织者拟将新党称为“农工党”,先在广州、上海开始活动,准备发表相应的声明,眼下正同身在德国的邓演达谈判吸收分子加入这个党的事宜。^[6]身为总

[1] 《索洛维约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莱特)致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6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291页。

[2] 《索洛维约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莱特)致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6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291页。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28年2月4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290—291页。

[4] 《苏兆征、向忠发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8年3月7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348页。

[5] 又名武剑西(1899—1973),河南巩县人。1922年上海同济大学毕业赴德国留学。在国外参加了声援中国工人的运动。1923年11月经由朱德等介绍加入中共,任旅德支部委员。1926年,由德国赴苏联,接受红军参谋总部特种军事训练。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任翻译(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355,第31页)。1930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在上海领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任务。曾受中共中央委派,协助宋庆龄组织欢迎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来华筹办“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代表大会”。1933年,调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此后在国统区从事文化界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宣传部处长。1953年任高等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副司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1954年,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与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林伯渠、瞿秋白、邓中夏、叶挺、王若飞以及国际友人斯沫特莱、斯诺等人都有较为密切的交往。“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患病后未得救治,死于北京。(王朝网络 wangchao.net.cn)

[6] 《索洛维约夫致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7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292页。

书记,向忠发十分不满的是,中山大学学员郭寿华^[1]竟早于他一个半月前便知道了这些情况。^[2]

于是曾经在中山大学讲演遭到起哄^[3]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浮出水面”。向忠发相继得到的报告涉及到许多中共领导人,他开始紧锣密鼓处理事态。1928年2月11日向忠发递交报告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说“中共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边,主要是广东的,反对中共;被列举的人有杨匏安、冯菊坡、郭瘦真、阮啸仙、张善铭、于树德、李求实和湖北省委的一些人。说好像周恩来也有些动摇,现倾向于谭平山。就连素有“铁军”将领之称的叶挺,也被翻出旧账,说他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向忠发认为“这与谭平山的影响不无关系”。谭的罪名是否定武装起义的策略,号召建立工农党。紧接着,向忠发使出杀手锏,为这个组织和这些人定性: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他的具体建议是:目前在柏林的廖焕星^[4]是邓演达与谭平山之间的联系人,与之关系密切。^[5]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6]研究中共分裂问题并制定相关措施,撤销廖焕星现职,另派人前去。^[7]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内的空气紧张起来。

又过了4天,2月15日,向忠发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呈上报告一则,它给人的印象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原来他把这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定性为“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半孟什维克”性质,故此建议尽最大可能与谭平山进行斗争,他把调门再行提高,要“从思想上揭露之”,

[1] 郭寿华(1902—1984),广东大埔人。五四运动时期活跃分子,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学生部长。1925年后加入中共,受广东省政府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5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副武官,后代理武官。1984年在台湾去世。

[2] 《向忠发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9次全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2月11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3卷,上册,第293页。

[3] 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版,第165页。

[4] 廖焕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柏林组的工作人员。

[5] 邓演达的夫人从中国给他的汇款和信件也由廖焕星转交,《邓演达研究与资料》,第355页。

[6] 此次全会于1928年2月9—25日在莫斯科举行。

[7] 《向忠发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9次全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2月11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3卷,上册,第293页。

以便“从组织上巩固”中共。^[1]

斯大林一锤定音。向忠发曾要求同布哈林等面谈,向其汇报迄今他们“还不了解的过去中共的情况”并请领指示。^[2]情况重要,更高一级的斯大林亲自过问此事,接到向的信件八天后,2月23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把向忠发使用的“半孟什维克”中的“半”字去掉,升级为“孟什维克”。决议称:“中国共产党应当对那些原共产党员谭平山等为组建名为‘真正共产党’的‘农工党’,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做法进行无情的斗争。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它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3]又过两天,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把这一段写入正式决议。^[4]再后,斯大林的观点载入了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内称“第三党”、“工农党”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共要“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5]

邓演达致宋庆龄的信被截获后。不管当时宋庆龄对于上述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共等的决议和运作是否知情,第三党整体上已经不在“革命阵营”了,“涉嫌”第三党者的境遇发生剧烈变化也顺理成章了。就在向忠发紧锣密鼓“调查”第三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要情况,2月17日和2月21日宋庆龄给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写了两封信。^[6]邓演达回了信,主要谈的是第三党。可是信被截获了,全文如下:

庆龄姊姊同志:

Ball Searow, den 28/ II 28

接到你 17/ II 的信时,我打算晚几天再写信给你,方才又接到你

[1] 如他说,彭述之与蔡和森有矛盾,可是又联手攻击瞿秋白,罗亦农也参与。组织部长周恩来“优柔寡断”,陈乔年未得党的允许改组了武汉党组织。至于陈独秀,很难说就不会跟随谭平山。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300—3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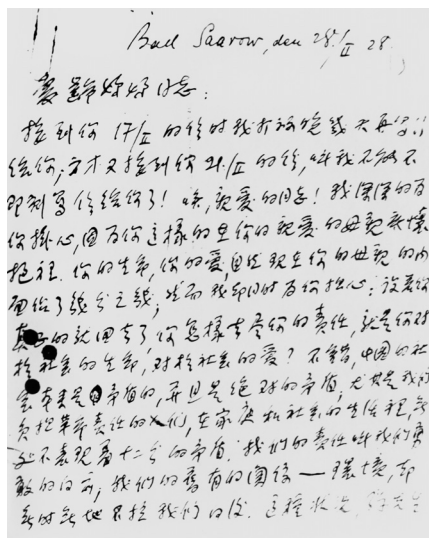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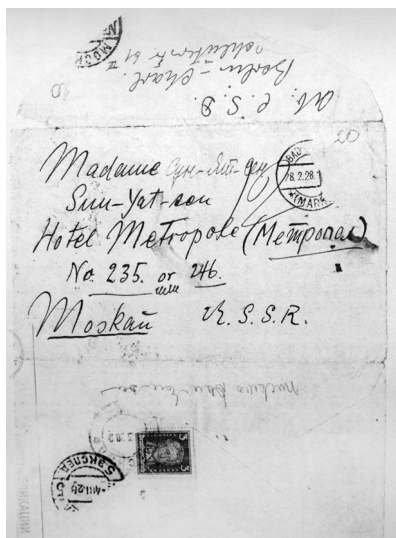
[2] 迄今未见布哈林会见向忠发的情况,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301页。

[3]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1号(1928年2月23日)”,《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共产国际(1919—1943)》(Политбюро РКП-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 (莫斯科)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4]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93页。

[5]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08页。

[6] 这些信至今我们没有见到。



21/II的信,叫我不能不即刻写信给你了。咳,亲爱的同志!我深深的为你挂心。因为你这样的在你的亲爱的母亲的怀抱里,你的生命,你的爱,自然现在你的母亲的内面占了几分之几;然而我却同时为你担心:设若你真正的就回去了,你怎样去尽你的责任,就是你对于社会的生命,对于社会的爱?不错,中国的社会本来是矛盾的,并且是绝对的矛盾,尤其是我们负担革命责任的人们,在家庭和社会的生活里,无处不表现着十二分的矛盾。我们的责任叫我们勇敢的向前,我们的旧有的关系——环境,却无时无地不拉我们向后。这种状况,孙先生也深深的虑着,尤其是在他后半期的政治生活里。不过,孙先生勇气和决心坚强的狠,把一切落后的牵挂都先后的打破了罢了。

庆龄姊姊!我是赞成你回去一躺[趟]看你的亲爱的母亲的,如果她真是有病;但是我不赞成你回上海^[1]去,我盼望你能设法请你的母亲无论如何到日本去,你到日本去候她。这样子可以得着许多益处,免去许多害处。第一,日本的地方养病好些,方便妥当些;第二,可以免去国内反动关系的欺骗牵扯;第三,可以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因为一件事做成两件好事。我最近接到国内无量数的信件和请求——都是叫我转致意给你的。彭泽民最近有一封很恳

[1]下划线为原文所有,下同。

切的信来,我明后天就转给你看。总合起他们的意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我已经有过一封信给你,稍稍问你现在的意见,因为你从前的意见,我已经知道了的。我以为继续总理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不过一切纲领政策口号及组织自然要十二分具体的指出,才能免去过去国民党的招牌人人可以顶戴,国民党的说法人人都是可以接受的混淆暧昧底性格。因为这十二分重要的使命,我必然要和你详细商量;但是我现在必不能到莫斯科去,因为我如果现在就去,那党的组织必不能成功,你可以知道这个种关系的。我——以及国内多数同志的意见,我们应该到日本去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趁这个机会先去日本。我现在决心三月十号出院工作,等待几个月后即到日本去做工,你应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但是我盼望你十二分的留意秘密。

因为说话的方便及一切方略的决定,我们有亲口谈一次话的必要,望你能设法到德国来一次。一来在回国前可以借名浏览西欧景色;二来可以多得些消息。我十二分的盼望你能秘密进行这个工作罢!你的母亲即使有病,迟三五天见面不十分要紧的,望你一面有以安慰亲爱的母亲;一面更有以安慰国内无数渴望我们——尤其是你——的青年及工农同志也。各事要和你面谈的很多,恨不能插翼飞去和你立刻见面!!!

叶挺有信给我要来德国,我前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盼你告诉我?我的病到三月十号业算完结,我不再被病了!我十二分的盼望你放心,安慰,拿着你的决心和勇气去安慰你亲爱的母亲!祝你的康健。

弟演达^[1]

信惊动了斯大林。宋庆龄是否收到这封信,目前已经无法查证。能够见到的是,信被译为俄文交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2]信封完好地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这封信

[1] РГАСПИ, 全宗514, 目录1, 案卷355, 第19—20页。“盛年谱”上册第391—393页将此日期错标为“2月22日”。

[2] РГАСПИ, 全宗4, 目录1, 案卷355, 第17页。

遂引起了一阵波澜。

3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会议并就邓演达信中提到的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人一一做出具体指示。

关于叶挺,斯大林听信某些人的报告,^[1]认为他反对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应组织一个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因邓演达上信中说叶挺可能前来,那么斯大林便令叶挺到“疗养院住一个半月,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提高军事素养”。为不让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很快相见,斯大林再做如下安排:

“最好让她到美国去一两个月,做报告,发表演说,宣传苏联和中国”。这里又听出了“利用”宋庆龄的音符。至于宋庆龄是否独自前去,政治局决议中使用的词句是:“如果宋庆龄愿意让刘克司^[2]同志陪同,不反对他前去”。^[3]

显然,米夫对邓演达、宋庆龄依然在磋商建立第三党一事保持着“高度警惕性”,既然斯大林已经指示,作为下属,米夫紧紧跟上,第2天,3月23日,就来具体落实,他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名义向加拉罕和伏罗希洛夫就宋庆龄问题提出四大项计九条建议。

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要“利用”宋庆龄。建议联共(布)中央,由“负责同志与宋庆龄谈一次话,摸清她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第三党决议的态度”;“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制定利用她及其同道的方针”。此外,讲到如何对待宋庆龄时,米夫使用了обработка这个词,其含义是“加工”,用什么原料“打造成”一件什么东西,如果用于对人,则有“劝说”的意图,不过修辞上带有俗话色彩,类似我们说的把某人“修理一番”,也就是改造某人的意思。为此,他提出的措施是安排她参观苏联建设成就,安排人为她讲课,^[4]让她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大会等。

至于宋庆龄的角色,这个文件明确了“利用”的基调。米夫捡起

[1] 如 Г. И. 谢苗诺夫 2月15日所做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 上册, 第311—312页。

[2] 原名 О. Ю. Пличе 普利契, 1926—1927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时与宋庆龄相识。

[3]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6(特字第15)号》(1928年3月22日),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 上册, 第352—353页。

[4] 此词原文为 ректор, 指的是中山大学的教师, 并非“讲解员”。

了鲍罗廷在中国时使用的对待国民党的“楔子策略”，即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打进楔子，分化国民党，利用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或剔除右派。米夫认为在国共关系方面，“可以利用宋庆龄来分化国民党的军阀上层，保证把国民党左派挖出来参加与中共联络的工作”。在国务活动方面，则“利用宋庆龄向南京、武汉和冯玉祥这三个中心施加压力，迫其恢复同苏联的关系”。说到“利用”宋庆龄之口发布有关苏联的“正确”信息时，米夫不仅毫不遮掩共产国际为苏联外交服务的打算，而且要她“大义灭亲”，揭露国民党领导人孙科、胡汉民、伍朝枢（当时在土耳其），“和所有帝国主义报刊的反苏言论”。想使母亲攻讦儿子（虽然孙科并非宋庆龄亲生），这种惯用的伎俩，我们已经熟悉了，1927年4月蒋经国、邵志刚（邵力子之子）都曾由共产国际布置向报界发表声明，批判他们各自的父亲站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一边扼杀革命，并宣布不承认他们为父。

在米夫的建议中，在社会活动方面，宋庆龄被共产国际赋予的作用是：“由她牵头提出在中国建立反帝大同盟^[1]分部的计划，同时保证这个广泛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合法掩护”。对于第三党的积极组织者邓演达，米夫与斯大林一样，提出的是“分而治之”的做法，称如果对宋庆龄这样做“有效”，就把邓演达叫到莫斯科来，但是务必“让他与中共更加密切地合作，以期把他派上与宋庆龄一样的用场”。^[2]

至于叶挺，共产国际要让他离开柏林和宋庆龄，把他调到莫斯科

[1] “盛年谱”上册，第385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下用“尚年谱长编”）（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均称该组织由宋庆龄倡议建立。此说待考。据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档案“反帝大同盟”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Archives*，它是由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1927年2月创立于布鲁塞尔。此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与流亡瑞士的列宁接触。他是1915年青年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德共党员，十月革命后明岑贝格为伏尔加河一带饥民募捐。1927年反帝大同盟创立时，得到法国作家、共产党人巴比塞、作家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积极支持。其宗旨是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斗争，这个组织的建立是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一部分。1928年共产国际将阶级斗争路线引入同盟后，英、法等许多国家的非共产主义成员退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9年7月该组织首先在上海建立，随即其他方也先相继建立，如是年12月建立的哈尔滨反帝大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它吸引了广泛的社会阶层。

[2] 《米夫致加拉罕的信》（1928年3月23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3卷，上册，第356—357页。

来,参加广州起义一周年的纪念活动。^[1]

不言而喻 1927 年 11 月 1 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莫斯科宣言》中关于“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努力已经被釜底抽薪。

四、斯大林表态 宋庆龄离苏赴德

邓演达继续争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帮助。邓演达于 1927 年底到柏林后,就第三党事曾经给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职的武兆镐写过信。宋庆龄来德国前不久,1928 年 4 月 25 日前^[2]他又通过武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关于第三党的详细报告。于其中分析了中国政情。

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彻底消灭封建残余,进行反帝斗争,同时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可是“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因为它完全放弃了反帝和民主思想,因而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而中国共产党仅仅“代表纯粹无产阶级的利益”,由中共充当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还为时尚早。目前中国需要一个能够“代表非无产阶级阶层——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城市自由职业者、学生等的利益”的政党,因此第三党的建立是“客观”需要,这个“中华革命党应该领导起所有民主分子,并努力吸引一切反帝群众,以加强和扩大革命的实际力量”。邓演达表示,如果“出现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第三党”,那他“会加入,相对的条件是同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合作。没有这个条件,第三党势必会客观上落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阵营”。邓演达表明他“对任何反动封建势力”都不会妥协,更“不会助桀为虐”,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朝着民族民主方向前进”。

4 月 25 日布哈林、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曾为苏联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的加拉罕,收到了米夫交来的这个重要文件。^[3]

[1] РГАСПИ,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355, 第 48 页。

[2] 目前所见报告是俄文本,上面没有标示日期。米夫将报告呈送布哈林、斯大林等人的时间是 1928 年 4 月 25 日。РГАСПИ,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355, 第 21 页。

[3] РГАСПИ,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355, 第 21 页。

在此前后谭平山也从国内给邓演达发电报,说要同第三国际联系。^[1]事实证明,这已经不是1927年《莫斯科宣言》发表时的状况了,邓演达、谭平山的“同共产国际联系”到这时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共产国际不仅不会帮助他们建立第三党,而且早就布下监视的网,还在1928年2月,宋庆龄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不仅掌握了邓演达的情况,而且通过秘密渠道安排廖焕星给“美国党中国组书记施混同志,预防第三党在美国的活动”。^[2]这一切都不是吉兆,宋庆龄、陈友仁 and 邓演达等在国外为第三党所做努力前景可虞。

宋庆龄等人能否得到苏联援助,答案也清楚了。斯大林同陈友仁谈话时,劝陈回国参加革命运动。陈友仁并未“听劝”,因他不愿意过问中国政治,不愿意与蒋介石合作,同时他认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首先是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只有在发生日本侵略时才有可能。^[3]

这个背景有助于理解斯大林所做的表态。有人说宋庆龄也会见过斯大林,笔者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会见的原始记录,^[4]宋庆龄本人说他们见面是1927年,在加里宁家中。^[5]但无论如何,结果是清楚的,宋庆龄写道:“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

[1]《李维汉致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8年5月25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第3卷,上册,第411页。

[2]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243,第30页。

[3]陈友仁之子陈丕士说父亲是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斯大林的,见其书《中国召唤我》,第164—165页。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找到这次会见的档案文件。2010年9—10月间本文作者向РГАСПИ保管部В.Н.Щечлина女士求助,回答称在斯大林会见的外国人士档案中目前尚未发现与陈友仁谈话的记录。

[4]2010年10月11日承蒙前述В.Н.Щечлина女士相告,目前只发现了斯大林同宋庆龄的会见(1953年1月13日)的标题,没有具体内容。还可参见《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杂志1998年第4期。

[5]《百年潮》2008年第5期第47页记载郭沫若、宋庆龄等与斯大林1953年1月的会见时提到,宋庆龄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曾会见过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是在加里宁同志的家里见面的吗?”这话仅仅肯定他们见过面。如果是在加里宁家中,那很难说是正式接见。另外,关于他们会见的时间,斯大林说“我们要二十五年才能见一次面呀”这个“25”不过是个粗略的数字。

据曾经担任陈友仁、邓演达和宋庆龄秘书的章克从陈友仁处听说,在宋庆龄离开莫斯科前不久,她和陈友仁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宋庆龄感谢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并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表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则“希望她和她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讨论,以后派信使去中国联系”。陈丕士在《中国召唤我》一书(第164—165页)没有说明会见的确切时间。

爱泼斯坦书(第240页)也引用这段话说,宋庆龄(或有陈友仁)是以“国民党左派身份”会见斯大林的,这样的语境很难成立,因为早在1927年10月之前中共就放弃了国民党的旗帜,斯大林不可能再让国民党左派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除非他们的会见是在此之前。

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呆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1]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2]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3]此信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她对“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的事情在50多年后的1981年依然记忆犹新。

五、中华革命党 宋庆龄在德国

1928年5月^[4]初宋庆龄到达德国,住在邓演达为她安排的地方。她不像在苏联那样是贵宾,而是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在邓演达的帮助下潜心钻研中外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他们在生活上也互相帮助。^[5]共同的目标是促进中华革命党的建立。

国内外遥相呼应。当时国内还有其他一些派别,如陈公博的改组派,^[6]但他既反对中共也拒绝与共产国际合作,对第三党抱排斥态度。谭的第三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因其主张推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不顾中国客观上的可能性,一味据主观愿望制定政策,“所以要批判他的纲领和行动”。^[7]至于第三党的名称,原来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叫法。1927年夏,谭平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左派联合会”时,章伯钧、朱蕴山、张曙时等在名称上各有所见,但其政治主张说明他们选择的是介乎国共间的第三条道路,“外界在尚未获悉其组织名称、政治纲领和社会基础之前,便以主观揣测,或属恶意歪曲,

[1] 邓演达约于1927年12月赴德。

[2] 黄琪翔(1898年9月2日—1970年12月10日),字御行,广东梅县人。1926年参加北伐,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上将。1931年起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的领导。抗战时先后任集团军司令、赴缅甸远征军副总司令,获国民政府嘉奖。1947年第三党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黄任秘书长、副主席。1949年后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时再受人身冲击。1970年逝世。

[3] 宋庆龄晚年写给爱泼斯坦的信是目前唯一可用的材料,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40页。

[4] 宋庆龄到达德国的时间目前说法不同,“尚年谱长编”(上)(第212页)说是5月4日,“盛年谱”上册(第400页)说是“5月1日”。

[5] 《邓演达研究与资料》(第357、358页)邓给妻子信介绍了在柏林生活的拮据,“孙夫人还答应帮助我,我才能够留在欧洲呢!”

[6] 成立于1928年5—6月间,主要人物是陈公博、顾孟余,办有《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主旨是反蒋、要求改组国民党,另外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激烈的政策和主张。

[7] 《上海农工党专辑》,第10页。

称之为“第三党””。^[1]谭平山坚持按照当年孙中山在日本使用的“中华革命党”来命名这个组织,并将此事告诉已经在欧洲的邓演达,所以邓演达写给宋庆龄的上述信中告诉她“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组党。

谭平山草拟的《政纲》,先在国内油印12份,在一定范围内讨论过,有人说这“是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而以共产党的面貌出现的”。在政治上,《政纲》明确表示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反蒋即“反对阶级独裁及以党专政的变相的社会官僚主义”,经济政策一主要目的是建设超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从中能够看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关于人为缩短社会发展进程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此文件虽然也引用了莫斯科宣言,但是邓演达认为谭的《纲领》不红不白,“行不通”,他主张改组国民党,继续三民主义,复兴中国革命。^[2]

就这样,该党发起者事实上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开始了工作。1928年初它处于萌芽状态,未曾正式开成立大会便已经成立。地点在上海福煦路国民里14号,由戴盆天夫妇看守。内定有负责联络者和联络的地区如北京、江西、四川等,并在筹划军事活动。谭平山“总指挥”。1928年6月13日中华革命党“主席团”发表第一号《训令》;为呼应宋庆龄的《莫斯科宣言》办了一个刊物《星》。^[3]1928年5、6间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渗入各大学,联系和发展了许多大学生。影响不断扩大,已经到了北京,如上述,甚至到了莫斯科。

尽管谭平山和宋庆龄、邓演达等遥为配合,但宋庆龄的访苏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她是怀着对莫斯科的失望前往德国的。邓演达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但是无论后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根本不可能再与他和他的同道合作,回报他的是向忠发与共产国际联合中共制造的一起冤案。这起冤案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已如上述。

宋庆龄在德国时,有一位德俄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罗比列(Fride

[1]《上海农工党专辑》,第8—9页。

[2]《上海农工党专辑》,第11页。

[3]该刊由马哲民主编。另外还出版《科学三民主义》,并开办了书店等。

Rubinet)“受驻柏林苏联使馆之命”与之“往返”,此人在德共中央做宣传、教育及报告等工作。^[1]莫斯科方面通过他可以把宋庆龄的活动了解的一清二楚。廖焕星在5、6月间接触宋庆龄后,曾表示“极力反对援助左派国民党或及第三党”。^[2]

不管宋庆龄对这一切是否知情,她并未放弃筹建第三党的工作。她一直在思考,在研读。有时她觉得“也许共产党是对的”,她的“对”与错标准是什么呢?是共产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3]

为说明她的内心,还有一个事情也颇值得提及。得知有来自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办了一个学校,“他们的政治见解与孙博士接近,在许多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蔑视社会民主党”,她发生了很大兴趣,愿意前往了解并且期望将来有可能时派遣一些中国青年男女去学习。^[4]在莫斯科一年多的生活和经历后,在莫斯科见证了中山大学的情况,例如邓演达的讲演遭到起哄等情况后,她的思想感情依然与当年的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批判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时^[5]一样,她的政治倾向即选择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的做法,是不可忽略不计的。

宋庆龄的同道受到株连,她本人的处境也变的艰难起来。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番明里暗里操作为第三党定性后,1928年5月25日,一则上海来信向共产国际提供了确切情况,是关于第三党的秘密报告,内称该党组织者邓演达、宋庆龄、谭平山、陈友仁、唐生智、黄琪翔等已经决定用中华革命党为名组党,他们与国内的谭平山密切联系,甚至已经讨论正式的军事计划。^[6]这个情报确切无误,6月13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成立。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中共

[1] РГАСПИ,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355, 第 32 页。

[2] РГАСПИ, 全宗 514, 目录 1, 案卷 355, 第 32 页。

[3] 《宋庆龄致杨杏佛函》(1928年8月21日),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4] 《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10页。

[5]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3—426页。

[6] 《李维汉致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8年5月25日),*ВКП(б), 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第3卷,上册,第411页。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莫斯科也继续采取措施,监视“涉嫌”人员。

廖焕星本是中共驻柏林组的工作人员,也是邓演达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人。他因在5、6月间接触宋庆龄,便“涉嫌”第三党而遇到麻烦。先是中共于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于8月间“正式决定廖焕星同志……担任中国共产主义大学(即此前之孙大)中国问题研究室^[1]管理并整理中国书报工作”。让他离开柏林回到莫斯科,^[2]后是他在共产国际受到指控,被立案,“交联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审查”,^[3]柏林中国组也被要求把关于这项问题的材料请罗比列写出证明信,说明其是否“清白”,以及他对待宋庆龄等人活动的态度。^[4]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到1928年11月13日已两次催促他速来莫斯科,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目下行将开始”审理其案件。^[5]

在国内,中共在1928年5月11日就此事通告全党,说第三党“咒骂”工农暴动,“深恨工农运动过火”,反对C·P“超过时代”的政策而“背叛工农群众”,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活动,“勾结张发奎、唐生智、张贞等失意军阀”,他们“哄骗群众”,正在筹建一个党,但“名称还没有确定”。第三党现在的活动已经证实他们是“效忠于豪绅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走狗”。^[6]

同时,中共已经在国内对第三党进行斗争,开始派遣“可靠的同志去第三党中做侦探”,并向可能受他们影响的工农群众“揭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驱逐出去”。而且中共也为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群众”做了许多工作,“使他们归于”共产党“影响之下”。^[7]就这样,昔日一个战壕的战友变成了“哄骗群众”的人而落

[1] 这个机构的名称应该是“中国问题研究所”(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по Китаю),设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内。

[2]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355,第48页(原档页码不清,系据前后文件页码猜测)。

[3]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355,第48页(原档页码不清,系据前后文件页码猜测)。

[4]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355,第32页。

[5]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355,第48页(原档页码不清,系据前后文件页码猜测)。

[6] 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1928年5月11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4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9页。

[7] 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1928年5月11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4册,第58—59页。

人被“揭破”“面具”者的行列。

作为第三势力的中华革命党处境相当艰难。因活动经费,又因内部分歧,章伯钧请谭平山辞职,劝邓演达回国主持工作。^[1]

宋庆龄、邓演达先后回国。在德国,组建新政党的努力并未停止,叶挺关心第三党筹备的情况并到了柏林。^[2]黄琪翔也从日本前来,8月偕叶挺与宋庆龄相会,讨论把忠于国民党的人士集中起来,建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尽早回国的问题。^[3]

也是在这个月,郑太朴随太虚法师赴欧洲讲学,随身带上了谭平山的《政纲》,交给邓演达。^[4]

他们的活动环境绝无宽松可言,除前述“涉嫌”人员受到审查外,直接参与组党的叶挺,本已有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的“前科”,受到跟踪理所当然,中共代表团令其柏林组注意叶挺的行踪并报告“叶同志在柏林担任何项工作,有何活动,是否参加中国组经常会议等”,并指示“叶挺同志转党事暂待”。^[5]

宋庆龄的境遇是什么呢?她是被“批判”的对象。向忠发等运用共产国际传统的“斗争”哲学,在1928年11月10让最了解宋庆龄活动情况的人出面,“决定廖焕星同志在最短时间赶做几篇反对邓宋等第三党的文章”。^[6]

1929年4月底宋庆龄与邓演达商议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邓演达派遣黄琪翔以宋庆龄秘书的身份陪同,^[7]行前她向报界发表声明,称回国仅仅是为了参加孙中山的安葬仪式,今后绝对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8]这个声明的英文稿也寄给了孙中山葬事筹备处的总干

[1] 《上海农工党专辑》,第19页。

[2]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355,第20页。

[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59页。

[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1页。

[5] РГАСПИ,全宗514,目录1,案卷355,第39—40页。

[6] 笔者尚未见到廖焕星直接点名批判宋庆龄的文章,但他所在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开展了对于三民主义系统的批判,有卡拉·穆尔札的《孙文主义的阶级实质问题探讨》,[俄文]《中国问题》,吴永清译,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4辑;又,安东诺夫《孙文主义与中国革命》一书,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1931年。

[7]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5月15日,引自“尚年谱长编”(上),第223页;又见马烈著:《农工先驱邓演达》,第117页。

[8] 《宋庆龄选集》上册,第72页。

事杨杏佛。^[1]5月6日宋庆龄动身回国。结束了在国外近两年的生活。

尾 声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虽“有纲领、有组织、有活动,但它的名称在开展活动中并未统一采用,它的纲领经谭平山草拟后并未通过,它的组织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并未正式成立”,但它“恰似一个胎儿”为1930在国内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事先打下了组织上的基础。^[2]宋庆龄在国外不为政事纷扰,有比较充分的时间研读和思考贯彻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1930年9月1日《革命行动》(半月刊)创刊号发表了邓演达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反映的是邓、宋等经研读有关著作形成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思想,它与谭平山的《政纲》基调相同,贯穿其中的并不是十月革命剥夺有产者的政策,依然是孙中山循序渐进以和平手段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思想。

请看《主张》说:

“主佃两方,暂时共享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其形式以契约定之”,这里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音符,事实上否定了十月革命的没收政策;

“平民政权”的阐述称:“要使农工的利益都确实得到保障”,从而否定了“共产党只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的做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且批评“共产党只盲目的追求未来的空想”。

就社会政策而言,《主张》称:“共产党在目前要使中国社会更穷乏混乱化,我们却要使中国新的社会秩序早日形成”。^[3]

这使人想起著名的德国社会活动家罗莎·卢森堡。十月革命后她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说他们的政策:必然使“苏维埃的生机”受到“压抑。没有选举制,没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各派思想不能自由竞争,任何一个社会机关都会没有朝气……而且这种状况势必

[1] “盛年谱”上册,第417页。

[2] 《上海农工党专辑》,第20—21页。

[3]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35—436页。

导致社会生活的野蛮化——谋刺、杀人灭口等”现象的发生。她认为“把贫穷当善举……并且将其当作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结果是“给国际社会主义帮了倒忙。”^[1]

事实上，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谭平山等在1927年已经在中国见到了类似十月革命的状况，恰恰是不希望这一切重演，才有他们的上述活动。

爱泼斯坦引述过宋庆龄1927年9月在莫斯科所说的话“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2]他做出的结论是：宋庆龄“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同毛泽东稍早时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3]。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因为当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持异议者并非“反对土地革命”或“反对农民获得经济解放”，分歧的焦点在于通过什么道路去达到这种解放，是通过政治手段即苏俄式的杀鸡取卵的暴力“革命”道路，还是通过养鸡生蛋的渐进道路。

同样，笔者也不敢苟同年谱作者关于宋庆龄“充分肯定了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斗争”。^[4]评价一个人的活动，应以其活动的社会效应为准，以其是否符合社会健康发展为准，而不能以人划线，仅看他是否赞成某领袖某政党的观点和政策，这不仅有失公允，而且也不利于全面客观研究作为政治家的宋庆龄。

再者，宋庆龄遵循的是孙中山的遗愿，对于苏式共产主义，孙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时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主张。迄今为止没有史料说明宋庆龄不同意孙中山的那些观点，她的大量言行表明她矢志于实施和贯彻孙中山的思想，特别是在农民和土地问题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她才和谭平山、邓演达、陈友仁等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才是他们从1927年夏开始筹备第三党的初衷。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无论中共还是共产国际都开始检讨此前

[1] 罗莎·卢森堡：《俄国的悲剧》，载其《文章、言论、书信选集》，第327页，莫斯科，1991年。引自俄罗斯科学院通史所编：《共产国际史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2] 《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5—57页。

[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25页。

[4] “尚年谱长编”（上），第200页。

的土地革命政策,为了共御外侮,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改变了其激烈的土地革命路线,“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事实上与孙中山当年的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观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实行的“三农”政策和中国农村乃至全社会的发展,无不说明那种“你死我活”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哲学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

正义的、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举动不会因时间而泯灭,邓演达回国后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该组织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1947年再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沿用至今。这一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参加政协,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事实本身就是对极左路线的否定。

就像当初陈独秀一样,第三党先后创建者的动机,也是为国为民,同样是冒着风险,有人在“被通辑”的状态中秘密活动着。他们或流落海外如宋庆龄、陈友仁、彭泽民、邓演达,或被开除出中共没有了活动地盘如谭平山,或被斥责为“临阵脱逃”如叶挺。在既没有军队保证,更惶论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党即使能够建立起来,能否维持下去,能否如宋庆龄等在《莫斯科宣言》中所说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责任,则另当别论。况且她在该党1930年成立时就看到:“至于第三党,称之以它将来的名字,能不能成事颇多取决于南京和北平之间争吵的时间长度。只有在此阶段,邓等才能够保持活跃。我看这一团体希望不大,因为它对南京和北平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2]

但是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平民政权”直到今天,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条件下也不失其意义。一味迎合共产国际的向忠发以左派自足,虽承认自己不谙政治,只知参加越左越革命的大合唱,狐假虎威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手对付自己的同胞,其坚定性似乎“高强”,但是他实际上只想苟且活命,到最后出卖了同志,以叛徒恶名把自己牢牢钉在了耻辱柱上。

蒋介石杀害了邓演达,共产国际和向忠发制造了第三党的冤案,

[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4页。

[2]《宋庆龄致杨杏佛函》(1930年8月30日),《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19页。

甚至组织批判邓、宋。第三党的教训毕竟是深刻的。

宋庆龄在苏联和德国的活动记载的是她寻觅革命道路的思想路程,昭显着她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奔走呼号,不随波逐流,不为权势所动,追求正义的高尚情操。她走着自己选择的道路,成为令世人敬佩的政治活动家。

(因腿部受伤,本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得由朱玖琳和马铭德二位热情帮助寄送材料,特此铭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玖琳)

宋庆龄眼中的蒋介石*

朱玖琳

[内容提要]

宋庆龄与蒋介石,一个是孙中山的爱妻,一个是孙中山的爱将,两人另有姻亲关系,但是两人均认为自己是孙中山革命遗愿的真正捍卫者,对方是伪信徒。蒋介石初期在生活上的不检点让宋庆龄一开始就对他很是侧目,不愿意让妹妹嫁给他;蒋介石“清共”,宋庆龄视之为“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闻邓演达遇害,宋庆龄怒发宣言,痛骂蒋介石等人是自私自利的军阀、政客;蒋介石大肆屠杀异己力量使得宋庆龄在宗教信仰上也对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在人格上,宋庆龄承认蒋介石终究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华北事变后,宋庆龄拥护蒋介石在抗战中的领袖地位,并支持他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担当起拯救中国的重任;抗日战争结束后,宋庆龄希望建立代议制联合政府,因而对蒋介石不改旧有传统独裁作风非常不满。

[关键词]

宋庆龄 蒋介石 孙中山 革命 国民党 共产党

宋庆龄与蒋介石,一个是孙中山的爱妻,终其一生都在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一个是孙中山的爱将,长期担任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党魁及中华民国首脑。两人另有姻亲关系,但是两人均认为自己是孙中山革命遗愿的真正捍卫者,对方是伪信徒。宋庆龄痛斥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叛逆者;

* 初稿用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10年8月主办的“蒋介石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为修改补充稿。

蒋介石则暗示宋庆龄不是一名忠诚的国民党员^[1]。

在大陆方面,十余年前,林家有、蒙光励二位先生已对宋庆龄与蒋介石进行过比较研究。^[2]十余年来,虽有很多新史料披露,但零星发表的论文并未出林、蒙二先生左右。究其原因,一是研究者对已公布的新史料未加重视;二也是因为新史料本身,尤其是宋庆龄档案文献在两岸的挖掘工作尚不够深入。就目前情况而言,研究者还不能做到充分使用两岸资料,超然两岸意识形态之外,对二者进行客观、科学的比较和评价。

但是,研究工作没有理由因此停滞不动。史料虽然有限,然十余年的积累毕竟还是有很多新的宝贵资料可供使用。做客观比较和评价的时机和条件的确尚未成熟,但我们至少可以先从二者本身各自出发,探讨他们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了解他们内心深处对双方分歧的认识和解释,从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目前,已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客观地分析了蒋介石对整个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解、判断和选择,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则披露了他对宋庆龄的真实看法,虽然着墨不多,但大体已很明了。与之相比,宋庆龄对蒋介石的评价则较多,比比见诸于她的私人书信、访谈记录,以及公开发表的宣言声明之中。它们起讫时间长,跨度大,从中亦可见蒋介石在不同时期在宋庆龄眼中的不同形象。

笔者试图从研究宋庆龄的角度出发,缕清宋庆龄在各个阶段对蒋介石的态度和评价,探讨两人分歧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对个人和中国历史的影响。

一、早年生活荒唐的蒋介石

宋庆龄婚前在日本担任孙中山秘书时就认识蒋介石,据日本外务

[1] 《蒋介石致宋庆龄电》(1927年12月18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 林家有:《试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蒙光励:《大革命时期的宋庆龄与蒋介石》,《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7卷第2期,1995年4月。

省档案记录,他们至少有过一次共同与孙面商国事的经历。^[1]蒋介石超群的军事才能使孙中山对其极为器重,曾把他评为党内水平最高的知兵者。^[2]孙中山广州蒙难,蒋介石应孙之召赴粤助阵,孙谓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3]

孙氏夫妇广州脱险返回上海后,蒋介石在莫利爱路孙宅首次遇到了宋美龄。那时的宋美龄为帮助刚刚遭受广州蒙难之痛的二姐料理家事,减少了社交和慈善活动,经常前往莫利爱路寓所,因而也置身于孙宅正在进行的军政辩论,并切实参与到这些讨论和决策之中。^[4]宋美龄的美貌和与众不同的气质使她在上海拥有很多追求者,蒋介石也对她一见倾心。据美国记者艾米莉·哈恩(Emily Hahn)所著《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一书记载,蒋介石随即认定宋美龄“正是他所想要与之结婚的姑娘”,因而他委婉地请求孙中山帮忙,说:“先生,我现在没有妻子。您认为宋小姐能被说动接受我吗?”^[5]孙中山没有直接去问宋美龄,而是先去征求了宋庆龄的意见。此时的蒋介石已与毛福梅离婚,与姚冶诚断绝了来往,但正在与陈洁如同居。孙中山与宋庆龄商议时,“宋庆龄情绪激动地回答说,她宁可看到妹妹死去,也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在广州至少有过一两个女人的男人,即使他是未婚的。”^[6]哈恩此书是在宋蔼龄的大力支持下,以采访宋美龄和宋蔼龄所得而成,并经宋氏姐妹认可后方出版,书中如此细节化的描述当未有误。

关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养,就连他自己都承认“狭邪自娱,沉迷久之”^[7],难怪有道德洁癖的宋庆龄无法接受这样的人作妹夫。

[1] 俞辛焯、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页。

[2] 李吉奎:《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孙蒋关系研究》,《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3]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1页。

[4] Thomas A. DeLong, *Madam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McFarland and Company, Inc. 2007, p56.

[5] Emily Hahn, *The Soong Sisters*, First e-reads publication 2003, p104. 该书原有中译本——《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为确保原意精确,拙文若干对该书的引用仍以英文原著为准。

[6] Emily Hahn, *The Soong Sisters*, p104.

[7] 转引自杨天石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1927年获知蒋宋联姻时,宋庆龄极为气愤,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对蒋介石人品的排斥也是原因之一。宋庆龄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这一婚姻的双方都是出于投机,其中绝无爱情可言。”^[1]但是从蒋介石在日记中的真心表白来看,宋庆龄误会他了,他的确是深爱着美龄以至“终日想念”。蒋一直在天理与人欲之间挣扎,与美龄结婚后,他皈依了基督教,内心世界有了上帝的监督,其对自身的道德约束自然越发严厉,早年的荒淫无度不再。

对蒋在个人修行上的改变宋庆龄是看在眼里的,她在1940年对斯诺说:“开始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合,但是,现在我认为就是了。美龄真心爱蒋介石,蒋介石也同样爱她。没有美龄,他也许会坏得多。”^[2]

二、背叛总理三大政策的蒋介石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婚礼,场面之大甚至把新娘美龄都吓着了。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是下野之身,但前来参加婚礼的除了党界要人、沪上名流外,还有美、英、法、日、挪威等各国使节,用美龄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领事机构都出席了”^[3]。蒋实质地位之高从此可见一斑。婚礼后的第二天,蒋介石白天还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享受新婚之甜蜜,晚上则先“会子文与力子”,继“往访静江、任潮兄”,“开始了他的政治会谈”^[4]。一个月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正式恢复了他在党政军方面的最高地位,“官复总司令原职”^[5]。

但是,已出走在红都莫斯科的宋庆龄闻讯后却十分气愤,她认定这是一桩政治婚姻。宋庆龄之所以如此讨厌这桩“政治”婚姻,是出

[1] [美]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2] [美]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01页。

[3] 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January 24, 1928), in *Madam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p77.

[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12月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January 24, 1928), in *Madam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p77.

[5] Letter, Mayling Soong Chiang to Emma Mills (January 24, 1928), in *Madam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p77.

于她在政治方面的考虑。

孙中山在世时,蒋介石曾积极贯彻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主张,甚至比孙更甚一步地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并举;孙中山去世后,为了维护党内和军校的团结统一,他在批评共产党人坚持两个主义的时候,也曾表示过“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叛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1]不久,蒋介石在多疑和猜忌之中误发动了“三二〇”事件,但是事出有因,这当中除了蒋个人的偶然因素外更与此时复杂的国共关系有关。共产党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清道夫,道路扫清后需让位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这当然不能为国民党所接受,“蒋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的重心,也是他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2],于是在国共两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时候,蒋即为党也为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分共”,乃至“清共”的道路。

蒋在走向“分共”道路的初期,从“三二〇”事件到整理党务案,目标还只是在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在这段时期,宋庆龄对此未发议论。不过此前,她在踏上政坛后不久,首次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前夕,曾向记者发表谈话,坚决反对不久前召开的“西山会议”,认为“西山会议派”是“一小撮反对国民党政策的叛乱分子”^[3]。因为“西山会议派”明确表示反共,要将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的队伍。

当蒋介石驻足南昌,反对国民政府定都武汉时,宋庆龄也未对此有何过激的批评。1月7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一次会议,专门就迁都问题作出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应俟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当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规劝道:“弟等初到鄂时,时局颇感困难。但因人民对国民政府之信用[任],得将时局改造日趋稳定,外交地位顺利,军事消息日升,财政大有气

[1] 蒋介石:《团体训练的重要》,《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35页,转引自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2] 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113页。

[3] 原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4日英文版,中文见蒋明译:《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对记者的谈话》,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1992年第5期。

[起]色。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务希坚持到底,不独战争必须身先士卒,政治亦然。中央领袖必须亲临政治冲激之地,始能战胜敌人。弟等以为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1]有文称宋庆龄当日个人还去电蒋介石批评其“在南昌徘徊不前,有误革命”^[2],故蒙光励先生在其《大革命时期的宋庆龄与蒋介石》一文中判断,宋庆龄与蒋介石矛盾的公开化始于迁都之争。然而,对比1月7日见诸档案的文字,这封口传的所谓宋庆龄个人致蒋介石电显然不可信。首先,这封电报与1月7日联名信的措辞完全不同,联名信是在规劝蒋回心转意,而这封电报则完全是在训斥蒋,性格不事张扬的宋庆龄当不致撇开联席会议诸位单独去信训蒋,做有违团结之事;第二,3月7日,在武汉方面讨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否为等待蒋介石而延期举行的会议上,宋庆龄从始至终未表态,若其反蒋态度如这封电报这样坚决,当一定坚持会期不宜推迟;第三,联席会议议决国民政府地点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这封电报的口吻俨然政府地点已定,蒋在抗命,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蒋之公然抗命是在被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剥夺其党政最高权力后在上海“清党”,在南京另立门户。另外,3月3日,宋庆龄和宋子文在会见倾向蒋介石并认为武汉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越轨过火”^[3]的陈铭枢时,陈向他们出示了蒋介石及谭延闿等手书,二宋均对蒋等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一职“无异辞”^[4]。这说明宋庆龄此时的政治立场尚处于较为中立的状态,并没有明确反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15日,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宋庆龄同与会者一起,作出惩治蒋介石的决议:“蒋中正戮杀民众,背叛党国,罪恶昭彰,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

[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4—375页。

[2]《宋庆龄是一位可爱谦逊的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81年5月30日。

[3]《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4]《陈铭枢致蒋介石函》(1927年3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300-00001-104。原件仅记8日,据内容判断当为1927年3月8日。

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1]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对立局面。22日,宋庆龄同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恽代英等40人一起,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2]

蒋介石采取“戮杀民众”的残酷手段必然是崇尚民主的宋庆龄所不齿的,当时如此以后还是如此。不过在这段时期,宋庆龄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原因与之后并不完全相同。这时,她的理论很简单,因为“容共是总理一种政策”,“现在要变更总理的政策,她不能赞成”。^[3]在孙中山初提联俄容共政策的时候,他身边的许多人都不赞成,宋美龄在参与孙宅辩论时,也曾为此跟宋庆龄闹得互不说话。^[4]宋庆龄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这并不代表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认为共产党是比国民党更先进的政党,她对共产党的极左言行也十分不满。彼时,上海一共产党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破获,搜出的密电码用“上等货”代表共产党,用“次等货”代表国民党,宋庆龄因而表示:“共产党真可恶,他们竟当国民党是次等货。”^[5]在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处目睹了“五月指示”后,宋庆龄对共产国际号召没收土地、逮捕军官、成立新的工农军队和通过激进成员夺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权“大为惊慌和不悦”^[6]。不过,当武汉政府就此宣布分共时,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表示国民党对这些错误也负有责任,不应该“逃避责任,诿过于他人。”并表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办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0页。

[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3] 陈公博著:《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4] Thomas A. DeLong, *Madam Chiang Kai-shek and Miss Emma Mills: China's First Lady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p56.

[5] 陈公博著:《苦笑录》,第86页。

[6] [美] 丹尼尔·雅各布斯著:《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种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1]这份声明是宋庆龄第一次以个人名义指责蒋介石、汪精卫违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同时也表明,她认为国民党内有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力量,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就是革命的左派,反之就是反革命的右派。

不久,宋庆龄秘密出走莫斯科。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一切外交关系。17日,宋庆龄致电蒋介石,批评其此举是“自杀行为”,表示暂缓回国以示抗议。18日,蒋介石复电谓:“作为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你的电报和你继续留在俄国的决定都不可能出自你本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可以不受胁迫地表达你自己的见解,你就能为党作更多的贡献。”他暗示宋庆龄若继续坚持己见,将不再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对此宋庆龄甚为气愤,23日她再电蒋介石,指责他违背孙中山遗嘱与苏俄断交却无意与帝国主义列强断交,“是帝国主义的同谋”。^[2]

三、血腥独裁的伪基督徒蒋介石

1931年12月,在邓演达遇害及南京珍珠桥惨案之后,宋庆龄怒而发表宣言。与以往不同的是,宋庆龄这次不仅痛骂了蒋介石个人,并对整个国民党本身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在这一宣言中,宋庆龄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对蒋介石进行了痛斥,痛斥内容也不单单是蒋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问题。她指名道姓地公开骂蒋实行独裁统治、制造宁汉分裂、勾结军阀、屠杀革命者、向帝国主义者投降,是造成国民党灭亡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她还痛陈:“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并表示:“惟有以工农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

[1]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8页。

[2]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页。

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1]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在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宋庆龄的这一宣言不仅公开表明了她在反对蒋介石的统治,甚至公开宣布了她与整个国民党站在对立面。这显然与她此时政治思想的转变有关。

宋庆龄初到莫斯科时,仍然认为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她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中明确说明:“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2]到莫斯科后,她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时,总不忘表明她代表的是国民党左派,是革命的国民党。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一起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以后的“第三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主张平民革命。称: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农、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尤以“最受压迫剥削之农工群众”为主要动力;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勾结之高利贷资本家”;革命的结果是“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之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3]这种“平民革命”的理论,不同于共产党纯粹的“工农联盟”,但它反对国民党压迫工农运动,发展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思想,把工农视作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动力。

鉴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这三位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地位,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曾给予三人高度的重视。联共(布)不仅为宋庆龄和陈友仁来苏提供了一万卢布的旅费,^[4]还特地拨出招待费,安排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主

[1]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3—86页。

[2]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页。

[3] 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08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席团委员叶努基泽负责他们“在苏联逗留期间的全部接待工作”^[1]。

1928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专门就即将离开苏联的宋庆龄的问题召开会议,就如何争取宋庆龄的理解和支持作出了决定,并为宋庆龄的未来政治活动确定方针。会议决定:“让宋庆龄同我们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一次谈话,以便弄清她对共产国际最近一些决议,特别是她对第九次全会决议(关于第三党的条款)的态度。”此外,“还有必要对她做更有力的系统的工作,并让她了解我们的建设和政策”,诸如“组织她到苏联各地参观”、“吸收她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指定1、2名讲解员对她做思想工作”等等。关于宋庆龄未来的政治活动,会议制定以下方针:吸收宋庆龄参加社会活动,使其主动参加中国的反帝同盟的工作,“并保证可以利用这个广泛的组织作为共产党人进行工作的某种合法掩护”;“利用宋庆龄来瓦解国民党军阀上层分子和团结所有真正的左派在与共产党保持联系情况下进行工作”;“利用宋庆龄在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问题上对南京、武汉和冯的中央施加压力”;“利用宋庆龄来正确地报导苏联的情况,揭露无论来自国民党首脑(在土耳其的孙科、胡汉民、西西伍)方面,还是来自帝国主义报刊方面对苏联的造谣和诽谤。”^[2]

旅居德国期间,宋庆龄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坚持由国民党来领导中国革命,也动摇了平民革命的主张。1928年8月21日,她在从柏林致杨杏佛的信中流露:“可能共产党员是对的——只有他们的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3]1929年她短暂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正逢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学良违背《中苏协议》以武力夺回中东路,国民政府予以全力支持。8月1日,时值国际反战日,她打电报给“国际反帝大同盟”,将南京政府支持张学良谓之为“反动的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势力”相勾结,并痛骂蒋介石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7卷,第71页。

[2] 黄修荣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390页。

[3] 《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9页。

面前。”^[1]这是宋庆龄第一次用如此严厉的语气骂蒋,虽然没有直呼其名,但蒋仍然为此怒火中烧。

蒋介石于8月7日到沪,据说“原欲疏通孙夫人意见”^[2],但是在看到传单后,他非常气愤,也许正是因此而没有如原计划那样亲自登门探访,并于10日转派戴季陶赴宋宅见宋,当面责难宋违背党纪、丢政府和民族的脸。面对责难,宋庆龄言辞激烈地反驳道:“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3]宋庆龄此举更加激怒了蒋介石,震怒之下,蒋写了一封措辞同样激烈的信回骂宋:

夫人大鉴:

中正此次赴沪未克访晤,于心欷然不安者久之。近回南京,得夫人铅印之传单,其文句污蔑本党与政府,实非夫人态度之所应出也。中正以为,污蔑本党与政府乃非污蔑现在当局,实为污蔑本党之总理,未知夫人思及之否?观夫人之传单,不仅污蔑总理而且污蔑夫人之本身。请夫人再一详察此传单之文句与语意,所指为“反革命国民党领袖之欺叛性格从未有如今日之无耻暴露于世界”,是谁为欺叛?谁为无耻?“叛徒们既背叛了国民革命便免不了堕落成帝国主义的工具”,此叛徒们为谁?背叛国民革命者为谁?堕落成帝国主义的工具有是谁?今中正于此不能不以党员之资格为夫人答之。反对收回国权者是为卖国,即为国民革命之叛徒;受苏俄帝国主义之欺骗而自暴弃其国家之人格者即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反对国民党国民革命者即为欺叛之徒。其他吾不忍多言矣,请夫人再深长思之。吾知此电文必非夫人所拟,亦非夫人本意之所出,然而以夫人之名义而复自承认其电文是

[1] 兰德尔·古尔德:《孙逸仙夫人坚持信仰》(英文),《民族报》(The Nation) 1930年1月22日,转引自《文献》1981年第10期。

[2] 《陈福民致阎锡山电》(1929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073-054。

[3]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5页。

夫人(拟就),在总理所产生本党之历史而竟有此事,是诚不仅为夫人个人惜,抑且为为[原文如此——引者]吾总理哭也。如中正知而不言则不仅不能对总理在天之灵,抑且无以对本党与党员诸同志,并无以对我革命之良心,请夫人详审之。知我罪我不尽欲言,并颂
近安

蒋中正○

八月十五日^[1]

这样的信若真送达宋庆龄手中,后果可想而知,而蒋写此信的目的也是要同宋庆龄“决绝”,不过经宋蔼龄调停,“得免决裂”。宋子文曾于8月22日从南京回到上海,“设法消弭”,但由于他夙主拥蒋,兄妹间意见亦极相左,结果宋庆龄依然复于9月去国游走。^[2]

1930年8月,第三党在国内正式成立后,宋庆龄从柏林致信杨杏佛,明确表示她对第三党不抱希望。她说:“至于第三党,称之以它将来的名字,能不能成事颇多取决于南京和北京之间争吵的时间长度。只有在此阶段,邓等才能够保持活跃。我看这一团体希望不大,因为它对南京和北京以及共产党都要斗争。”^[3]

宋庆龄1931年回国后,对许多事情感到不满,她发现到处存在腐败现象,而她却无法改变,这使她感觉特别难受。^[4]邓演达遇害和南京珍珠桥惨案直接刺激了她不怕带上红帽子,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蒋介石的大肆屠杀使宋庆龄在宗教信仰上也对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1932年,6位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年作家遇害,宋庆龄愤怒地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员长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埋了。显然,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哩。”《哥林

[1] 台北“党史馆”藏“总裁致孙夫人函”,类别序号135/12.2。原件无年份,据内容判断当为1929年8月15日。

[2] 《陈福民致阎锡山电》(1929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典藏号:116-010101-0073-054;吴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 《宋庆龄致杨杏佛函》(1930年8月30日),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4] 《宋庆龄致杨杏佛函》(1931年9月),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27页。

多书》痛斥派系纷争,宣扬博爱。宋庆龄认为蒋介石无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大开杀戮之门,不是一个真信徒,因此表示:“如果他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1]

四、有骨气的抗日领袖蒋介石

宋庆龄厌恶蒋介石的血腥独裁,多次公开予以痛骂,但是她也曾难得地夸过蒋。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接受阎锡山的电请从香港北上,与“西山会议派”握手言和,成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的一面旗帜。宋嘲讽汪“甚至吞下西山派的苦果”,“像溺水者一样,为了救命而抓住身旁任何一根稻草”,认为其此举非常卑鄙,“极度缺乏个人质量”。与之相对应,宋夸奖蒋道:“蒋尽管有他的所有虚伪盛名和其它错误,但他至少还有一些品质和骨气。”^[2]然而,宋之称赞蒋有骨气并不代表她支持蒋。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与胡汉民起“约法之争”,扣胡于南京汤山,倒蒋势力因此重又聚集起来,汪精卫在广州另立政府。对于这两次大规模的倒蒋运动,宋庆龄始终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予以评述,她认为这是属于敌对军阀之间的争斗,并不能解决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再次像溺水者抓救命稻草一般投降了日本人,而有骨气的蒋介石则领导正面战场坚持到了最后胜利的那一天。但是,对于蒋在抗战中的领袖地位,宋庆龄起初并不认可。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遇害,宋庆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后,经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3]此后,宋庆龄的政治态度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保持一致。1934年4月20日,为了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帮助中国共产党渡过难关,宋庆龄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会长的名义,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但六大纲领

[1] [美] 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03页。

[2] 《宋庆龄致杨杏佛函》(1930年8月30日),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19页。

[3]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2,卷宗号224,转引自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

在根本上是中共为反蒋和走出困境的策略之举,宋庆龄此时与共产党一样,并没有转变反蒋的态度。^[1]

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准备用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同时,共产党也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与国民党妥协。于是,宋庆龄既帮助蒋介石派董健吾去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又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呼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是因为抗日高于一切,“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初虽支持张学良之举,但最终还是认可了蒋在抗战中不可或缺的领袖地位,所以曾准备发表声明,要求和平解决。^[2] 1937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共在宣言中宣称服从三民主义,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并表示愿意不计前嫌,团结抗日。宋庆龄随即于26日在《抵抗》三日刊第12号、《救亡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次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强调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共同抗战。宋庆龄随即与何香凝共同署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的纲领,实行抗战到底》声明,表示拥护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并“向领导代表大会之蒋中正同志致以敬意”,盛赞军事上获得初步胜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最高军事领袖蒋中正同志之贤明指挥所致”。^[3]

宋庆龄承认蒋介石的抗日领袖地位,但对其在民主建设上的表现一如既往地不满意。1938年10月20日,她在会见深受罗斯福总统信任的卡尔逊少校时表示:“蒋介石所鼓励的是对他本人、而不是对政府

[1] 详见朱玖琳:《宋庆龄抗战思想之转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

[2] 详见朱玖琳:《宋庆龄抗战思想之转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

[3]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3—226页。

和国家的忠诚。”她认为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领袖们则实行了”。她反对蒋介石的长期训政统治，认为“应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时间早过去了”。^[1]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时，宋庆龄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指出党派问题“决非处理共党一党之问题，而为处理我党以外各抗日党派之一般原则”，而各党依法自由发展“本为民主国家当然之定则，而非各党派在同一个革命目标下不互猜忌，尤为我国正在抗战建国时期所必要”。强调：“吾党领导革命，以进于创行宪政，权之所在，责无旁贷。”要求“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2]2月3日，宋庆龄再次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函蒋介石，请其谨慎处理新四军问题，“切实执行总理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以扫除敌寇，创造自由平等独立之新中国。”^[3]

五、不改传统独裁作风的蒋介石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共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与之相对应，蒋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还政于民”。与此同时，随着国共两党围绕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争论日趋公开化后，民间的民主呼声日益高涨，支持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对此，蒋采取了打压政策。

1945年3月中旬，宋庆龄曾亲自出面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蒋对此愤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知我对其各种横逆暴戾卑劣手段皆不能生效动摇，知我决心，绝无指派其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以庆龄与我提共匪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共匪也），最后则以宋说项无效，乃不得不由俄国出而暗示其护共之态度，要求我

[1] [美]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子星》（英文），第316—318页，转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2]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19—322页。

[3] 《宋庆龄等致蒋介石函》（1941年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典藏号：002-080103-00050-011。

容共。”^[1]

对此种种,5月3日,宋庆龄曾在与苏联大使馆外交官谈话时批评道:“政府丝毫也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政府不仅不理睬人民的要求,而且还猛烈地打击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她强调指出:“根据所有情形推测,国民大会的代表将由上层委派,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因此,指望从国民大会得到真正民主的结果明显是错误的。”她显然认为蒋介石所谓召开国民大会以还政于民事实上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假民主,她赞成中共的联合政府的主张道:“建立联合政府是摆脱目前业已形成的政治局面的唯一途径。这种立场不仅获得了中国的进步阶层,而且还有这些阶层之外的社会舆论的支持。”^[2]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在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当日,邀请毛泽东来渝和谈。蒋介石以为,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将不再支持中共,毛泽东在明了这一点后势必会有所顾忌,收敛其夺权计划。毛泽东则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赴渝谈判。这种情况下,谈判的结果也可想而知。^[3]但是,对这次国共谈判,宋庆龄却态度乐观,她对苏联大使馆外交官表示:“可以希望谈判获得圆满的成功”,“建立联合政府不是不可能”。不过同时她也表示谈判的最大障碍是中国的红军问题。^[4]的确,各有主张的谈判双方难以在核心的中共军队及省区问题上达成一致。在“双十协议”正式公布后的第二天,13日蒋介石即秘密发布“剿共”密令。

同时,蒋也加大了打压民主呼声的力度。1945年4月,蒋下令对云南可能发生的反政府学潮“断然予以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5]。10月初,他用武力强行解除了把云南变成亲共左派分子庇护所的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对此,宋庆龄说,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蒋介

[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2] 沈志华:《关于宋庆龄1945年与苏联使馆接触的几则俄国档案》,《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

[3] 见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533页。

[4] 沈志华:《关于宋庆龄1945年与苏联使馆接触的几则俄国档案》,《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

[5]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蒋主席面谕事致各教厅厅长、各大学校长、各专科学校校长、各学院院长、各中等学校校长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4009198,转引自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551页。

石的昆明行动令人感到意外和奇怪。然而,这却是对蒋介石传统政策和作风的最好鉴定。”^[1]

国共依旧边打边谈,在美国的干预下,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政协会议所作改组政府等之协议并不被国民党内所接受。短暂停火之后,四平战役爆发,内战再起。

1946年5月19日,四平之战结束之日,一封署名特德的英文来函向宋庆龄告知了最新局势,其中包含国共谈判之内情。

该函来自中共方面,首先谈的就是内战有从关外向关内蔓延的可能性问题。函谓:“大元帅[应译为“委员长”——引者]以及他的一伙蓄意要把中国本土引向内战”,因为他们不是在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将主力部队向北推进,而是“试图巩固他们在沈阳以南的势力”。

来函告知,美方对是否支持蒋将内战升级尚举棋不定;但是与此同时,蒋已在采取一切行动使内战升级,“在北平地区、山东、太行地区、江苏北部,也有可能察哈尔和热河,挑起敌对行动”。

来函还告知,在某些问题上,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显著的”差异。“M将军[即马歇尔将军——引者]要考虑他不得不面对的来自国内的对立意见”,另一方面,“大元帅[应译为“委员长”——引者]也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防御力量(如在四平街战役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美国将军支持的犹疑不定等”。因此,“立刻在满洲[应译为“东北”——引者]停战的希望还没有完全消失”,中共将竭力避免“由于直率地批评而引起美国方面政策上的冲突”,以取得国际上的合作,“阻止内战在长城内的蔓延”。

来函透露,中共同意就东北问题展开协商,前提是“立刻在满洲[应译为“东北”——引者]全面停火。”

来函在信末提出,国民党所谓的改组现政府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把戏,中共对此毫不感兴趣。^[2]

对甚盼国共和谈能取得圆满结果,建立代议制联合政府,实行民

[1] 沈志华:《关于宋庆龄1945年与苏联使馆接触的几则俄国档案》,《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

[2] 《特德致宋庆龄函》(1946年5月19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58—60页。

主政治的宋庆龄而言,中共此函所告知的情况不啻是一个打击。虽然她早在国共此次和谈之初就清楚地认识到“CP不会愿意把他们的军队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而KMT又不愿放弃一党专政——这是即将举行的谈判中两个简单而又具体的基本情况”^[1],但她对美国的介入抱有希望,正是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向蒋提出中国应该建立联合政府,实行现代民主统治,以避免内战。^[2]宋庆龄认为美国因素是一个“对局势起作用的新因素”^[3]。但是,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没能成功调停国共不共戴天的矛盾,宋庆龄对外界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没有公开对政局和蒋有任何评价。

1946年6月6日,在占领长春之后,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劝说下,宣布在东北休战15天,以便谈判解决东北问题等。然而这几乎是一纸空文,中共在苏联的支持和敦促下,变得强硬起来,四平战役刚停,就在关内发起报复作战。蒋介石下令6月发起全面进攻,毛泽东也决定把报复作战变为主动进攻,于是内战迅速升级,在关内外全面爆发。

7月18日,宋庆龄在寓所会见前来拜访的周恩来。22日,公开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声明毫不客气地指责蒋介石是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这种内战已经是不宣而战地开始了”。她提出,国民党必须立即执行建立联合政府、实行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的任务,“否则就要担负起掀起内战的责任。”^[4]

1949年1月,面对即成事实的分裂局面,宋庆龄最终无奈地表示:“我们中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曾试图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然而历史仍然选择了这条破坏性的道路。”^[5]

[1] 《宋庆龄致杨孟东》(1945年2月17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89页。

[2] [美] 埃利奥特·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录》,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第154—155页,转引自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3] 《宋庆龄致杨孟东》(1945年2月17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89页。

[4]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15—419页。

[5] 《宋庆龄致史蒂文森夫人》(1949年1月16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76页。

结 语

宋庆龄与蒋介石，在政治道路上长期站在对立面，这其中是否有个人恩怨的成分在内？坊间有人说，因为蒋介石在孙中山去世后追求宋庆龄不成，所以蒋对宋怀恨在心；又有人说，因为蒋介石杀了宋庆龄的密友邓演达，所以宋对蒋恨之入骨。公与私，究竟是哪一个因素主导了他们对对方的态度。

从已公布的蒋日记可以明了，蒋介石在礼仪上始终保持着对宋庆龄的尊敬，但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同样是美龄的姐姐，对蔼龄，蒋介石一直亲昵地称之为大姊、孔姊；而对庆龄，蒋介石不仅很少提及，并且通常情况下均尊称“孙夫人”，从不称二姊。1945年为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事，蒋因怨恨宋而直呼其名，但也仅限于此，并未像他在日记中对其他招致他不满意的人那样予以痛骂。^[1]这说明，对蒋介石而言，他必须尊重宋庆龄，不是因为她是妻姐这样的私人因素，而是出于她是先总理的遗孀这样的官方考虑。

需要特别深究的是关于蒋介石阴谋暗杀宋庆龄的传说。由于宋庆龄亲共的政治立场，戴笠曾派人试图打入宋的身边监视她。据曾是军统特务的沈醉说，戴笠受蒋介石指使阴谋暗杀宋，沈与戴具体策划了暗杀计划，但戴最终在蒋的压力下又取消了计划。^[2]另据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职务的王正元回忆，宋美龄听说戴笠的计划后特地致电宋子文，要他关照戴笠不得胡来。后者证明了前者所述暗杀宋庆龄确有其事，但此事是否直接受蒋指使却要画一个问号。1931年蒋曾因扣胡汉民于汤山而致使倒蒋派对其群起而攻之，于是不得不第二次下野；1935年汪精卫遇刺时，面对各方压力，蒋拼命澄清自己。暗杀总理遗孀，从政治影响上而言，是比前两者更具恶劣性的。其事若成，不仅自动授予倒蒋者以致命把柄，更

[1] 据台北“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先生相告，蒋介石曾在1951年的日记中痛骂宋庆龄。的确，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蒋对宋的基本敬意已随着在国民党丢失江山后宋选择留在大陆而尽丧。1949年10月6日，国民党中常委第219次会议通过决议，除李济深等19人已先后另案开除党籍外，将宋庆龄等33人永远开除党籍。

[2] 沈醉：《蒋介石阴谋暗杀宋庆龄》，《文史精华》1996年第4期；王正元：《宋美龄的姐妹情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会让举国民众寒心,最终的结局只会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成为众矢之的,这点基本常识蒋介石不会不具备。所以,无论从个人的政治地位,还是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前途考量,蒋介石均不会出此下策。

政治因素决定了蒋介石对宋庆龄的态度;同样,宋庆龄对蒋介石的看法也是出于政治的角度。拙文虽说是在谈宋对蒋的认识和态度,但同时反映的也是宋对整个中国政局的看法。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守三大政策,因而反对蒋介石“清共”;蒋介石大权独揽后,宋庆龄追求民主,因而反对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并最终加入了她认为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共产党;华北事变后,宋庆龄赞成抗日是第一要务,因而支持蒋介石抗日领袖的地位;抗日战争结束后,宋庆龄希望建立代议制联合政府,因而对蒋介石不改旧有传统独裁作风非常不满。

宋庆龄虽然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她以妻姐的身份对待作为宋氏家族外延成员的蒋介石。如果是出于私人恩怨,依照宋庆龄的性格,她一定会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之后,与蒋断绝私人来往,但事实上,虽然宋庆龄一再发表反蒋言论,她与蒋之间的私人交往并没有中断。蒋多次亲赴宋的寓所探望,均受到了宋的亲切招待。1943年3月12日,蒋介石偕蒋纬国探望住在蒋介石重庆官邸黄山别墅的宋庆龄,宋以水煮蛋款待,蒋介石因而得意地对蒋纬国说:“此故乡宁波宽[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1];1946年2月,蒋访宋在上海靖江路45号的寓所之后,嫌该寓所狭小,特授意黄仁霖为宋另觅大屋。^[2]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政治对立对个人关系毫无影响。因为政治的原因,宋庆龄与其家族和蒋介石之间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晚,孔祥熙到宋庆龄住宅要求她签署一项关于谴责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声明,遭到了她的拒绝,她对孔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3]所以,当宋

[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1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2] 见上海档案馆藏吴国桢1948年5月31日致俞济时函,档案正题名“关于接收保护孙中山故居及孙夫人住屋问题与宋子文、俞济时等的来往文书”,档案号Q1-6-676。

[3] [美]埃德加·斯诺著:《复始之旅》,第112页;毕万润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氏家人当晚在上海聚集在一起，同宋美龄一起商量对策时，唯有宋庆龄除外，“尽管从私人感情方面她是同情的”^[1]。

然而，宋庆龄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对于国共两党而言意义特殊。身为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政治上无疑具有象征意义。正因为看到她的价值取向能够影响到相当多的人，所以国共两党都在努力争取她的支持。宋庆龄坚决站在反蒋的立场上，对国民党的党国统治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妨碍。杨杏佛之所以被杀，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和所造成的影响。同盟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的宗旨，一度争取到了大量像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入会；同盟致力于营救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的活动，尤其像“刘煜生案”这类迫害新闻自由的案件，使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形象在民众间极为恶劣，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合法保护。宋庆龄曾告诉杨杏佛，对于泄密蒋介石“非常震怒”，因而“安排侦探去调查何处泄密”^[2]。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宋庆龄不再公开参与反蒋活动，也不再公开发表严厉的反蒋言论，她把主要精力转向以自己在国内外的声望和影响，为抗日争取国际援助上来，“避免参加政治方面的争论，以免影响工作”。^[3]

1946年7月22日，她打破沉默而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在海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响。在美国，电台于当地时间22日早晨播出声明^[4]；美联社报导谓，美国各报，俱以首页刊登声明，并强调其论点谓：“中美反动派的确企图经过中国内战，将美国与苏联卷入新的世界战争”^[5]。宋庆龄声明在美国朝野上下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发表谈话，赞成声明，认为为了促进和平，美国应该放弃

[1] [美] 艾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第229页。

[2] 《宋庆龄致杨杏佛函》（1932年12月），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啼痕——杨杏佛遗迹录》，第228页。

[3] 宋庆龄基金会编：《宋庆龄选集》上册，第415页。

[4] 《有吉幸治致宋庆龄函》（1946年7月22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80页。

[5] 《人民日报》1946年7月27日。

对中国的军事干涉,这是美国人民所欢迎的^[1];美国共产党也响应宋庆龄声明,发表宣言要求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2]就宋庆龄声明,美国政府也迅速作出回应,7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评论称:“美国对华政策已确定多时,决不加变更。”但对宋庆龄所提出的撤退驻华美军,在中国代议性民主联合政府建立前停止对中国当局之军火及军事援助等要求,均未作正面答复。^[3]7月29日,美国政府下令暂停运送武器给中国。^[4]虽然只是暂时的,但宋庆龄的影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宋庆龄初期对蒋介石的厌恶的确是出于对蒋个人品行的判断,因而其反蒋也是局限在非官方事务的家事上。对成为中国军政统帅的蒋介石,宋庆龄始终认为他是一名独裁者,她在抗日战争期间之所以对蒋的领袖地位采取了拥护和支持的态度,并不是因为蒋在她心目中的独裁形象转变了,而是基于现实需求使然。

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这是宋庆龄衡量蒋介石是否能最终解决民生问题的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的关系权重又决定了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治地位的态度。

政治性的原因决定了政治性的结果。宋庆龄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对他们个人之间的家族关系并没有造成分裂;但她在政治上反对或支持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内政外交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宋时娟)

[1]《新华日报》1946年8月5日。

[2]《新华日报》1946年8月16日。

[3]《人民日报》1946年7月28日。

[4]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271页。

简述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推行“科学研究”的 尝试(1949—1966)

任冉冉

[内容提要]

纵观中国福利会各历史发展时期,与时俱进,特色鲜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福会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工作目标与工作内容,先后确立了“示范性”、“实验性”和科学研究的工作目标。围绕工作目标,宋庆龄指导中福会调整工作内容。1959年至1966年,宋庆龄加强了中福会“科学研究”的工作内容,并将其视为中福会永远存在的前提。然而诸多未知原因,致使此项工作最终不了了之。

[关键词]

科学研究 宋庆龄 中国福利会 实验性 示范性

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保卫中国同盟,解放战争时期,将其发展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基础上发展为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如此概括中国福利会历程,即“是在一个时代里诞生,而在另一个时代里长成的。”^[1]纵观中国福利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工作目标、任务、内容均特色鲜明,无一不与时代相契合,与时俱进特色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成为新中国人民大众福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建国初期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确定

建国后,宋庆龄看到“有关救济与福利工作的整个情况在物质上已经有所改变。过去,中国人民总是处于‘受援者’的地位。现在胜利以后,我们能够从物质上与精神上都处于‘捐赠者’的地位,特别在被压

[1] 宋庆龄:《救济工作的两种概念》,《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迫国家的进步势力中间尤其如此”^[1]，鉴于此，作为人民团体、有着新中国“头号福利团体”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地位、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依据目前所公布的材料，可以推断出宋庆龄与中共领导人讨论新时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最早应该是北上参加开国大典期间。宋庆龄返沪后，于10月21日曾函致耿丽淑^[2]，信中称：“我知道你迫切地想知道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在情况和其未来的前途。……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那就是我要继续开展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而对于机构变化问题，有两个可能的趋势，与“解总”合并为一个新的机构，亦或是继续作为独立组织存在，与“解总”分工合作。“就政府的组织、运转的标准化和整体的协调而论，我们的国家仍处于组建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福利会的问题暂时被搁置着。”^[3]

对于搁置的原因，除了国家仍在组建这一因素外，同年11月9日，宋庆龄致王安娜的信函中提到了另一个原因，“在确定它未来的职责之前，必须先召开一次会议，以讨论总的救济事宜。也就是说，一九五〇年初，我们必须开会讨论全国的救济工作及其重建事宜。”^[4]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共对新政权下的救济和福利事业没有丝毫的计划。

同年11月8日，宋庆龄致耿丽淑的信中提到，自10月21日信后，在北京曾召开两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了第一次会议，两次会议做出三个决定：

（一）于一月或二月（1950年——笔者注）举行所有救济和福利组织的全国性会议，以制定全国性工作。这次会议的代表将来自各个

[1] 《宋庆龄致耿丽淑函》（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280页。

[2] 耿丽淑（Talitha Gerlach，1896—1995），美国人。1926年，受全美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上海支援中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展工作。1947年后回美，因宣传中国革命而被美国基督教青年会解雇。1952年，应宋应龄之邀，第三次到上海，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顾问、《中国建设》杂志编稿人，曾兼任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1986年3月6日，在她90岁生日时，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向她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她“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的有益的贡献”。1987年，耿丽淑获上海市公安局对外国人颁发的第一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证书。是年，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荣誉奖。1989年，获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荣誉证书。1991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和奖章。1995年2月12日，在上海病逝。

[3] 《宋庆龄致耿丽淑函》（1949年10月21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14—215页。

[4] 《宋庆龄致耿丽淑函》（1949年11月9日），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174页。

战线,能代表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将制定一个章程,长期工作方针及范围,并使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运转并开展实际工作。

(二)在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所有的救济和福利组织将继续像往常一样开展工作。

(三)在对外宣传和募款活动方面,对于由于自然造成的灾难,政府将不开展任何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过分地强调中国人民目前的贫困。^[1]

以上不难看出,中共希望通过召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有关福利救济的全国大会,来规划和实施新中国的福利救济事业。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命运如何?全国性的救济大会对基金会又会有何种工作安排?宋庆龄需要知道中共高层的态度。在1950年,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召开前,宋庆龄派谭宁邦、陈维博赴京与周恩来总理请示基金会今后工作方向。得到的答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要继续存在,等孙夫人到北京后,有关工作方向与经费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2]

1950年4月25日,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在26日作了《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这一报告明确了新政府对于救济福利事业的态度:“中国人民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救济福利事业才不再是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也不再是少数热心人士的孤军苦斗,而是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并进行和平建设一系列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就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内容。”^[3]

这一讲话为包揽社会救济事业的政府慈善工作确定了基调,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否定了旧政权的慈善事业,同时,要求对民间慈善机构和红十字会等组织进行接收、改组,民间力量因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而失去了举办慈善事业的社会基础。大会召开期间成立

[1]《宋庆龄致耿丽淑函》(1949年11月8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26—227页。

[2]中国福利会办公室编:《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191页。

[3]董必武:《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人民日报》1950年5月5日。

的全国性的组织——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负责接收一切来自海外的救济物资,“政府、半官方与人民团体所作的工作转向由救济总会承担”^[1]。如此,作为人民团体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为什么可以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宋庆龄在开幕式上作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回顾并总结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以来的工作。中共允许宋庆龄在全国性的大会上报告该机构的工作,本身就是对其工作的肯定,也可以看作是允许其继续开展工作的前提。而真正体现这种存在必要的是中共重新确定了基金会的工作目标、任务与内容。

在大会召开期间,宋庆龄与周恩来商讨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新时期的方针与任务,最后确定:要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工作,加强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宣传。^[2]

人民政府允许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开展原有项目工作,调整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增加新的工作内容,这是充分考虑了客观形势的变化,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及中国福利基金会本身的基础和条件做出的决定。开展国际宣传,毫无疑问与发挥中国福利基金会过去与国际救济组织建立的广泛联系的优势,及宋庆龄本人的国际影响力有关。发挥示范作用与建立指导性工作是对福利基金会过去工作成绩的肯定,更是为基金会确立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成为新中国福利、救济事业试验田的地位,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同时存在提供了依据。

为贯彻大会精神,1950年7月25日,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上海宋庆龄寓所召开。会上通过《中国福利会章程》,确立了基金会从事福利方面实行实验性及示范性工作,并为中国人民建设工作进行国际宣传的宗旨。^[3]出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变化,宋庆龄向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通报,她决定将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

宋庆龄在信中提到更名的主要原因,“这个字体现了我们组织的

[1] 《宋庆龄致耿丽淑函》(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81页。

[2] 《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第190—191页。

[3] 杜淑贞主编:《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最终目的。这就是,我们要体现我们是从事母亲儿童文化福利工作的权威机构”。^[1]“实验性”、“示范性”工作方针与任务的确立,使得“科学研究”工作呼之欲出。然而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宋庆龄的精力放在了人民救济总会的组建、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活动等工作中,直到1956年。

二、科学研究工作提出及其实施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十大关系”的讲话。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科学发展和繁荣文学文艺的方针。

同年12月12日,宋庆龄致函路易·艾黎,再次谈及中福会开展科学研究的工作计划:

“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将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机构专门致力于此。由中国福利会在高技术水平上来从事这项工作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多么想让我们的工作能完全符合‘研究机构’这个名称。你可以想象,建立这一项目不是一桩简单的事。它对我们、对中国来说是全新的,而且是复杂的。这不是几个星期的问题,因为,准备工作就要求从世界各地搜集许多资料,加以研究、筛选,联系中国的条件和需要,讨论出一个中国福利会的长期计划。”^[2]

据目前资料所示,这是时隔6年之久,宋庆龄再次提及中福会的科研工作,此后宋庆龄再未提及,直到1959年。

1959年始,从宋庆龄多次致函李云^[3]、邹尚录^[4]等中福会工作人员

[1] 《宋庆龄致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函》(1950年7月),《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333页。

[2] 《宋庆龄致路易·艾黎函》(1956年12月12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19—520页。

[3] 李云,原名祝修贞,女,浙江海宁人,1915年生于苏州。1929年4月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到宋庆龄处任联络员。次年12月陪同宋庆龄去香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鲁中地区工作。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军代表。1952年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1978年5月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现已离休。

[4] 邹尚录,先后任中国福利会人事处副处长、处长和业务室主任。

的信函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59年至1962年,是宋庆龄在中福会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的时期。这一时期,宋庆龄的工作重点即为督促中福会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努力使其早日符合“研究机构”这个名称。

1959年2月15日,宋庆龄在致李云的信函中,对1959年工作提出了4点具体要求,第一即为:

“今年工作主要是抓工作质量和科学研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提高工作质量,才能进行科学研究,要进行科学研究一定要提高工作质量。因此,这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而且要开头就抓紧。不要前松后紧或者前紧后松的现象。”^[1]

195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反右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在各条战线得到全面执行,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借助大跃进的“东风”,宋庆龄在中福会内启动了科学研究——以此作为“工作跃进”的表现——“对科学研究工作特别加以重视,为保卫总路线,贯彻总路线而奋斗”。^[2]更有甚者,宋庆龄在是年年末,号召中福会全体工作人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妇幼保健、儿童文教事业和对外宣传工作,特别是对于科学研究方面,贡献出一起力量。”^[3]两封致函中福会全体工作人员的信件,两次用到“特别”,可见宋庆龄此时对推动中福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迫切心情和期望。

然而就目前所见资料,并未发现宋庆龄对推行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全面或具体实施的纲领性文件。^[4]对于如何开展工作,宋庆龄仅在1961年6月26日,致邹尚录的信函中明确提出,今后中福会科研工作地开展应依照其同年5月25日致李云函精神执行。^[5]其他精神我们或许也可通过来往信函能略知一二。1959年至1965年,宋庆龄就中福会开展科学研究及相关问题的部分指示,如下表所示:

[1] 《宋庆龄致李云函》(1959年2月1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54页。

[2] 上海档案馆藏档:《宋庆龄给中国福利会全体工作同志的感谢信》,C45-1-199-8。

[3] 上海档案馆藏档:《宋庆龄给中国福利会全体工作同志的感谢信》,C45-1-199-9。

[4] 1962年5月17日,邹尚录曾向宋庆龄呈送本年度科学研究计划,涉及中福会各单位选题,这并不能算作宋庆龄本人的一个构想。《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24页。

[5] 《宋庆龄致邹尚录函》(1961年6月26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08—609页。

1959—1965年宋庆龄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表

时 间	对 象	主 要 内 容
1959年2月15日	李 云	1959年工作重点主要是抓工作质量和科学研究,阐述二者辩证关系。
1959年4月4日	李 云	1959年科研工作必须抓紧,指出科研工作并非工作总结,应有长远目标,开展专题研究。
1959年9月5日	李 云	就前段时间中福会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出现的争论,明确对开展此项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1959年11月12日	中福会全体同志	重视科学研究工作。
1959年12月30日	中福会全体同志	提出要为科学研究工作贡献出一切力量。
1960年1月26日	中福会同志们	肯定科研工作的开展,阐述科学研究的必要性,提出科研是中福会永久存在的前提。
1960年3月14日	中福会同志们	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开展寄予希望。
1961年5月25日	李 云	科研是中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包括保健院在内的各单位应该积极主动地开展。责成邹尚录狠抓。
1961年6月17日	中福会同志们	提出科学研究工作来指导“实验性”和“示范性”。
1961年6月20日	邹尚录	指示各单位应立足实际,拟定科研计划,集思广益,开展争鸣。
1961年6月26日	邹尚录	指示中福会依照同年5月25日致李云函中的精神,开展科研。
1961年10月25日	邹尚录	肯定《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报告》。
1961年12月22日	邹尚录	肯定幼儿园的两篇科研报告。希望在初步成绩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总结经验,取得更出色的成就。
1962年1月15日	邹尚录	收到1961年科研情况报告,对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兴,并勉励大家。
1962年3月19日	中福会各同志	感谢大家在孙中山逝世三十七周年之际来函致意,肯定大家的工作,尤其是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续表)

时 间	对 象	主 要 内 容
1962年4月23日	邹尚录	肯定少年宫编写《有趣的游戏》。
1962年5月21日	邹尚录	肯定本年度科研计划。
1962年6月19日	中福会全体同志	提出“尤其是科学研究工作,争取更新、更大的成就”。
1962年8月14日	邹尚录	肯定陈维博《谈儿童游戏》一文,对少年宫和剧院提出工作要求,“对科研工作不断选新题材”。
1963年3月27日	李 云	督促各单位要抓紧科学研究工作,希望各单位在干部配备齐全后,科研工作应更有成绩。
1963年6月14日	中国福利会各同志	庆祝中福会成立25周年,提出中福会要加强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使科学研究的水平能有较快提高。
1965年8月28日	李 云	加强科学研究,破除条条框框,不断实践,总结经验,提高水平。注意培养具备一定政治觉悟的青年科研干部。

(资料来源: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上海档案馆藏档:《宋庆龄给中国福利会全体工作同志的感谢信》,C45-1-199-8, C45-1-199-9, C45-1-216-1, C45-1-233-4, C45-1-248-7。)

这期间宋庆龄在中福会大力倡导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大跃进的影响外,宋庆龄工作思路发生调整、对解放后十年中福会工作成果与希望之间的差距也可算作动因。

1958年3月37日,宋庆龄在致爱波斯坦的信中提到这种变化,即在一个建设新社会和新经济基础的国家里,出现灾害的两种救济方法,一是直接救济,另一是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与自然斗争,变灾区为稳定和生产的地区,通过实施这种工程项目使其远远超过原有的战胜自然的力量,“这才是消除救济需要和毕其功于一役的建国之道”。^[1]

而促使思路调整的原因,源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1960年1月

[1] 《宋庆龄致爱波斯坦函》(1958年3月27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43页。

26日,宋庆龄在致中福会的信中提到了这种形势的变化:

“你们和我一样都晓得客观形势的改变要求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机构都要有所改变。十年以前当我们最初提出示范性、实验性的目标时,当时为了给予我们的机构一个总的方向——示范性、实验性的目标是合宜的和完满的。在我会庆祝二十周年前后显然光是这一目标也就不够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有所进展,以便赶上国家各方面发展的形势。同时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在‘示范性’‘实验性’的目标之外,又增加了科学研究这一目标。”^[1]

早年确定的示范性与实验性的工作目标,决定了中福会要不断适应新形势,永远走在全国福利救济事业的前头。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福会十年间的发展与宋庆龄的殷切希望存在着差距。1961年6月17日,宋庆龄在中福会23周年会庆之际,直言这种差距,“在十一年前,我们就提出了以‘实验性’‘示范性’作为我们工作的奋斗方向。现在总结一下我们的工作,觉得能起‘示范’作用的还未能算多。我希望同志们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来正确地指导工作,并持之以恒,争上游,攀高峰。”^[2]

这种大力推行的工作力度,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效果。1961年6月20日,宋庆龄致函邹尚录,信中提到少年宫、保健院、幼儿园、托儿所等单位取得的科研成果^[3];1962年1月3日,邹尚录致函宋庆龄,并附送上了1961年科研情况报告^[4];同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七周年之际,中福会致函宋庆龄,提到“全会工作,经过二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提高工作质量,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5]

三、宋庆龄推动科学研究工作的构想

这一时期,宋庆龄非常重视科学研究这一为适应新形势变化而提出的工作目标,并将其上升为中福会永远存在的前提^[6]。宋庆龄关于

[1]《宋庆龄致中福会同志们函》(1960年1月26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80页。

[2]上海档案馆藏档:《中福会廿三周年会庆宋庆龄致函中福会全体人员》,C45-1-233-04。

[3]《宋庆龄致邹尚录函》(1961年6月20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06—607页。

[4]上海档案馆藏档:《宋庆龄致邹尚录函》,C45-1-248-1。

[5]上海档案馆藏档:《孙中山逝世三十七周年中福会致宋庆龄函》,C45-1-248-2。

[6]《宋庆龄致中福会同志们函》(1960年1月26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81页。

在中福会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总体思路,体现在具体指导开展工作及解决因开展科学研究而在中福会出现的争论和问题上。

1. 辩证看待工作质量与科学研究的关系

1959年2月15日,宋庆龄在致函李云的信中提到,工作质量与科学研究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提高工作质量,才能进行科学研究,要进行科学研究一定要提高工作质量。因此,这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1]

同年9月,宋庆龄针对当时中福会就科学研究工作展开的争论,选取了其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明确。首先明确完成国家任务、提高工作质量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在明确了首先要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不断提高质量,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倒过来又促进工作质量的提高。这样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更好完成国际所给的任务。”^[2]

2. 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工作经验的总结

1959年4月4日,宋庆龄致函李云,提出:“科学研究工作并不就是总结工作经验,科学研究应有较远目标,进行专题研究。”^[3]

1961年5月25日,宋庆龄又向李云提出:“科学研究工作是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4]

前后观点截然相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宋庆龄对科研工作认识的深入,另一方面是宋庆龄对科研工作开展不力退而求其次,积极引导中福会各单位从低到高,从初级到高级开展科研工作思路的具体体现。

3. 中福会的科研工作除保健院外,均属社会科学范畴

宋庆龄认为,“中福会的工作是属于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除保健院外,科学研究都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内的”。同时,剧院和儿童时代社是文艺单位,它们都涉及教育问题。她并提出中福会是个教育单位,为更好起到教育作用,必须深入研究教育上的问题,必须掌握儿童

[1] 《宋庆龄致李云函》(1959年2月1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54页。

[2] 《宋庆龄致李云函》(1959年9月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69页。

[3] 《宋庆龄致李云函》(1959年4月4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57页。

[4] 《宋庆龄致李云函》(1961年5月2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03页。

的年龄特点,因此要学习心理学,尤其是教育心理学。^[1]

其他如科学研究的工作方针是为工作、生产服务,解决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科研工作要遵循发展规律,专题确定后,要提出具体步骤和措施,坚持由低到高,由初级到高级,单位要配备专人负责领导等,均是这一时期,宋庆龄对中福会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直接指示。宋庆龄多次集中阐释她对科学研究的工作思路,无疑反映出此时中福会内部对开展此项工作的态度、工作思路、方式方法等存在诸多问题。

四、科学研究工作中在中福会内部的分歧

宋庆龄在中福会倡导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中福会内部就一些具体问题出现过争论,宋庆龄均一一及时进行纠正,同时自己的工作思路也是随着工作实践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目前没有明确资料显示,中福会内部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分歧,我们只能通过1959年9月5日宋庆龄在致李云的信中略见端倪:“有几个问题我想把它们明确起来,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些问题争论中,浪费时间。”^[3]从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点:

1. 国家任务与学术研究孰重孰轻;
2. 科学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关系;
3. 中福会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范畴;
4. 如何具体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这些问题应该看作是当时中福会内部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焦点,因此宋庆龄才会就此类问题集中进行解答并一一明确。而宋庆龄在短时间内多次致函中福会相关工作人员,也从侧面说明这一工作推行得并不顺利。

宋庆龄将开展科研工作的阻力归结于思想保守,号召中福会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它的危险性和拖后腿的影响,并展望中福会的前景:“科学研究工作刚刚萌芽,可是它的嫩苗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我们必

[1] 《宋庆龄致李云函》(1959年9月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69—570页。

[2] 《宋庆龄致李云函》(1959年9月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69页。

[3] 《宋庆龄致李云函》(1959年9月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69—570页。

须爱护这些嫩苗,那么它们才可以迅速地、健康地成长。在这些嫩苗里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使它们在中国福利会中担当主导的地位。”^[1]

此后中福会科研工作地开展依然缓慢。宋庆龄看到了这种情况,并看出了部分单位的工作进展也是迫于压力而并非是积极主动的开展工作,于是责成邹尚录“狠抓”,并提出要听取全面汇报。^[2]

此后,邹尚录经常将科研工作规划及取得的成绩向宋庆龄进行汇报。1961年,中福会相关人员终于拿出了1961年科学研究规划草案,及《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报告》。^[3]

然而1962年之后,宋庆龄对科研工作的阐释和大力推行此项工作的情形与1959年至1962年期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1959—1965年宋庆龄关于科研工作的指示表》所示,更多的是对中福会各部门取得的具体科研成果表示高兴和勉励。在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中,已经鲜有大段论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及如何开展工作之类的指示或是信函。

1965年8月28日,宋庆龄致函李云,提出“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破除条条框框,不断实践,总结经验,提高水平。同时注意培养一批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的科学研究的青年干部。”^[4]这是“文革”前宋庆龄最后一次对中福会科研工作的指示,此后这一重要工作目标被长期搁置。

宋庆龄认为,确立了科学研究工作,是为中福会找到了得以永远存在的前提。然而时中福会各单位与工作人员并未真正认识到这一前提的必要性,更准确地说是未能深刻理解宋庆龄推行此项工作的用意。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文博馆员)

(责任编辑:黄亚平)

[1]《宋庆龄致中国福利会同志们函》(1960年1月26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81—582页。

[2]《宋庆龄致李云函》(1961年5月2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03页。

[3]《宋庆龄致邹尚录函》(1961年6月26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08页;《宋庆龄致邹尚录函》(1961年10月25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10页。

[4]《宋庆龄致李云函》(1965年8月28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42页。

锲而不舍，深化拓展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浅见

张 磊 张 苹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先驱孙中山逝世迄今已近85年，中国和世界在这期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的光辉形象并未在时光流逝中淡化。他在炎黄子孙中间受到普遍的尊重，而且获得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地区的人们的广泛认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终极目标是要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世界大同”为其最高的理想，充分体现了人类企求的共同进步趋向；至于他的愈挫愈奋的坚毅精神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则是风范长存，堪为楷模。

孙中山研究成为“显学”，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孙中山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而其过程则是曲折起伏的。

迄今为止，孙中山研究仍是有待深化与拓展的重大课题。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这桩研究任务，仍然需要我们的持续努力。满足于现状和停滞不前的观念，必须消除和改变。严峻的现实是：在辛亥革命百周年的前夕，竟然难以从为数甚多的成果中确认一部全面的、深刻的、科学的孙中山传记和一部完整的孙中山全集，岂不发人深省。

—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确认正是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虽然,“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孙中山坚持三十年的捍卫共和的斗争,晚年更是与时俱进。他的政治生涯贯串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时期,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的活动涉及了各个社会领域,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孙中山研究的学科意义自是不言而喻,几乎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所有重大课题,具有深刻而丰厚的内涵,成为两个世纪交汇时期历史的缩影。同时,孙中山研究还具有着持久普遍的社会意义。他的思想和实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涵盖了台湾海峡两岸,成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旗帜,并且,关乎不同社会制度及发展层次的国家与地区。他一生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目标,仍然是当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课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应是继续实现和崇奉的准则;他总是把自己的活动置于世界范围,从宏观视角去认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适乎世界潮流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封闭,吸取国外的先进思想,而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时刻不忘把中国革命运动融会于被压迫民族和进步人类的伟业;此外,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还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着现实意义,他的改革开放主张和经济社会发展方案,依然具有借鉴作用。

大体说来,随着人们对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的深入全面的理解,关于这位世纪伟人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同时,两方面也在互相作用。还在他驰骋于历史舞台时,就已有关于他的传记和文集。当他逝世后,孙中山研究开始广泛展开。他的著述被编成各种版本的文集问世,以他为对象的研究甚至跨出了国界。

严格说来,真正系统地研究孙中山思想和他的实践,显然始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此之前,曾有数量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著述。国民党方面的不少有关出版物,则多为宣传品。50年代初中期,大陆的学者们力求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从事研究。他们把孙中山的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范畴,认真收集和整理资料,对他的三民主义、哲学思想、革命实践和主要业绩进行了研究,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论断,纠正了先前论著中的不少偏颇和舛误,形成了第一次高潮。而在一度

停滞后,以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为契机,再次掀起研究热潮。196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研讨会和会后编录的论文集,显示了孙中山研究达到了新高度。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一批孙中山研究者——他们大抵都是青年——至此已经逐渐起到骨干作用。十年内乱期间,孙中山研究遭到严重摧残,甚至成为一种罪名。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到来,社会科学的春天降临,以70年代末期为发轫,孙中山研究进入空前的繁荣阶段。20年来,举行过多次研讨会,规模较大的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等。1996年11月,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举行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研讨会”,除海峡两岸和港、澳的学者外,还有日本、韩国、越南、俄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欧洲、南美洲的专家。会议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展示了丰硕的成果。新世纪初,又举行过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此期间,台、港、澳和日本、美国也多次召开了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学术讨论会。至于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堪称空前。相继出版的有《孙中山全集》、《孙中山文粹》、《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研究丛书》(十部)、《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1984)》、《孙中山论》、《孙中山辞典》、《纪念孙中山先生》(图录)等。粗略估计,专著、译著、资料汇编、图录和工具书约300余种,论文约2000余篇。研究机关和学会纷纷成立,计有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两个孙中山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的孙中山研究中心等。孙中山研究会为数更多,分别为全国性、地方性和民主党派组建,日本、美国和台、港、澳地区,亦有类似学术团体。以上所列,不过荦荦大端。在此期间,台湾的学者们也取得了丰硕的相关成果。

然而,近十余年来,孙中山研究的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思。概括说来,部分成果的质量实难令人满意。重复乃至低水平重复的论文,时有所见。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学风、文风的浮躁和急功近利的

心态。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丰硕,创新的起点颇高,致使有些从业者知难而退,另觅捷径,乃至选求十分瑣细和怪诞的题目。先前的辉煌有所减色,应当引起深思。

回顾和反思,是为了增创辉煌。不断超越的关键在于充分地认识孙中山研究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关部门真正重视和支持这项研究,制订规划,培育和加强研究团队。研究者们则宜摒弃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学风、文风和心态,再接再厉,奋进不已,把孙中山研究推向新阶段。

二

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应当首先着眼于理论、方法论的进一步完善。为了更科学地反映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力避僵化、偏颇、绝对化和简单化,采取改革和开放的态度,吸取新的理论、方法论的积极因素,关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以丰富和发展先前所持的理论、方法论。

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唯物史观无疑能够使研究者综览事物的全貌,纵观事物的过程,把握现象的本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确认个人与群体的作用。但是,还必须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助于深刻而全面反映历史的理论、方法论中的成分。唯物史观本身即是开放和发展的,而愈益复杂剧变的社会需求与之相应的理论、方法论。

孙中山研究,亦复如此。理论、方法论的运用,存在着不足和缺陷:离开了历史条件去苛求或溢美孙中山的活动的倾向,在近年来有所发展;侧重于他的政治方面的研讨,忽略了其他方面——如经济建设理念与方案、文化思想等——的探究;关于三民主义的研究较少触及理论部分(如民族的界说、自由观、平等观、生产要素论、价值观等),对政体的构想和方案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孤立地论述他的理论和实践,对其从属的社会阶段和凭借的历史舞台浅尝辄止;缺乏比较研究,难以清晰显示他对于先驱者的扬弃和较之同代革命党人的优长;仅只把他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他的独特心态和性格。

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理论和比较方法、计算方法、计量方法、系统方法等等,以便更为准确、全面地展示出他的真正形象。归根结底,历史科学不是史科的排比。只有在充分的、真实的、典型的、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综合,作出中肯的评价,引申出不同层次、领域的规律和论断,史学才能成为科学。

三

认真探究孙中山与同他相关的社会思潮和运动,把握它的文化取向,是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的重要途径。

杰出人物总是与多种社会思潮和运动相联系,并成为一定的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代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跨越了两个世纪,贯串了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加以长期流亡域外,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因此,与孙中山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必然是繁复的——涉及范围广泛,内涵堪称多元。

毫无疑问,孙中山与当代西方思潮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还在少年时代就已走向世界,受过欧洲式的教育,从西方充分吸取了民主主义,其机遇和作为在那个时代确是罕见和难能可贵的。必须深入研究他与“西学”的关系:接受了哪些理论,拒斥了什么观念;经由何种渠道获取,涉及了哪类学派;如何把引进思潮与国情及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熔铸自己的思想体系;“西学”在他的理论中占有什么地位,起着哪些作用。孙中山与社会主义思潮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他曾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融通起来。他在青年时代就接触了社会主义,并对各种流派作过评价。应当进一步研究与之有关的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对社会改良主义的认识;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民生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异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阐明上述有关问题,大有裨益于把握孙中山思想的实质。应当指出: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的必然文化取向。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滞后,难以及时产生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鲁迅把这种作为譬喻为普罗米修斯的窃取天火。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特别是长期居于官方哲学的儒家文化的

关系,仍需进行深入研究。1994年1月,海峡两岸学者在杭州举行的“孙逸仙思想与儒家人文精神研讨会”和2010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学术研讨会”,即为明证。大部分学者确认孙中山思想决非全盘西化的产物,他的理论中蕴含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人本主义等)。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潮,总是兼具时代精神和民族形式。民族虚无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但有待探讨的问题甚多,诸如:他是儒学的继承者,抑或是孔孟之道的离异者?如果认为他曾经离异,那么晚年是否回归?他有否“儒学情结”?传统文化在他的理论中居于什么地位?他从传统文化中主要接受了哪些成分……,这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

孙中山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运动,关系匪浅。他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十分重视,采取了扬弃的态度。洋务运动曾经一度吸引了他的注意,但很快就察知其浅陋和局囿。维新运动给予他以深刻影响,他却迅速突破了君主立宪的藩篱。可以断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有着互动。在其晚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尤为重要。此外,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也与他早有联系。还在20世纪初,他曾经访问过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总部,受到的却是冷漠待遇。后来,他与共产国际和苏俄——苏联有过合作,而在实现过程中也交织着复杂的矛盾,从国共两党延伸到国际范围。这类课题的研究确实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四

孙中山是一位真正的巨人,他的理论与实践极为丰富。他多次环行世界,懂得几种外国语言。他制订了现实主义的政纲,又糅合以美好的梦想。他思索着古老的哲学命题,又亲历戎行指挥作战。他身处经济极其拮据的困境,却构想着宏伟的建设蓝图。他在历史潮流面前从不止步,而是与时俱进。他经历过胜利的欢欣和“槁木死灰”般的心境,但总是毅然前行。因之,对孙中山的研究必须充分反映这种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实况。

关于孙中山思想研究的著述甚多,然而在是否以三民主义为框架

的基本问题上都有异议。应当深究他的多元的思想源流,剖析他的思想熔铸过程及其曲折性,阐明他的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就民族主义而言,从反满口号到明确的反帝主张,历30年方始达成,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原则,最少经过三次变易。民权主义中有关政体的擘划——革命程序论、政党与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全民政治论、地方自治论和五权宪法论,都需认真研究。甚至被孙中山自称为“味同嚼蜡”的《民权初步》一书,也应从关于会议通则的论述中发现民主启蒙意义。民生主义应以探究土地和资本为核心,而其精髓无疑在于对近代化的、社会化的大生产的肯定。他没有如民粹派那样在资本主义面前表现出伤感和恐惧,并且力求避免垄断所带来的社会溃疡。他的土地纲领是复杂的,但却是组成近代化方案的必要部分。他探究过区域经济的相关问题,颇有助益于物质建设。他的开放观念和实业化的具体构思,亦含有科学的积极因素。文化思想中的许多问题,如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的交互关系、中西文化的融合及西化与国情,以及军事、外交、教育和科技思想等亦应更加重视。

对于孙中山的实践活动,应作全方位的研究。他担任政党领袖——从兴中会到中国国民党——垂30年。他与许多国家有着联系和交往。他几乎终生从事“战争事业”。他为制订经济计划而多方勘察思考。要之,关于他的实践活动的研究必须兼有宏观与微观角度。

* * *

孙中山研究有待深化和拓展,我们没有理由自满,也不能任其停顿,更不应当削弱。

但愿能以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为契机,推进相关研究工作,群策群力,增创辉煌!

(作者张磊为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张革为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宋时娟)

两岸盛会, 共求新突破

——“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明同

正值盛夏, 两岸四地学者怀着满腔热情, 汇聚珠江畔, 共同探讨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弘扬。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孙中山基金会主办、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承办的“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学术研讨会, 2010年6月27日至30日在广州珠江宾馆隆重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四地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会议, 共收到论文46篇。论文主要围绕三个主题: 一是孙中山与中国传统学说的关系; 二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价值; 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会议受到各方的关注, 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杨桐,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斌, 原广州市市委书记、孙中山基金会名誉会长欧初, 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邬梦兆,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华同旭, 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萍, 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孙中山基金会理事长石安海, 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梁国典, 中山大学教授李锦全, 台湾辅仁大学校长黎建球, 东吴大学原校长刘源俊等, 出席了开幕式。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的著名学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教授, 以及台湾大学副校长包宗和教授发来了贺信。

孙中山基金会理事长石安海先生、孔子基金会理事长梁国典先生, 先后在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作了紧扣主题而深刻详尽的致辞,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秘书长罗安宪教授作了学术综述。

会议气氛活跃又和谐, 人人畅所欲言, 时时有不同的观点交锋。在短时的切磋中, 有共识、有突破。广东的各大媒体以及中国评论等网站均作了报道。

孔子与孙中山是中华文化的符号

与会学者, 对会议的主题“从孔子到孙中山”都十分认可。普遍

认为,这一主题既具有学术意义,又具现实意义。

因身体状况未能赴会的张岂之教授,在热情洋溢的书面发言中,明确说“我认为这个主题很好,将20世纪伟大人物孙中山与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弘扬联系起来,在今天既有深刻的学术内涵,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雷区,许多人不敢涉足。曾有学者翻阅建国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以及中国思想史的专著,发现大都依据毛泽东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指示,从孔子开篇,直写到孙中山,然而,几乎所有的书在孙中山的章节里,都仅谈孙中山,而没有论及孙中山与孔子的关系。换言之,孔子与孙中山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是否有着承传关系。这一问题,或是无人问津,或无人敢于问津。

这次学术会议直接切入了一个关系民族文化发展命运的重大课题,并由文化而延伸至当今人人关注的两岸发展问题。学者们从肯定孔子与孙中山的重要地位,进而探讨文化对民族振兴的意义所在。

台湾政治大学胡春惠教授响亮地提出,孔子与孙中山一古一今,都是“中华文化的符号。”他认为,尽管孔子在其一生中,遭到了许多挫折,但他与西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一样,享有民族人民的尊崇和骄傲,“孔子与儒家思想已变成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符号”。胡教授进而提出,与古代的孔子有着同样政治命运的孙中山,他“一生也十分坎坷,他为了建立富强康乐的新中国,而常年四处奔波,最后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胡教授强调,“他们在对中华文化的塑造上,均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厥功至伟的贡献,而他们死了多少年,对中国仍有着源远流长的影响力,甚而至今今天,我们两岸四地中华儿女,仍然共同尊敬”。因而胡教授认定,“举办这个‘天下为公两岸行’学术会议,并以‘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为讨论的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两岸关系日趋和解,春暖花开的此时此地来举办,如何发扬‘公天下’的理想,更有一种现实性与前瞻性的教育意义。”

澳门理工学院杨允中教授,以“复兴梦、强国路与群体智慧的开

启”为题发言,更拉开了广角镜,从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的热潮中,透视孔子作为“顶级大师”的贡献与影响。他认为,“孔子是2 500年来影响世界最深的中国人”。依据媒体的报道,杨教授指出近五年间海外已先后建立孔子学院282所,差不多每6天,世界上就多一所孔子学院,“这是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的一道全新的中国特色风景线。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至今尚没有第二个人可凭个人威望、个人响应力卷起如此全球性的办学高潮”。所以如此,杨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孔子“主张德政礼仪、仁爱兼容,主张和而不同、有教无类等民本理念并终生为之奋斗”,“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不仅直接构成中华文明宝库取之不竭的重要源泉,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产生的震撼力,也难以被取代”。

在杨教授看来,同孔子一样成为“国际级”的伟大人物,便是孙中山。因为他“最早喊出‘唤起民众’、‘振兴中华’,并及时推出《五权宪法》及《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即以改变历史的大思想家形象被加载中华史册”。杨教授的结论是,孔子与孙中山“他们的名字、形象、贡献都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级”,他们“永远令海内外华夏子孙为之动容,为之惊叹,为之骄傲”。

广东省社科院张磊研究员认为,应当注重对近代传统的研究,我们过去对古代思想研究得较为充分,而对近代思想研究得不够深入。孙中山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和孙中山的思想都具有普世价值。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也明确认为,“孙中山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思想的先进和行事的坚韧,体现在真正奉行‘天下为公’和毕其一生爱国爱民爱中华”,虽然“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孙中山没有条件将自己的想法完全付诸实践,但他的理念、卓识和胸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当今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在民族振兴的历史阶段,重新研究和评估两位主要的历史文化名人,有着特别的意义。正如张岂之教授所说,“学术研究不能脱离时代。一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在这个时候,两岸学者共同探讨孔子与孙中山这个课题,肯定会更加富于新意”。

孙中山是中华文化近代转换的第一推手

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过程考察,孙中山与固有的传统文化是否存在承传关系,这是建国以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始料未及的是,与会学者都比较一致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会议中,学者明确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第一推手”。

复旦大学沈渭滨教授认为,孙中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是近代中国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第一个推手”。沈教授明确指出,近代仁人志士以及洋务派、维新派,对中华文化近代化所作的努力,都“无力使中华文化更新”,“都难以形成近代化理论体系”,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华文化近代化的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真髓,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反映中华文化发展趋势”。进而,沈教授具体指出孙中山与中华文化的承传关系,认为“民有、民治、民享,符合这些原旨以民为本的真谛;建设民族国家,符合民族独立的历史诉求;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趋势”;《实业计划》“是中国近代化最完整的发展蓝图,体现了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博大胸怀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雄心壮志”;《五权宪法》“五权独立,相互制衡,显示了中华文化在历史转折中的中西并包、以我为主的独特魅力,是孙中山对西方政治的大胆创新”。沈教授由此推断,“从孙中山开始,中华文化进入到近代化的新阶段”,对孙中山在社会转型时期中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学界,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的探讨中,“近代”与“现代”二概念,常常是交叉使用的。

关于孙中山在中华文化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孙中山基金会立项的“孙中山的儒家情结”课题组成员,经过近4年的刻苦攻关,终于在会议前夕拿出了紧扣会议主题的专著——《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越》。课题组负责人广东省社科院黄明同研究员,代表课题组作了大会发言。课题组从人们对孙中山与儒学关系的争议切入,认为孙中山对中华传统文化既有传承又有超越,进而具体剖析三民主义与传统学术的一致性,指出民族主义因袭了儒家的“四海

一家”、“天下一统”；民权主义承传了传统的“民为邦本”的核心理念；而民生主义则是儒家均富的思想的现代版。课题组认为，“孙中山对于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思考，不仅独特，而且意义深远”，他的“兼收众长，益以新创”的富于岭南特色的开放创新文化观，“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整合中西、创新发展的‘超越式’思路，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以建设新文化提供了正确方向。另外，他融汇西方现代技术、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而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以儒家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终结，诞生了既有现代理念又具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体系”。课题组由此得出结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可谓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界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走出中世纪的中国”。

显然，这次学术会议探讨了一个若干年来敏感而颇具争议的论题，并得到比较明确而一致的看法。

民国时期，学界与政界便曾有关于“孙中山与儒家道统”的讨论。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戴季陶在《孙文主义哲学基础》一书中记载了孙中山与马林的谈话：“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着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这段话，后来成为民国时期对孙中山与儒家道统关系的基本调子，当时的政府首脑和学术界，大都如是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的社会政治格局变迁，带来了学术研究的变化，依据当时学界常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学者大都回避论及孙中山与儒家道统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大陆学者也纷纷重新探讨这样一个关乎中华文化承传的课题，遗憾的是成果还不太多，更缺乏深度和广度。本次学术会议，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有了较大的突破，如上的综述，则可见一斑。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李吉奎教授的论文，针对过去对孙中山与儒家道统的关系的争议，作了详尽的阐述。论文首先回顾了历史：1921年12月，孙中山对共产国际的马林宣示，他曾为说服一个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一连八天，每天八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李教授进而提出，“戴季

陶在谈同一件事时称,孙说自己是文武周公孔孟以来道统的继承者,是否如此,史料无证”,可以“不议”,但李教授又认定,孙中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承传的关系。他从三个方面说明:将旧文化、旧道德纳入民族主义;“五权宪法”在“规抚”西方的同时,加上了中国的“考试”和“监察”,“因袭”过去的优秀制度;民生主义实发端于孔孟。李教授认为,“既然三民主义的每一部分均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那么,他将三民主义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自视为道统的继承者,也是言之成理的”。

许多学者的论文,涉及了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对传统的继承,并强调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时的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认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密切,他既注意清除儒家思想已经僵化的躯壳,又努力提升其中的精华,加以弘扬光大”。宋教授从六个方面揭示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继承儒家的民本思想,将其提升到民权主义的高度”;“继承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将其提升到民生主义的高度”;“继承儒家的爱国主义传统,将其溶入民族主义之中”;“发扬儒家乐观向上的精神,练就愈挫愈奋的革命意志”;“发扬儒家革故鼎新的精神,寻求中国向前发展的道路”;“发扬儒家以德辅政的伦理精神,确立新国民的道德规范”。

孙中山在文化的传承中进行提升,使之跨进新的时代。这“新时代”的概念,在学者的论文中,各有不同的表述,有称之为“近代”,有称之为“现代”,总之是“走出中世纪”的“新时代”。暨南大学张晓辉教授认为,“孙中山牢牢把握时代命脉,根据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适应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从内涵的深度和外延的广度提出了现代中华民族思想与文化的命题”。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集大成的思想,含有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精粹。中山大学高小康教授认为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广州大学程潮教授认为,在孙中山那里,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对象之间是以彼此错位的方式出现的,社会革命是以民生为中心的,而社会建设是以民权为导向的。这些论述都很有见地,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显然,学者们是从中华文化由古代向现代推进的意义上,确定孙

中山在中华文化转型中的地位,称之为“第一推手”,他当之无愧。

中华文化的资源及其当代价值

紧扣会议主题,许多论文和发言对中华文化的资源及其当代价值作了评估。

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中华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精神文化资源”。山东省社科院刘宗贤研究员认为,“它像一座富矿,蕴藏着对现代人精神生命、未来人类社会有积极意义的恒常价值。因此,我们对它的责任不是褒贬和摒弃,而是开采和提炼,通过自觉的文化选择,促成它的积极转换,使它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新的贡献”,又认定“今天儒学在中国的重新兴起,不只是中国自身现代化转型对它的需求,也是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融和趋势对它的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郭齐家教授,对中华文化的资源及其当代价值,作了总体性的分析。他认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色是人本文化,它有别于西方的神本文化。人本文化是融合凝聚的文化”,“中华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修己安人,成己成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等”,对其进行弘扬,则“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探讨如何弘扬中华文化时,与会代表首先肯定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时代意义,并就具体的方面加以诠释。

人文精神的重建

辅仁大学校长黎建球教授,对中国人文精神作了系统的论述之后,具体阐述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的必要,以及重建的具体内涵。黎教授指出,面对当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大家都致力于经济的建设,但在经济建设发展之余,也体会到人文精神的衰微,一般人都以赚钱为唯一的价值观,作为唯一的生活模式与核心,为了赚钱什么都不管,不但不在乎伦理的关系,也不在乎那种与天地和谐的精神,更扭曲了自己的人性,而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愈来愈混乱”,因而“必须要有人提倡重振这样的精神,所以在体会到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在受到冲

击之后,我们必须重新建立”。

黎教授建议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之后,强调选择“符合现代意义”的内容加以重建,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整合的精神”,包括“人跟自己的整合”、“人跟社会的整合”、“人跟天地的整合”;二是“整体的精神”,即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统一,“我们承认肉体的需要有其必要,但我们更要接受精神发展的迫切性。如果不能有精神上的发展,肉体就会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精神上的发展,就是要有核心的价值观,要有中心的思想,要有内在渴望得到至善、幸福的目标”;三是“追求至善”,这是“人的内在的基本需要”,“乃是一种完美的境界,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仁的精神”。

道德精神的弘扬

浙江省社科院吴光研究员认为,儒学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具体便是“一德五道”:“根本之道是仁道”,“义、礼、智、信、中、和、敬”,都是仁道的具体体现。吴教授指出,“在当代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充分认识儒学当代价值”,“树立‘一道五德’的价值观”,“弘扬儒家的道德人文精神、建设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罗安宪教授对诚信观念的历史生成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诚’是内在的,‘信’是外在的”,“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重要的道德品格;“‘信’的要求却是‘说到做到’”,“只要做不到,就是‘不信’”。罗教授认为,诚与信都重要,但“信”比“诚”更难。针对当今社会失信的现状,罗教授呼吁,“全社会大力推行诚信教育应是现代社会非常切实的问题”。

台湾铭传大学刘久清教授,面对全球风险社会而思考走出困境的对策时,特别提到了儒家的仁爱观。他认为,“‘仁者爱人’,是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也就是说,在关系脉络下的个人,最重要的考虑不是如何个人实现,而是如何与他人相互丰富、彼此成全。如此一来,一个个的个人不再是孤立、必须以一己之力自行承担所有风险后果,而是相互支持、彼此共同承担生命共同体”。

关于道德精神的弘扬,还有学者通过个案的剖析,揭示中华文化资源的丰富,以及利用资源为现代社会服务的必要。五邑大学刘兴邦教授,通过对梁启超《德育鉴》的剖析,发掘其对传统文化的诠释与转换的贡献。他指出“梁启超的《德育鉴》以中国传统‘私德’作为镜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和审视,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因素,从而进一步实现了从‘公德’到‘私德’的转变”。进而,刘教授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理性主义地分析中国传统‘私德’,所蕴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那便是“向人们展示了这样的真理:任何国家和民族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既必须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所固有的优秀文化资源,也必须吸取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全盘否定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排斥世界其他民族先进文化传统的社会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现代化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

有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上审视儒家道德精神的当代价值。台湾联合大学刘焕云副教授在论文中称,“儒家德行观重视人彼此内在的关系和整体的和谐”,“寻求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天的内在感通”,“儒家的‘仁’,一方面强调人的反省”,“另一方面,‘仁’也是道德实践,在实践中人才能实现自由意志之自律与其他世界之关联”。

生态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启示

儒家的“天人合一”与“公平正义”,无疑提出了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核心理念。虽然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这些理念未能完全地得以实现,但它仍给今人带来许多启示。

东吴大学谢政谕教授的《孔子的伦理观与当前生态伦理的对话》,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役自然”所带来的自然失序与生态浩劫,进行了反思,进而具体诠释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强调“在孔子思想里,也明显地表达天道、地道与人道三者相结合的三才之道,也就是研究天的法则、地的法则、人的法则,要充分结合,才能达到人与天地相参”,“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所蕴育出来的社会价值观俨然成为一个可贵的天地人三才相结合的生命哲学”,“这样有序的耕作,正是生命

永续发展的当今之道”。最后,谢教授认定,“‘人类’之所以不灭种,完全靠‘人’知道‘谦卑’,相互‘尊重’,能‘传’‘承’有智慧”,“‘人’是渺小的,我们不只要‘敬畏’上天,更要‘赞叹’上天!我们要谦卑地向‘大自然’学习!”谢教授借鉴于儒家伦理,对当前生态伦理问题的反思,无疑是告诫人们孔子所建构的伦理关系,有助于减少当代人类的环境灾难。

关于政治生态,中山大学冯达文教授作了极其精彩的大会发言。冯教授首先评论了汉唐,“取宇宙论为理论支撑”的“社会——国家的公共结构与运作系统”,便是一种“生态政治哲学”。冯教授认为,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如早在先秦时期的《仪礼》、《礼记·月令》、《管子·四时》、《管子·五行》、《吕氏春秋》,以及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这些著作的基本主张是,以为‘天’与‘人’是相与的,‘人’必须依天立法。天以阴阳大化、四时替轮、五行生克为规则,故人类社会的生活秩序、国家的政治设施,亦应按这些规则行事”,总之“治国设施要做到‘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以社会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今的政治生态环境,冯教授认为,“我们不可以不承认现代的民主政治,注意到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这当然值得肯定和尊重”。然而,冯教授敏锐地觉察到,当今政治生态环境失衡的严重状况,诸如:“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关切的是人与人在利益上的协调,未免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和人的超越追求”;“以民主的方式确保的平等权利只是让‘在场’的利益个体参与的,过去、未来不‘在场’,弱势群体也往往不‘在场’”。冯教授明确提出,“正是顾及过去、未来,顾及弱势群体,‘正义’才得以提出和确保。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以‘在场’利益个人或团体为基础,很难真正建立起‘正义’论”。冯教授更尖锐指出,“现代社会又很热衷鼓吹价值中立,这样一来,价值的追求便被边缘化和私人化了;另一方面,社会的公共运作系统,由于失去了价值内容,则越来越形式化、操作化了,政治变成了‘游戏’,谁玩得有手段,谁就可以争得权力。这样的‘政治游戏’岂不很肮脏吗?”他在告诫人们,应当对如上的种种作出深刻的反省。

大同理想的承传

台湾政治大学彭立忠教授指出,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大同社会,以此为借鉴,我们也应当追求“富而好礼的公民社会”。他认为,二千多年前孔子曾经勾勒过一幅理想政治社会的蓝图,即“大同之治”,这是“人民彼此不相图谋作伪、盗窃不乱作的境界,是一种道德高尚的境界。同时人人以‘天下为公’作为社会信念,不藏私、不为己,政治上重视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政府对于人民的生老病死、养生送死皆能有所照顾”。彭教授认为,孙中山继承了“这个和谐的大同之治”,在孙中山的认知中,“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彭教授更强调,当今继承从孔子到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的必要性。他指出,进入21世纪,“两岸社会在各自生聚教训的积累下,基本上摆脱了民国初年的大富与大贫的困境,可是社会上贫富差距扩大的隐忧,富而夸侈斗胜的现象层出不穷,必要从传统文化的智慧中及海外文明发展的借鉴里,寻找建立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台湾淡江大学张双英教授对“天下为公”作了深入的历史分析,认为《礼记·礼运》所讲的“小康”与“大同”两种境界,“不仅是一先一后出现,而且两者之间更是‘因果关系’”,前者讲“天下为家”,后者讲“天下为公”。张教授明确认为,过去对“为”的诠释有误,“为”字应当读作“wèi”,是“为……设想,替……服务”的意思,其中的“天下”应解释为“人人”。因而,他重新诠释“天下为公”的涵义:“‘天下为公’的最恰当解释,便是‘人人为他人设想,人人为别人服务’,而不是‘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他是在道德的层面上强调大同社会的内涵,这一观点也引起了与会者的注目。

对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文化的问题,与会学者还从民族主权或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同视野进行探讨。

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认为,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文明对话的过程,对话双方应当彼此尊重,强迫性的、居高临下的对话是不平等的。蔡教授响亮地提出,“儒学不会死,儒学必须革新”。在他看来,说“儒

学已经死亡”，或说“儒学将统治世界”，都过于“简单”化，儒学“作为一种流行了2500年的传统文化，肯定有其生命力，但是同时，也因为它历史的久远，就难免带有旧时代的印记”，所以像于丹那样读《论语》，而把儒学捧红，而李零读《论语》又降低了儒学的现代地位，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儒学“必须和世界对话，在对话中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

华南师范大学宋德华教授认为，文化的多元化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发展趋向，多元格局的形成和持续离不开对外文化交流，而交流的本质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没有止境的。华南师范大学谢放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制度文化，但所学的只是其外在形式，而没有真正学到其内在层面，自由、平等远比“国会”这一外在形式更为重要。

华南师范大学贺璋璐教授指出，传统文化中“有关两性的探讨是自人类以来的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中都存在的一个普遍话题，是一个跨时空、跨国界的共同话题”，孔孟所谓“男尊女卑”的实意是讲男女的身份性，即人的言行举止应当符合自己的伦理身份，而并非刻意维护等级之“独尊”。贺教授引用了孟子的话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进而指出在当今，“强调和注重两性在天然差别基础上的关系”，以及两性的“伦理关系”，对于构建和谐家庭以至和谐社会，都值得人们思考。

澳门理工学院谭世宝教授关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看法，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的《羊城晚报》的相关报道，受到社会关注。谭教授认为，“遗产”一词的含义是死后留下的物质财富，“文化遗产”本来是中国“自己独有的物质或非物质财富，却要向联合国有关机构申请，成为联合国所承认并列入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名录”，“这等于在某种程度上自动放弃或出卖属于自己独有的财富权”，因此建议我国应当明令将以往误称的“文化遗产”，改称为“文化财产”，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正式公布。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途径的探索

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了如何发掘中华文化资源，使之实现思想价值

的时代转换,同时也十分关注近年来部分学校,积极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普及中华文化的经验。来自各类学校的与会者,均以自身的经验为依据,展示当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途径的探索。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李训贵教授指出,传承中国文化,首先要确立身份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格的培养,传承中国文化,是确证精神家园的需要。李校长详细介绍,该校在世界儒学联合会叶选平会长及其夫人的关怀下,设立国学院的经验,以及所取得的社会效应。

香港珠海书院周正伟教授回顾了香港在回归前,各级学校在推行经典教育方面的情况。周教授以为,自19世纪英人占领香港后,虽强化西方教育,但仍然沿袭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第一所由香港政府开办的学校——中央书院,该校的中文科,也选择沿用传统经典作为教材的内容”;民国时期,“香港各级学校,自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中文科的教材,仍依循习惯,多以传统经典为主”。

广州大学吴小强教授结合该校的教学实际,对儒学经典巨大的思想和社会价值作了新的阐释,认为“传统儒学经典所承载的中华人文精神,正是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精髓,在新的发展时期,在传承弘扬经典人文精神的同时,不断赋予其时代的新内涵,是儒学经典与时俱进,成为当代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精神信仰支柱”。吴教授还介绍了该校开设“中国文化名著导读”课程的具体内容,以及学生的感受与收获。

广州市天河区先烈路小学张锦庭校长,以“中华经典文化教育在全日制教育中的探索”为题的论文,首先阐述了全日制教育中推行中华经典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进而指出“经典教育乃时势所趋,刻不容缓”,最后把小学经典教育实践概括为七大方面:“创设校园环境,展经典诵读”;“落实课时诵经典”;“课堂教学渗经典”;“多种形式背经典”、“多彩活动现经典”;“课题研究促经典”、“家校合力推经典”,由是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广州,在正规教育中开展中华文化经典教育的大好势头。

刘宗贤研究员认为,儒学是一种“精英之学”,“又是百姓日用的‘常道’之学”,因而,她主张“重新普及儒学”,像过去那样,把儒家提

倡的“亲情伦理、道德良心、公道正义、忠信仁义,以及‘家国天下’的爱国思想”,向百姓天天讲,“使儒学重新转化为国民心灵中的某种精神力量,使它重新发挥积极的道德教化作用”。她呼吁,“我们作为儒学的研究者,除了研究书斋里的学问外,还负有一种重要责任,即将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道德伦理中精华发掘出来,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给世人听”。

本次会议虽定位为学术会议,而事实上,与会者已经在“雅”与“俗”、“精英”与“民众”的交结中进行研讨。这昭示着学者们已经在深入研讨儒学的学理问题的同时,渐渐地走出了书斋,承担起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换为民众的精神食粮的历史责任。

中华文化与两岸的和平发展

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亲密交谈,真诚切磋,和谐相处,乃此次研讨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为可贵的是,两岸学者密切关注如何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弘扬,求得更多的共识,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

2008年,正值两岸大三通正式开通之日,时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先生,破例在其中央党部接待由孙中山基金会主办的“‘天下为公’两岸行”学术交流团全体成员时,如是说:“血脉和文化是割不断的。”确实,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凝聚的纽带,两岸的与会学者均努力在探讨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弘扬中寻找彼此的切合点。多篇论文从儒家的核心价值,以及孙中山的思想智慧,来探索两岸关系发展。

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认为,“孙中山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为公、义、博爱、中、和、平六个概念”,“中”与“和”“贯穿了孔子与孙中山,是中华文化里一脉相承、历久弥新的瑰宝”,他专就“和”的概念来论述两岸关系的未来,期待以中华文化和通两岸。刘教授提出,“传统儒学相当重视‘和传统’、‘和天地’、‘和族群’、‘和万邦’”,“孙中山思想特别重视‘和传统’、‘和族群’、‘和阶级’、‘和宗教’、‘和万邦’”,用这种体现中华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审视两岸的未来发展,可以说,两岸将来应当是多元共济、和而不同的“一个和美的家园”。

台湾师范大学黄城教授和他的学生匡思成助理教授共同撰写的论文《孙中山和平思想与两岸关系的发展》指出,应当以孙中山的和平思想为指导,配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两岸的文化整合应是现阶段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工作。论文认定,孙中山继承了儒家“仁”的概念为其核心价值,“在群体的互动与相处上主张以传统中国王道思想‘以德服人’”,“孙中山从王道精神出发,以世界大同为其终极思想的群体互动主张,具有平等与多元意涵,‘和平’是贯穿其中的精神”。因而,论文提出,“在‘全球化’与‘区域整合’的趋势下,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两岸能否和平整合实为中国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中国现代化是保种、保文化并非保国家”。作者建议,“透过‘对话’,进行全面的交流,寻求‘文化整合’,重新建立起属于两岸中国人民的文化共识”,也就是“找回或重构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整合与扩大共同的现实利害,组成密不可分的关系网,编制或建构共同的未来理想图”。作者如此构想和建议,无疑是高度重视中华文化在两岸和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孙中山基金会最年轻的理事熊席麟副研究员,就中华文化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意义,在论文中提出三点看法:“一、两岸和平发展必须以传承中华文化为纽带,凝聚当代价值共识,增强民族向心力”;“二、两岸和平发展必须以捍卫中华文化为旗帜,振奋民族精神,与分裂势力、反华势力作最坚决的斗争”;“三、两岸和平发展必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感召,互助共荣,共创新时代的民族辉煌”。这揭示了中华文化在两岸发展中的具体功能。

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教授认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严教授回顾了两岸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主题的两岸文化交流之后,呼吁“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临之际,两岸各界认识更应该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这个大题目,加强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为创造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做出新贡献”。

从会议学术观点的如上综述,足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也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另外,在会议的发言和论文中,还有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龚隽教授、高小康教授,广东省社科联田丰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张树旺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教授,深圳大学李大华教授,广州大学纪德君教授,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申群喜教授、肖飞教授,以及台北“国父纪念馆”郑乃文馆长、台湾“孙文学术文化交流基金会”赵玲玲教授、元智大学洪泉湖教授等多名专家在会上的发言,均有独到之见,限于综述的篇幅,未能尽纳于文中,甚为遗憾,有待会议论文集明年上半年出版,以飨读者。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中山基金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宋时娟)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研究现状述评与展望

郭 骥

[内容提要]

上海孙中山故居内保存有大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藏书,是研究他们思想的重要资料。孙中山逝世后,故居藏书经过两个阶段的整理之后,针对藏书的研究或利用藏书对孙中山进行的研究随之开展。自1990年代起,针对藏书的研究主要包括研究故居藏书的边缘问题、利用《藏书目录》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将《目录》研究结论作为探讨孙中山思想的辅证材料,以及利用《目录》等各种文献资料研究孙中山藏书和读书情况等四种形式,然而以上各形式都未直接涉及藏书本身。本文认为,针对故居藏书本身的研究非常重要。通过研究,或许可以回答诸如有关孙中山是否亲自购买、翻阅、摆放藏书等疑问,同时对于了解孙中山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关注重点,以及知识分类体系、学科分类标准、所关心的学科前沿问题,乃至他的视野范围和兴趣偏好都会有所裨益。

[关键词]

孙中山 故居藏书 研究情况

上海孙中山故居位于上海市香山路7号(原莫利爱路29号),1918至1924年间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在此居住。^[1]期间孙中山撰写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并为演讲“三民主义”准备材料,是为其思想凝炼总结之重要时期。

1925年3月25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临终留下《家事遗嘱》,将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了夫人宋庆龄。此后,宋庆龄继

[1] 根据王耿雄先生的统计,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寓所居住时间合计两年十一月零六天,参见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续在寓所内居住,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离沪移居香港、重庆。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宋庆龄回到上海,将寓所赠与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

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唯一共同的住所,故居内保存有大量藏书,是研究孙中山和宋庆龄思想的重要资料。这批“所遗之书籍”大抵有1 932种5 230册,其中西文(包括英、法、德、俄文)种类最多,计有1 528种2 029册,中文389种3 143册,日文15种58册。^[1]

藏书整理的两个阶段

针对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的整理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至1981年宋庆龄逝世前,该阶段以整理藏书为主。

孙中山逝世后,身在北京的宋庆龄立即打电报到上海寓所,嘱咐保持孙中山在世时的原状,因此故居内的藏书也基本维持了当时摆放的顺序。

大约到了1950年代中后期,宋庆龄曾组织工作人员对故居藏书进行整理,并在藏书的书脊上粘贴编号标签,这些编号保存至今。^[2]

第二阶段为宋庆龄逝世后的1980年代,在整理藏书的基础上开展了初步的研究工作。

1981年宋庆龄逝世,不久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此后针对故居藏书进行的第二次整理,便是1980年代在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的组织下进行的。

这次整理的成果,保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1989年编印的《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内部发行)一书中。《目录》根据“类别索引”排序,内容包含书籍的“书号”、“文种”、“书名”(“译名”)、“作者”、“出版单位”和“出版时间”等项目,大量外文书籍得以整理,《目录》成为研究故居藏书最基本的资料。

除了整理和翻译外文书名外,管理处版《目录》的一项重要成果

[1] 各语种中,又以英文最多。藏书数量根据中村哲夫先生《关于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的统计,事实上故居还有少量书籍未编入序号,因此也未编入《藏书目录》。

[2] 据原宋庆龄上海寓所工作人员周和康先生的回忆。

是对藏书作了分类。其中外文藏书被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法律等以及杂志、年鉴等类别,日文藏书被单独列出,中文藏书则被分为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军事等类别。

整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将书橱内书籍的排列原状拍摄记录并绘制成图,保存了原始资料。

在1980年代整理的基础上,1993年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和日本孙文研究会合编了《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主要参与者为日本学者中村哲夫先生。中村先生在部分藏书的基本信息中附录了诸如开本尺寸、页码等内容,并参考《大英国博物馆书目》和《美国联合图书总目录》等资料,增加了“英美主要图书馆书号”一项以便读者查对原书,同时请上海交通大学方明光、严民先生校对藏书的书名和译名。^[1]

汲古版《目录》参考了管理处版《目录》原有的分类,对西文类(即原来除日文以外的外文类)重新做了分科,将书籍分为百科全书和年鉴、政治(附法律、军事)、经济(附铁路)等十个科目。

基于故居藏书的整理工作,中村哲夫著有《关于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1993年3月10日在上海中山学社的报告》,考察了故居藏书概况、类别构成、藏书来源、署名和藏书印等内容,揭示出孙中山亲自在部分书籍上署名和盖印的习惯、宋庆龄藏书印的种类、孙中山和宋庆龄没有眉批的习惯,以及有关原美国人佑尼干(T. R. Jernigan)藏书等问题。由于中村哲夫是为数不多直接接触过藏书的学者,同时他对藏书概况曾有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因此该文是迄今为止关于孙中山故居藏书研究最为权威的论文之一。^[2]

有关故居藏书研究的四种形式

1990年代以来,学者们根据《藏书目录》等材料,从不同方面对

[1] 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日本孙文研究会:《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后记》,日本汲古书院版。

[2] 中村哲夫:《关于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1993年3月10日在上海中山学社的报告》,《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该文修改后被收为汲古版《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后记》,后经删节以《孙中山的重要遗产——藏书》为题,刊登在《团结报》1993年6月16日第二版。

故居藏书进行研究,不过几乎都是围绕英文类的藏书。有关藏书的研究主要包括四种形式:

第一种是研究故居藏书的边缘问题,以增加对故居藏书本身的了解。

自从中村哲夫修订《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并对故居藏书进行初步探讨以后,针对藏书本身具有推动性的研究在十余年内几乎没有进展,目前仅停留于对一些边缘问题的关注。

对于藏书边缘问题的研究,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先生发现了一份孙中山1914至1915年在日本丸善书店购书的清单。

此外,日本孙文纪念馆武上真理子研究员撰有《孙文与佑尼干——知识连索的开端与发展》一文,探究曾任美国驻沪总领事的佑尼干与孙中山的交往情况,孙中山故居藏书中原佑尼干藏书的比例构成,孙中山藏书、宋庆龄藏书和佑尼干藏书的关系,以及围绕《远东美国律师协会1920年年度报告·佑尼干追悼特集》的一系列问题。^[1]

拙文《佑尼干与孙中山藏书》则主要考察了孙中山部分藏书的原拥有者佑尼干的生平概况,并对孙中山与佑尼干,孙中山与佑尼干藏书之间的关系作了梳理,提出研究佑尼干与孙中山藏书时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2]

两篇论文对中村哲夫揭示的故居藏书中原佑尼干藏书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不过仍是关于故居藏书边缘问题的讨论。

第二种是利用《藏书目录》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其代表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先生。

姜义华先生利用久保田文次发现的孙中山的藏书单和《藏书目录》,撰写了《孙中山思想发展学理上的重要准备——跋新发现的一份孙中山购书清单》^[3]一文,并参考俞辛焞、王振锁的《孙中山在日活动

[1] 武上真理子:《孙文与佑尼干——知识连索的开端与发展》,《孙文研究》2005年第38辑。

[2] 拙文《佑尼干与孙中山藏书》曾于2009年11月在“中山论坛(二)‘孙中山与上海’”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待刊。

[3] 姜义华:《孙中山思想发展学理上的重要准备——跋新发现的一份孙中山购书清单》,《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读书》1993年第2期载《孙中山的购书单》一文,对此也有介绍。

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和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揭示了孙中山曾于1915年前后关注过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潮、经济问题,以及哲学、矿业、冶金、地质、建筑、养蜂、化学等方面的著作,同时关注一战、关注民生,并且正为撰写《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做准备的证据。

事实上从1991年起,姜义华先生根据孙中山的生平和思想,分门别类对故居藏书进行探讨。他是最早利用《藏书目录》,并对故居藏书和孙中山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最为深刻的学者之一。姜义华先生从孙中山《建国方略》所包含的三部著作入手,以孙中山的藏书作为研究的重要材料,撰写了诸如《民权主义思想渊源——上海孙中山故居部分藏书疏记》等一系列论文。

首先是针对体现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民权初步》,有《民权主义思想渊源——上海孙中山故居部分藏书疏记》^[1]一文,内容是针对政治方面藏书的梳理。姜义华将孙中山的政治类藏书分为政治学概论、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各国宪法与宪政、政党政治、联邦制与地方自治、各国政治制度与各国政府、法与法制等类目分别探讨,考察孙中山的政治视野。

其次是针对体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实业计划》,有《孙中山〈实业计划〉战略构想析评》^[2]一文,内容是针对经济方面藏书的梳理,从藏书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发展史、实业(交通港口铁路、城镇规划管理、银行信贷)、政治经济学理论等方面分类讨论,以此审视孙中山的实业理念。

再次是针对体现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孙文学说》,有《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3]一文,主要利用故居《藏书目录》和《孙中山从丸善购入的书籍目录》两份材料,对孙中山哲学方面的藏书进行整理,分析《孙文学说》的哲学思想来源,并得出当时孙中山最关注的是“以叔本华、尼采、博格森和倭铿为代表的怀疑、批判乃至否定近代

[1]《中山社会科学季刊》1991年第6卷第2期。

[2]《近代中国》1991年第1辑。

[3]《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物质文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而倡导精神追求、非理性化及人文主义的哲学”的结论。

而在姜义华先生的《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1]一文中,则通过对故居藏书中有进化论的专门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天文学、地质学、生态学、遗传学、优生学、人类学论著的分类考察,论证了孙中山“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的学理基础与思想渊源。

2006年,姜义华先生撰写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同盟会——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视》^[2]。文中,姜义华先生对自己多年来关于孙中山故居藏书的研究作了概括,随后着重考察了故居藏书中1911年前出版的书籍,将之分为历史(包括综合性著作、外国史、中国史等)、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流派、社会问题等)、政治(包括民主制度、法制、比例代表制等)、经济(包括经济学理论、垄断资本、财政学、铁路运输等)和军事(包括战争史、战略战术、枪支射击、海军)等方面,通过比对孙中山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对其知识积累和早期思想的形成进行探讨分析。

此外,姜义华先生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民族形成的进程》^[3]、《对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的接续与超越——孙中山晚年褒扬儒学理路试释》^[4]两篇文章,则根据故居所藏辜鸿铭翻译的英文版《论语》和《中庸》,以此说明辜鸿铭以及传统文化对孙中山的影响。

通过上述论文,姜义华先生在对故居藏书进行分类爬梳的基础上,对孙中山思想的来源和内容作了系统论证。

中村哲夫在参与整理故居藏书之前,就已撰有《试论孙文与美国经济学》^[5]一文。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学者出口勇藏先生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强调其有关孙中山与美国关系的论述,随后结合《藏书目录》论证了孙中山曾受到美国经济学的影响,这也是较早利用

[1]《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2]《史林》2006年第5期,又见《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4]《史林》2009年第4期。

[5]《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

《藏书目录》对孙中山思想进行研究的论文之一。

段云章先生在《放眼世界的孙中山》一书中,为说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时所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情况,对《藏书目录》中1911年前出版的501种西文藏书进行分类统计。他首先将藏书从内容上分类,计算出政治113种、经济129种、军事33种、社会58种、法律36种、文化(包括历史、哲学、文学等)132种。随后根据国别统计,“论及国别较多,包括欧、美、亚、非的许多重要国家,如美、英、法、俄、德、日、意、印度、朝鲜、菲律宾、埃及等近20国,其中以美(183种)英(148种)最多。……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介绍或论述中国的50种,可见孙中山很重视外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最后又从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三个方面统计藏书,“属于民族主义者59种,属于民权主义者81种,属于民生主义者165种”。书中还以部分藏书举例,作为研究孙中山学习西方思想的参证。^[1]

而在稍早的《孙中山与印度》^[2]一文中,段云章统计并介绍了故居藏书中有印度书籍,以证实孙中山对中印关系的重视。

孙宏云先生的《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演进》^[3]一文,针对故居藏书和丸善书店购书清单中有关法律书籍,考察了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而在《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4]一文中,主要研究了孙中山在其国民会议主张中所表达的职业代表制,其中统计了藏书中关于比例代表制的书籍。

此外,朱云志先生的《孙中山的宗教信仰特色》^[5]则统计了孙中山关于宗教方面的藏书,以说明其宗教思想的变化。

第三种研究形式是第二种形式的延伸,即在讨论孙中山某方面思想时,将针对《藏书目录》的研究结论作为辅证材料进行论证说明。不过这类研究,大多转引中村哲夫、姜义华和段云章诸先生的成果。

其中以研究孙中山经济思想方面的论著,所引用故居藏书相关研

[1] 段云章:《放眼世界的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5、39、42、43、45页。

[2]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5年第5期。

[3] 《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 《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5] 《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究资料的情况最多。如谢放的《孙中山与中国城市近代化》^[1]、赵可的《美国现代城市制度与孙中山直接民权理论》^[2]、鄢定友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3]、周建雄的《孙中山经济发展思想研究》^[4]、郝先中的《孙中山〈实业计划〉中关于皖江开发的设计》^[5]、王金玉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6]、刘世红的《从〈实业计划〉看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的特质》^[7]、干润梅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溯源》^[8]，均提到了故居中经济方面的藏书，主要参考姜义华《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实业计划〉战略构想析评》和段云章《放眼世界的孙中山》的研究成果。

历史、哲学和宗教方面，有洪认清的《孙中山与史学》^[9]，引用了中村哲夫的研究成果；皮庆侯的《孙中山民生主义伦理思想研究》^[10]，参考了姜义华《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的研究成果。

第四种是利用《藏书目录》和相关论文，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研究孙中山藏书和读书的情况。

例如李联海先生在《孙中山轶事》中，首次提到孙中山藏书中有关佑尼干藏书的信息。^[11]胡波先生在《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一书中引用中村哲夫的统计数据，以说明孙中山勤于读书的事实。^[12]其他如沈道初先生的《略论孙中山读书生涯》^[13]、傅国涌先生的《鲜为人知的孙中山读书生活》^[14]和《孙中山：“革命不忘读书”》^[15]等，也都论及故居藏书，用以介绍孙中山的读书情况。至于沈春樵等的《孙中山读书生

[1]《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

[2]《中州学刊》2000年第6期。

[3]《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4]湖南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

[5]《皖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6]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7]《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8]《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7期。

[9]《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

[10]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11]李联海：《孙中山佚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12]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13]《学海》1996年第6期。

[14]《同舟共进》2006年第11期。

[15]《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22期。

活的文化价值》^[1],则是对各家研究成果所进行的综合。

内容最为翔实的,有张笃勤先生的《孙中山读书生涯》,书中以孙中山的一生为线索,将其藏书和读书佚事相结合,材料来源广博,叙述深入浅出。^[2]

除此之外,毛凌文先生的《孙中山文献学研究》^[3]一文,将上海孙中山故居的藏书以及故居管理处编撰的《藏书目录》列为相关孙中山的重要文献资料。

孙中山故居藏书的研究意义和展望

从故居藏书整理和研究的全过程来看,除去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外,罕有针对藏书本身的研究。这是由于两个阶段的整理工作主要出于保管的目的,很少将藏书置于研究的层面;而后因为藏书原件保存于库房,无法获得更多关于藏书本身的信息,故而只能利用《藏书目录》进行研究。目前研究故居藏书的基本资料——管理处版和汲古版的《藏书目录》,又均未曾在国内公开发行,能够直接利用的学者很少,而大多数的论著只能转引自二手材料。至于那些涉及藏书本身的论著,也仅限于利用《藏书目录》,或是讨论与藏书有关的边缘问题,如对佑尼干藏书的研究等。

事实上,研究故居藏书的意义,在于这是除去孙中山遗留的文字音像外,最能体现其思想的实物了。姜义华在对故居藏书历经近20年的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在20世纪所有中国人中,就阅读西文书籍数量之多、方面之广、层次之高而言,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以超越孙中山。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他精心研读大量西方理论、学术著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4]当然,目前尚未被关注的故居中文类藏书,其实也表现出孙中山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和取舍态度。

与公共图书馆不同,私人藏书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大体可以分为

[1]《天一阁文丛》2006年第4辑。

[2]张笃勤:《孙中山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

[3]武汉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4]姜义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同盟会——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视》,《史林》2006年第5期。

三种：为藏书而藏书、为读书而藏书、读书与藏书结合。那些考究珍版图书的藏书家、藏书楼，是为藏书而藏书的代表；而从上文援引的各类反映孙中山读书生活的书籍中，我们似乎能够证实孙中山是出于读书的目的收藏书籍。因此，较纯粹着眼于版本收藏的藏书家而言，孙中山的藏书或许更能反映出其思想关注之所在。

如要对某位历史人物进行研究，他的文集、手稿、书信、日记和藏书等都是重要资料。同为以文字作为载体的史料，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多由作者反复修饰润色；手稿相对原始，却也不免于为外人而作；书信可能较为私密，不过写信者出于礼貌等原因，时常会对思想感情有所节制；相形之下日记更为隐私，多有真实思想的流露，但往往也会被揭出刻意为之、事后弥补的案例，例如近年关于顾颉刚先生日记引发的争议。^[1]至于某位历史人物为读书而收藏的书籍，虽然不是他思想的直接表达，却因藏书经历长时间的累积形成，或能体现藏书者的视野所及和关注重点；更因藏书的客观存在，或可反映出藏书者的知识结构。例如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曾通过鲁迅先生的藏书，尝试考察其知识结构。^[2]

笔者曾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对于故居藏书的保存情况有着些许的了解。与现存共计4 062种，约14 000册的鲁迅藏书相比，孙中山藏书并不为多，然而孙中山故居藏书的特点在于最大程度完整保留了藏书的原始状态，其关键之处就是放置的次序。正是由于宋庆龄对故居藏书的保护，使我们有机会接近当年孙中山在世时的藏书原状，这无疑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对于历史而言，其所涉及三个层面，包括已发生的历史事件、针对历史事件的复原，以及针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藏书研究，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尽可能复原藏书的本来面貌，亦即藏书的原状，由藏书自己“陈述”，将其蕴含的丰富信息充分展现，随后再结合孙中山生平和思

[1] 如朱维铮：《顾颉刚改日记》，《东方早报》2009年2月1日。

[2] 如孙郁先生曾于2007年6月4日在新浪的“网上大讲学”讲演鲁迅的知识结构，相关问题又见于他的《新旧之间——鲁迅藏书一瞥》（《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7月）等论著。探讨鲁迅的知识结构，更早的有王锡荣先生的《鲁迅知识构成初探》（鲁迅定居上海6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节选后以《鲁迅知识构成的历史与特点》为题发表于《鲁迅学发微》，百家出版社1994年9月）。

想进行评析。只有基于复原了的藏书原状的研究,才更具有说服力,否则某些问题很可能对藏书研究的可信度产生影响。而复原藏书原状的工作,或许会对探寻答案有所推进。

根据对藏书原状的初步考察,笔者怀疑故居西文类藏书的原状排序实际已蕴含了藏书者自己的学科分类标准,而且排序的形成很可能与孙中山本人有关。如果这一猜想成立,将对解决下列三条疑问有着极大的推进,同时这也是研究故居藏书原状,甚至是分析孙中山知识结构之关键所在。

第一,藏书是否由孙中山亲自选购。故居藏书的来源是多样的,包括了孙中山亲自购买的藏书、孙中山购买的原佑尼干的西文类藏书,以及宋庆龄的藏书,其中前两者属于孙中山自己选购的藏书。中村哲夫认为孙中山整批购买了原属佑尼干的藏书,体现了孙中山晚年关注的方向,这属于孙中山藏书的一部分^[1],鄙意对此大体赞同,但同时认为购买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这批书籍与孙中山此前购买的其他书籍的地位还是略有差别的。当然如能对三者区分研究,可能更为恰当,这也能为探讨宋庆龄和佑尼干的思想提供重要资料。

笔者通过对故居藏书原状的初步研究,发现以藏书书脊标签1655和1656号为界,1655号以前的藏书有着明显的内在分类体系,而1656号开始的藏书则类别混杂。这一现象似乎预示着并非所有故居藏书都经过系统整理,1655号以前的藏书应该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如果大胆地假想,该界限或许是区分孙中山和宋庆龄藏书的标识。

第二,孙中山是否了解藏书内容。故居藏书汗牛充栋,且书中似乎很少有孙中山的笔记内容,孙中山是否了解这些书籍,是藏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假如孙中山对这些书籍的内容一无所知,那么藏书的价值将会大大降低。通过各种回忆孙中山读书生活的材料,我们大致已能判断孙中山是为读书而藏书,但他对故居藏书的了解程度,仍有待于通过藏书本身获得更多的直接证据。

笔者通过分析故居藏书(主要是1655号以前)原状的分类方式,

[1] 上海孙中山故居管理处、日本孙文研究会:《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后记》。

发现藏书分类者对于整批藏书的内容是相当清楚的,并且有着独到的分类想法。如果这位藏书分类者是孙中山本人,那么藏书的价值不言而喻。

第三,孙中山对于藏书是否有自己的分类标准。目前所见的两部《藏书目录》,都是依据语种和整理者所制定的学科分类进行的排序;而诸如姜义华、段云章等学者,或从《建国方略》或从三民主义内容的角度,分类研究故居藏书。既然藏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复原藏书原状,假若孙中山对藏书有自己的分类标准,作为研究者理应对此表示尊重。

根据笔者对故居藏书的认识,藏书的实际分类与《藏书目录》的分类方式虽然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不少差异。遵循藏书的编号,重新复原出一套体现藏书原状的排序方式,是深入研究藏书分类者自身分类标准的前提。

总之,通过针对藏书的研究,诸如有关孙中山是否亲自购买、翻阅、摆放藏书等疑问的解答,他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关注重点,以及知识分类体系、学科分类标准、所关心的学科前沿等问题,乃至他的视野范围和兴趣偏好,或许都可由藏书来做“陈述”。如此,孙中山故居藏书方可成为复原孙中山知识结构的重要材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孙中山的知识构成提供参考。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大学博物馆(筹)馆员)

(责任编辑:宋时娟)

我所知道的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

周和康

1956年初,我从市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调上海宋庆龄寓所任生活管理员,李燕娥是宋庆龄的贴身保姆,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信赖。李燕娥不识字,宋庆龄写给她的信我念给她听,她给宋庆龄写信由我代笔,最后她签名,她个人的一些情况也常对我讲。宋庆龄关于李燕娥的情况也常写信给我。因此,使我对李燕娥有比较多的了解。李燕娥过世快30年了,我把知道的情况写出来,纪念这位忠心耿耿为宋庆龄服务一辈子的大姐。

一、宋庆龄收留李燕娥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县人,1911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家里十分贫穷,出身船工。她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叔父抚养长大,并长期跟随叔父在船上生活。16岁时,由叔父作主许配给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那人是给包饭老板专送包饭的小无赖,他任性赌博,喝酒作乐,喝醉了就动手打骂李燕娥。婚后不久,李燕娥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忿然出走,于1927年千里迢迢前来上海投靠同乡谭妈。谭妈是谭洁怀的母亲,曾经在宋庆龄家当过保姆。

谭洁怀原住在虹口嘉兴路三德坊10号,是专治鹅掌疯(手癣)的医生,在海宁路开了一个诊所。宋庆龄和谭洁怀的关系亲密,我到寓所工作后,宋庆龄经常嘱我送物到他家中去。宋庆龄在寓所设家宴,放映电影时,亦请谭洁怀前来作客。谭洁怀也经常前来寓所探望,并送上食品等物,例如从南京西路凯司令定做的鲜奶大蛋糕,从吴淞桃园选来的2棵水蜜桃树,就种在寓所后花园西侧中间。

宋庆龄与李燕娥相识于腥风血雨的年代。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宁汉分

裂，7月17日，宋庆龄离开汉口回到上海。就在这时，谭妈把李燕娥介绍给住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宋庆龄。

当谭妈介绍李燕娥的苦难身世和不幸的婚姻遭遇时，宋庆龄连声叹惜，十分同情地说：“你多么不幸，你多可怜呀。”就毅然决定把她留下来，作为自己的保姆。顿使李燕娥感恩万千，倾吐肺腑之言说：“夫人，我愿意服侍您一辈子”。

8月22日，宋庆龄赴莫斯科，李燕娥同另一少年何元光留下，看管宋庆龄的莫利爱路寓所，直至1931年8月13日宋庆龄由欧洲返回上海。

李燕娥的不幸婚姻在宋庆龄的亲切关怀下，得到秘书黎沛华的大力帮助，不久就解除了和丈夫的婚约。为此，她对黎沛华的感情很深，尊称为黎先生，以表示敬意。每天按时都要到秘书室去探望问好称安。并带上热水瓶，给黎先生茗茶解渴。从此之后，李燕娥就终身不嫁，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跟随在宋庆龄身边，忠心耿耿工作54年，直到病逝。

二、李燕娥给我的最初印象

我是1956年到宋庆龄寓所去报到的，宋庆龄首先给我介绍了警卫秘书隋学芳和李妈（宋庆龄当时称李燕娥为李妈，日后改称李姐，我们则多称她李同志）。李燕娥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她个头不高，体态健胖，短鬓齐耳，朴实无华，忠厚善良，心直口快，有话就说，毫不留情，讲话嗓门大，说一口带浓重广东口音的上海话，衣着朴素，穿一身剪裁得体深灰色开襟上衣，下着宽大的长裤，手里经常拿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放在上衣口袋里，常习惯性地抚摸一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下楼梯，咚咚作响，一听就知道是李同志下楼来了。当时，我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情况不太了解，李同志总是不厌其烦一一指点，应该怎样去做，让我从中得到教益。有一天，李同志把宋庆龄的信件发给我登记分发，接着就笑容可掬地说：“周同志，信件登记簿上的字，应写正楷，不要潦草，因为这本簿子每月都要定期送给夫人亲自看的。家里用的账簿，亦是如此，每张发票，你要重新写一张，把品名、金额核算清楚后贴在原来的发票上面，这样可以使夫人看起来省力，做到一目了然。还有你每天早晨去供应站买小菜，所有东西都要挑新鲜的、质量好的买，回来后，就直接交给厨师验收。凡是一切

外买食品，你要绝对负责，食品拿到后，你就不能离手，亲自交给我。因为这些食品，都是直接给夫人吃的，责任重大啊，出了事情，你我可担当不起的，所以，你要提高警惕，谨慎小心，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客厅里古董橱的钥匙，我就交给你保管好，不要乱放。这些古董瓷器，其中有一套是夫人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送的。你每月都要揩一次，用软布轻揩细拭，千万不要碰坏。要经常保持清洁，不能沾有灰尘。这些都是很贵重的古董，你要小心轻放，务必高度注意。对楼下每个厅堂的清洁卫生工作，你要仔细认真检查，镜框、门框、护墙板的上面，都要用自己的手去摸一下，看看是否有灰尘。总之，角角落落都要搞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沾。对不清洁的地方要及时指出补搞。夫人是十分重视清洁卫生工作，检查起来很严格。千万不能马马虎虎，疏忽大意……”。

有一件事，我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迄今难忘。1956年夏天，有一天，警卫秘书隋学芳要我派人把厨房里的窗纱拆掉，以便通风。将热量迅速排除，降低厨房温度。当时，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甚了解，就从管理室带来木工拆除厨房窗纱。当木工敲窗的声音给宋庆龄听到时，她就走到楼下厨房，轻声细语地问我：“周同志，谁布置你把厨房的窗纱拆下来的，厨房里没有了窗纱，苍蝇、蚊子就会飞进来，不符合清洁卫生的要求。如果厨房里太热的话，我想可以摆上一只电风扇吹吹降温。”接着她又和蔼可亲地婉转告诉我：“你刚来不了解情况，以后凡是家里房屋设备装修或更动，希望你征得我的同意。”我连忙称是，一定遵照首长指示办理，并请木工立即把窗纱装上，恢复原状后，宋庆龄说了声“谢谢”，笑容满面上楼而去。事后，李同志悄悄地对我说：“周同志，夫人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任何房屋设备、家具摆设的更动，未经夫人自己同意，谁也不能改变，请你以后切实注意。”李同志的话十分中肯，使我茅塞顿开，并从中得到教益。从此以后，对寓所房屋的几次修缮，我都要向宋庆龄请示汇报，对需要作重大改动之处，还绘图拍照，送请宋庆龄审核批示，然后再进行动工修缮，得到宋庆龄的好评。

三、李燕娥跟随宋庆龄转战香港、重庆

1937年12月23日，一个西北风凛冽的寒冬，宋庆龄在李同志的

陪同下，从莫利爱路29号寓所走出，离开上海，乘法国邮轮前往香港，于26日抵达香港后，就住在二弟宋子良干德道11号2A的家中，然后于1939年12月初迁移到九龙加林加道25—27号大弟宋子文寓所居住。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一天空袭警报拉响后，大批日本飞机飞临香港上空轰炸。当时，飞机就在头上肆意盘旋时，李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把竹扶梯架在旧墙上，奋力帮助宋庆龄翻越墙头，搀扶到隔壁邻居家里的防空洞避难，终于避免了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浩劫。这件事，除了李同志亲自讲给我听外，记得在1962年1月18日上午，宋庆龄嘱我在客厅谈话时，也曾经提及此事。她说：“有一次，我居住在香港，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飞机就在我们头上，李妈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立即架好扶梯，帮我翻越墙头，搀扶到隔壁邻居家里的防空洞避难……”往事记心头，顿使她眼睛也湿润了。

1941年12月10日清晨，宋庆龄在李同志的陪同下，前往启德机场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前往重庆。

在重庆期间，宋庆龄居住在渝中区西路口新村5号（现为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由李妈奉侍在侧。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由当地友人介绍来的服务员谭明德和一位汽车驾驶员。

1945年11月8日，宋庆龄离开重庆，乘专机到达上海，随行人员李同志和谭明德，居住在靖江路45号（现为桃江路）。

在重庆使用的那辆美国“派克”轿车，是由轮船托运到上海来的。我去寓所工作时，见到这辆“派克”车仍停放在车库里，每隔一个月，我和刘春生就把车开到虹桥俱乐部试车，对该车例行保养工作。1957年初，根据宋庆龄指示，要把“派克”车托运到北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我通过上海铁路局金处长联系，由刘春生驾驶“派克”车，直接开到上海东站货运室陈主任处办理托运手续，然后装上16次特快车，托运到北京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

四、李燕娥是宋庆龄的总管家

平时在寓所里，李同志的主要工作是侍奉宋庆龄，端水沏茶，送上早点、水果和食品，传递文档和信函，传达宋庆龄的指示。

她事事处处以保护、关心宋庆龄安全为重。她每天都睡得最晚，每天都要亲自检查一遍家里所有的门窗是否关好，室内温度如何，电灯、煤气、自来水的开关是否拧紧关好，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每当裁缝前来家里量尺寸做衣服时，我安排裁缝在楼下电话间的红木圆台旁干活，当李同志陪着宋庆龄下楼来，她就侍奉在侧，寸步不离，既当参谋，又做保卫工作，安全可靠。直到裁缝工作结束，她才搀扶着宋庆龄一起上楼去。在上海家里，宋庆龄走到哪里，李同志就跟随到哪里，从不轻易离开。每次国外邮包寄来，李同志立即送上楼去，先请宋庆龄过目，再把邮包拿到自己房间的阳台上去拆封，经过仔细检查，送回宋庆龄处收下。这样做，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外曾经多次发生邮包拆封时突然爆炸的事故。为了保证宋庆龄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李同志总是自告奋勇地担当起这一任务。

李同志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当宋庆龄居住在上海寓所时，每逢星期日上午，她就匆匆赶往乌鲁木齐北路的一个教堂去做祈祷，整个上午，就在那里度过，风雨无阻，从不缺席。而当宋庆龄离沪返回北京后，她就足不出户，哪里也不去了，连到教堂去做祈祷也终止，日夜守望在寓所，看管好这个家，集中精力做好家里的工作。她每天早晨五时即起来，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吹进来。遇到阴雨天，紧闭门窗，不让潮湿空气侵入室内，以免物件家具受潮霉变损坏。接着开始打扫楼上房间，别看她人胖体重，干起活来，却是干劲十足，步履矫健，把卫生间里一套三件洁具，墙面瓷砖擦得洁白干净。为了保持室内清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她爬上蹲下有时不惜跪在地上，把角角落落都揩得干干净净。每年大伏天，她格外忙碌，我们在楼下翻晒地毯，她独自奔向二楼朝南的大阳台上，翻箱倒柜，翻晒孙中山先生的珍贵文物和宋庆龄的裘皮衣服，然后拿进房间内，用电风扇不断地吹，凉透后，一件件折叠整齐，放进原来的衣箱内，再加些樟脑丸防蛀。接着她和我们一起，把宋庆龄放在书橱里的所有藏书和唱片、照相簿等，进行清洁整理工作，先用棕刷轻轻地刷去浮灰，再用软布把藏书一本本轻擦细拭，揩得干干净净，按照原样放回书橱，在书的上端放好樟脑丸防蛀。连续几天的辛勤劳动，确实搞得李同志大汗淋漓，精疲力尽，可是她从不叫苦，毫无怨言，总是乐呵呵的，她深情地说：“这是夫人交给我的任务，为了保护好孙

中山先生的珍贵文物和夫人的衣服，再苦再累，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因此，家里所有的衣服、家具、书籍、唱片、地毯等物，从未发生过霉变损坏现象。今天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文物能够完整无损地保存得这样完美，确实离不开李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劳动。

李同志在日常工作中，态度严谨，十分细心，一是一、二是二，容不得半点马虎，她掌握家里所有的钥匙，保管得很严格。每次关门后，都要亲手把门推一推，试试看门是否关牢，才放心离去。家里每次房屋大修，必须把主楼各厅室出清，把所有家具全部搬到辅楼去存放。李同志就搬到秘书室去住，所有重要的东西，集中在这房间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只铁质深褐色的文件箱，一定要在她触手可及的床旁，因为这是宋庆龄存放重要文件和贵重物品的铁箱。她一定要日夜看管好，以确保该箱的安全。她对我说：“这是夫人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全力以赴保护好这个铁箱。”由此可见，这个铁箱的重要性。宋庆龄逝世后，在清理上海家里财产时，一些重要文件，如毛主席和周总理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开会的亲笔信以及孙中山印章等物，都是从该铁箱中取出来的。

李同志心直口快，目光锐利，发现问题，有话就说，毫不留情。1962年8月26日早晨，警卫秘书隋学芳把随身备带的一支小手枪，装在塑料袋里，挂在工作人员吃饭间的衣架上，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当李同志下楼来发现此事，大吃一惊地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拆滥污^[1]把手枪到处乱放，太不像话了。”然后，她立即把门锁上就去找隋学芳，对他提出严厉责问：“你的革命警惕性哪里去了，万一手枪被人利用去干坏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作为宋庆龄的警卫秘书，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责任重大，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呀！”说得隋学芳哑口无言，连称对不起，今后一定注意改正错误。

1964年4月27日上午11时，警卫秘书孙国印对李同志说：“五一节将到，我们准备开一个会，请你准备一下讲话。”李同志回答：“你叫我准备什么，我不会讲的。”孙国印又问隋学芳过去是干什么的，李同志说：“我不知道隋学芳在北京是搞什么的。”孙国印说：“我亦不知道，因为隋学芳生病，我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代替他的工作，待他病

[1] 拆滥污，上海方言，即不负责任的意思。——编者

好后,我仍要回去的。隋学芳是宋庆龄的警卫秘书,管理宋庆龄的一切工作,我因新来这里,情况不熟悉,请你帮助。北京的宋庆龄工作,都是我们局里管,上海太复杂。”李燕娥回答;“隋学芳是警卫秘书,我们这里是张甦平、安培廉领导的。家里的事情,都由管理员来管的,你也想和隋学芳一样一把抓吗?那你在做梦。”孙国印听后只得悻悻走开。

1964年5月10日上午,孙国印在寓所内,擅自把宋庆龄的“吉斯”轿车开进车库时,被李同志看到,就立即责问孙国印说:“你这么大胆,把首长的专车开进开出,把轿车撞坏了,又是公家倒霉。你如果要学开车,可由公家另外派一辆车来给你开好了。”说得孙国印面红耳赤,从此再也不敢开这里的轿车了。

五、李燕娥会烧适合宋庆龄口味的饭菜和布置宋庆龄喜爱的环境

李同志虽然不识字,但她的烹调手艺和插花艺术还是很高的。

为了改善宋庆龄生活,有时李同志下厨房,亲自为宋庆龄烧几个可口的菜肴。她的拿手好菜是咖喱鸡、烤羊腿、红烧牛白腩、霉干菜笋红烧肉、鱼生粥、西式什锦炒饭等。这都是宋庆龄爱吃的。家里的鲜花插瓶和盆花摆放,都是她的拿手杰作。从花卉剪插、花瓶摆放她都要自己动手,她把菖兰、香水月季、康乃馨、水仙、腊梅、天竹、象牙红等搭配得很好,红花绿叶,相得益彰,生机盎然,幽幽花香,飘飘逸逸,婀娜多姿,给人以美的感受,颇得宋庆龄和中外来宾的赞赏。

在宋庆龄寓所,日常都是由李同志为宋庆龄布置四季鲜花和盆景。每当寓所接待中外重要来宾时,宋庆龄事必躬亲,总是事先做好周密的安排,亲自巡视,调整插花瓶、盆景的布局,有时兴起,还会拿起剪刀,亲自修剪一番。她平时喜爱的插瓶花是玫瑰、香水月季、菖兰、康乃馨、阿丽斯、菊花、象牙红、水仙、腊梅、天竹、银柳等。她对白色花朵的香味,特别喜爱。

1956年10月10日是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前一天,这天上午,宋庆龄检查接待国宾落实工作情况时,在客厅里对李同志和我说:“插花是一门很有讲究的艺术,在客厅里插上一束绚丽多彩的鲜花,可以起到画龙点睛、满室生辉的作用,给人以美的享受。周同志,

你看,李妈的插瓶花,千态百态,多么趣^[1]呀!你要向她好好学习。”接着又说:“插花要和季节相结合,在元旦要插象牙红^[2]、腊梅和水仙,给人以艳红青翠迎新年的喜庆、祥瑞气氛。春节要插上腊梅、天竹和银柳,这是传统中国式的插花,给人以吉祥如意、凝重幸福的感觉。要使鲜花插得鲜艳,饱满而又持久,花瓶里的用水很有讲究。早晨在花瓶里加水、换水可使花朵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枯败。盆花晚上都要搬到室外,放在阳台上让它吃些露水,才能长期保养好。”宋庆龄的一席话充分显示了她的渊博知识和审美情趣。

六、李燕娥与宋庆龄有十分相似的情趣

李燕娥长期和宋庆龄生活在一起,受到宋庆龄思想熏陶,因此,她和宋庆龄在情趣喜好上十分相似。

她们虽然都没有孩子,但都热爱儿童,喜欢小孩,把所有儿童都视为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亲热地称呼宋庆龄为“宋奶奶”、“妈妈太太”,称呼李同志为“阿婆”。

逢年过节,宋庆龄总要邀请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少年宫和自己身边工作人员的小孩到家里来做客、吃饭、看电影、唱歌、做游戏,并请李同志下厨房做她拿手的西式什锦炒饭来招待小客人,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笑容满面,乐而忘返。每当这时,家里充满一片欢乐景象,显得格外热闹。特别是每年的圣诞节和元旦的晚上是家里最热闹之时,灯光明亮,节日快乐。节日之前,我们准备好一棵从龙华苗圃选来的苍翠碧绿圣诞树,把它装在大花盆里,搬进客厅,摆放在古董橱前面,由李同志把圣诞树精心打扮起来,装上五彩缤纷的小灯泡,挂上色彩鲜艳,逗人喜爱的各式各样小动物玩具和圣诞老人,洒上用包香烟的银色锡纸剪成一条条细长的雪花,加上一缕缕棉花,把圣诞树打扮成火树银花,一闪一亮,五光十色,好看极了。宋庆龄就会用赞美好看的上海话说:“你们看,趣得来。”节日晚上,她像往常一样,邀请亲友和小孩前来做客,大家围坐在圣诞树旁,尽情欢乐,谈笑风生,并摄影留念。遵照宋庆龄所嘱,由李同志分送给每人

[1] 趣,上海方言,即非常好看的意思。——编者

[2] 象牙红,即圣诞花。——编者

一份节日礼物，接着就开始自由活动。宋庆龄端坐在沙发椅上，笑容满面，李同志侍奉在侧，宾客细声轻语，促膝谈心，孩子们偎依在她的身旁，滔滔不绝地讲着各自的喜闻乐见，宋庆龄一边听着，一边挨个地拉着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长问短，孩子们发出了阵阵的欢笑声和甜嫩的欢呼声“谢谢太太！祝您健康长寿，新年快乐”。整个客厅童声大合唱，欢天喜地，荡漾在充满节日欢乐的浓浓气氛中。

每年清明节和西方的复活节，宋庆龄嘱我采购鸡鸭蛋30余斤，其中以鸭蛋为主，作为染彩蛋用。届时，她就会亲临厨房指导，由李同志和钟兴宝^[1]共同操作，把鸭蛋染成五颜六色的彩蛋，包装成袋，每袋放上12只彩蛋，作为礼品分送给客人。然后就邀请各方面的小朋友前来家里做客，她在李同志和钟兴宝的陪同下，一起漫步在绿茵茵的大草坪上，把彩蛋藏在草丛中和树根旁，接着就健步回到大阳台藤椅里坐好，嘱咐小朋友去寻找，当小朋友找到彩蛋后，大声呼叫“找到了，找到了”。手拿彩蛋，笑声不绝地手舞足蹈，大家不约而同地奔向宋奶奶身旁，争先恐后送上各自找到的彩蛋。见到小朋友那样兴高采烈的神态，乐得她拍手称好，舒心大笑，马上把装在红色封袋里的彩蛋分送给每一位小客人，让小朋友领受这份温馨的情意。

宋庆龄和李同志都十分喜爱小动物，除了鸽子外，还曾经先后在寓所养过四只猫：一只“辟德根”，另一只“来宾”，还有一对波斯猫“珍妮”和“汤咪”。波斯猫一身洁白的长毛，长着一对碧绿似翡翠的大眼睛，从外表来看，确实美丽迷人，但是它们不争气，到处大小便，弄得家里臭烘烘，很不清洁卫生。根据宋庆龄的意见，嘱我物归原主，退还给西郊公园。“来宾”是最后养的一只猫，黄色虎狸斑的，它娇小伶俐、活泼可爱，是从外面逃到寓所的野猫，宋庆龄为它取名“来宾”，只是它野性不改，经常向外跑，直到饥饿时，才回来吃饭。1979年冬天，它又一次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宋庆龄和李同志最喜欢的“辟德根”是一只黑白相间、毛色油亮、尾巴乌黑的猫。它爱清洁，从不随地大小便，总是在小扶梯旁的指定地点方便，平时爱吃小猫鱼伴

[1] 钟兴宝，1953年来到宋庆龄身边的保姆。——编者

米饭,从不偷食家里的东西,晚上在家里捕捉老鼠。它善解人意,很有灵性,逢到家里熟悉的人,就会伸出右爪和你握握手,宋庆龄示意要扇子、拖鞋,它也会立即用口衔来给她。为此,宋庆龄和李同志特别喜欢它,似乎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宋庆龄在家时,人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咪唔咪唔叫个不停。宋庆龄在办公时,它蜷伏在脚旁不吵不闹、一动也不动。宋庆龄在起居室坐在沙发椅上休息,它就躺在沙发旁,闭着眼睛睡觉。宋庆龄在餐厅用膳时,它坐在大菜台^[1]下等待着宋庆龄给它的美食,津津有味吃个不停,不时伸出舌头在嘴边舔个不停。午膳后,按照惯例,宋庆龄到大阳台上去来回踱步,它也要跟着走。宋庆龄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它亦仰卧在地,不断翻身晒太阳,高兴时纵身一跳坐在宋庆龄膝盖上摇头摆尾,伸出前爪,要和宋庆龄“把手言欢”,真是好玩极了。每当宋庆龄外出归来,只要汽车开到大门口,一揪三声喇叭,它就会从楼上飞快地跳到楼下大扶梯旁,像是迎接主人的归来。对待李同志,“辟德根”同样很亲热,宋庆龄离沪返京后,它就紧跟李同志不放,每天做猫食时,咪唔咪唔叫着不停,来回穿梭奔跑,直到李同志把猫食放在小楼梯转角处,它吃得碗底朝天,才肯罢休。平时,它喜欢逗留在李同志的房间里,如果不在,一定在阳台上晒太阳,只要听到李同志呼叫声,它就会很快回来出现在她的前面。每星期六,李同志将猫引逗到辅楼洗晒衣服的玻璃棚内,把它抱进盆内洗澡,用木梳顺毛梳得干干净净,用毛巾擦干后,带到大阳台上晒太阳,然后给猫身撒上白色药粉,以防止和消灭猫身上的小虱,使猫经常保持清洁卫生。遗憾的是由于“辟德根”逐年衰老,不幸死亡,根据宋庆龄和李同志的意见,我们把它深埋在前花园东侧的竹林中。

七、宋庆龄十分关心李燕娥的生活

在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宋庆龄和李燕娥相知相依,格外亲近。宋庆龄对李同志生活上的关爱,确是无微不至的,经常把苹果、广柑、生梨等水果,装在大信封里送给她吃。每年夏天,家里备了西瓜、冰

[1] 老派上海话称西餐为大菜,大菜台即西餐桌。——编者

冻桔子水和酸奶，也随她取用解渴。北京庭园里的葡萄、苹果、石榴、梨、枣子熟了，宋庆龄分装在藤篮里，千里迢迢，托人带来上海，送给李同志尝尝。还有国外亲友送给宋庆龄的芒果、巧克力糖、苏打饼干、起司奶酪等物，总要留一份，托人带回或邮寄给她，共同分享美食。

宋庆龄不仅关心李同志的生活，还经常勉励她努力学习，读书识字，并不惜抽出时间，亲自教她读书识字。宋庆龄教导她说：“学写字如做人，人要正，字要正，要从写正楷入手，学好写字的基本功，不写潦草字，使人看不懂。”宋庆龄经常从北京寄来《人民画报》、《中国妇女》、《中国建设》和其他学习资料，并将有关重要报道，亲自用红笔划出，嘱我读给李同志听。为了让李同志及时收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宋庆龄把自己心爱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她。李同志的卧室就在宋庆龄办公室外间，靠近宋庆龄的卧室，她们之间，在床头上互装电铃，如有事联系，只要一按电铃就可以互通消息，李同志会立即赶到宋庆龄身边，嘘寒问暖。有时深夜，宋庆龄也会悄悄地来到李同志卧室，轻轻地替她掖好被褥。鉴于李同志人胖体重，她原来睡的一张铁床较高，上床、下床不太方便。为了关心她的安全，宋庆龄嘱我设法购买一件合适的床。我就到上海大厦家具厂，为她特地设计定做一张低矮适宜、上下方便的席梦思床。宋庆龄的慈爱，使李同志及时得到一种老年人的满足，惬惬意意睡了将近20年。

每当宋庆龄居住在北京，就和李同志通过书信往来，互致问候，传递信息，每周一信，音信相传，从不间断。每一星期，宋庆龄就有一封情真意切的亲笔信寄来，接着李同志就会很快写回信向宋庆龄事无巨细地汇报家里情况。由于李同志没有受过文化教育，识字不多，她的每次复信，都是由我代写的，首先是拟好草稿，读给她听，再根据她的意见修改补充，写好后，由她亲笔签名，封好，由我前往邮局寄给宋庆龄。每当李同志收到宋庆龄的来信，她会十分高兴，匆匆上楼拆开，立即就喊“周同志，夫人来信了，请你快来读给我听。”我就一字一句读给她听，对不太理解的语句，还要解释给她听，直到听懂为止。因为这一任务，亦是宋庆龄亲自指定我去执行的。有时如果在一星期之后，

还没有接到宋庆龄的来信，她会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夫人怎么还没有来信呢，不知身体可好。”并不时走向大门口传达室去询问。迫不及待地盼望信件的到来，这种心切切，望眼欲穿的焦急心情，表达了李同志对宋庆龄的真挚感情。同样，宋庆龄如果没有及时收到李同志的复信，也会殷殷思念，有时在晚上还亲自打长途电话来询问李同志。由此可见，她们之间确实感情深厚，关系密切。

每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李同志的生日。据我所知，宋庆龄从来没有忘记过。届时，宋庆龄如住在上海家里，提前几天，嘱咐我到上海大厦预定一只鲜奶大蛋糕，上面裱有“生日快乐”的红字，连同两大包的广柑、苹果送给李同志，作为祝贺生日的礼物。生日中午，家里备了放有两个红烧鸡蛋，一块红烧肉的面，分送给每个工作人员吃，即席一起向李同志祝贺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整个小餐厅，充满热烈欢迎的气氛。当宋庆龄住在北京，在李同志生日前几天，宋庆龄就会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

周同志：

你好！星期日即十月初十是李姐的生日，请你代我买一只好的熟油鸡及10斤香蕉苹果送给她，并对她说要自己吃，不要送人了，很难得的。^[1]

此信看后请即烧掉。

匆匆

致

敬礼

林 泰

1970-11-3

1971年11月8日，我收到宋庆龄从北京写的来信：

周同志：

你好！现在要托你办一件事。旧历十月十日是李燕娥同志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了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有些表示，她忠心耿耿的[地]^[2]工作。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

[1] 下划线为宋庆龄所划，以下书信亦同。——编者

[2] 信中括号里的字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编者

斤香蕉送给她(连这张贺片)。

多谢你!

林 泰

1971-11-8

总之,每年李同志的生日,她总会从宋庆龄那里得到一份温馨美好的礼品,始终没有间断过,充分表达了宋庆龄对她的真诚关爱。

八、宋庆龄特别关怀李燕娥受伤一事

1961年11月25日,寓所内发生了厨师何元光伤害李燕娥的案子。此案涉及到宋庆龄寓所内部事务,影响较大,根据有关领导指示,必须严加保密。此事尘封了20余年,除了公安部发过内部通报外,是鲜为人知的。直到宋庆龄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后,我才陆续披露出来。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我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情况。

何元光是广东顺德县人,1916年出生。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在李燕娥陪同下,离开香山路7号寓所前往香港后,寓所就由何元光负责看管。据李同志告知,何元光胆大妄为,竟敢把房屋分租出去,收取房租肥私,干了些坏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她以博大的胸怀,教育何元光认识错误,改过自新,仍旧留用在身边工作,并把他带到淮海中路寓所担任厨师。1959年,有一天,李同志悄悄地对我说:“何元光这个人很不老实,油头滑脑,动手动脚,不尊重女性。有一天中午我正在煎荷包蛋,他竟敢侮辱到我的头上来,忿怒之下,利用锅铲,盛起一铲油,泼向他的头颈处,烫伤起泡后,何元光无可奈何地用毛巾围住颈部,遮盖自己的丑事。当刘春生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支支吾吾说:‘我是在烧小菜时不小心被烫伤的’。”我听后心里暗自好笑,这是他自作自受的可耻下场。

何元光品质不好,自私自利,手脚不干净,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在副食品上动歪脑筋,小偷小摸,得手后就拿到家里去,致使我们工作人员吃的小菜、肉类和鱼类的食用量,日渐减少。我思想上有所察觉,怀疑有人私自动手脚。为了弄清事实,做到心中有数,我对采购来的副食品用量十分注意,并把这一情况,告知李同志,在征得她的同意后,

1961年8月31日上午,当我采购来两条鲳鱼,交给何元光验收、清洗、切片放入冰箱。上午8时50分,何元光就借口向我请假说有事要出去一下。当他匆匆离开后,我和李同志、警卫员程瑞庭打开冰箱取出鲳鱼来看,始终拼不成整条的鱼,其中各少中间鱼块,初步认为是被何元光偷拿去,他就借口有事外出,把鱼块送回家去。第二次是9月7日上午,我采购两斤重的一块猪肝,交给何元光验收后,他又要请假外出,我和李同志、程瑞庭取出猪肝一秤,只有一斤十两,缺六两。当时秤的衡量度为16两制。何元光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猪肝缺少6两?”他回答很干脆说:“新鲜猪肝冰后是要缩水的,你何必大惊小怪。”接着第二天,我又去购买一块两斤重的猪肝,经过何元光验收后,我把猪肝放在一只盖碗里,外面用绳子扎牢封好,隔天拿出来,在李燕娥、程瑞庭、何元光面前一秤,竟然仍是两斤。在事实面前,何元光无话可说,默不做声。9月17日下午1时30分,安培廉和隋学芳找何元光谈话时,他承认偷了猪肝、鱼块拿回家了,同时还承认以前曾贪污粮票60余斤拿回家去使用。由于上述事实的揭发,使何元光恣意伺机报复。

1961年11月25日早晨7时左右,我记得那天是星期日,按照规定刘春生是每星期六晚上回家休息,星期一早上回来上班工作。我正在小厨房前面走廊扫地,突然听到主楼厨房内李燕娥的惨叫声“喔唷啊”。我回头一看何元光亦在厨房里,就立即奔进工作人员吃饭间窗口前,大声叫喊“李同志,李同志”却没有一声回答,我情知不妙,连声喊问:“老何,你在干什么?”也没有什么回答,我急忙推门进去,却没有预防到何元光早已躲藏在小扶梯的门后,见我进去,他高举一根铁棒,是水汀炉上一根摇手铁棒,猛朝我的头上敲来,幸亏我眼疾手快,双手往上一举,没有被铁棒全部击中,但已经被他打得头破血流。当时,我意识到出了大事,就在小扶梯旁与何元光抢夺铁棒,我比他年轻力大,夺下了何元光手中的铁棒,他趁机逃进厨房,把厨房门关上反锁起来,把整个身体贴在门上,顶住不放。我用全力拼命推门,仍无法推开厨房的门,连声大喊:“王宝兴快来,这里出了大事。”接着我又连声大喊,奔向大门口传达室对警卫员张建俊说:“不好了,何元光打死李同志了,快进去捉。”当张建俊和我赶到厨房时,绿化工王宝兴亦闻声而来,我们在工作人员

吃饭间窗口连声叫喊：“何元光快快开门出来。”只见他在厨房里手持菜刀，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你们谁敢进来，我就杀死谁。”我们忍无可忍，合力推门，张建俊首先入内，只见何元光手拿菜刀，高高举起，穷凶极恶，还要杀人，张建俊立即拔出手枪向他右手臂开了一枪，夺下了手中的凶器菜刀，三人合力制服了何元光。我立即打电话向安培廉、张甦平汇报情况，并把躺在厨房地，满头是血、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李同志，用救护车急送华东医院全力抢救，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住在华东医院继续治疗。当时宋庆龄正在北京，圣诞节、元旦来临，宋庆龄嘱隋学芳打电话给我，要在李燕娥处拿出贺年卡送往北京使用。因为历年的贺年卡，都是从上海家里取去的，经过宋庆龄亲自书写贺词，分送给国内外亲友。为此，我只好设法把李同志从华东医院接回家来，取出贺年卡后，把她送回华东医院住院治疗。可是在宋庆龄和李燕娥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周一信，音信相通，从不间断。这次不好了，多日没有接到李同志亲笔签名回信的宋庆龄，感到十分不安，后经再三询问隋学芳，使他无法再隐瞒下去，只得如实汇报，当宋庆龄知道李燕娥头部被砍受伤，仍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她忧心如焚，立即决定于1962年1月11日，从北京乘飞机匆匆赶回上海家里。她步入大门，一眼望见李同志侍立在大扶梯旁迎接她的到来，两人见面，百感交集，激动万千。只见宋庆龄用动情的目光，久久凝视李同志受伤的头部，并用手轻轻抚摸着，眼泪夺眶而出，她们相拥而泣。宋庆龄亲切地说：“李姐，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是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像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总算弄清楚了。”然后，两人手挽手上楼去休息。

当天中午，李同志手持宋庆龄亲自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周同志：

今天本来我想和你谈谈家里的事，但因神经痛得厉害，只好在纸上讲几句。首先我要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你自己亦受了伤。这次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许李同志的命没有了。这里其他同志亦很负责，有勇敢的表现，值得表扬。

李同志的身体很虚，虽然出了医院，但须要休息，精神上受这样大的刺激，必须放弃一切，好好休养。因此我请你暂时掌握李同志平时

的责任为荷。

匆匆。 并致

敬礼

宋庆龄

1962年1月11日

根据宋庆龄的指示,我暂时负责李同志平时的工作,加强管理家里的事务。宋庆龄的神经痛有所好转后,于18日上午10时在客厅里约见我谈话,她和颜悦色地轻声询问了有关李同志住在华东医院抢救治疗的情况,我如实作了详细汇报。宋庆龄动情地说:“周同志,我从来没有对你讲过,李同志是一个无亲人的孤独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尽了迫害。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十六岁来到我身边当保姆,对我忠心耿耿,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解放前在上海孙先生故居,国民党反动派曾以金钱、地位,诱使她监视我的活动和共产党的往来,搜集情况向特务机关汇报,她严词拒绝了反动派的威胁利诱,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我,支持我的革命活动。有一次,我居住在香港,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飞机就在我们头上,她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立即架好扶梯,帮我翻越墙头,搀扶到隔壁邻居家里的防空洞里去避难。”谈到这里,首长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接着又说:“何元光这个人,劳动改造是改造不好的,如果放出来是会害人的。现在处理定案否?为什么还不处理。我早已明确告诉过,一定要依法处理。据说张同志开了一枪是吗?他们都骗我(他们是指警卫处长王济普和警卫秘书隋学芳),说什么李同志在医院里只住8天就出院了,一切都好。这也是王处长打电话来说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造谣冤枉李同志,说要和他(指何元光)同居,这真是胡说八道。老实说,前几天,我在夜里梦见李同志的头被刀砍了,满身是血。所以,我就立即决定回家来了。我知道你也没有办法,他们不许你写信给我,其实这样的大事,是应该向我报告的。今后,我可以放心了,有你在家里,否则叫我下次怎好出门去北京。”从此开始,宋庆龄才改称李妈为李姐的。并开始和李姐在一起吃饭。往常宋庆龄是在餐厅用膳,有时遇到工作繁忙或身体不适,就改在楼上办公室小餐桌上用膳。在她的办公室中间,放着一张小方桌,二把靠背椅,

一把朝南，一把朝西。有一天用膳时，当钟兴宝端上饭菜放在小方桌上后，宋庆龄就将一把朝南的椅子推开说：“李姐，这边坐吧，来和我一起吃饭。”可是李同志心里明白，这朝南的是主座，过去皇帝就是朝南坐的，她是服侍夫人的保姆，绝对不能坐这个位子。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夫人，您是主人，总是这样客气，可我怎能坐得下去，还是请夫人坐这个位子。”宋庆龄笑着说：“李姐，别这么说，你跟随我身边几十年了，工作勤奋，忠心耿耿。长期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早就像亲姐妹一样了，就坐这里吧。”这就是宋庆龄的崇高品德和人格魅力，是她充满真情称呼李妈为李姐的全过程，也是她和李姐一起吃饭的开始。

1962年3月7日，宋庆龄从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前往北京。她人在北京，心系上海，情牵李姐，时刻惦记着她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情况，处身设地为她着想，不忍心让她再做劳累的工作。5月10日，宋庆龄特地从北京来信：

周同志：

接李同志七号的来信，藉悉家中情况，又知她的健康日有进步，并已做了许多工作，我很安慰和高兴。

但是，李同志的身体刚好转，并血压高，工作不宜过于疲劳，请你转告她不要蹲下去打地板腊。这些用气力较多的工作，还是请别位同志做做吧。希望她好好休息，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我仍腰背痛，关节炎痛等，尚在按摩及服药治疗中。

祝

同志们均好！

宋庆龄

1962-5-10

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该案件迟迟没有结案。致使宋庆龄感到焦急和不安。1967年6月27日，她从北京亲自来信：

周和康同志：

李燕娥同志是一个无亲人的孤独的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尽了迫害，我从来没有对你们讲过。解放以后，她又受到何犯的侮辱，你是知

内情人之一。她遭何犯恶毒手后,据钟兴宝同志说,经常在屋里暗自哭泣,不让我知道,怕我为她难过。对她这样一个旧社会里受尽苦难,新社会中又遭到何犯的欺侮的妇女,必须使她亲身体会到人民当权时代的光明,使她知道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对何犯,因此决不能有他蒙混过关,就此漏网。正因为这样,很想亲自到上海向张春桥^[1]同志面谈全案经过。但是由于这里有任务等原因,不能离开北京,只好写就一封信寄给你,由你把信面交张春桥同志,我深信你一定会尽你的力量的,我们务必使这一案件得到正确的结论。

此致
革命敬礼

宋庆龄

1967-6-27

请看完信后,将封好送去。谢谢!

宋庆龄的来,谈到李燕娥的不幸身世和她遭到何犯毒手后经常躲在自己房间里暗自哭泣,宋庆龄为此深为不安,提出要依法严惩何犯的不法罪行。我看完该信后,遵照宋庆龄的指示,立即封好,于1967年6月29日前往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交由黄振家同志签收,这个签名,迄今仍留在我的发文簿上。该信送出不久,市革会公检法组,曾经派人前来寓所了解情况。我清楚记得在大门口传达室,由我陈述李燕娥案件的全过程,张建俊和王宝兴一起参加,发言补充案件现场情况,一致要求公检法依法办案,严惩何犯的不法罪行。据了解何元光一直劳动改造,没有放出来过。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李同志虽经华东医院抢救脱险,但终于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经常头昏目眩,颇感不适,以致日常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宋庆龄对此十分关心,请华东医院继续治疗,希望在她身边有人陪伴,帮助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就想让李同志的养女李圆住到寓所里来。1973年6月17日,她在家里给我来信:

[1] 张春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编者

周同志：

因李燕娥同志近来的身体不好，我看她需要她的女儿李圆从本月19日起住进来照顾她一下才好，等我回来后再讲。

宋

1973-6-17

但是这个养女，不太争气，好吃懒做，不愿意积极主动去照顾她的日常生活，每天连倒洗脚水等事都不肯做，拖拖拉拉，敷衍了事，使宋庆龄大失所望。特别是在1979年4月8日李同志患了宫颈腺癌之后，李圆对她照顾不周，很不得力。1981年李燕娥逝世不久，宋庆龄便让李圆搬了出去。

九、宋庆龄两度安排李燕娥去北京治病

1979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的保健医生——华东医院胡允平医生，在给我们工作人员做例行体检时，发现李燕娥的红细胞超标，当时胡医生怀疑她是妇科病，就动员她到华东医院作进一步诊治。4月8日上午，我陪同李同志前往华东医院妇科门诊做进一步检查、化验。当时，是由胡允平医生和护士盛学素一起陪同接待的。胡医生悄悄地告知我说：“化验结果，初步诊断李同志是患了子宫颈腺癌Ⅱ。”胡医生然后安排4月9日，邀请市肿瘤医院吴柏生医生前来华东医院会诊，确诊病情基本上一致。接着胡医生安排李同志在华东医院住院，我请华东医院妇科朱瑾医生开介绍信，陪同李同志前往肿瘤医院，办理门诊看病手续，领取治疗新卡号047749一张，请陆树贤医生诊查，原打算安排李同志在4月23日上午去做上镭治疗的。

（一）宋庆龄第一次接李燕娥到北京治病

为了慎重起见，并征得李同志同意后，我于4月13日晚上打电话向宋庆龄汇报李同志的病情和胡医生的治疗安排。她在电话里明确指示我说：“周同志，你要镇静些，无论如何不要告知李姐患的是癌病，只要说得了妇女病就可以了。过几天，我会派人前来上海接李姐到北京去治病，你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协助李姐整理行李，好言劝慰李姐不要心急，谢谢。”我清晰记得，只过了三天，宋庆龄就委派北京寓所

的服务员陆森林同志，前来上海接李同志，并于4月17日上午陪同李同志一起乘飞机前往北京去治病。那天，是我使用家里的“吉姆”车，把李同志和陆森林送到虹桥机场，登上飞机，飞往北京去的。到机场送行的有张甦平秘书长和李家炽副局长。

在北京，遵照宋庆龄的指示，有关李同志治病之事，都由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办理，4月17日那天，就是杜秘书在北京机场接到李同志后，直接把她送往解放军301医院，有关住院、探望、动手术等都由杜秘书亲自办理。

为了治疗李同志的病，宋庆龄十分重视，想方设法来挽救她的生命。从上海华东医院借调李同志的病历卡，邀请北京肿瘤医院、协和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专家共同会诊，商讨治疗方案，一致认为还是开刀动手术较为理想。经过宋庆龄同意后，6月1日，李同志在解放军301医院动手术，由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亲自主刀，从上午7时进手术室，一直到12时30分结束，整个手术做得很好。

1979年5月10日，我接到宋庆龄亲自写的来信：

周同志：

你的信写得详细，我很感谢你代李姐的一份工作！也注意到同志们的学习。周总理教导我们，知识就是力量。

市委同志很关心，送来的很多海鲜。昨晚永洁^[1]代写去一封致谢的信。昨晚她能尝到这些难见的食品，非常高兴。今晨我们都在5时起床，因永洁须往机场到美国去学习。请代永洁问候李局长^[2]。

李姐仍在301医院做理疗。很难过的是没有发现她的病情！现在一时不能给她做手术——须要做Radium理疗。我不知导[道]为什么检查身体时，医院没有发现她有这种病——早知导[道]就好治疗了！

请你继续管理家务，并劝同志等要多学习，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匆匆。祝你和同志们身体健康！

林 泰

1979-5-10晨

[1] 即隋永洁，宋庆龄警卫秘书隋学芳次女。——编者

[2] 即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编者

在李同志动手术的第二天,为了让我们及时得到李同志病情的消息,她就立即写了一封来信:

周同志:

昨天李同志已动了手术。二位大夫对我讲,开刀后证明是“子宫内膜癌”做得还算早,没有扩散,因此我们就放心!

沈粹真[缜]大姐快要来开会,请代买10包陈皮嘉应子(像你上次买的一种)请沈大姐代带来,如过[果]没有钱,请快来信为盼。

祝家里同志们都好!

这信看后即扯掉!

林 泰

1979-6-2

经过解放军301医院动手术和精心治疗,李同志的病情日趋好转,胃口很好,一天要吃一只鸡,饭量也可以。杜秘书每天都要到医院去探望她,遵照宋庆龄的指示,每天带去她喜爱吃的食品、水果等,使她十分高兴。为了安慰家里同志对李同志病情的关心,告知住院情况并代表李同志谢谢大家,宋庆龄连续写信:

周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我代李姐谢谢同志们对她的关心。今天她的伤口可拆线了。

请你去香港有限公司到故居去拍照时,依照李同志的办法布置一下为盼。

今天忙在开会,不多写了。

祝好!

林 泰

1979-6-7

1979年6月18日,我又接到宋庆龄的来信:

周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告诉你和同志们,李姐已恢复健康,现在她仍住在医院疗养,胃口也算不差,她要我代她谢谢同志们对她的关心。

沈大姐已来过了,带了你代买的物品。这里天气十分热,可是人

大会已开了,看到许多老朋友来,十分高兴。

祝你和同志们健康!

林 泰

1979-6-18

1979年8月4日,宋庆龄写了一封来信:

周同志:

多谢你及时的[地]给我寄来很需要的香云纱裤,一切都好,但张师傅忘掉我的西装裤,都要开在左边的。但你寄来的余料,很放[方]便的,在这里再改一下。这个事,一定又麻烦了别的同志!在这炎热的天气,这样快能穿上这裤,要多谢你们了!

李姐住在医院,因须做电疗,巩固一下动手术的一步,使她不再患这病。或许要月底回来。她很高兴,家里的同志们很关心她的健康,要求写信时,特别要谢谢各位同志对她的热情。香港电视台是否选了几张故居的照片?

你趁着大伏天,把家里的地毯等晒了一下,做得很好!希望你们各位健康,注意天气的变化为要。

近来工作特别忙,因此不能经常写信回家请原谅。

祝你及各位同志都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林 泰

1979-8-4

我的信请不要留,因匆匆写的!

李同志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疗2个多月,她的病体基本康复,8月中旬出院,回到北京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寓所继续休养。在那里,她和宋庆龄生活在一起,漫步在庭园里,观赏盆景花草,拍照留念。高兴时,还要走到假山上的枣树林中,采摘几颗枣,心情十分愉快。

1979年9月9日,宋庆龄怀着愉快的心情,写了一封来信:

周同志:

9月9日的信及物件都收到了。谢谢你!这里蔬菜很难买到。你寄来的小白菜很好。

我近来发气管炎，高烧一个多月不能吃东西。昨天大夫要我去医院去照X光，结果没有肺炎，大家都放心了！

李姐在这里养病，我看到她必[不]过一次，因怕传染感冒等给她。她要我谢谢同志们对她的关心。她每天在园子内散步，一点不觉得冷静。这里同志们也待她很好。

匆匆数字

祝你及同志们健康！

林 泰

1979-9-9晚

请不要留信，信写得太匆忙！

1979年9月25日，宋庆龄来信再次嘱咐我，不要在李同志面前提起她患癌病之事。宋庆龄办事十分细心，即使是小事也要提到，重大之事，一定会在信中划出一条粗线，提示我要特别注意。她在这封来信中写道：

周同志：

你的来信早想答复但近日气管炎虽已有一个多月了，仍未痊愈，值[直]至今日才能答谢。李局长带来了许多礼品，就分给我的同事们，他们都很高兴尝到南方的名产，你极细致[仔]细，东西很好的[地]装束，十分感谢你！

李同志已到医院去复查过。都很好。这次杜同志费心照顾她并安慰她，也要多谢他的。李姐当然很想回家，但我要她过了国庆节后回家。大家都对她很好，她也觉得很高兴。每天继属[续]到园内散步，不觉到冷静[清]。我因怕传染我的气管炎给她，只好不多和她在一起。等我感冒完全好了，和她多接近。她虽然没有癌，但医生嘱咐不要在她面提起这个癌病！她生的是子宫瘤已割掉了。

这信请看后即扯掉！

顾金凤的粮票收到了。现送来收条，谢谢！

匆匆。

祝你们都健康！

生日快乐

林 泰

1979-9-25

节日请照从前一样，买些水果、肉、鱼等让大家吃。

李同志虽然身在北京，但心在上海，始终念念不忘上海家里。她唯一的希望是早日回到上海来居住，安心休养。宋庆龄为了安抚她不安的心情，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事事处处给她以亲人般的温暖，设法做些让她高兴的事，嘱咐杜秘书专程陪同李同志参观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如天安门广场、颐和园、故宫、景山等处，并摄影留念。使她十分高兴。1979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李同志的68岁生日，宋庆龄趁此难得的机会，特地在北京寓所为李姐祝贺生日，设家宴，吃寿面，备了一只新鲜奶油大蛋糕，让大家欢聚在一起，共同祝愿李同志生日快乐，健康长寿，乐得李姐开怀大笑，衷心感谢夫人对她的亲切关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再三提出请求，让她早日返回上海家里去。宋庆龄满足了她的要求，于12月4日，在北京寓所服务员陆森林的陪同下，一起乘飞机返回上海家里来休养。当时，陆森林就住在上海寓所辅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根据杜秘书来电告知，安排陆森林顺便到崇明家乡探亲一星期。回来后，由我代办了一张去北京的硬卧火车车票，用轿车接送她去上海火车站，乘火车返回北京。

（二）宋庆龄第二次接李燕娥去北京治病

当李同志回到上海家里后，我遵照宋庆龄的指示，告诫同志们在李同志面前，绝对不能提起她患癌症之事，只说是得了妇女病，已经割掉治好了。要是李同志提出想吃什么食品，遵照宋庆龄的指示，尽量满足她的要求使她在家里安心休养早日康复。对此，家里的工作人员都能做到，并格外体谅她，处处热心帮助并关心她的生活，使她心情开朗，十分愉快。她经常和我们谈笑如常，每天早晨即起，在庭园里来回散步，坐在朝南的大阳台上藤椅里晒太阳，一日三餐，仍和以前一样，照吃不误，饮食起居一切如常。但是，按照三个月一次的定期体检惯例，1980年3月中旬，我陪同李同志前往华东医院进行体检，仍由胡允平医生和护士盛学素陪同接待，在做B超检查时，发现李同志腹部有一个肿块，胡医生情知不妙，估计可能是癌症转移，把她送往妇科仔细检查，确

诊是癌症转移。当时我就对李同志说：“你仍是妇女病，问题不大，回家去再说。”当天晚上，在征得李同志同意后，我立即打电话向宋庆龄汇报李同志的病情，她立即决定派陆森林乘飞机前来上海，接送李同志到北京去治病。我记得是3月27日上午，用家里的“吉姆”车，把李同志和陆森林两人送到虹桥机场，前往北京去的。在北京机场，仍是杜秘书来接李同志的，然后和她一起前往后海北沿46号寓所住下。3月28日下午，由杜秘书陪同办理住院手续后，住进北京医院南楼1010病房。就在李同志安抵北京的第三天，即3月29日，宋庆龄就匆匆来信：

周同志：

你好！

李燕娥同志已安抵北京。昨天下午送她到北京医院去治疗了。十分感谢你送给我的糯米！这样好的产品这里是看不到的。市委同志很关心，送给我的许多土产，非常感谢他们！

你寄给顾金凤的粮票她已收到，但她的收条我一时找不到。

祝你和同志们都很健康，生活愉快！

致

敬礼

林 泰

1980年3月29日

1980年4月18日，我接到宋庆龄来信：

周同志：

你的信及附件已收到了。谢谢！李同志现住医院，很高兴她配合大夫作手术的准备。现在只吃流汁，如酸牛奶等。星期一要给她动手术了。希望大夫能有好消息给我。同志们都很担心她的消息，明日传给她听，她一定很感谢你们的好意！

近日来我非常忙，不能多写，请原谅。

祝

你们大家健康！！

林 泰

1980-4-18

4月21日,李同志在北京医院做了第二次开刀手术。大夫发现她的癌症已广泛转移,无法割治,只能切片做病理化验,就缝合了刀口,结束手术。据大夫说,唯一的办法,是用药物来延长她的生命。由于李同志的病情恶化,癌细胞已广泛转移,大夫传来不好的消息,致使宋庆龄十分不安,一筹莫展,只能想方设法托亲友从国外购买有效药物,以延长李同志的生命。同时,宋庆龄感到有些心烦,身体不适,发高烧以及琐事频繁,很想早日回到上海家里来休息。从这些信中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心中的无奈,和她对上海温馨的家有着深深的眷恋和无尽的思念。

1980年5月5日,我接到宋庆龄来信:

周同志:

我托人送交你处二包东西。一包请送给沈粹缜同志,另一包请送交郭宝珠^[1]太太。

李姐仍住医院,因病未治好,缺少有效的药,现在托人从外地转来。

匆匆。祝

你及同志等健康,工作顺利!

林 泰

1980年6月6日,我接到宋庆龄来信:

周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我发高烧,因此不能写信回家。

李同志仍留在医院,但每天带她的饭菜去因她不习惯北方的伙食。

近来老杜和她一起在医院拍一个照相(永洁拍的)很好。我请他送一份给你及同志们看看她近来的情况。

这里事繁,我每天要看许多文件,因此觉到很疲劳,希望早些能回家休息。

祝你及同志们健康!

林 泰

[1] 郭宝珠,英文名Pearl Kwok,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加拿大华侨、孙中山朋友郭标的女儿,幼年在上海中西女塾读书时与宋庆龄是同学。她也是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首席伴娘,与海外宋家一直保持交往,曾代宋美龄向宋庆龄转交治疗荨麻疹的药。宋庆龄逝世后,她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宋庆龄追悼会。——编者

李同志在北京医院进行第二次开刀手术后,在医院的精心治疗下,刀口很快愈合。遵照宋庆龄的指示,杜秘书仍每天前往医院探望,送上她喜爱吃的饭菜和水果等,使李同志感到十分不安,连续几次向宋庆龄提出请求说:“夫人,请让我回到您身边去吧!我在医院里住不惯,天天想念着您,离不开您呀!”充分流露出李同志对宋庆龄的真实感情。宋庆龄对待李同志事事处处给她以亲人般的温暖,体谅她的苦衷和难处,关爱着她的身体健康,只好接受她的要求,请杜秘书办理出院手续,于7月17日中午把李同志接回到后海北沿46号寓所内居住。为了照顾好李姐的日常生活,做好护理和安全工作,宋庆龄特地请了两个保姆,日夜服侍她。当时,宋庆龄明知李燕娥的病情,无力治好,却千方百计执意从国外买来进口药物来延长她生命,希望出现奇迹。

1980年7月13日,宋庆龄来信:

周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多谢你帮永洁去办理他人托她的事。她已去信给邓金传^[1]有关他的几件事体了。

近来我们忙得很!因为要趁永洁在这里时给永清^[2]办理她的婚事。天气非常热,天天到市上去找适当的家具等。十分费神!永洁是代我的责任。

李姐在这里休息及打针,但她很想回家。她在上海时,那里的吴[胡]医生说她生了癌。这是对病人很不好的!这里的医生等都说是别的病,因此她心里舒服得多了。我请你要保守这个消息,让医院及家里的同伴等千万不要再提她犯了怎[什]么病。因为,现在给她打个针都是很贵的,能延长她的寿命,因此请大家要协助,使她打的针有效。多谢你!

[1] 邓金传,又名邓传,时居美国纽约。其父是原上海三民帆布厂创办人邓森斋。邓金传育有二女,经常携女儿来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寓所做客。“文革”期间,邓家财产被抄没。“文革”后,政府进行财产退赔,邓金传委托隋永洁办理,宋庆龄嘱周和康协助隋永洁一起办理。——编者

[2] 即隋永清,宋庆龄警卫秘书隋学芳长女。——编者

匆匆。祝

你们在家都健康！

上次的信以妥收。台风大雨没有伤害树木等，因你及时有准备。
谢谢你！

林 泰

7/13

1980年9月4日，我接到宋庆龄来信：

周同志：

你好！你托李局长带来的土产都收到了，我应〔因〕一直发气管炎，因此直到今天才写几个字。

永清结婚时，你及刘同志，唐同志送她的礼品，她很感谢。但她现在住得很远，不能多见到，新郎也是一个演员，但比她岁大。她们住得很远，因此不能经常见面。

李姐的病仍旧不改变。近来李圆来信写得太没有良心，使她非常气，睡不好，吃不下等情形。她希望早些解决李圆要结婚的事，但很不容易找到人和住处。

现在人大开会，我忙得很，另外须〔需〕要接见外客。永洁现回美国去学习了，她很懂事，亦很肯帮助他人，因此这次回来，一点得不到休息。但她身体不是最好，这次帮了我许多烦恼的事情。

请看完信后，即烧掉为荷。

祝你同志们健康！

林 泰

1980-9-4

1980年9月18日，宋庆龄又来信：

周同志：

你托李处长带来的东西及我拜托代买的糖都收到了，多谢你！

李姐的病未减轻，因此可能还要回医院去挂葡萄糖。

你给他〔她〕的信有关粮票之事，我明天读给她听，因昨晚她没有休息，疼得很。

你处如须〔需〕要钱，请写信来给我。

匆匆。祝你及同志们健康！

林 泰

1980-9-18晚

李同志的病情，日趋恶化，痛不欲生。亲眼目睹李姐痛苦不堪的病情，宋庆龄束手无策，想不出任何有效的灵丹妙药来解除李姐的病痛。宋庆龄知道国外医生对待癌症病人痛苦的安乐死办法，打一针来解决。但宋庆龄舍不得，不忍心让李姐打这样的针，希望她能奇迹出现起死回生。

1980年10月8日，我接到宋庆龄的来信：

周同志：

你寄来给李姐和阿金^[1]的粮票都收到了。谢谢你！这里天气已冷了。但李姐总之〔是〕想回家。她的健康更不好，但她不愿回到医院去。但是医院总想她应该回医院，她不能休息，日夜痛得叫起来，人听到了很难过。她的唯一希望能早些回上海。这里的菜，她吃不下，十分苦恼，但无法使她安静下来。这种病是最痛苦了。外国人有了这病总要医生打针让她死吧！但我总是舍不得给她打这种针——希望有奇迹。

永洁得了美国的奖学金已回去继续学习，一天总要读19个小时！因会〔为〕文化大革命时，她没有机会读数学，历史等，因此，她的生活很紧张！

匆匆。祝你们同志健康！

林 泰

10/8

1980年10月31日，宋庆龄来信：

周同志：

你好！你在十号寄来的布料，照片等都收到了。谢谢你！

我也收到伊罗生^[2]先生的信，感谢你的介绍故居给他夫妇听。他

[1] 即顾金凤。——编者

[2] 伊罗生（1910—1986），英文名Harold R. Isaacs，美国新闻记者、作家。1930年到上海。曾参与创办《中国论坛》，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80年重访中国，与宋庆龄等一些当年的老朋友重逢。——编者

回美国后如有写作，我一定要寄给你看的。

李姐的健康一天坏一天。鱼、肉、菜、水果都吃不进，她很想回家。她说上海的青菜好吃。这里的北方味道都吃不下，晚上要起床四五次当然不能睡觉。这里两个保姆轮流夜里陪她，怕出事。她的苦闷，我没有办法解决，虽我很同情她。

此信看完后请不要留！

我自己身体健康还未恢复，仍旧有皮肤病、气喘，但大夫、护士天天来打针。

外边谣言我已90岁了，但这不是真的！他们都想给我做生日！如果你听到这个消息，请代我辟谣为感！

祝你及同志们都身体健康！

林 泰

1980-10-31

1980年12月某日，我接到宋庆龄来信：

周同志：

你18号的信及各样应用的衣衫（李姐的）东西及青菜等都收到了。多谢你！我现在托你给我转交一个日历给陆秉机^[1]的儿子，陆妙福为感。他住在绍兴路，但不知住几号，请查明后代我送去并告诉我什么号。他的父亲从前很帮忙的。

我要给你寄300元为家费用，因看上去李姐今年不可回来，但你手里钱不多了。匆匆。祝你及同志们过愉快新年，并请年底及春节如旧，请同志们吃得好些。

匆匆。

林 泰

由于李同志的病情日趋恶化，危在旦夕，全身已肿，寸步难行。宋庆龄怀着无奈的心情，于1981年1月25日只得把她送回北京医院住院，大夫都已束手无策，无药可救。在这十分难过之时，宋庆龄依然为李姐着想，特意来信嘱我趁沈大姐前往北京之便，请她带些上海

[1] 宋庆龄在安排周和康送礼物给陆秉机时，曾对他说：“陆秉机很帮忙的，我过去举行义卖活动时他一直出力的。”——编者

的青菜和青橄榄给李姐泡茶用。凡是李姐需要的，宋庆龄都是有求必应的。

1981年1月18日，我接到宋庆龄来信：

周同志：

你寄给李姐及阿金的粮票都收到了。谢谢你！

听说沈大姐快要来北京，请你代买些青菜及半斤新鲜的青橄榄让她泡茶用。别的东西不要买，因为李姐现在牙不好嚼东西了。她的健康突然不好，现在全身肿，也不能走一步路，我十分难过，但医生都束手了。但不要对人讲，特别是李圆。

祝好！

林 泰

1981-1-18

十、李燕娥生前知道宋庆龄为其安排好的安葬地

李同志过世后要安葬在宋庆龄父母墓旁，我在1970年就听李同志讲过，她对宋庆龄关于她的后事安排十分满意。

每年清明节前夕，宋庆龄总要写信给李同志，嘱我陪她到虹桥路的万国公墓（现为宋庆龄陵园）宋庆龄父母的墓地去扫墓。每次去扫墓，都是由刘春生驾驶“吉姆”车，带上6盆瓜叶菊盆花，放在坟墓的上首，以寄托宋庆龄对父母的怀念和哀思之情。这样年复一年，从未间断过。这6盆花象征着6个子女的亲情，一盆花就是一个子女的爱意。正象李同志所说“夫人曾经对我说，清明时节去扫墓，每年如此，不能忘记。我是代表兄弟姐妹去扫墓，他们都在国外，只有我一个亲人留在国内去完成扫墓的任务，以表达子女对父母的孝心和敬意”。

1970年清明节时，我陪李同志去万国公墓扫墓，在墓地上，她忽然笑着对我说：“周同志，你晓得我百年之后，安葬在哪里？”我回答：“李同志，你又要开玩笑，你不是说要活到99吗！今天谈此事，恐怕为时过早吧！”她笑笑，指着地上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喏，就在这里脚下葬在夫人父母的身旁。夫人早已给我安排好了，她在左边，我在右边，生死永远不分离。周同志，你看，我的福气多好呀！”这

充分显示出宋庆龄与李燕娥早已约定，天上人间，生死相守，永不分离。事实证明，她们逝世后，先后安葬在宋庆龄陵园她父母墓地的左右两旁，实现了生死永不分离的诺言。

就在这一天，过了一会儿，李同志接着说：“周同志，我衷心希望夫人长命百岁，如果夫人百年之后，淮海中路家里的房屋，我不便住下去的话，夫人已经对我说过，决定把我安排到陕西北路369号^[1]去住，住在二楼朝南的一大间内，这一间最好，阳光充足，煤气、卫生设备都是独用，可好啦！周同志，你以后要经常来看望我，帮助我买些东西……”

从这一件件包蕴着人间真情，爱心感人的生动事例和一封封情意切的亲笔信中，都充满着宋庆龄对李同志亲如姐妹般的深情厚谊，显示出宋庆龄超群的修养，崇高的品德，宽广的胸怀。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溶汇于平等的基础上，这种高尚的情操，启迪着人们朝着更美好的思想境界升华。

十一、宋庆龄为李燕娥安排的葬礼

1981年2月5日晨，李燕娥的心脏停止跳动，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70岁。当时，杜秘书意欲立即打电话给我，告知李同志病逝北京的消息，但被宋庆龄婉言阻止。她对杜秘书说：“你今天就不要打电话回家，让他们好好过春节，还是让我亲自写信给周同志吧！”第二天，1981年2月6日，我接到宋庆龄1981年2月5日晨写的航空信：

周同志：

我今晨很丧[伤]心因会[为]李姐早晨5时在北京医院过世了！我叫杜同志今天不要打电话回家，让你们好好过节日。明天可能会通知你们的。

她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你及李唐^[2]同志待她很好，她不[会]忘记的。但对李圆她是十分痛心的！

早我应许她，以后我回家时，带她的骨灰到上海安葬在我们宋家

[1] 陕西北路369号，是宋家老宅。

[2] “李”，应为司机刘春生，“唐”为厨师唐江。

在虹桥坟墓安葬，像自己亲人一样。她很安慰。我一定要做到的因会
[为]我对她亲热的。余事以后面谈。祝好！

林 泰

1981-2-5

从这封宋庆龄亲笔信来看，当时她的心情十分悲痛，心慌意乱，匆匆下笔，写了些错别字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我读完她的来信，潸然泪下，怀着悲痛的心情，不禁思潮涌动，久久难以平静。由于李姐病逝，使宋庆龄感到十分痛心，情绪不佳，发生手抖，嘱我不给人看这信，我自应遵嘱执行。在这令人悲痛的时刻，宋庆龄想到是不要打电话给家里让我们好好过春节。她时刻关心别人，把悲痛留给自己，让大家欢乐的人格魅力，使我们深受感动，永远铭记在心。

李燕娥病逝北京后，遵照宋庆龄指示，有关李姐的后事，都由杜秘书办理，并告知他说：“李姐的骨灰，火化后拿回家里来，以后带回上海，安葬在自己父母坟墓旁边。”

2月11日，在北京医院举行的李燕娥遗体告别仪式，宋庆龄送了花圈志哀。

2月12日，杜秘书书面报告宋庆龄：“李大姐的后事还是一下办完好，请李局长将骨灰带回，照您的指示安葬您父母墓左边，参照公墓情况坟墓立个碑”。

2月13日，宋庆龄书面答复，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

2月16日下午，沈大姐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宋庆龄，她对沈大姐说，要为李燕娥立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她亲切抚摸李姐的骨灰盒，俯下身去，把脸贴在盒上亲了几次。2月18日，李燕娥骨灰由李家炽副局长带回上海后，我立即前往康平路188号办公室，接过李燕娥的骨灰盒，骑上自行车，把骨灰盒送到万国公墓李通海同志处存放。

市领导非常重视李燕娥墓的建造工作。市府秘书长张甦平、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等亲自到万国公墓与工作人员研究建墓工作，约在3月下旬李燕娥墓建成，为卧碑式，碑长120厘米，宽60厘米，碑上镌刻着：“一九八一年二月，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

1981年4月2日上午,我参加了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送的花圈安放在李燕娥墓前。另外送花圈的有张甦平、沈粹缜、李家炽,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市万国公墓,北京后海北沿全体同志,上海淮海中路全体同志等。当时,参加安葬仪式的有张甦平、李家炽、市委行政处副处长戴炳书,以及我和卢宝荣^[1]等。李家炽副局长致悼词。

1981年4月7日,我接到宋庆龄嘱交给张甦平的一封信。这是在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后,她为了向有关出力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特意给张甦平秘书长的答谢信:

张甦平同志:

李燕娥女士之墓已经竣工,特向您和所有出力的同志,致以深深的谢意,请转告出力的同志为感。专此

即致

敬礼

宋庆龄

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

附言:宋副委员长由于健康原因,签名不能如前,请见谅。

这封信,是由秘书张珏拟稿写成的,经宋庆龄阅后签名同意,故特地附言说明宋庆龄的签名与以前不一样的原因。

1981年6月4日,我有幸参加了宋庆龄的国葬典礼,看到宋庆龄的墓与李燕娥的一模一样,宋庆龄的墓在父母墓东边,李燕娥墓在西边,这使我非常感动。李燕娥能享受此殊荣,引起了我对宋庆龄与李燕娥情缘的思念。

(作者原为宋庆龄上海寓所生活管理员)

(责任编辑:刘国友)

[1] 卢宝荣是市委行政处汽车队驾驶员,经常为宋庆龄开车。——编者

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纪录 (1942—1945)

李玉贞 译注

译者按:下面的文件原存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司、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合编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第4卷《苏中关系1937—1945》^[1]一书,现将其中首次面世的关于宋庆龄的7个文件译载于下。

一、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С·А·潘友新

就中国再起内战烽烟和美英两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同中国著名国务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的谈话记录
(1942年5月22日,重庆,苏联大使馆)

先是互致问候和寒暄,之后听到孙夫人说起蒋介石过一个半月或两个月要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会议,我问她的看法如何:是否会有人趁蒋介石出国之机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威慑共产党。(我说,可能我过虑了,也许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

宋庆龄回答我的问题说,蒋还没有最后决定前去。现在知道的情况仅仅是他有意前去并在做准备。蒋介石准备到印度的时候,同她商量过。可现在他根本没考虑她是否知悉他要到华盛顿一事。另一方面,她说,在分析中国是否发生内战问题时,应该关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他们同蒋介石会晤时,总是先说眼下中国根本不得发生任何

[1] 该书由С·Л·齐赫文斯基(汉名齐赫文)主编,А·М·列多夫斯基、Р·А·米罗维茨卡娅、В·С·米亚斯尼科夫编辑。书名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下用СКО),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Памят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年出版。

内江和内争。孙夫人说她不了解中国内部情况,对我的问题总起来看没有多谈,但是她认为政学系^[1]的影响并不足虑。

我问她如何看待中国国内政局,孙夫人说,有一个情况格外重要,这就是许多普通的国民党员抱怨生活不易,物价昂贵,也就是说,对现状表露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原因便在于国民党领导不力,说如果由共产党治国,那就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因现状而滋生的此类情绪已属司空见惯,国民党领导和蒋介石本人不得不予以关注。

我问宋庆龄,蒋介石本人如何看待我们中苏两国的相互关系,孙夫人说,有一次她同蒋介石谈起,蒋说苏联军队英勇善战,从其表情看出,蒋是满意的。

我问孙夫人,蒋介石对她本人的态度如何,她说现在比以前好一些。亨利·路斯^[2]途经香港时,曾与孙夫人会面并承诺在蒋介石面前为她的美国之行说项。不久,蒋介石就接见亨利·路斯。后者建议派遣宋庆龄到美国,蒋介石说,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不过她总是仅代表共产党说话。这样,她的赴美自然也就作罢了。

我问孙夫人,蒋介石对英美驻华大使的态度如何,她说蒋介石对他们的评价极差,他管克尔叫流氓加无赖,管新任英国大使薛穆(Sir Seymour)^[3]叫白痴加混蛋,关于美国大使高斯,蒋则说他根本不是东西,窝囊废一个,除了做生意,什么也不懂。孙夫人补充本人的看法称,蒋的话很有道理,不管高斯还是薛穆都没有任何作为。宋庆龄强调,真的应该记取一个情况,英国人一见中国人就骂美国人,美国人也一样——骂英国人。所以对他们的议论应当斟酌。不过,我也指出,他们面对面时好像也骂苏联人吧?孙夫人说,这是完全肯定的。

接着谈到印度。我问,是否有许多美国飞机停留在印度,准备转运

[1] 袁世凯1916年死后,作为旧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分化为几个派别,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联络欧事研究会成员和志同道合者组成了政学系。该派在1923年解散。本文指的是新政学系,它形成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及其以后,其主要成员有:杨永泰、熊式辉、黄郛、张群、吴铁城等。其中的张群,曾任上海市市长,1938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1940年11月起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在任六年多。黄郛曾任外交总长,1936年故去。

[2] 路斯,史料又作“卢斯”,全名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出版家,1923年创办《时代周刊》Time。他创办的《财富》Fortune(1930)和《生活》Life(1937)都是发行量和影响力很大的刊物,销量达百万份之多。路斯是美国共和党人士,1941年来华,主张支持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再次来华。

[3] 薛穆爵士, Seymour Sir Horace James, 1945—1946年任英国驻华大使。

到中国。宋庆龄说,现在那里是有相当数量的飞机,可英国人不同意运往中国。众所周知,印度几乎不打算做任何武装抵抗,所以英国人要抓住一切可能性。她说,美国海军武官马克休前天刚从印度前来,昨天同她见面,他说印度根本没有做任何防御准备,加尔各答处于直接威胁之下。他还说,澳大利亚有250 000美国军队,说美国到处建立相当于我国游击队的特种部队,好像马克休本人也有意在中国这样做。

然后我们谈到中苏相互关系问题。我说,在中国,特别是在报刊上,经常有人提出,苏联应当立即对日宣战,否则,日本会首先进攻苏联。我说,我们非常明白,苏日必有一战,因为日本迟早会进攻我们,但是现在苏联已经是轴心国的主要打击对象,苏联正单枪匹马地与法西斯集团最强大的对手作战。战争是血腥的,伤亡极大。这场大规模厮杀的全部负担,对我们是不可承受之重。^[1]可是在中国这里,许多人不明白或不想明白这一点。他们要求我们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向我们要援助,可是我们自己在许多方面也感到匮乏。我们过去提供了援助,将来任何时候也绝不会放弃支援正义事业。但对我们也应当得到理解,应当理解我们的难处,应该珍视我国军民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功绩和英雄主义精神。针对这一点,孙夫人指出,何应钦和政学系首先应当对中国报刊的这种做法承担责任。

谈话最后,我应宋庆龄之请,就我所知,介绍了卫国战争前线情况。

H·T·费德林会晤时在座。

俄罗斯外交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3,第244包,案卷11,第207—210页。首次发表。

译自CKO,上册,第695—696页。

二、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H·T·费德林 就中国国内政局同中国著名国务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的谈话记录 (1944年10月31日)

互致问候和寒暄之后进行了下述谈话。

[1] 美国外交文件(FRUS 1941 China, 第510—611页),克尔向美国政府详细报告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美国认为一定要避免中国内战。CKO,下册第630页有这个报告的全译文。

宋庆龄在谈到中国国内的政局时强调说,眼下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会不择手段,不惜冒任何风险以求达到目的。特工部门已经在公开镇压民主运动了。他们破坏进步分子的所有活动,加强镇压和逮捕共产党人与左派。国共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蒋介石不会同意共产党增加其势力。他也不会让人民和政府民主化。由于政府发生危机,当前正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CC派越来越强硬,势力也越来越大。然而政治冒险者任何走马灯式的更迭都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经历的危机。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特工部门的疯狂措施、反动势力的嚣张、内部斗争的骤然激化、将领们和地方军阀们的离心倾向——凡此种种都证明罪恶的当政者越来越孤立。人民对国民党统治者的离心离德与日俱增。

现在转到中美关系。宋庆龄声称,前些日子的事态说明中国反动人士的加紧活动也影响了国民党对美国关系。众所周知,史迪威将军坚决主张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主张援助中国共产党,为此蒋介石已经把他撤换了。正是由于史迪威的这些进步措施,他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才相当紧张。难怪蒋介石在纳尔逊^[1]回美国前夕对他说,美国的所有建议,他蒋介石都可以研究,但是无论如何要撤走史迪威。难怪史迪威以示威的姿态拒绝接受中国的授勋,并且向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声明,“他要让蒋介石拿着这枚勋章进地狱”。宋庆龄强调说,确有此事,这是史迪威的副官亲口告诉她的。

宋庆龄认为把史迪威撤掉是蒋介石的一大胜利。现在他和他的亲信们口出狂言,称终于把一个亲共的对中国内政涉入太深的美国将军搬掉了。反动分子们之所以得意,还因为把洞悉中国国内形势的史迪威排斥开以后,他们成功地争取到魏德迈将军受命前来。宋庆龄指出,蒋介石对素以亲英和反动著称的魏德迈非常满意。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对者和顽固的保守派,美国大使高斯对撤走史迪威喜形于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顾问艾奇逊有关。

[1] 纳尔逊(Donald Marr Nelson, 1888—1959),美国资本家,1942—1944年任美国战时生产局主席,1944年曾经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率领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来华,协助中国政府建立战时生产局并成立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

宋庆龄强调说,另一方面,把史迪威召回,却使中国民主人士相当失望。不过,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上讨论撤走史迪威,蒋介石愤怒地指责史迪威干涉中国内政并且犯了战略错误的时候,谁也没敢反对蒋介石。宋庆龄说,就连孙科因“害怕失宠于总裁”也不敢替史迪威说话。

宋庆龄针对华南的分离运动说,当初美国人直接支持同李济深派的接触。各方愿意协同行动。美国人已经承诺供给李济深所需的武器辎重。万事俱备之际,李济深突然赴梧州,从而打破了美国人的计划。宋庆龄认为,这可能是蒋介石干预的结果,他派了间谍监视李济深,也可能是李济深本人犹豫不决,出尔反尔。在这件事上,众所周知的蒋介石派往桂系的亲信白崇禧也起了作用。一说起李济深的行为,美国人总是极其愤懑。

至于美国赴延安的军事考察团,宋庆龄说,应当把它看作探测气球,是一种直接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试探,想把后者的实际力量和内部政治形势做一番研究。美国人到处公开谈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特区、中共领导人等等的良好印象。然而在他们的报告和个别谈话中,许多人却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就不算共产党,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不过就会进行土地改革等等。例如德百里将军和政治顾问谢伟思在致宋庆龄的私人信件中就向她说明,他们愿意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名义发誓,在特区绝对没有一丝一毫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特点,并不像俄国布尔什维克所说的那样。

关于民主联盟的工作,宋庆龄强调说,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松散的组织。最重要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能把联盟领导起来,集中精力去完成一些迫切的政治任务。宋庆龄强调说,该联盟仅代表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很遗憾的。

然后宋庆龄告诉我,称现在有一种说法正闹得沸沸扬扬,似乎蒋介石有意改善中苏关系。据传,为此他想把儿子蒋经国派到苏俄去。^[1]宋庆龄指出,蒋介石正在做外交游戏,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蒋经国

[1] 详见李玉贞:“国民政府同苏联的最后博弈者——1945—1946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载《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5—1459页。

要去,倒是真实的。

至于孔祥熙在美国的情况,宋庆龄说,他让蒋介石大失所望,因为他在美国一次次的讲演把中国的困难和需求说得过分直白,向美国当局露出了我们的底牌……最近孔祥熙未必敢回重庆,在这里他还会遇到麻烦,诸如被要求辞职之类。^[1]

谈话最后宋庆龄说,她一度想让孙科和宋子文重归于好,但是徒劳。这位失宠的外交部长闭门索居,情绪沮丧,可是孙科却自鸣得意,没有觉察到他对陈丕士^[2]一类的人过分信任,后者毫无分寸地同所有使馆密切联系,沉溺于每周两次在自己的公馆举行的舞会,美国和中国间谍就在舞会上接头。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H·费德林

俄罗斯外交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3,第244包,案卷15,第4—7页。

译自CKO,上册,第817—819页。首次发表。

三、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

和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H·费德林

就中国的民主运动同宋庆龄的谈话记录

(1945年5月3日)

互致问候和寒暄之后进行了下述谈话。

我们问起中国民主运动的情况,宋庆龄回答说,是中国人民对民

[1] 孔祥熙(1880—1967),1934年起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长达11年。1944年6月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会外曾以蒋介石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遭到美方的反对。加上他有贪腐行为,国内财政状况紊乱,战局不利,蒋介石令其辞职,由俞鸿钧接任(详见汪朝光:《蒋介石:“撤孔之举犹嫌太晚”》,《历史学家茶座》第2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此后孔滞留美国,次年7月始返国。(关于孔祥熙辞职前后情况见郭荣生:《民国孔庸之先生祥熙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 陈丕士,1901年生于牙买加的西班牙港,祖籍广东中山县,其父陈友仁在辛亥革命后回国,是孙中山外交事务的法律顾问。后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丕士7岁赴英国读书,学习法律,取得大律师资格。1926年因母病故回国,随北伐军到武汉,到外交部工作成为父亲的助手。1927年7月国共统一战线破裂,陈丕士秘密护送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回苏联,从此旅居苏联和德国。后参加抗日战争。自1983年起为全国政协委员,晚年撰写回忆录《中国召唤我》。1989年病逝。

主权利的要求决定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已经是不可须臾离开并且十分紧要的”。

宋庆龄说明国民党人士在这方面的行动时强调,政府丝毫不考虑人民的要求,它不仅不重视这些要求,反而坚决镇压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今年11月12日开国民大会,国民党拒绝在会前就此采取任何积极措施。

讲到即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时,宋庆龄说,从种种迹象看,代表将由上而下地指定,而不是选举产生。所以期待大会在真正民主化方面有什么结果,显然是错误的。

她强调说,“建立联合政府才是当前政局的唯一出路。不仅中国国内的进步人士,就连国外的舆论也都持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问她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前不久的声明^[1]有什么看法,她回答说,“有一个很普通的事实是不能忘记的——赫尔利是一个超级富翁,是反动政策的支持者。他的声明旨在支持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本意”。

宋庆龄针对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说,在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除了其他问题,还应当讨论民主问题。目前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已经收到许多取消一党专政和建立联合政府等的建议书。而且这些建议是一些国民党员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小组或团体名义提出的。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И·М·米克拉舍夫斯基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Н·费德林

俄罗斯外交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3,案卷15,第244包,第45—46页。首次发表。

译自CKO,下册,第34—35页。

四、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А·А·彼得洛夫

就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2]的结果同宋庆龄的谈话记录

(1945年5月30日)

互致问候和寒暄之后进行了下述谈话。

[1] 指赫尔利1945年4月2日在华盛顿对记者的谈话,反对以武器供给中共破坏中国统一。

[2] 此次代表大会于1945年5月5—21日举行。

我问宋庆龄对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有什么印象，她回答说，代表大会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成果：无论当权者还是政府都没有改变。一切照旧。

我说，毕竟代表大会还是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宋庆龄对此回答说，由于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在抗战前选举出来的，由于他们并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那就很难期望大会能有什么成果。

我请宋庆龄谈谈对此次代表大会的其他看法，她回答说，她没有参加大会，所以不了解详细情况。

“孙科能向你们介绍很多情况”，她说。

“不过您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员，后来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对吧”，我问。

“我对国民党和与会者的行为不负任何责任”。

然后我问她，近期中国报刊何以对中苏关系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

宋庆龄强调说，“许多事实说明社会各界和政府人士确实都主张加强中苏关系。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我同政府人士的谈话，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府真心实意想在这方面做出一些重要转变。”

讲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做法时，宋庆龄说，此人政治上无能，有时达到可笑的程度。

“国共谈判破裂后，赫尔利成了罪魁祸首”，宋庆龄说，“赫尔利自鸣得意，继续唯蒋介石马首是瞻。有一次赫尔利同蒋介石谈话过后问我，他有没有理由对中国的政治命运抱乐观态度。我只好回答说，如果他各方面都听信蒋介石的话，那么他就有一百个理由成为这样一个乐观主义者”。

接着宋庆龄指出，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在各方面给人的印象都比赫尔利好。

她强调说：“尽管魏德迈是军人，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了解和观点却要优于他的外交界的同行。在军政和外交事务上，魏德迈比赫尔利高出一大截。”

谈话结束时我对宋庆龄的友好接待和谈话表示感谢并希望以后再行会晤。

她本人表示愿意保持公务上的联系。

谈话时使馆一等秘书H·T·费德林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A·彼得洛夫

俄罗斯外交档案馆全宗0100, 目录33, 案卷14, 第244包, 第128—129页。

首次发表。

译自CKO, 下册, 第50—51页。

五、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H·T·费德林

就苏联在改善中国政治局势的作用问题同宋庆龄的谈话记录

(1945年7月21日)

今年7月21日我和宋庆龄女士进行过一番谈话。

宋庆龄在评价中苏谈判的现状时强调说, 据各种情况判断, 蒋介石改善中苏关系的决心很大。分析中国代表团的成份就能看出, 蒋介石委派了他认为最值得信任和最可靠的人去进行谈判, 名义上行政院长宋子文是代表团长, 事实上履行团长职能的是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1]

我指出, 这不过是因为蒋经国懂俄语罢了。宋庆龄认为, 懂俄语自然要紧, 但目前情况下重要的是对蒋经国政治上的信任。宋庆龄说: “蒋介石特别信任其爱子。很难找到第二个像蒋经国这样能够得授全权的人。事实上蒋经国对父亲的想法做出的解释相当主观。有时候他会有意夸大蒋介石本人想到的和能够想到的”。

然后我问, 她对蒋经国本人有什么看法。宋庆龄回答说, 她不太了解这个人, 因为直到不久前, 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仅仅是从某个时候起他被人当成了俄国方面的专家。至于蒋经国的为人, 许多人觉得他缺乏政治家的风度, 野心勃勃, 说他太“狡猾, 难以捉摸”。

讲到眼下中苏谈判的目的时, 宋庆龄强调说, 据她所知, 宋子文出

[1] 详见李玉贞: “国民政府同苏联的最后博弈者——1945—1946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 载《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第1425—1459页。

使苏联的主要目的和作用就是全面解决中苏关系的各种问题，保证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条件，主要的是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宋庆龄指出：

“你们应当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政治形势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共关系十分紧张。两党的谈判已经陷入绝境，想和平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目前没有任何希望。还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尽管大家都知道有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介入，要使同延安的谈判有收效，蒋介石还是无能为力的。这一点你们当然是清楚的。”

“蒋介石到底打算如何把现在的外交谈判同解决共产党的问题结合起来呢”，我问道。

“你们一定也看得很清楚，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但是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依然认为延安一如既往受着莫斯科的指挥。所以国民党领导人觉得，解决国内主要政治问题最根本的手段，只能是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因为后者在指挥中国共产党”。

我问宋庆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政府是否有意进行某些民主改革呢？”

“据我所知，民主人士对于建立联合政府抱的希望实属极大幻想。蒋介石并不指望通过国内民主化，而指望依靠外来因素——利用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来解决国内基本的政治问题即共产党的问题。请注意，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

“重庆对苏联在远东的行动有什么看法？”

“尽管中国领导层赋予国内问题以头等重要的意义，保证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条件还是宋子文出使的最主要任务之一。众所周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绝大部分政府人士都不赞成苏联参预远东战争，因为这样只能给太平洋地区本来已经复杂的形势火上浇油。然而现在却有种种情况让人得出蒋介石本人主张苏联对日宣战的结论。这样看来，国民党领导人的主要想法是缩短战争时间，从而使共产党失掉扩大地盘和发展力量的客观有利条件”，宋庆龄如是说。

“您对目前谈判拖延^[1]的原因有什么看法？”

“谈判中显然涉及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重庆商量，没有

[1] 蒋经国、宋子文等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同斯大林等的谈判，因斯大林要去参加于7月17日开幕的波茨坦会议而中断，中国代表团回国，17日到达重庆。8月5日再到苏联。

蒋介石本人的批准,就解决不了。波茨坦会议^[1]不过是代表团回重庆的一个方便的托词罢了。”

然后说到孔祥熙从美国回重庆^[2]的事。

宋庆龄说,孔祥熙对重庆目前的政局极为不满,她强调,孔还从来没有经受如此困难的处境。CC派、政学系、黄埔系和中国共产党等各种政治派别的批评和攻击使孔祥熙进退维谷。他认为摆脱目前处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回到美国去“继续治疗”。

接着宋庆龄对我说,她从同孔祥熙的谈话中听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打算近期到重庆来。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为好转。宋庆龄说:“都说,当初宋美龄她就是因为生病才出国去的,经美国医生的一番努力,她‘身体上的病’几乎已经完全治好了。不过,另一方面的情况是,人们把蒋介石夫妇间的分歧渲染得太过分了。他们的通信至少说明他们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外国报刊说的那么不好,这我还知道一些。”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H·T·费德科

俄罗斯外交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3,案卷15,第244包,第72—74页。
首次发表。

译自CKO,下册,第142—144页。

六、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A·A·彼得洛夫
就中国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在中国的反映
同孙中山遗孀宋庆龄的谈话记录
(1945年8月29日)

互致问候和礼节性对话后进行了下述谈话。

我问宋庆龄,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苏中条约持何看法。她回答说,

[1] 1945年7月7日至8月2日英美苏三国在德国柏林以西的波茨坦举行的会议,英国代表先是丘吉尔(因工党在大选中失败,7月26日艾德礼新任首相并前来参加会议),美为杜鲁门,苏为斯大林。讨论战后德国问题和敦促日本投降的问题,发表《波茨坦公告》。协议设立中、美、英、苏、法外长会议,定经常在伦敦开会。

[2] 孔祥熙于7月8日回国。

重庆对这个问题有截然不同的互相对立的两种看法：以CC为首的反动分子像往常一样坚决反对条约内容。

宋庆龄指出：“CC派公开宣称他们永远不会同意强加于中国的条约。他们正竭尽全力使中苏关系复杂化。除了口头宣传外，他们还发放各种各样的传单和宣言，公开反对条约内容。”（宋庆龄拿了一份这样的文件让我看。）

说到苏中条约的反对者时，宋庆龄指出，不仅中国的反动派在进行反苏宣传，许多美国和英国人也持反对态度。

宋庆龄说：“我认识一个美国将军，他告诉我说，许多美国人根本不同意中苏条约的内容。到了这一步，中国人再也不能把香港收回了，可是英国需要香港，就像俄国需要旅顺一样。”

宋庆龄针对美国大使赫尔利的做法强调说，许多人似乎觉得赫尔利和宋子文之间已经达成某种十分的默契。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宋庆龄指出：“不久前我同一位美国记者交谈，他把同赫尔利的秘密谈话告诉我。原来赫尔利特别不满意于宋子文，因他赫尔利，为使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设想过许多措施，可宋子文却不予支持。”

记者没有多谈这些“措施”的意义和性质，然而即使这样，也看得很清楚，赫尔利正为自己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舆论界威信扫地一事寻找“替罪羊”。

至于中国的左派，宋庆龄说，那么，不出所料，都是条约的支持者，为这个条约欢欣鼓舞。

然后我们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的问题，我问宋庆龄，她对谈判前景有何看法。她回答说，她对现在两党的谈判持乐观态度。

宋庆龄说：“我想，谈判可望有满意的结果。我个人持乐观态度。”

“也就是说，您认为双方可就建立联合政府事达成谅解了”，我问。

“尽管我不敢百分之百地肯定，但建立联合政府并非不可能，因为我经常把事情看得过于乐观。”

“不过，什么问题可能成为障碍呢？”

“看来，中国红军会成为最困难的问题。”

谈话最后，宋庆龄对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的甘乃光和刘锴发表了一些看法。

谈话时在座的有H·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A·彼得洛夫

俄罗斯外交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3，案卷14，第244包，第201—202页。

译自CKO，下册，第210—211页。

七、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H·费德林

就美国、英国对中苏关系的政策和稳定中国国内政局的问题

同著名的中国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宋庆龄的谈话记录

（1945年10月7日）

今年10月7日我同孙中山遗孀宋庆龄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谈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时，宋庆龄强调说，众所周知，一向听命于美国驻华军政代表旨意的美国宣传机关，正加紧进行反苏宣传。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军，成了开展这一宣传的借口。就红军驻兵朝鲜进行的反苏宣传则尤其激烈。美国宣传机关试图诋毁苏联军队并破坏其威信，他们指责“俄国人横行霸道，抢劫掠夺朝鲜的和平百姓”。为此，美国人使用了各种材料，说明红军部队似乎在朝鲜所到之处实施的抢劫，就像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

我问宋庆龄，蒋介石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之间的关系如何，她回答说，蒋介石“对赫尔利十分满意，想不出有比他更好的人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了”。宋说，不过，由于美国左派激烈批评本国对华政策，赫尔利打算辞职了。据悉，洛克和曼斯菲尔德可能是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候选人，后者在美中政治事务圈里颇有些名气。

然后我问英国大使的表现，特别是他对苏联的态度，宋庆龄说薛穆是一个阅历很深的老外交家，他为人谨慎，沉着冷静，他的夫人可不

是这样。

宋庆龄说：“有一次我们谈话时，薛穆夫人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俄国人比纳粹好不了多少。”

宋庆龄针对近来云南省的事态说：“许多外国人感觉蒋介石在昆明玩的那一招^[1]出乎意料，有些奇怪。然而这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蒋介石将军传统惯用政策的特殊风格。这样一来龙云会在中央政府得到一个类似傀儡的职位，可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起来反他，结果将使他受到刑事——政治上的指控。龙云已经一无所有了。他像盛世才、白崇禧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已经是无兵之帅了。卢汉将军取代了龙云。卢汉是中央政府的忠实奴仆，早就开始挖其前任的墙角了。”

我接着问了西昌的形势。宋庆龄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蒋介石、宋美龄和宋子文三人到西昌一事本身就说明那里的事态举足轻重。

宋庆龄指出：“不排除蒋介石西昌之行的结果会使云南事件在刘文辉身上重演。蒋介石在离开边远的中国西部省份之前，想把这一地区的秩序‘整治底定’，稳固中央政府的政权。”

我问宋庆龄，她对蒋介石派驻满洲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将军做何评价，宋庆龄说，她“对此人的评价一向都是查其言观其行：熊式辉属于最反动的那个派别，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台柱子”。

宋庆龄还说，应当把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一事看作蒋介石刻意加强国民党控制和统治东三省的直接行动。

讲到上海形势和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以及何应钦司令助理冷欣^[2]的行为时，宋庆龄强调说，近来关于这两个人的传闻不少，不过都不符合实情。

宋庆龄说：“任命钱大钧当上海市市长让那些反他的人十分不服气，

[1] 指“驱龙事件”。龙云（1884—1962），1945年2月3日被任命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统辖第一、九两个集团军。5月19日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有联系，同情民主运动，蒋介石认为龙云跋扈，欲除心头之患，便于1945年9月30日—10月2日指使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次日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委以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空头衔职，4日起龙云被软禁，两天后被挟持到重庆，是谓“驱龙事件”。蒋介石于10日授予龙云抗战胜利勋章。龙云后去香港，1950年到大陆，1962年故于北京。

[2] 冷欣，江苏人，1925年入黄博军校，抗战末期为民政部参军，在第三战区服役，1945年出席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1949年后去台湾。

这些人就决定诋毁他，让他在蒋介石面前名誉扫地。事实上钱大钧和冷欣并没有参与他们说的那些坏事。”

谈话结束时，宋庆龄把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普曼关于国共谈判问题，以及中国当前政局的报告给了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H·费德林

俄罗斯外交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34，案卷22，第253包，第68—69页。
打印件，原件。首次发表。

译自CKO，下册，第261—262页。

中国福利会藏宋庆龄与爱泼斯坦等往来书信选译

沈海平 编注 甘庆元 译 鲁 平 刘懿芳 校

2005年4月底5月初,刚过完90岁生日的爱泼斯坦在住院期间正式立了遗嘱,表示愿把自己多年珍藏的信件捐出来。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去世。悼念活动结束后,爱老夫人黄浣碧将老朋友同时也是宋庆龄研究专家张爱荣与傅伍仪请到家中,夜以继日地一起整理这批信件。在整理过程中,黄浣碧将其中涉及中国福利会与《中国建设》杂志内容的往来信件挑出,共有32封。其中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书信共25封(23封为原件,共42页;2封为复印件,共2页)、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书信6封(均为原件,共6页)、宋庆龄致埃洛萨(Eloesser)博士信一封,共2页。同时捐出的还有宋庆龄赠送给爱泼斯坦的电烤炉一只、领带一条以及爱泼斯坦穿过的西装一套。

黄浣碧认为,创办中国福利会是宋庆龄一生中诸多重要贡献之一。宋庆龄从创办起即担任主席,亲自领导这个机构43年。《中国建设》杂志社是中国福利会的下属单位,也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份面对西方世界的外文杂志,宋庆龄对这份刊物倾注了关心、热爱和智慧,每期都以林泰的名字亲自寄给国外友人。此部分信件集中体现了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的思考和在国际宣传的理念,反映了宋庆龄的重要思想和贡献。

在编译过程中发现,黄浣碧捐出的注明为宋庆龄致爱泼斯坦的25封信中,有11封已经收录于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余下的一封为抗战时期在重庆替爱泼斯坦签署的中文介绍信。一封为宋庆龄自制的名片。另有2封经鲁平校译时从内容中确认其中一封为爱泼斯坦写给宋庆龄的;还有一封为刘尊棋致爱泼斯坦夫妇的。

此次刊登出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书信共21封,均为首次发表。其中宋庆龄书信13封:致爱泼斯坦12封,致埃洛萨博士一封;爱泼斯坦致宋庆龄信7封,附刘尊棋致爱泼斯坦夫妇信一封,宋庆龄为爱泼斯坦签署的介绍信一封。

在宋庆龄致爱泼斯坦的书信中,宋庆龄对办刊人员的挑选,对刊

物名称、每期文章和封面照片的选择,乃至杂志开本与字体的大小,都经过反复推敲,一一细述,并有独到的见解与具体的意见。从中反映出宋庆龄对创办一份面向国际展现新中国真实面貌的刊物所付出的努力,倾注的心血。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她创办刊物的想法和思路,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十分内行的宣传专家。

结合1997年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特别是1995年出版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集中阅读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金仲华、陈翰笙等人的往来书信,有助于对宋庆龄对外宣传及办刊思想的深入研究。

第一部分: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函

1. 致爱泼斯坦(1939年6月30日)

《人民战争》^[1]

这本书不同于其他国外介绍我们反侵略战争的书。因为它把对我们过去斗争历史具有分析性的第一手资料与我国革命的未来发展前景紧密联系起来。中国的每一位朋友都值得一读。

宋庆龄

1939年6月30日

2. 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2](1946年6月29日)

亲爱的邱茉莉和艾培^[3]:

收到你们让米尔德里德·普赖斯^[4]带给我的一块这么漂亮的料

[1]《人民战争》为1939年爱泼斯坦所著在伦敦出版时的英文版书名。1991年中文版译为《人民之战》。信为宋庆龄为《人民战争》所作的说明书。

[2]邱茉莉(1905—1984),爱泼斯坦夫人。1939年到香港参加保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1951年受宋庆龄邀请与爱泼斯坦一起经波兰重返中国,参加了《中国建设》的筹备工作。负责杂志的编译与改稿工作,并参与杂志的推广。

[3]即爱泼斯坦。

[4]米尔德里德·普赖斯(Mildred Price),女,美国援华会执行主任。也是中国战灾孤儿和儿童福利美国委员会的执行主任。

子,真是太叫人高兴了。我就去做一件上衣,这一定是我最喜欢的了一件了。可她带给我最好的,还是你们确定在秋季回来的消息^[1]。但愿签证不要遇到什么麻烦。这里有大量的工作等着你们,你们肯定无法想象我们是多么的想念你们。

现在有些新的情况,首先,我们决定把我们组织名称中“委员会”^[2]这个词去掉。普赖斯强烈反对我们组织的名称,她提出应该是“中国福利基金理事会”,可我们又不是一个理事会那样的机构,为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决定缩短我们的名称。

普赖斯还建议任用一个叫珍·格林的,从美国过来做我们的秘书。我们认为,还是等到我们的办公处扩大到足以需要更多工作人员时再考虑吧。同时,经美国援华联合会的认可,我们请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杰拉尔德·谭宁邦^[3],他过去曾任职于美国的军用报纸和电台。让他全面负责行政工作以及总体计划,包括目前项目的执行和新项目的启动。他要负责我们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和红十字分会等机构的联络。当然,他也还要负责宣传事务。据普赖斯说,谭宁邦一直以来都在帮助我们进行各种资金筹措项目,无论从哪个方面,他似乎对我们都有求必应。

在我们的各类项目中,包括了首先要在当地建立一个儿童图书馆^[4]。对于美国送来的“宝物箱子”中对我们没有用的那些书籍,我想我们应该将其中确实好的一部分翻译成中文。加上从各个书店征集来的中文图书,以此作为开始,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一个有着更美好状况的世界的兴趣。原重庆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

[1] 结果是爱泼斯坦与邱茉莉于1951年才重返中国。

[2] 1945年起草《保卫中国同盟声明》时,曾决定将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1945年12月公开发表时,定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3] 谭宁邦(1916—2001),美国人。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服兵役,先在军队《战争中人》任编辑,后在军队无线电台设在好莱坞的总部担任节目制作人,主编《军队无线电回放》月刊。上尉军衔。1946年在中国从美军复员。同年7月1日加入中国福利基金会,担任总干事。后任中国福利会顾问。1972年回美国定居。

[4] 1946年10月12日,儿童图书阅览室在上海沪西胶州路725号晋元小学内创立。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兼任主任。郭沫若特为开幕式写儿童诗一首表示祝贺。

斐君^[1]可以担任主席,负责这个项目^[2]。我们正在帮助一个工人诊所,这样可以形成相互结合的效果。如此,所有工人的孩子就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教育。

我从英国战时机构获得了几千箱食品,这些食品原本是给战俘准备的。这些都已经分发给了许多贫困的单位和工人们。我们的那些缺乏营养的朋友们,在看到这些食物时,被那奢侈的夹肉面包、黄油、鱼甚至糖果盒香烟吸引,就像狼一样地涌向这些食物。我们希望红十字会能够提供衣服之类的物品,这样孩子们也能够有衣穿了。

这个月,我们组织京剧义演,连续演出了六个夜场^[3],获得了一亿法币的收入。还有一晚,我们组织了一场名为“这就是军队”的崩克摇滚乐的演出,收益也超过了两千万法币。后面那场演出多亏了莫里斯·科恩^[4]的帮助,他照例是我们的圣诞老人。顺便告诉你,他在战时娶了一位加拿大姑娘,他是上个月来的,打算在这里与孙科的两个儿子开展一些业务。他上周回的加拿大,不久就会回来。他以自己活泼的写作风格完成了他的自传,我告诉他,如果他同意让我的一位朋友作他这本书的编辑的话,我将为他写序。还有很多可改进的余地。希望这事能引起这位“Buddy”仁兄的兴趣。科恩说过,如果谁能使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他愿意与其对半分。

到现在想必你见过魏璐诗^[5]了吧,并且听说了一些近况。但是,有

[1] 倪斐君(1912—1966),浙江镇海人,贺耀祖夫人。积极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后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新中国的建国活动。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遭迫害致死。

[2] 为救助贫困儿童,经宋庆龄多方努力筹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委员会于1948年2月4日在范沈露茜夫人家成立。范沈露茜任主席,多林·伦诺克斯任副主席,倪斐君等35位贵夫人为成员。俗称“阔太太会”。

[3] 1946年湖南等地发生严重饥荒。湖南省邵阳地区四个县1200名孤儿,本被收容在国民党办的4个孤儿院。后来国民党拒绝维持这些孤儿院,孤儿们正面临被抛弃街头的困境。中国福利基金会专门组织了一个救济饥荒特别委员会,举办义演等活动。京剧界著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积极响应。从6月1—6日,在中国大戏院举行连续6天的义演。宋庆龄为此专门发表了讲话《平剧义演的意义》。此次义演收入全部送给受灾最重的湖南省,使1200名孤儿得到照顾。

[4] 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 1889—1970),英籍犹太人,中文名马坤,曾任孙中山侍卫长兼副官。

[5] 魏璐诗(1908—2006),奥地利人。1933年来到上海,参加了路易艾黎、马海德等人的马列学习小组。受宋庆龄影响,决心长期留在中国,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曾任保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1951年起任北京国际新闻局德语专家。

一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就是王安娜^[1]与王炳南很快就要离婚了。普赖斯说,王经常通信的那位男友,总是喝醉了酒跑到美国援华会去讨要王的来信,她的情况很糟糕。普赖斯希望为她本人配一副牙齿和一些漂亮的衣服,以便改善我们与此地各种救济机构之间的联系。普赖斯认为这是她与这些机构打交道不成功的唯一原因。

关于普赖斯,你们没能给我一些意见,我们对她有时在与这里的陌生人打交道时所表现出一些粗鲁的做法非常失望。她准备与拉里·罗辛格和一个会用汉语会话和阅读的叫李敦白^[2]的男孩去华北和西北,他要负责向美国援华联合会报告我们在解放区开展的活动。邱茉莉,如果辛西亚^[3]还没有跟你说的话,见到你时我会告诉你的。

我要就此搁笔了,由衷地感谢你们的礼物以及有关FEDP (Committee for Faculty Excellence & Diversity)珍贵的材料,我们的朋友们正饶有兴趣地学习呢!

宋庆龄

1946年6月29日

注:宋庆龄在此封打印信件的内侧手书补充——Ida Pruitt 和Nor Esser 刚离开这儿去Soudan-Paochi (应该是个地名吧)。Peter 现在掌控实际情况。Falconer 是个品行很好的人,还有他妻子也富有同情心。艾培,真是要感谢你让我结识了他们。

宋庆龄在信的首左上角又有手书一行:有关普赖斯的请保密。

3. 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 (1951年8月8日)

亲爱的朋友:

[1] 王安娜 (1907—1989), 德国人。1934年与王炳南结婚。1936年来中国。在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时,是保盟第二届中央委员,负责捐赠物资的接受、分配与运输。后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储运工作干事。《中国建设》初创时期为推广发行工作作出贡献。1955年回德国定居。任德中友协名誉主席。著有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2] 李敦白 (1921—), 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 美国学者, 1944—1979年曾长居在中国, 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曾在延安工作, 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领导人。解放后, 因先后牵涉苏联间谍案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而两次入狱。1980年返回美国定居。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书。

[3] 即廖梦醒。

欢迎你们成为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部的正式成员。我们非常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同事。这个生气勃勃的组织将推出一些生动、准确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宣传材料,详细介绍新中国的巨大进步。

顺便通知你们已被分别任命为《中国建设》杂志的执行编辑和助理编辑。希望你们每星期至少有一天在我们大草厂16号^[1]的办公室^[2]工作。

致以最好的祝愿

你的非常真诚的

主席 宋庆龄(签名)

1951年8月8日于北京

4. 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51年12月4日)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的来信和寄来我们杂志的样稿。样稿看上去很好,看来在富有吸引力的封面里将会出现一些更丰富多彩的内容。它终于让我确信《中国建设》在这个月真的要诞生了。上周,我收到了一权威人士^[3]给金仲华^[4]的电文,强调了我们的杂志尽快面世的必要性。因为中国人民保护儿童委员会的代表团将于下月出访维也纳,这样就可以把我们杂志在国外分发了。你看,我俩的想法是多么一致啊!我很乐意作为赠书的信上签上我的名,要是“金”^[5]不同意的话,我可以用中福会的信笺。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计划在10日左右离京去上海。要是你愿意同行,请提前告诉我,以便我可以为你在我车厢预订铺位。

[1] 北京大草厂16号是《中国建设》杂志社最早的办公处,在当时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大院内。

[2] 此信为打印件。其中“在我们北京大草厂16号的办公室”为宋庆龄手书添加。

[3] 指周恩来。

[4] 金仲华(1907—1968),保盟时期中央委员,负责《保盟通讯》中文版。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1950年任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应宋庆龄邀请,任《中国建设》编辑委员会主任兼任社长。

[5] 即金仲华。

耿丽淑^[1]已经在香港,可能会来这儿。可能你还记得我们曾想请她担任我们的推销员。她在日内瓦时谭宁邦曾给她去信,请她帮我们找一些关系,也许她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渠道。

柳无垢^[2]来见我,她也想去上海休息一下。我还知她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你是否了解她适宜来我们这儿做什么工作,是搞翻译呢?还是做行政工作?尽管我知道她是个出色的英译汉的人才,但无从判断她其他方面的所长。正好“金”在担心李伯悌^[3]在我们这儿呆不长,因为她怀孕了,而且是借调给我们的。金曾向我提议是否让无垢参加我们《中国建设》的工作,他觉得应该把她放在北京而不是在上海。我们中福会办公室需要一位合适的人来负责研究部门。所以,如果这里无法安排她的工作,我们可以请她参加我们其他部门的工作。关于此事,请毫无保留地把你的想法告知。

非常感谢你转寄我这篇未发表的文章,我要请示一下总理是否应把它也包括在这书里面。他曾提出要删掉好几篇在战争期间写的文章。

向你们俩致以我最好的祝愿!

又及:听说魏璐诗将来这儿。

宋庆龄

1951年12月4日

5. 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51年12月15日)

亲爱的朋友:

我实在说不出有多失望,我在离京前和到上海时都错失了与你进

[1] 耿丽淑(1896—1995),美国人。1916年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派到中国工作。1938年冬,参加保盟上海分会,任秘书,认识了宋庆龄。1946年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1947年底被基督教女青年会召回纽约后,继续组织中国福利呼吁会支援中国人民。1951年在宋庆龄安排下,绕道香港秘密回到中国。任中国福利会顾问。

[2] 柳无垢(1914—1963),柳亚子次女。保盟香港时期秘书。1949年8月陪同宋庆龄北上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为她翻译文件、信函。1949年11月调至外交部。

[3] 李伯悌(1918—1996),1938年入党。1945年先后担任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上海分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1951年参加《中国建设》筹备工作,为杂志初期领导人之一。

行一次长谈的机会。因为有些事我非常想听听你的意见。问题之一是有关“王安娜”的事,她既想回德国,又在京和你一起为杂志工作。她说实际上是你让她找我商量。据我所知,北京办事处没她合适的岗位,她既不能做行政工作,又不能把中文译成外文。倒是有一可能,她可以写一本书向德国介绍中国。可惜中福会还拿不出这笔资金。至于回德国,更是我无能为力的事。

我还未见到金仲华,倒是已看了新的杂志。作为创刊号,我觉得图片还不够清晰和生动。另外还有些次要的批评,待我见到金时再对他讲。

附上有吉^[1]的一封信,如果合适,请在你的《人民中国》^[2]杂志上刊登。顺便还附上我签名的样本,以便邱茉莉把它制成印鉴,在给维也纳的代表团赠送我们的杂志时作盖章之用。我已得知保护儿童的大会将推迟到四月份。

希望耿丽淑已在那儿了,并能担当起一些重要的工作。

致以深切的敬意。

宋庆龄

1951年12月15日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

6. 致爱泼斯坦(1952年3月25日)

亲爱的艾培:

感谢你19日的来信及附件。我知道你想让我就“三反”运动写些东西。我可确实实认为无论是金仲华还是吴耀宗^[3]在这方面都比我

[1] 有吉幸治(1914—1976),美籍日本进步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史迪威麾下服役时认识了宋庆龄。二战结束后被派驻延安,因发回的报告被认为过分讲了延安好话而被遣回美国。1951年因“麦卡锡”法陷害被捕入狱。宋庆龄为营救他,将自己珍藏的结婚礼服赠送其亲属,让他们变卖后用于诉讼开销。其亲属没有变卖,留作珍贵纪念,于1981年10月送还北京宋庆龄故居。1972年,有吉幸治与宋庆龄恢复通信。此后两次来华拜访宋庆龄。1976年患癌症去世。

[2] 此时爱泼斯坦与邱茉莉皆同时任职于《人民中国》和《中国建设》。在时间分配上以《人民中国》为主。

[3] 吴耀宗(1893—1979),广东顺德人。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主任、青年协会书局总编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盟后,吴耀宗与耿丽淑、沈体兰、吴大琨等组成保盟上海分会,积极筹募善款与物资,支援新四军。1946年起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

强。至于细菌战争的问题,我已公开发表了我的声明,但我估计它不适合发表在我们的杂志上。因此,我建议你可以找茅盾或者郭沫若商量,请他们写此题目。他们在外国都很著名,这次应该可以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正忙着阅读有关即将召开的亚太和会的大量资料。我准备写篇东西。如果好的话,或者可以用作7—8月号这期的社论。这些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所以此刻可能难以做更多的了,而且我的眼疾也一直困扰着我。

再谈谈对第二期的意见,我觉得它不如第一期,尽管后来出版的几期比头两期有所进步。金知道我对第二期非常生气,仍是这图片的老问题,好些我们刊登的图片已经一再出现过。我们刊登的那篇关于内蒙古的文章的配图,在《人民中国》和《中国画报》上发表过,还有这两个女孩在签名的那幅,早已在国外发表过。我们应加倍努力去发掘一些别人没有用过的图片。还有,其他一些图片也没达到应有的水准,还不够突出。图片版面的安排与上期的太雷同,显得凝重有余,生动不足。要是我们获得了一张确确实实好的图片,给它的版面大些,甚至整幅版面,或许杂志会更显生气。不管怎样,也还应当能想出另外一些办法的。

此刻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些了。艾培,我同意你的看法,总的来讲,杂志比首期有所进步。

非常期盼再见到你,向你和邱茉莉表示我最热烈的敬意!

你的永远的

宋庆龄

1952年3月25日于淮海中路1843号

7. 致邱茉莉(1952年6月19日)

亲爱的邱茉莉:

这星期日程安排很满,让我们在周四下午4点见面吧,同时我想先给你们说些我的想法。

1. 在我思想上,陈翰笙^[1]博士无疑过去和现在一直主持着《中国建设》北京办事处的工作。金是编委会主席,就此身份而论,应对杂志负总责。陈翰笙作为编委会副主席,领导北京的编辑工作,而我们刚派去的干部将承担起行政责任。北京与上海人员有明确的分工,无论从哪方面都没有冲突,这是上次你和翰笙在我这儿定好的。可能引起误会的是6月6日的那封信(源自以前的那些讨论)。由于要对上海的工作做调整,信中只提到了上海的情况,而没有提到北京,但是,这些一直都是绝对明确的。

2. 关于你全职调到《中国建设》工作,我非常赞同。事实上,我非常关注的还是我们的杂志不能准时出版。似乎我们再也无法赶上来,这问题从杂志创刊起就一直困扰着我们。肯定还有其他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和艾培不能全部时间投入到我们这项工作。尽管我们早预见到《中国建设》会遇到的各种情况,我还是认为你用全职来这儿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另外,要加强各方面的人手,以便进一步改进编辑工作,同时也为把《中国建设》办成月刊做准备。如果这是我们1953年的目标,我们现在就必须在这非常时刻做好准备,而且不能受任何干扰。根据前三期发行的经验,要把我们的杂志送到海外读者手中,途中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要变为月刊,我们必须在1953年第一期出版以前,就及早让海外读者知道这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实际上,应该在今年最后这两期的杂志上就宣布此事。

感谢你能向所有相关的人转达我的想法。

宋庆龄

1952年6月19日

又及: 请替我看一下写给刘尊棋^[2]的信稿,你比较了解他(我仅见

[1] 陈翰笙(1897—2004),原名陈枢,江苏无锡人。保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建设》编委会副主任。1951年起,历任外交部顾问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2] 刘尊棋(1911—1993),原籍湖北鄂州,生于浙江宁波。新闻家。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全国政协常委。

他一面,只有点模模糊糊的印象)。请对它提出意见,不然替我再写一份寄他也行。(要是我们的人事处秘书知道,她会告诉我,我只需要发个指令给刘,让他必须放你们……)只怕事情没那么简单。要是你,还有陈翰笙也是这样认为,我们有可能要求把你和艾培都调出《人民中国》社的话,请告诉我,我将通过北京方面的渠道,让高层领导支持我的请求。

另外私下告诉你:中福会的党员对于耿丽淑私自直接见我、尼赫鲁及和平代表团成员等很恼火。她一天上午一连找了四批人,外办的人全给搅乱了。尽管她的动机没错,可是方式方法不对。中福会人事处秘书希望我找她谈次话。我觉得这也难,还是写了封信给她。同时,我打算要秘书长召开一个中福会的全体干部会议,再次向大家说明我们与国外朋友接触的规定,要他们记住。这样对耿丽淑和王安娜都有益。请用我们新的方式来教育耿丽淑,让她懂得什么叫民主集中制。我怕她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误导了,特别是对民主的看法。我们必须帮她理解新的情况,这样她才能更有效地工作。

8. 致爱泼斯坦(1953年3月14日)

亲爱的朋友:

这是回复你3月3日的来信,你的信是邱茉莉12日转交给我的。

我只想在封面问题上再讲几句,我们用了这么大的图片来做封面,杂志自然会更醒目。然而,我们的杂志不论在书店、图书馆还是家里都肯定要与其他很多刊物竞争。这就意味着,我们杂志的名字,尤其是“CHINA”这个字必须要强有力。这关系到字体的样式和放置的部位。当然这也关系到在整个封面设计上标题如何摆。我建议你与美术编辑关注一下未来的封面设计,我急切地希望看到新的封面设计稿。

如果我们要提高杂志图文的质量,看来目前最主要的是干部问题。诚然,最近新增加的一些人员可能对此多少有些帮助,但据我所知,这些新人经验不足,我们还需要更多专业人才。但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实现。与此同时,你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进行一些专

业培训。

关于北京和上海两个办事处^[1]的联系,这正是我们此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当我想清楚了马上告诉你。

两个办事处之间应保持既良好又紧密的联系。这样,不管我怎样忙于其他的事情,我都能随时了解情况。我认为我们的杂志很重要,因为有中福会的名字在杂志上,我觉得有责任看着它充分发挥潜能。

我同意我们应为我们的杂志重新取名^[2],我们已完成重建并踏上了在更高水平上的征途。所以我想,在1954年为第一期的开始就要有一个新的名字。现在还有时间来好好思考,想出个好名字并事先通过推广工作来为此铺路。我们应该沿着这些思路行动。我将试想出一个既能适应形势,又能持续一段时间的名字。

我让邱茉莉带回这封信。好多事情一时间都奔我而来,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和她多谈一分钟。

坦率地说,我非常不愿意看到所有的工作程序都将移到北京去,这样我更没机会见到你们俩了。

对你们最好的,

你们永远的,

宋庆龄

1953年3月14日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

9. 致爱泼斯坦(1976年3月13日)

亲爱的艾培:

《中国建设》杂志已收到。报道写得极好,我想一定会是国外最受欢迎的。我虽然不能当面向你致谢,但请谅解,我确实深深地感激你这最友善的帮助。

[1] 《中国建设》成立初期,由于北京没有印刷厂,故编辑在北京,排版、印刷、推广、发行均在上海。一个杂志分上海、北京两处办公。每出一期杂志,北京的编辑多次往返上海。很不方便。

[2] 《中国建设》一名,无论英文还是中文,均易引起歧义。杂志社同仁多次想更名,均因没有合适的刊名而作罢。1990年更名《今日中国》。

你一定已听说我的朋友陈乙明^[1]几天前在香港逝世了。有吉也患上了那置周总理于死地的相同的病，他才刚刚动完手术。我想他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极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不到深夜决不上床睡觉，总是那么急匆匆地从檀香山赶到芝加哥，又赶往南方，为中美友好做大量的事。我很害怕他会挺不住这可恶的癌症。

自我摔倒至今，我一直针对我的关节炎在进行热疗。你也许对这会感兴趣吧，我听一朋友介绍，她出席了一位英国医生的讲演，那医生说现在关节炎已不再是无法治愈的——并且他还演示了如何把一种称为“polyreer”的物质注入关节的结合部。他还给一些年老的病人这么做，真是太奇妙了！只见这些瘫痪在床上多年的人居然能站立起来，而且能走路了！就好像给生锈的锁和钥匙孔里上了油一样。

也许那一天，你这些老朋友会有可能尝试这种称为“polyreer”的新式疗法了。但是，说是此种治疗必须回避那些因营养不良而体弱多病的人，尤其是那些缺乏维生素C和复合维生素B的人。

我的右手腕骨折了一次，很厉害。可那位令人讨厌的医生给我接的很不好，我想要是手术就好了。因此我的书写走样得很，希望你能看清我这潦草的字迹。

我一直在尽力想法抛开所有烦心的事，按给我的建议那样，平静地生活。还有，我想告诉你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里湿润的天气倒是治好了我皮肤上的麻烦。

向你和邱茉莉致以最好的祝愿！

宋庆龄

1976年3月13日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

[1] 陈乙明（1895—1976），祖籍广东河顺，香港注册会计师。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义务会计师。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二部分：爱泼斯坦致宋庆龄函

1. 1951年8月18日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欢迎和给予我们任命。

我们抵达北京后就用了很长时间讨论这份新的杂志并熟悉你们提供的资料。我们很高兴受到您的委托，能参与这项工作，并期待与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部^[1]进行合作。

如金仲华所要求，我们计划于8月25日左右离京来沪。届时我们希望能详细讨论这本杂志以及与我们工作有关的所有细节。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用我们工作时间的一半在大草厂的办公处为杂志的首期出版进行工作。希望在我们来上海时已能带上我们已完成的稿件的主要部分。

致以真诚友好的敬意！

您真诚的

1951年8月18日于北京

2. 1951年8月18日

亲爱的朋友：

我和邱茉莉收到了中国新闻总署副署长刘尊棋8月16日给我们的来信，信中谈了有关我们在此工作的意见，我摘抄其中两段如下：

“我很高兴告诉你们，我收到了乔冠华^[2]同志关于你们今后在中国的工作的信。他在信中说，鉴于要把《人民中国》办得更好，你们俩将

[1] 1950年7月25日通过的《中国福利会章程》第十条规定：设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席由本会主席兼任。宋庆龄曾希望着手开展中国人民建设的国际宣传工作。最终她的设想化为一份面向国际的《中国建设》杂志。

[2]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部长。时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

主要在《人民中国》工作。此安排早先已征得了孙夫人的同意。乔还说，邱茉莉可以把较多的时间放在《中国建设》上。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你们两位工作安排的问题，望此信有助于对此作进一步明确。”

“关于你们的身份问题，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政府已经决定任命你们为中国新闻总署顾问。该总署的任务之一，就是编辑半月刊《人民中国》。”

如信中所说，我们已经多次商谈，但由于商谈对方尚无权做最后决定，因此仍存在一些不明之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主要职责所在（不仅仅是工作时间的分配问题）。刘对我们和陈翰笙反复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并说他也已写信详告金仲华。他还特别要求我们给您转达他信中的要点，即上述所引两段。

乔同志现在正外出，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与他商询。他肯定希望尽快阐明问题，以便两处工作能顺利进行。

您真诚的

1951年8月18日于北京

3. (1953)^[1]3月12日

亲爱的朋友：

所有当今中国的杂志，包括《人民中国》都刊登许多有关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还附有他的肖像。《人民中国》是以毛泽东的电文作为导言。

翰笙和我正商量着我们杂志以怎样的篇幅为宜。我们认为，我们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读者，不能完全和其他杂志一样处理。一个额外的难处是，我们的杂志已上印刷机了。我们认为，还是应按照我们杂志的宗旨和读者对象来应对这类极其重大的事件。只有一个办法：在杂志的最前面增加两页社论。

这个社论有其特殊的意义，尤其对印度和缅甸等地的读者。我们原来想以编委会的名义发表个声明。后来认为，这个社论只有由您来

[1] 此信没有注明年份，根据内容，应为1953年。

执笔最合适。我们非常期望您能答允。

由于时间紧,杂志又在印刷机上了,我们这就把我们原来以编委会名义拟定的草稿发给您,另外还加了些建议供您取舍。当然,它不一定符合您的风格,但是它也许有助于向您提供我们想对读者表达的一些重点。

您写毕后请把稿子发给金仲华。此文大约1 000—1 200字左右。我们可能在文章的上面配一幅在天安门纪念集会的照片。

现今,我们正忙着赶第三期。邱茉莉最好在上述安排全部完成以前就赶回来。我们正给金仲华写信。请他把这社论送到印刷厂,并插入杂志。

永远的

3月12日

4. 1960年8月2日

亲爱的朋友:

我们全家来这儿度假。这地方真美……地方很宽旷,但都是一座座小房子,因此你不会觉得相互干扰。海滩美极了,这儿一般是“外国专家”的度假场所,管理井井有条,备有很多娱乐设施,供大家选用。

在我抵达北戴河第二天,就转来了斯托特·盖尔德给我的信。他曾是伦敦《新闻记事报》驻重庆的记者,您还记得他吗?他7月初写信给我,说他可能在10月份要来中国。我收到他信当天就转给了外交部新闻司。然后我在离京前去电询问是否能在我来度假前给他个回复。我得到他们的答复时恰好是我准备离开的前一天,我也当即寄了个便条给盖尔德。新闻司的同志说,他应向我驻英代办处申请签证,当天就可以签发。他们还提议他最好在10月1日国庆节来访,我也如此建议他。

我之所以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您大概也有印象,斯托特是个急性子。他在给我的第二封短信里说,他也直接写信给您。他很怕签不出,或者签证拖延时间太长,以至他再也不能成行。因为到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我之所以向你唠叨这么些,就是想让您知道,有关这

一切已全办妥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报社工作,但是他现在想要编辑一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我觉得这很好。要是他来这里,我们可以和他讨论这书应包括哪些内容等等。虽然他只能待两个月左右,但我想,那段时间他还是能做很多事的。斯托特自从1951年被迫离开《记事报》后,一直没有找到报社的工作。他曾是《记事报》驻美国的记者,因为他太反美而被召回。他回到伦敦后,又因为他不够反苏而不被允许写任何报道。那以后,他转向了天主教,现在为“蓝十字会”工作。这是个为狗治病的医院!1958年,我们见到他,他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他试图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系列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起初,他们承诺刊登他的文章,但又临阵退缩了。这让他失望之极。自那以后,他一直梦想来这儿。

几周前在北京,我们与斯诺^[1]匆匆见上一面。原来的斯诺看上去好像已经所剩无几了。也许是害怕和那些断绝他生路的势力再斗下去,他毕竟还是希望靠他们来谋生。所以他现在成了一个典型的两面派的自由主义者。然而,在他身上多少还有那多年积累起来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真挚情感的火花。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使它复燃。希望能做到。

艾培^[2]和我一样向您表达爱意!

1960年8月2日于北戴河7号

5. 1974年2月4日

亲爱的朋友:

这是一份重新打印过的并但愿是有所提高的稿件。另外,我再次

[1]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著有《西行漫记》、《为亚洲而战》、《复始之旅》、《大河彼岸》、《漫长的革命》等。1928年到中国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次年应孙科之邀游历全中国。1931年结识宋庆龄。1936年6月在宋庆龄帮助下前往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10月返回北京后写出30多篇通讯报道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发表,引起轰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支持抗战与中国的民族经济,与路易·艾黎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1941年初,率先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被国民党当局吊销护照,被迫离华返美。1960年移居瑞士。1960年、1964年、1970年3次访问中国,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他去世后,根据其遗嘱,部分骨灰安放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2] 此信为打印。从语气看应为爱泼斯坦。当时艾培夫妇正在度假。估计由爱泼斯坦口述,邱茉莉打字,故结尾时顺手打出艾培向您致意。

道歉,我拖延了一阵。我又患了小一阵流感。很可能是由于我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大量旧杂志,一动也不动。而其他的人都去参加了外面的集会,把暖气给关了,忘了我还在。这样,我就着凉了,一直冷到了心里。不过,也没关系。说起感冒,我就像那种肚内装铅的木偶,冷不丁往下蹦一下,马上就会往上回蹦。也许,我现在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但愿不是如此)!

下面是几点说明:

1. 文章的第一段介绍50年代的“中国福利呼吁会”^[1],我们可以在句子的结尾提到此机构时,加上“纽约中国福利呼吁会”即可。我认为不必过于具体,因为,现在的情况已远远超越过去那类福利机构(目前机构的性质已大不同于老的机构)。

2. 我尽量使总的语气面广一些,不是仅仅着眼在某一个组织机构和事件上,而是谈到开展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个总任务。与此同时,也不忽略具体的对象和场合。考虑到两点:(a)我想这既有助于阐明双重目标,也可包括《中国建设》的出版。这两方面并不相互排斥,但又较难均衡对待。(b)新的刊物的样式,时间等尚有待具体参与者详细讨论。目前不要转移视线,而是集中在以一份国家刊物激励国家团结的思想。

3. 原草稿论及中国这段的重点不明,有几处太空洞,有些方面则过于偏重——如医学方面。因此我试图既充实前者,又不削弱后者。

关于与美国建立友谊的目标,内容取自(美国)东岸地区组织发表的“原则声明”,登载于该组织出版的期刊《中国和我们》(刊物原文为“China and Us”)5—8月号(第二卷第三号)第8页。

我不熟悉目前的有关同志——不像唐(明照)^[2]在这儿时的情况,可

[1] 中国福利呼吁会,1949年由美国友人建立的援华组织。耿丽淑任主席,会址在纽约。抗战初期,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友人成立了美国援华会,将募集的资金与物品支援宋庆龄领导的保盟,用于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统一管理援华资金,组成包括美国援华会在内的美国援华联合会。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联合会日益成为反共、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耿丽淑、爱泼斯坦等毅然脱离美国援华联合会,于1949年春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中国福利呼吁会。这一行动,立刻得到宋庆龄的充分认可和赞同。

[2] 唐明照(1910—1998),广东恩平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转入美国共产党并相继任美共加州大学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书记。1939年10月起任美共中国局书记达10年之久。1950年后,历任外交部专员、中联部局长、中联部副秘书长。1958年兼任《中国建设》副总编辑。1972年4月由中国政府举荐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9年回国后,任中联部顾问。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以见面并互相探讨。因此我上面谈的印象有局限性,也请不要以为我谈的印象是对目前政策有深入认识,或对事实和背景有充分了解而得出的。

希望以上这些对您有些帮助。望您身体复原良好。也望我们很快会见面。

我没有见到纪念斯诺的照片,但是看到了有关他的电视新闻报道。看到邱茉莉一眼,但完全没看到我自己——只是听到我的女儿大声说:“那是我爸爸的秃顶。”

但是我们很高兴您看到我们,我们外表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感觉上也没有什么差别。

一如既往的,

我想再次说明,由于脱离这儿时间较长^[1],我对这儿的情况完全不熟悉。

6. 1976年12月21日

亲爱的朋友:

“四人帮”连同所有他们的腐朽和伪善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怀着一种特有的希望和信心向您致意。希望这新的一年对您,对全国人民和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是美好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人民半个世纪的卓越斗争所取得的中国革命的成果及伟大的事业,现在可以不再被那些恶性膨胀的骗子和恶魔扭曲而向前发展。

很高兴在电视上看到了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您看上去显得非常精神、健康。还有,您此后接见巴基斯坦外交使节的情景,我们也看到了。

李伯悌告诉了我们请您写关于总理的纪念文章的事——这肯定对《中国建设》和海内外的人民都非常合适,这也是《中国建设》杂志的同志们的强烈愿望。不幸的是,这里冬天的气候使您的皮肤病又犯了,致使您不能动笔。不过,要是您感觉好些了,或者有可能了,我们仍然非常希望您满足我们的要求。恳望您再考虑一下。好在还有一

[1] 爱泼斯坦夫妇在文革中遭诬陷,于1968—1972年被捕入狱长达5年。1973年平反后,受到周恩来接见。

个月的时间。如果您想要帮助的话,我会尽我所能。或者,您可以把您的想法和要写的内容口述给我们,由我来执笔,然后请您修改和定稿。这样也许可以减轻些您体力上的消耗。

好好考虑一下吧。

致以爱意

艾培

7. 12月6日^[1]

亲爱的朋友:

很抱歉没有早些得到消息。所有处理过这文章的人都觉得很好。除了一些细节和字眼外,我想不应该会有什么意见和修改。但是工作的进度实在有点慢(由于有个人生病致使在某个环节上耽搁了几天)。听说,上面认为这篇文章还是在《中国建设》发表最合适。同时,我已一再向他们表明,您希望这篇文章能以比《中国建设》通常运作的速度更快的速度早日发表。

在星期一或星期二会有一篇翻译好的中文稿,这是惯常的报批程序所必需的。我希望能很快通过审批,那样就可以请您最后定稿了。

下周将与您联系。或许您想要我做得更多些或者更直接些。就《中国建设》而言,的确是慢了点。不过,文章将得到很好的反响。

致以爱意

艾培

第三部分: 其他书信

1. 宋庆龄为爱泼斯坦签署的介绍信(1941年)^[2]

迺启者: 爱泼司丹^[3]先生(Mr. I. Epstein)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

[1] 此函年份不详。

[2] 此介绍信为中文。原件本无时间,1941年为爱泼斯坦生前确定。

[3] 爱泼斯坦的旧译。

港促进会执行委员。兹因公须赴重庆，路经粤桂湘黔川各省，拟沿途调查各地合作运动，特介绍前来晋谒，请赐见，并予方便为感。此致
四川省军政长官！

宋庆龄

2. 宋庆龄致利奥·埃洛萨博士^[1]（1949年3月15日）

亲爱的埃洛萨博士：

我写信与你实有一事^[2]，事关紧迫，你能尽快以电报回复，我将十分感激！

由于你一直全身心地在大 陆致力于工作，还不知晓有关我福利救济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很想让你了解这最新的情况。

你也知道在这两年美国援华联合服务会一直没为我们在中国的项目筹集一分钱。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对申请的要求越发政治化了。实际上他们对近几年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持反对态度。因此，我们在多种场合向美国援华会在美国负责我们中国北方方面项目的代表提出，既然不为我们筹集资金，那就退出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着手计划发起运动来为他们自己和我们的本体筹措资金和物质援助。可是，美国援华会固执地不采纳我们的建议，以致过了去年11月的最后期限，那时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甚至停拨了他们的办公经费，终止了他们的一切活动。

由此，以中国福利呼吁会命名的一个新的机构产生了，它将专门

[1] 利奥·埃洛萨（Leo Eloesser, 1881—1976），美国医生。1945—1949年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到中国工作，在延安、晋察冀边区和北方各解放区支持当地的医疗工作。在他的半自传式的书*Leo Eloesser M.D.: Eulogy for a Free Spirit* (1982)中，详细谈到他在解放区的医疗工作。延安、张家口、石家庄、阜平等地的医院，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

[2] 这是宋庆龄为支持将于1949年4月19日在美国纽约举行开幕式的中国福利呼吁会向埃洛萨医生发出的紧急邀请信。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美国援华会和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USC）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只支持解放区项目为由连续2年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项目支持越来越少，几乎停止。为此，正在美国的耿丽淑和爱泼斯坦决定发起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动员美国各界人士继续全力援助中国人民。但当时美国各界并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宋庆龄向斯诺等一批了解中国、同时对中国人民怀有同情的友好人士写信、发电报，邀请他们加入中国福利呼吁会，出席开幕式。为使美国人民了解情况，争取对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支持，宋庆龄力争邀请曾在中国工作过，并有说服力的知名人士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说。为此，她给正在中国参与援助项目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埃洛萨医生写了此信，希望他能赴美出席会议。

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的项目筹集资助。这时,美国援华会又推翻了原先的想法,决定维持原状继续留在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内。他们这样的事实是在1949年没为我们的项目提交一份预算,而且也不存有一点可能把我们包括进去的希望。实际上,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项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没被美国政府承认的项目,无论在什么地区,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都不支持。你看,我们是不得已把自己置身于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之外采取措施的,我们只能接受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并且指定他们作为我们在美国的唯一代表。

中国福利呼吁会的筹备委员会由国际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耿丽淑小姐和一位作家、记者身份的犹太人士,爱泼斯坦先生共同负责。也许,你已见过了这两位好朋友。他们试图跨越所有职业、政治、经济的界限来组建中国福利呼吁会,尽可能地拓宽它的基础面,以便囊括一切真正愿意帮助中国人民的群体和人士。这儿也附寄上他们已经邀请作为董事会成员的第一批人士的名单。

他们觉得组建中国福利呼吁会,当务之急应当有一个目前在中国享有声望的人士,处在董事会的显要位置。这就是我写信与你的目的所在。他们向我们提出,拟请你担任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副主席。我真是举双手赞成这一建议。你看,我收到他们信的当天即写信给你,而且和他们一起真心诚意地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邀请。你知道一定会很高兴,约瑟夫·史迪威夫人也已经邀请了艾伯特·爱因斯坦^[1]博士一起加入。

假如你觉得作为副主席有点勉为其难,中国福利呼吁会还有一个建议供你选择:他们非常希望你担任一位名誉主席。

为了尽快地让其运作起来,中国福利呼吁会于4月19日将在纽约举行一个成立午宴,在中国福利呼吁会成立之际的这一场合,你的出席将极具特殊意义。而你,也只不过暂时离开一下你的工作岗位而已。中国福利基金会将承担你往返美国的费用,而且会想方设法帮你

[1] 爱因斯坦(1879—1955),犹太人,生于德国。现代物理学家。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27年与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发起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1933年因受纳粹迫害,迁居美国。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发生后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爱国领袖。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的许多部门中都有重大贡献,其所创相对论对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极为深刻影响。

成行。你往返美国既可以绕道上海,也可以绕道香港。

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很可能是我们尝试着用一些其他方式跟你接触,可结果你却没有得到真正来之我们的只字片语。当你拿到我的这封信时^[1],我们非常希望收到你的电报回复,表明你的看法。

你正在为中国人民做着十分重要的工作!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

您真诚的

孙逸仙夫人

1949年3月15日

(附件)

3. 刘尊棋致爱泼斯坦夫妇(1951年8月16日)

亲爱的艾培和邱茉莉:

我高兴地告诉你们,我收到了乔冠华同志关于你们今后在中国的工作的来信。他在信中说,鉴于要把《人民中国》办得更好,你们俩将主要在《人民中国》工作。此安排早先已征得了孙夫人的同意。乔还说,邱茉莉可以把较多的时间放在《中国建设》上。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你们两们工作安排的问题,望此信有助于对此作进一步明确。

至于你们的身份问题,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政府已经决定任命你们为新闻总署顾问。该总署的任务之一,就是编辑半月刊《人民中国》。

总署的同志都衷心欢迎你们能与他们共事,尤其是《人民中国》杂志社的同志们。我们的杂志以及其他方面的对外宣传确实需要有很大的改进,而你们在这方面的专长将是极其宝贵的。

你的兄弟般的致意

刘尊棋

1951年8月16日

[1] 当时通信情况不畅。从埃洛萨3月18日给其他人的信中看,似乎他并未及时收到此信。并且,那时埃洛萨医生正在上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忙于为解放区争取获得送一名基层医生赴美国进修培训的奖学金金额以及一批援助物资而不懈努力,无法抽身。

Part one: Soong Ching ling to Mr. I. Epstein & Miss Elsie Cholmeley

1. To Epstein (June 30th, 1939)

“THE PEOPLE’S WAR”

This book is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foreign work on our war of resistance because it relates its analytic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struggle to the past history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our national revolution. Every friend of China should read it.

Soong Ching Ling

June 30, 1939

2. To Epstein & Elsie (June 29th, 1946)

Dear Elsie and Eppie:

It was so sweet of you to send me the beautiful material by Mildred Price. I shall have it made up soon and it will be my favorite dress. However, the best thing she brought me was the assurance of your return in the fall. Only keep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re will be no snags in visa procurement. Lots of work awaiting you and you have no idea how much we have missed you.

Now for some news, first of all, we have decided to drop the word “Committee” from the title of our organization. MP objected strongly to our name and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be called China Welfare Council. But we are not a Council so we have decided for convenience sake to shorten our name.

MP also suggested the appointment of a Jean Green to come out from US to be our secretary. We have decided to wait until our office is expanded enough to warrant taking on many workers. Meantime with the approval of UCR we have invited Gerry Tannebaum, of UNRRA and formerly of the I. and E. section of the US army to take charge of all administrative work, as well as be responsible for overall planning, which includes keeping present project in action, and activating new ones. He will take over liaison work between ourselves and UNRRA, CNRRA and the Red Cross branches, etc. of course in charge of publicity as well. Tannebaum has been helping with our various fund raising projects already and from all angles he seems to be the “answer to our prayer”, according to MP.

You will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among our various projects, we have included a Children’s Library to be established locally first. With all the treasure chests that have been sent from US, and useless in the interior I thought we should translate some of the really good books in to Chinese. Also have solicited Chinese books from the different book-stores and with this as a start we can do much to create interest in children for better condi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Mrs. Ho Yao-tsu, wife of the former

mayor of CK will be the chairman in charge of this project. We are helping a clinic for workers and this might be worked in combination. So that all workers children will get some free schooling.

I have obtained from the British War Organization several thousand cartons of food supplies that were meant for prisoners of war. This have been distributed to many poor institutions and workers. Our undernourished friends who act like wolfs when they see food are delighted with the luxurious meat loaves, butter, fish, yes, even candies and cigarettes. We hope that the Red Cross will come across with clothing, etc, for the children so they will be clad as well.

This month we have staged six nights' performances of Peiping operas which netted us 100,000,000 CN and a one night show of This Is The Army, a punk show but yielded over 20,000,000. The last show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help of Morris Cohen, who as usual was our Santa Claus. By the way, he married a Canadian girl during the war. Was here last month and intends to start some business here with Sunfo's two sons. Went back last week to Canada but will be returning. He has written his autobiography in his own racy style. I told him I would write the preface provided that he let one of my friends edit the book for him. Much can be done. Hope to interest "Buddy" in the project. Cohen said that he would go fifty-fifty with anyone capable to make a best-seller.

By now you must have seen Ruth W. and heard the latest dope but one. AW and WPN are going to get a divorce soon. MP said that her boy friend, who writes her frequently, always goes in a drunken condition to CAC to ask for mails from her. She has deteriorated very much. MP suggested that we "get her a new set of teeth and some pretty clothes in order to improve our liaison contacts" with the different relief orgs. Here, MP thought that was the only reason why her approach has failed.

You failed to give us some hint about MP. We were greatly disappointed by some of her vulgar approaches to stranger here. She is leaving for the North and NW with Rosinger and a boy called Sid Rittenberg who speaks and reads Chinese. He will report for UCR on all our activities in the liberated areas. When I see you, Elsie, I will tell you if Cynthia hasn't already done so.

I must bring this to a close with my hearty thanks for the gift and precious material on the Com. For a FEDP which our friends are studying with great interest.

Yours affectionately,

SCL

June 29, 1946

注：宋庆龄在打印信件旁边的书写补充——Ida Pruitt has just left with Nor Esser for Soudan-Paochi. Peter is holding the fact here. Falconer is a good man, Eppie, and

his wife is also sympathetic. Thanks for introductions.

Confidential re MP.(这句在信首左上角)

3. To Epstein & Elsie (Aug. 8th, 1951)

August 8, 1951

Mr. I. Epstein

Miss Elsie Cholmeley

16 Ta Ts'ao Ch'ang

Peking

Dear Friends:

This is to formally welcome you as members of the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Department. We are most pleased to have you as co-workers and look forward to a spirited association which will produce vivid, accurate and far-reaching publicity materials detailing the immense progress of New China.

This is also to inform you that you are appointed respectively Executive Editor and Associate Editor of the magazine "China Reconstructs". It is expected that you will spend the minimum of three days in each week working in behalf of this magazine, at our office at 16 Ta Chao Chang.

With best wishes,

Very sincer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4. To Epstein & Elsie (Dec. 4th, 1951)

Dear Friends: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letter and the proof of our magazine. It looks excellent and gives promise of still more interesting contents within the attractive covers. I am at last convinced that the CR will really going to appear this month. Last week, I got an authoritative person to send a wire to King regarding the necessity of having to appear soonest, since the delegate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Nation Committee in Defence of Children will be leaving for Vienna next month, and can bring copies for distribution abroad. Therefore, you see how fully I agree with your good suggestion. I should be glad to sign the letters for the gift copies, and on CWI stationery, if King doesn't agree to do so.

Confidential, I plan to leave around the 10th for Shai, so if you would like to go along, please let me know ahead, so I may reserve berths in my car.

Talitha is already in Hongkong and may come here. As you may remember, we plan to have her join us as Promotion man. Gerry has written her in Geneva to find out contacts for us, so she may bring us new channels.

Liu Wu Kou has been to see me about going to Shai for a rest. I also know that she is unhappy in her present work. Do you know whether she would fit in well in our local office, either as translator or administrative worker? While I know her to be an excellent translator of English into Chinese, I am incompetent to judge of her other qualifications. Meantime, King is worried that Li Betty will eventually leave us, since she is pregnant and only loaned to our office. Also King once suggested to me that if WK should join our work, the CR magazine, he thought she should be stationed in Peking and not Shanghai. Our CWI office needs a good person to handle the research dep't. So if she not required here, we may ask her to join the other branch of work. Please feel free to give me your advice.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nding on the unearthed article. I shall ask the premier's advice whether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book. He has suggested several articles, written during the war, to be thrown out.

My best greetings to you both

PS Heard that Ruth WY will be here soon.

SCL

Dec.4 1951

5. To Epstein & Elsie (Dec. 15th, 1951)

1843 Huai Hai Lu, C.

Shanghai

Dec. 15, 1951

Dear Friends:

I cannot tell you how disappointed I am that I missed the chance to have a long talk with you before my departure from Peking and upon my arrival at Shanghai, for there are a few subjects upon which I would like to have your advice. One of these subject concerns the problem of Anna Wang. She wants either to return to Germany or to work in Peking with you on the new magazine. She also mentioned the fact that you had advised her to consult me. So far as I know there is no need of her in the Peking office, as she cannot do administrative work nor translate Chinese into other languages. There is also the possibility of her writing a book for German consumption—but the CWI has not the funds for such undertakings yet. As for her return to Germany, this is a question which I cannot help her to solve.

I have not seen King yet but have seen the new magazine. The pictures are not sufficiently clear and lively for a first issue, other minor criticisms which I shall relate when I meet King.

An enclosing Koji's Letter, etc, which please make use of in your PC mag, if suitable, also enclosing a specimen of my signature in case Elsie might used to use

for the woodblock to send our mags to the delegates at Vienna. Saw the date of conference for defence of children has been postponed to April.

Hope Talitha is there already and will be coming down to shoulder some important tasks.

With affectionate greetings,

SCL

6. To Epstein (Mar. 25th, 1952)

1843 Huai Hai Lu, C.

March 25, 1952

Dear Eppie:

Many thanks for yours of the 19th with enclosures. I note that you have me down for the San Fan Movement. I am definitely of the opinion that either King Chung-hwa or Wu Yao-tsung would be better for this subject. And as for the article on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I have already issued a statement on this which, in my estimation, is not suitable for our magazine. Therefore may I suggest that you approach either Mao Tung or Kuo Mo-jo, who are both well known abroad, to write on this subject. These two persons should be made greater use of at this time.

I am very busy reading up all the necessary materials on the approaching Asian Peace Conference. I shall have to prepare something. If it is good perhaps it can be used as the editorial in the July-August issue. This is occupying much of my time set aside for this work, so shall not be able to undertake more than this now. My eye is still bothering me.

Re comments on the second issue, I do not think it is as good as the first issue, although later issues turned out better than the first ones I saw of No.2. King knows that I am "angry as hell" about it. The pictures are still a problem. Many of the ones we used have appeared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one we had for Inner Mongolian story were used in People's China and the People's Pictorials, and the two girls signing the register have appeared abroad already. We should make more effort to obtain more exclusive pictures. Also, some of the other pictures were not as good as they should have been, not outstanding enough. The lay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it was last time. Rather staid and not as attractive as it could be. Perhaps the use of bigger pictures, even though full page size, when we obtain a really good one, would do something to give the magazine more life. But there should be other methods thought out also. That's about all I can think of at this moment. I agree with you, Eppie, that the magazine, generally speaking, is better than the first issue.

Looking very much forward to seeing you, my warmest regards to you and Elsie.

Yours ever

SCL

7. To Elsie (June 19th, 1952)

Dear Elsie:

More appointments for this week to fulfill so let's meet Tuesday at 4PM, meantime wish to give you my ideas for forwarding.

a. There is no question in my mind that Dr. CHS was and is in charge of the Peking office of CR. King is the Chairman of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as such, responsible for the whole magazine. CHS, as the Vice-Chairman, is to lead the Peking editorial work, while the cadre we have just sent up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ve duties. This does not in any way conflict with the clear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Peking and Shanghai as put down the last time both you and HS were here. What may have been misleading is the June 6th letter (and all previous discussions which led to it) referred only to the situation in Shanghai since it was here that changes had to be made. For that reason Peking was not mentioned but should have been to be absolutely clear.

b. Regarding your transference to CR for whole-time work, I am definitely in agreement.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am quite concerned by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publish on time, nor can we seem to make up for lost time which has plagued us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magazine. I am sure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but one important one is that both you and Eppie are not able to devote yourselves entirely to our work. Since we see the CR's possibilities are everything we foresaw and more, I deem it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you work full-time on it. In addition, preparation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personnel all around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ditorial work and also to prepare for the issuance of CR monthly. If this is to be our goal in 1953, we must start to get ready at this very moment and let nothing distract us. After all, we can see by our experience with the first three issues it takes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 for our magazine to get abroad. If we are to go into monthly production, this should be an announcement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we must get it out before the overseas public well in advance of the actual first issue of 1953, in fact in the last two issues of this year.

I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would pass on my ideas to all concerned.

Yours,

SCL

June 19, 1952

PS Please see my draft to Liu Tsun-chi. As you know him well (I met him only once and has only a vague memory of it) Please criticize my draft or prepare one for me to send him. (If our personnel secretary should read it, she would tell me that all I had to do was to issue an order to Liu, and he must release you...) But am afraid it is not so simple. If you think, and CHS also, that we have a chance to pry both you and Eppie loose from the PC, let me know and I shall process this via Peking and get the top authority to back my request...

Another confidential matter, The party people in the CWI are very angry at TAG for approaching directly to see me, Pandit, etc. and the peace delegates. Four approaches in one morning and the FO people are so perturbed. Although her motive was good, her method was wrong. The personnel secretary of the CWI wants me to have a talk with her but I find this difficult yet, so wrote her instead. Meantime, I am going to get the chief secretary call a meeting of the all the carders and explain once again,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TAG and AW, our directive regarding contacting foreigner which they should remember...please try to educate TAG on the new methods and what is meant by democratic centralism. She is still being misled by the bourgeois ideologies, esp. on democracy, I fear. We must help her to understand the new conditions, so she could work more affectively.

8. To Epstein (Mar. 14th, 1953)

1843 Huai Hai Lu, C
Shanghai
March 14, 1953

Dear Friend:

This is in reply to yours of March 3rd which Elsie forwarded on the 12th.

I have just one word further to add on the cover page. I think the fact that we use such a big picture automatically draws attention to our magazine. It is impressive. But I am sure that we have to compete with many other publications, either in the bookstores or in libraries and in people's homes. This means to me that the name of our magazine, and especially the "CHINA" part must have power. This involves style of lettering and placement, but also involves how the title is placed in the total design. May I suggest that you and the artists keep an eye on when working on future covers. I look eagerly forward to seeing the new drafts.

It seems that staff is our main problem at this moment if we are to lift the quality of the magazine both in regard to picture and text. Of course I think the recent additions will help somewhat, but from what I have been able to gather, the

new people have limited experience. We still need more professional additions. This may take a bit longer to materialize, so in the meantime you may have to do some training.

As for the liaison especially between Peking and Shanghai offices this is a problem I am considering at the moment, I will inform you as soon as I get the final answer to it.

The liaison must be a good and close one between the two offices so that I can keep up with what is going on no matter how busy I get with other matters. I consider our magazine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since it has the CWI name on it, I feel responsible to see that it fulfills its potential.

I agree that we have to find a new name for the magazine. We have finished with reconstruction and started on a new path, to higher levels. But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do in 1954, starting with the first issue. This will give us time to think up a good name, and it will also enable us to put promotion work paving the way. I think we should move along these lines. In the meantime I will also try to think of a name that will fit the situation and also be able to last for quite some time.

I will be sending this back with Elsie, whom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see more than a minute owing to so many matters coming up at this time. Frankly, in one way I am very sorry to see everything moving to Peking. It means I will have less chance of seeing you both!

Best to you,

Ever your,

SCL

9. To Epstein (Mar. 13th, 1976)

Shanghai

1843 Huai hail Lu

March 13 '76

Dear Eppy:

The CR magazine have arrived. The article is excellent and I am certain it will be most welcome abroad. I can not thank you in person also—but please understand that I do appreciate deeply your most friendly help.

By this time, I think you have heard that my friend J M Tan passed away in Hong Kong a few days ago. Koji has just been operated upon for the same diseases that killed our Premier Chou. As Koji has always been hardworking never goes to bed before midnight, rushing from Honolulu to Chicago and the south, doing his friendships work for China, I fear very much he cannot overcome

this enemy cancer.

Ever since I came down I have been taking diathermy treatments for my arthritis. You may be interested to hear that a friend told me she attended a lecture by a British doctor saying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incurable case of arthritis—and showing how a new substance called polyreer was injected into the joints of arthritis and elderly patients and it was truly dramatic to see these people who had been paralyzed for years Just get up and walk ! Just like the effect of oil on a rusty key and key hole.

Perhaps someday this old friend of yours will be able to try that new cure called polyreer. It is necessary to avoid malnutrition particularly from lack of vitamin C and the B complex!

My hand writing has changed due to a bad fracture of the right wrist—broken bones badly joined by a stupid doctor instead of by a surgeon. However I hope you can _____ my scribble.

I am trying to live quietly as suggested, avoiding vexations of all kinds. The damp weather has cured my skin trouble, I am glad to report to yours.

My best wish to you and Elsie.

S. C. L.

Part Two: Epstein to Soong Ching Ling

1. Aug.18th, 1951

Peking, China
August 18, 1951

Dear friend,

We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for your kind letter of welcome and appointment.

Since we arrived in Peking, we have spent many hours discussing the new magazine and familiarizing ourselves with the material on hand .We are happy that we are to be entrusted with a part in its production and certainly look forward to our association with the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Department.

As Chin Chung-hua has requested, we are planning to visit Shanghai, probably leaving here on August 25.We hope then to be able to discuss both the magazine and our work in all the necessary detail.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been spending half our time at the office at Ta Ta' ao Ch'ang working on the first issue, and we hope to be able to bring the bulk of the copy in finished form when we come.

With kind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2. Aug. 18th, 1951

Peking

18th August, 1951

Chairman Soong Ching Ling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Shanghai

Dear Friend,

Elsie and I received a letter on August 16 from Liu Tsung-chi, vice-director of the China Information Bureau, giving views on our duties here. Below I reproduce two paragraphs:

“I am glad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Comrade Chiao Kuan-hua concerning your future work in China. He says in the message that both of you will be mainly engaged in seeing that the People’s China is better edited, and that this arrangement has met with Madame Sun’s concurrence some time ago. Chiao also says that Elsie may spend comparatively more time on China Reconstructs. This message, I hope, helps greatly to clarify your position, about which we have discussed so much.”

“As to your status, may I also inform you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appoint you as advisors to the China Information Bureau,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which is to edit the People’s China fortnightly.”

As the letter says, there has indeed been much discussion and persuasion, necessarily inconclusive because it has not been among persons with the power to decide, and centering mainly on the question of where our main responsibility (not only in terms of division of time) is to lie. Liu has repeatedly given his views to us and to Chen Han-seng and told us that he has written to Chin chung-hua in detail. He has also specifically requested us to pass on the substance of his letter to you, which we are doing by quoting the essential passage above.

Comrade Chiao is not in town at present and thus not available for direct consultation. He certainly hope that the situation is clarified soon for the benefit of productive work on both places.

Yours sincerely

3. Mar. 12th, (1953)

March 12

Dear Friend,

All current issues of Chinese magazines, including People's China, are printing many pages of material about Stalin's death, illustrated with his portrait, People's China is leading with Chairman Mao's message.

Han-seng and I have consulted at some length on what is the proper thing for us, and we think that since we cater to a different audience our treatment cannot be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by other magazines. An added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esent issue is already in the press. The problem is to deal with this event of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aims and public. This can now only be done in an editorial printed on an extra two pages in front of the magazine.

Such an editorial will b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to our readers in India, Burma, etc. We first thought of it in terms of a statement signed by the Board, but soon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suitable editorial can only come from your pen. We hope very much that you can do it.

Since time is short and the magazine is sitting on the press, we are sending you the draft of the original statement we had made up for the Board, with some additional suggestions. Please use it or discard it as you wish. Of course it is not in your style, but it may be of help in showing what we thought were the appropriate points for our readership.

Please give your manuscript when completed, to Chin Chung-hua. The article should be about 1,000-1,200 words. We may run it under a picture of the Tien An Men Memorial Meeting.

Since we are rushing No.3 out now, we are asking Elsie to come back before all these arrangements are completed. We are writing to Chin with a request that he get this page through the press and insert it in the magazine.

As ever,

4. Aug. 2nd, 1960

P. O. Box 7

Pei taihe

2nd August, 1960

Dear Friend:

We have come here for our holiday with the whole family. It is a beautiful place...very large but with small houses so you don't feel bustled. The beach is gorgeous. It is the general "foreign experts" vacation place, very well run, lots of games rooms, etc. for those who want them.

The day after I arrived I had a letter forward to me from Stuart Gelder who was the London “News Chronicle” correspondent in Chungking. Do you remember him? He wrote me at the beginning of July saying that he would like to come for a visit in October. I passed on the letter to the Foreign Ministry Press Department the same day I received it. Then before I left Peking I phoned to ask if I could give him any answer before coming on holiday. I got the answer just the day before I left and sent Gelder a note that same day. The comrade at the Press Department said that he should apply for his visa at the Office of the Charge ‘Affaires and they said that they were issuing it that same day. They also suggested that he should try and come for October 1st and I suggested this to him.

I am writing to tell you about this because as you probably remember Stuart is a rather impatient person and in the second note he wrote me he said that he was also writing direct to you. He was very much afraid that he would not be given a visa or that it would be delayed until it was too late for him to get away from his job, because no-one knew him any more. So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t has all been fixed up all right. He does not have a regular newspaper job now but want to do a book (with pictures) about children. I think a book will be good and when he gets here we can talk to him about its scope, etc. He can only take two months, I think it is, but I think he can do quite a lot in that time. Stuart hasn’t had a newspaper job since he was pushed out of the “Chronicle” in 1951. He had been their correspondent in New York but was recalled because his dispatches from the UN were too anti-American. Then he wasn’t allowed to write anything in London because he was not sufficiently anti-Soviet. He then turned Catholic and is now working in the “Blue Cross” which runs hospitals for dogs! We saw him in 1958 and he was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what was happening in China. He tried to get a series on the commune into the “Herald”. They promised to print them and then got cold feet and he was bitterly disappointed, he has dreamed of coming here ever since.

We saw a bit of Ed Snow the last few weeks in Peking. There doesn’t seem too much of the old Ed Snow left, he has become a typical facing-two-ways liberal, afraid of fighting the hand that doesn’t feed him but which he hopes will feed him again. Still there may be some sparks of real feeling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revolution under all the accumulation of years on top and we have been trying to blow on them. Here’s hoping.

Eppie sends his loves, as I do.

5. Feb. 4th, 1974

February 4, 74

Dear Friend:

Here is a re-typed and I hope improved copy, again I have to apologize for delay.

Had another very short bout with the 'flu. Probably because I sat motionless in the office catching up on a lot of old magazines while every one else was at an outside rally and forgot that the heat was off, so got chilled to the innards. Never mind, where colds are concerned I am like one of those lead-weighted dolls, quick to pop up again. Maybe (perish the thought) it is because I am also rather the same shape nowadays.

Some point on the accompanying:

1. The message in the first para. Was the one to China Welfare Appeal in '50. We could put in the organization by adding "to the China Welfare Appeal in New York" after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I thought no need to be so specific, because things are so far beyond the welfare type of relationship now (even though this was an org., which stood for a break with the old set-up.)

2. Have tried to broaden the general tone so that it is not so parochially centered on one organization and event but extends more to the general tasks of people's friendship. At the same time it does not separate itself from the specific addressee and occasion. Two consideration here: (a) This I think also helps it to fit the dual purpose—publication in CR as well if desired, the two are not exclusive but it was a bit hard to strike the balance; (b) Since the shape, time of publication, etc. of the new paper does not yet seem to have been well threshed out among those concerned, it seemed better to stay away from anything that would appear to be a nudge from here on such matter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ncouraging the idea of uniting in a national body with a national paper.

3. The section on China was in previous draft a bit lumpy, too thin in some places and the balance too thick on one—the medical. So I have tried to put more substance in the first, while not whittling down the second.

The list of objectives of the US friendship group itself is taken from the May-August (vol. 2, no. 3) "China and US", p. 8,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f the East Coast regional organization.

Not knowing the comrades now concerned with it—different from the time when Tang was here and we saw and consulted with each other. So my impressions are limited ones and I hope you do not take them as stemming from firm knowledge of the policies or full background and facts involved.

Hope this will be useful. And that you are feeling better now. And of course that we will be seeing you soon.

I did not see the Snow memorial photo, but did see the TV coverage. Glimpsed Elsie there though missed myself altogether—only heard our daughter exclaim, "there's Daddy's bald head".

But we are very glad you noticed, and we do in fact look much the same and feel not too different.

As always,

I want to say again that I am not au fait with this general field now, having been long absent and.

6. Dec. 21th, 1976

December 21, 1976

Dear Friend,

We send you these greetings with the especial hope and confidence, now that the four pests and all their foulness and hypocrisy have been done away with, that the New Year will be a fine one for you and for the whole people and country—the cause of the century and more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of the half-century of the people's epic struggle under Chairman Mao's leadership can now go forward undistorted by these self-inflated fakers and monsters.

It was good to see you on TV at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looking strong and well, and also later when receiving the Pakistani envoy.

Li Po-ti told us about asking you to do the memorial article on the Premier—which would be so suitable for CR and for the people abroad and at home and was the strongly expressed wish of the comrades working on the magazine, and also that unfortunately the winter climate here had brought back your skin trouble so you didn't feel able to. We still hope very much, if you feel better and possibly can, that you will consider it again. There is time, it would not need to be ready till a month from now. And if you need help I can do all I can, perhaps you could speak the recollections and thoughts you want put in—and I could write them down to relieve you of the physical strain, for your further correction and approval.

Do think of it.

In the meantime, all our love

7. Dec. 6, (?)

Saturday, Dec. 6

Dear Friend:

I am very sorry not to have had news earlier. The article was liked by all dealing with it and I do not anticipate any suggestions on changes, except possibly in minor detail or words. But the pace of things is rather slow (complicated at one point by the illness of one person along the way for a few days) and the opinion now seems to have gone back to CR as the best place. In the meantime I have said again tha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it out faster than CR's schedule allows.

On Monday or Tuesday there should be a Chinese translated text, which is the usual procedure for confirmation, and I hope the confirmation will come not long after, so that you can approve the text for the press.

Will be in touch with you next week, or perhaps you would like me to do

something more, or more directly. So far as CR is concerned, it is true that it is slow, but it will have quite good resonance.

With love,

Part Three: other related letters

1.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or Epstein from Soong Ching Ling (1941)^[1]

2. Soong Ching Ling to Leo Eloesser (Mar. 15, 1949)

Dr. Leo Eloesser

Peiping, China

Dear Dr. Eloesser:

I am writing you at this time on a matter of urgency and I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give me an answer by wire as soon as possible.

Since you have been working so hard in the interior, many thing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lation to my welfare work. I would like to bring you up-to-date.

As you may know, fo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United Service to China has repeatedly failed to raise any funds for our projects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this, they have become quite political in their appeals, and in effect were against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here within the past few years. Consequently, we have asked on many occasions that the China Aid Council, which represented our North China Projects in America, withdraw from USC and start out on a campaign to establish their own and our identities and raise funds and supplies. The China Aid Council has consistently refused to accept this suggestion and finally came to the point in November of last year, when USC could not even give them office expense money, of terminating their activities.

As a result of this action, a new organization was started under the name of China Welfare Appeal and this will be devoted exclusively to projects sponsored by the China Welfare Fund. Later the China Aid Council reversed its decision and decided to remain in existence but still as part of USC. This was done despite the fact that no budget had been presented for our projects for 1949 and there was little hope that we could have been included. There actually was a resolution passed at one of the USC Program Committee Meetings to the effect that USC would not support projects in areas not recognized by the US Government. You can see, therefore, that we forced to take steps which would put us outside the USC orbit and we accepted the China Welfare Appeal offer and have appointed them as our sole representa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1] The original letter is Chinese.

The China Welfare Appeal temporary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been led by Miss Talitha Gerlach of the international YWCA and Mr. Israel Epstein, author and journalist. I think perhaps you have met both of these good friends. They are organizing their committee on as broad a basis as possible so as to include all groups who really want to help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ave attempted to cut across all lines of occupa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We are enclosing the first list of people they have asked to be board members.

They feel that it is imperative that China Welfare Appeal have a person of stature who is now in the field in China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on their board. It is to this purpose that I am writing you. They have asked us to forward the request that you be co-chairman of the China Welfare Appeal. Since I heartily agree with this request, I am forwarding it to you the very day that I have received it and sincerely join with them 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accept. You will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at Mrs. Joseph W. Stilwell has also been asked along with Dr. Albert Einstein.

In the event that you feel you cannot accept as co-chairman, the China Welfare Appeal has suggested an alternative. They would then like you to be one of the honorary chairmen.

In an attempt to get start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China Welfare Appeal is having its inaugural dinner on April 19 in New York City. Actually if you could leave your work for just a short period, your presence at such an inaugural occasion would be of tremendous value. The China Welfare Fund would be willing to pay your expenses both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ck, and in any other way aid you in the completion of such a project. You can either come to Shanghai or to Hong Kong and fly both ways to and from America.

We might possibly try other methods of contacting you on these matters, but in the event you receive no word from us by the time this letter is put into your hands, we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would wire us your reactions.

With very best wishes for your health and the important job you are doing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 am.

Very sincerely yours,
(Madame Sun Yat-sen)

Enclosure

3. Liu Tsung-chi to Mr. and Mrs. Israel Epstein (Aug. 16th, 1951)

August 16th, 1951

Mr. and Mrs. Israel Epstein

Dear Epie and Elsis:

I am glad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Comrade Chiao Kuan-hua concerning your future work in China. He says in the message that both of you will be mainly engaged in seeing that the People's China is better edited, and that this arrangement has met with Madame Sun's concurrence some time ago. Chiao also says that Elsie may spend comparatively more time on China Reconstructs. This message, I hope, helps greatly to clarify your position, about which we have discussed so much.

As to your status, may I also inform you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appoint you as advisors to the China Information Bureau, one of the functions of which is to edit the People's China fortnightly.

The comrades in the whole Bureau, especially those in People's China, heartily welcome your participation in our work. There is indeed a great deal in our magazine and other fields of our foreign publicity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Your expert talents will be extremely valuable in this direction.

Fraternally yours,
Liu Tsung-chi

宋耀如海外书信选译

黄亚平 朱玖琳 宋时娟 译注

【编者按】

宋耀如是宋氏家族的开创者，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近年来，宋耀如的研究逐渐为学术界重视，2009年4月由海南省文昌市、海南宋耀如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在宋耀如故乡联合举办“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为国内首次宋耀如专题研讨会。会上所有学者的一个共同感受是，开展宋耀如研究所必需的第一手研究资料极其贫乏，需要从基础的研究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做起。2009年7月，我们在美国搜集孙中山、宋庆龄档案时，专程去亚特兰大爱墨蕾大学图书馆查阅林乐知档案，找到并翻拍了珍藏在其中的宋耀如致林乐知书信原稿5封。同时得到了杜克大学珍藏的宋耀如全套档案，内含宋耀如致美国友人的书信6封和致其长子宋子文的书信2封。2009年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来沪学术交流时将其主编的《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赠我们，书中收录了宋耀如致孙中山书信4封。可以说，这些书信每一件都是我们研究宋耀如生平、思想及其与孙中山、宋庆龄关系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过去虽有学者引用过其中的部分内容，但书信原文和完整的中文译稿则从未正式刊布过。现经多方努力，这些书信的著作权人或其保管者已同意我们在国内正式刊布。

宋耀如海外书信的编排，按其来源和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美国爱默蕾大学图书馆藏宋耀如致林乐知函（5封），由朱玖琳译注；第二个部分为：美国杜克大学藏宋耀如书信（8封），由宋时娟译注；第三个部分：《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收录宋耀如致孙中山书信

(4封),由黄亚平译注。

一、美国爱默生大学图书馆藏宋耀如致林乐知书信

1. 1881年6月25日

美利坚合众国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1881年6月25日

艾伦先生^[1]

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我离家已有六年,我希望我父亲能够知道现在我在哪里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文昌县,他们有帆船从澳门驶往南海,约走六天的水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是“韩鸿翼”。我希望您能找到他们,我已于数月前在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市皈依(基督教),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所以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使我可以回到中国,告诉人们关于我们救世主的事,收到信后请回信,我为此非常感谢您,再见。

您恭敬的
查理·琼斯·宋

地址:

查理·琼斯·宋
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院

附件: 宋耀如 1881年6月25日致父亲函

美利坚合众国

[1] 即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8—1907),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士。1860年来华传教。不久美国南北战争起,林氏经济来源断绝,乃转于中国政府任翻译及教习职。1868年起在上海自费主编《教会新报》,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风行一时。1881年重做传教工作,是监理公会驻华总办。1882年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自任院长。1890年发起创办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ll)。1907年死于上海。编著有《中东战纪本末》(八卷)、《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及《李传相历聘欧美记》等书。

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

1881年6月25日

亲爱的父亲：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在哪里。我于1878年与哥哥分别，离开东印度群岛来到美国，并幸运地找到了我们的救世主基督。因为基督的缘故，上帝就在我的面前。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便能回到中国，把达勒姆朋友们的友善和上帝的仁慈告诉您。他派他的独子在这个世界里为所有罪人受死。我是个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典而得救。我记得我小时候，您带我到大庙里去拜那些木头做的神像。哦，父亲，木头神像不会帮助人，纵然您礼拜一辈子也没有一点好处。在我们过去的时代里，人们对基督一无所知。但是现在我已找到救世主，不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会安慰我。请您竖起耳朵听，您能听到神在说话，请您抬起眼睛看，您能看到上帝的光辉。我信赖上帝，希望凭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再见您。我们现在正在渡假，我住在达勒姆的J·S·卡尔先生的家里。收到我的信后请立即回信，我将非常高兴得到您的消息。我爱您，也请向母亲、兄弟和姐妹们转达我的爱意。下次写信时我会告诉您更多的事情。卡尔先生和夫人（一家）是非常好的基督教家庭，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就对我很亲切。

您的儿子

韩教准

查理·琼斯·宋

地址：

查理·琼斯·宋

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院

2. 1881年10月14日

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校

1881年10月14日

Y·J·艾伦先生

亲爱的先生：

我已经在几天前收到了您的信，得到了一封您写的信我非常高兴。您要求我用中文写信，我已在纸上写了一些。^[1]我希望您能够帮我做我请求您做的事情。我希望再次收到您的信。在圣三一（学院）我们都很好。我们都在为您祷告。我们都向您致以敬意。我希望再次收到您的信。

非常真诚的C·J·宋

3. 1881年11月4日

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院

1881年11月4日

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已在前天收到了中文杂志，得到它我非常高兴。我感谢先生您，这里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我猜想此时您已收到我的信了。我希望您能找到我的父亲。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告诉您，但是我们都在为中国而祷告。我希望能看到有朝一日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支持上帝，坐在上帝的右边^[2]。上帝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将帮助在各地布道的每一个传教士将他的福音和仁慈传达给每一个生灵，而且当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上帝）工作时，他将在他自己的王国接待我们，我们将在那个幸福之家和许多亲爱的（兄弟姐妹）一起得到永恒的愉悦，永永远远。您认识B·克莱文^[3]博士吗？中国政府制作邮票卖吗？他们在上海有铁路吗？我前年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见到了一些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官费留学生，他们已在去年夏天返回中国。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学会以基督教信仰来敬拜。我希望他们把我们主的仁爱告诉他们自己的人民。我们在上海的教会有多少成员是我们中国的兄弟？您认识我们监理会在中国广州的传教士吗？我曾经听说过广

[1] 该信末有宋耀如简单手绘的从海南到上海的路线图，他在该图上用中文标有“广东”、“海南琼州”、“香港”和“上海”的字样。

[2] 出自《路加福音》22:69。

[3] 克莱文（Braxton Craven），时任圣三一学院院长。

州市的琼斯·D·D牧师,但是我从未给他写过信。我想我会写信给他的,问他在我们出生的海南岛传教的是些什么人。也许他能够告诉我关于那里的一些情况。再见。我将就此搁笔了,希望能收到您更多的来信。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兄弟们)。

非常真诚的
查理·J·宋

地址:

查理·J·宋
圣三一学院
北卡罗来纳州

4. 1881年12月16日

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校
1881年12月16日

我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在1881年12月3日收到了您的好意来信,它写于1881年10月24日。收到您的信我非常高兴。每次收到您的信都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我还收到了那些中文杂志。哦,亲爱的博士,您对我太好了。我希望我能为您做一些事情来回报您。两周以前我去了[误,应该是“离开”——译者注]北卡罗来纳州,(去见)M·A·威尔逊牧师,他住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随便说一句,我知道他处理所有远离本土之外的传教事务。我猜想您很熟悉他。我已经写信给德克萨斯州的李丁[音译——译者注]先生,但我还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博士,我曾经为了我父亲的事情请求您(帮忙),并对您多有麻烦。我知道您愿意帮助我,但是我不知道您是否能找到他,因为距离太远了。我感谢先生您的好意。我认为我不应该写信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信是否能够送到。我给您的地址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有关地址的信息,我无法得到更多消息了。请将我的敬意转达给在那里所有教会朋友们。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够回到中国,并希望我自己能够为基督教作见证。您能

在中国得到中国邮票吗？我看您寄给我的信上贴的是日本邮票。我会将我自己所喜欢的邮票寄给您的。您在上海有《基督教拥护者报》吗？您如果有中文版的报纸，请让我知道它每年的费用是多少？我的意思是我将在此信附上英文版的报纸。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兄弟们）。

非常真诚的

C·J·宋^[1]

5. 1883年1月3日

范德比尔特大学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1883年1月3日

我亲爱的艾伦博士：

收到您最后一封信时，我还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圣三一学院。亲爱的博士，收到您的来信我非常高兴，也很渴望了解您在中国的巨大成就。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见到您，并且承担起赋予我的责任。我们大家都以您为骄傲，甚至整个教会都是这样。您为世人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因而他们将知道杨·J·艾伦博士是这个世界曾经见过的卓有成就的工人。博士，我的愿望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作上帝的仆人。如果我的愿望能够成真，我想我会更加快乐的。我遗憾地告诉您，B·克莱文牧师去世了，死于心脏病。我们遗憾地看着他离开我们，我们并不希望这样，但是他知道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面临死亡的前几天，他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准备休息了。当然，他这样一个虔诚信奉主的人会得到（主的）赏赐的。去年9月我来到了范德比尔特（大学），我发现有两个年轻人也准备去中国。我猜想您大概认识他们，但是如果您不认识，我将告诉您他们的名字，德克萨斯州的J·斯蒂芬斯和南卡罗莱纳州的K·A·杜克斯，他们一个是医学博士，还有一个是神学博士。元旦那天，我们在卫

[1] 该信附有宋耀如侧面半身照一张，照片背面文字如下“Charles J. Soon韩教准. Monshow county, Canton State, China native land. Trinity College N.C. U.S.A.”（查尔斯·J·宋 韩教准，广东省文昌县，中国。圣三一学院，美国。）

斯理堂举办了一个晚会，杨博士被要求做传教演说。他说：“在我收到的艾伦博士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表示他想从我们教会中要四个人，所以我将立即挑选这四名兄弟。”以下兄弟被选中，J·斯蒂芬斯、N·E·汤森、K·A·杜克斯和J·C·戴维斯。博士，我想要一份上海的英文报纸。请告诉我报纸的价格，并请向我详细地介绍这份报纸，以及如何把钱寄给您等等。我随时恭候您的回音。收到您的来信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博士，您（知道）在中国有铁路吗？我听有人说他们有，而又听其他人说他们没有，哪一个不对？我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对我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问您来找到答案。如果您能这么做的话请告诉我。

博士，您希望什么时候再回美国？博士，我知道您只有一点点时间来回答那些问题。请原谅我问您这么多。我随时恭候您的回音。我祝愿你们大家新年快乐。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兄弟们）。

再见。

您真诚的
查尔斯·琼斯·宋

地址：

C·J·宋
范德比尔特大学卫斯理堂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二、美国杜克大学藏宋耀如书信

1. 致马蒂也小姐^[1]（1882年3月31日）

亲爱的马蒂也小姐：

几天前收到你的来信，因为非常急切地希望知道你的消息，我也许给你回信早了，请原谅。贝耶先生^[2]给斯尼特小姐^[3]写了信，所以我

[1] 马蒂也小姐，宋耀如在达勒姆的好友之一。

[2] 贝耶先生，应为宋耀如在圣三一学院的朋友或同学。

[3] 斯尼特小姐，应为宋耀如在达勒姆所认识的女孩。

们的信会同时寄出。前几天我收到了安妮小姐的来信,她说一切都好,那里的天气一直都非常怡人。毕业典礼近期即将举行,我们还得学习一大堆东西。贝耶先生向你问好,并感谢你的好意,男孩子们都很好。下个月我们将进行演讲。请代我向路易斯小姐^[1]问好。很希望再次收到你的来信。我会把此信附在贝耶先生的信里一同寄出。准备社团活动的时间到了,再见。

C·J·宋

1882年3月31日

于北卡罗来纳州兰道夫圣三一学院

2. 致安妮小姐^[2] (1884年4月24日)

亲爱的安妮小姐:

没有给你写信真是有些时候了,可是你一定记得,在我收到这封来信之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的。尽管,你说过不管是否收到回信,我都应该写信,没错。但是,我每周有24个小时要背诵课程,那些课特别难且冗长。每学期除了正常学习,还有2000页的平行阅读要做,像课本一样也要考试的。所以,你看这一年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愿这些能够使我尊贵的朋友见谅于我的怠慢。

期末考试将5月8日开始,22日结束。5月24日或25日,你可望收到我的长信。

本想今晚我能有足够的时间给你写一封长信,但是不行。

是的,我非常渴望见到你们,但是,今年夏天达勒姆之行取决于别人,而不是我自己。我盼望我能有办法解决我的旅费。

我必须以不久要进行的所有考试为准,所以要到考试结束后才能给你写信。噢,顺便告诉你,我写了个剧本,想寄给你,但我并不认为你会喜欢,因为没有好东西出自拿撒勒^[3],只因这是我自己的创作。知

[1] 路易斯小姐,宋耀如在达勒姆的好友之一。

[2] 安妮小姐,宋耀如在达勒姆最好的朋友之一,回到中国后和宋有书信往来,但英年早逝,宋耀如非常伤心。

[3] 基督少年时代居住地。

道你们很好,我很开心。请代我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希望你在祈祷中想着我。

我不能确定今年夏天我干什么。但我一直有个计划想要实现,(如果上帝允许的话),那就是传教士的演讲。

我们阅览室里有各种各样的神(像),如果明年五月份我能去达勒姆,我会把他们带给你。你会乐于见到他们,或者对这些没有生命的神有个全新的认识,并了解他们的特征。现在又到背诵时间了,我不得不结束这封信。请再次给我来信。

你真诚的

查尔斯·J·宋

1884年4月24日于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特比特大学

3. 致安妮小姐^[1] (1885年7月18日)

很快我就知道此信的作者是谁了,一个人的语言是他的一部分,所以我不用怎么猜,一看到字迹,立刻就认出信是谁写的。从达勒姆到华盛顿我花了三天的时间,用这么多时间我都可以到纽约打一个来回。在华盛顿我过得非常开心,尽管我只认得几个女孩。据说在华盛顿女孩和男孩的比例是七比一,其中有几个女孩很漂亮,我爱上了贝尔小姐。我得把心留在华盛顿,而人却要去中国?你不认为这很糟糕吗?

不存在爱上R叔叔女儿的任何危险。詹尼小姐要和一位年轻人订婚,他身高只有7尺9寸。罗斯小姐太小了,她才15岁,已去姐姐家度夏。所以你看即便我想陷入爱河,也没有机会。我猜想你在某个地方,不管你身在何处我都希望你过得开心。安妮小姐,我必须承认达勒姆女孩中我最爱你。难道你不相信吗?通过给你写信,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感情。这几天我和韦尔牧师在一起,他是我范德比尔特的同学。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

[1] 此信没有称呼,根据信中内容可知,是写给安妮小姐的。

我是上周三来这里的。下周一下午我会离开普利茅斯去华盛顿，然后从那里去格林维尔拜访另一个同学。最后，我会前往杜珀林的基南斯维尔拜访法里奥尔夫人，并在那里作一场报告和布道。请代我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请让我再次收到你来信。

查尔斯

1885年7月18日于

北卡罗来纳州普利茅斯

4. 致索斯盖特先生^[1]（1886年6月14日）

最亲爱的朋友：

上周六（12日）非常高兴收到您4月30日的来信。这是我回国后收到的您第二封来信，非常感谢您的两封来信。很高兴获悉那些鞋子和茶叶如期抵达并受到收件人如此高的评价。

是的，茶叶是给我在达勒姆最好的朋友詹姆斯·索斯盖特先生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将他的地址弄错了，好在信还是顺利收到了。我把这个错误归因于我的非一贯正确性，所以至少这次你得原谅我。不知为什么，我从来不会把你的地址搞错。

是的，我再次走在这片生育我的土地上，但远不是家一样的地方了。我觉得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有家的感觉。

不，我还没有去见我的父母。艾伦博士说过，我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春节期间去（1887年1月），在这之前不行。对这种发号施令，我很不满，但我必须忍耐。如果我草率行事，家里的人们可能不明就里，尤其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可能会认为我对监理会不忠诚，破坏了规矩，所以我就像老鼠那样，始终保持沉默。可是一旦时机成熟，我将不顾他的反对、高高在上的权威和对本地传教士的憎恶，来摆脱目前监管人所有傲慢的发号施令。大约在一年前，这个伟大的“大人物”想解

[1] 根据信中内容所示，“最亲爱的朋友”即为詹姆斯·索斯盖特先生，是宋耀如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最好的朋友之一安妮小姐的父亲。

雇布道的本地传教士；现在他又无视我有权获得的权益和平等的对待。我不喜欢在他手下工作，我想申请去日本。

假如要回家的话，我想就在明年春天的时候走。

因为中国新年前后，沿海和海南岛的中国人就变得非常麻烦。

上周六（12日）我们获得消息说董事会决定在日本成立布道团。被指派去日本工作的有蓝柏博士^[1]、蓝华德博士^[2]（蓝柏博士之子）和杜克博士。这些传教士中没有一个能够忍受上海的这个“专权者”。

今天下午我感觉不好，信写到一半我就想结束了。

另找时间再给你写封长一点的信。

爱你们。

永远忠于你的

查理

1886年6月14日于中国苏州

5. 致索斯盖特先生（1886年10月7日）

亲爱的索斯盖特先生：

收到您8月1日的来信已有数日。很高兴收到您如此精美的来信，同时为您因脚痛而行动不便，深感遗憾。不过，我确信您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威尔逊主教于一周前即上周二抵沪，按照预定的行程他现已去了北京。主教将于本月底回到上海，但我们的年议会直到11月底才会召开。在中国的这一地区，眼下的天气相当舒适。今天是周四，我刚从每周一次的祈祷会回来。南方长老会传教士正在本市召开年度会议。我们布道团的派克博士^[3]已去日本结婚，会在20日回来履

[1] 蓝柏（J. W. Lambuth, 1829—1892），美国监理会教士。1854年来华，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32年。1886年调往日本，死于神户。

[2] 蓝华德（W. R. Lambuth, 1854—1921），美国监理会传教医师，蓝柏之子，生于上海。1877年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返华，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施医传教。1886年随其父往日本建立监理公会，1891—1910年主编《监理会传教评论》（The Methodist Review of Missions），并任监理会干事。1910被选为会督。死于横滨，葬于上海。

[3] 即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 1858—1927），美国监理会传教医师。1882年来华，协助蓝华德大夫在苏州建立博西医院，任外科主任30余年。柏氏为蓝柏女婿、蓝华德的妹夫。

职。自从上次给你写信后,我成功地看望了我的家人。家中所有人都很好。他们看到我都非常高兴,尽管没人能认得出我来。我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眼下,海南本地人和朝廷军队之间发生了小小的战斗。在回海南的路上,我本以为会尝到枪药的滋味,但是战争离我的家乡太遥远了,未能尽兴。宜昌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徒们,给当地官员和人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只是给自己带来了毁灭。

请代我向所有人问好。如果有更多的消息我会写更长的信给您。

再见。

忠实于你的

查理·宋

1886年10月7日于中国苏州

又及: 请给我寄些随便什么报纸来。

6. 致索斯盖特先生(1887年2月4日)

我亲爱的索斯盖特先生:

获悉安妮小姐去世,万分悲痛;但反过来,知道她在天堂比在人间更加快乐,深感欣慰。毫无疑问,万物皆为那些崇爱上帝的人造福。愿上帝以他温柔的爱与恩典安抚并支持你们;最后,当我们完成生命中的一切,都将与她相聚于没有分离的幸福彼岸。

安妮小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作为基督徒的榜样值得人们重视。在我离开美国时,万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这么早发生,万没有想到我们不能再相见于此岸。噢,想到这里就非常难过。上帝把最甜美的花朵摘下,并从我们身边拿走;但是,这朵花正盛开在主的天国花园里。在主的怀抱里安息你是幸福的。从人间的悲伤转化为天堂的欢乐你会更加快乐。愿上帝让我们远离罪恶和虚弱,最终带我们归去,在那里我们将和所有的朋友、所爱的人相聚,与基督相伴永生。

我已经开始用本地方言布道,尽管方言讲得没有我想要的那样流利,还要过段时间才行。春节刚刚过去,而节日尚未结束。中国人在一年中都没有安息日,但是,逢年过节就会长达两到三个星期。本月

16日或者2月份,我们学校就要开学了。去年我们有12个学生,在即将来临的这个学期,我们期望学生人数会增加一倍。

昆山是个有着4英里围墙的城市。包括城郊,人口有300 000。当前,除了各种各样不信上帝的宗教外,我们这里有三种不同教派代表。这里的各种教派和宗教包括:我们、监理公会、南方浸信会、法国天主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北方长老会曾经也来到这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地主把他们从原来的房子赶走了,所以他们被迫迁移到别处去了。

请为我和我的工作祷告。愿上帝让我们来年取得更多的成就,更加深切地体会他的爱。

向大家献上我的爱。

无论何时收到你的来信我都会很高兴。

你永远忠实的

查理

1887年2月4日于昆山

7. 致宋子文(1915年5月3日)

我亲爱的儿子:

我非常抱歉地告诉你,我不能来看你和美龄,我原想来的,而且已经决定来了。我经常头疼并且眼睛不舒服,最近我偶然发现我的右眼几乎完全失明了。我去看眼科专家,检查了整整一个小时,检查完后他告诉我我得了肾病(肾小球肾炎)。我去看东京京都大学的一位著名专家,他也告诉我我得了肾病。我又去看东京圣路加医院的英国医生,他还是说我得了慢性肾病,他说我必须好好照顾自己否则这个病会把我击垮。

请让美龄看这封信,因为我不想再写另外一封同样的信。这是一封给你们两个人的信。我将在这儿再呆两个多星期,然后去神户,我想至少在那里度过夏天。

如果你想来看我,你可以买来回票,来日本和我一起度夏。如果美龄想一起来——但是你必须与旧金山或西雅图的港口的移民官商

定,这样当你在接下来的秋天返回学校时,能顺利登上美国的土地。我认为你最好买到神户的来回票,因为它比到横滨的来回票贵不了多少。美龄说在巴拿马世博会^[1]期间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票价比平时便宜,我想你应该带美龄一起来,因为我可能活不到她毕业的时候了。我的病情还不确定。它可能很快就把我带走,我希望在我死之前能见到你们俩。我会叫妈妈、罗莎、约翰和约瑟夫^[2]到日本来见你们俩。

我的电报地址是“宋·神户”。所以,如果你和美龄来的话,你就写:“coming”。但是如果你一个人来的话,你就写:“come”。罗莎在东京住了一个多月,葛龄随其后来东京,陪了我三个星期。我今天把她俩都送回家了。她们将乘6日的法国邮轮“维拉”号回上海,估计在10号到家。上帝保佑你们俩。不要忘记从美国移民官那里拿必要的文件,以保证你回校时顺利地重登美国领土。

爱你们俩。

你们最慈爱的父亲

C·J·宋

1915年5月3日于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3]

8. 致宋子文(1915年8月6日)

我亲爱的儿子:

你寄自伯灵顿的明信片和美龄的信同时寄来。获悉你俩身体健康,我很高兴。保重身体!没有一个好身体,教育实际上就如同其他东西一样毫无价值。所以,要始终以健康为重。

最近,上海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风暴。妈妈说她从未看到上海以前有这么大的风暴。外滩所有的树都被刮倒了。河中的所有船和舢板被刮到了岸上。我们家高大的镀锌铁纱门被刮倒了,砸在牛家的“feapo”树上,并砸坏了它。一艘沿岸航行的“清泰”号轮船在吴

[1] 全称是“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1915年2月20日—12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共有31个国家参加,参展品20多万件,参展人数达到1900万,历时280多天。

[2] 罗莎、约翰和约瑟夫,即庆龄、子良和子安。

[3] 1906年由基督教青年会华人总干事王正廷在日本东京创办。

崧口附近翻船，翻成了底朝天。船上有200多名乘客，有100多人当场溺水而亡。船上有4名刚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国的女孩，也被淹死了。想着这样的惨剧真是令人伤心。他们躲过了大海的风险，却被她们家乡的河水淹没，父母连一面都没见到。

老张伯伯的女儿大概要嫁给一个月薪120元的人，牛阿姨是媒人。新多〔音译——译者注〕大概也要嫁给一个月薪200或300元的人。刘耕〔音译——译者注〕现在是英美烟草公司在天津的主要职员。他月薪195元，正在谈婚论嫁。桂永江〔音译——译者注〕死了，他的妻子对他母亲很不好。永江在婚前是个懂事的儿子，但婚后成了一个十足的恶棍，由于他只听他妻子的话，对他母亲太不好了，所以当他死后，他妻子对他母亲更坏。有些人真是太忘恩负义了！

吴凯欧〔音译——译者注〕在日本。他的两个女儿跟着他。一个12岁，另一个10岁。他们和海滨胜地垂水的远亲住在一起。从神户乘火车大约需要3到4个小时。那里的远亲是鲍〔音译——译者注〕先生，是神户的横滨香料银行的买办。我也认识他。凯欧来俱乐部看我，并说鲍先生邀请我去一天。所以我和他在同一个下午一起去了。凯欧星期天将去Stami和东京，本月20日返回中国。凯欧有胃病。

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了李清亮〔音译——译者注〕和另外两个中国学生，他们是学医的。他们将赴美深造。我明白李清默〔音译——译者注〕也在美国，他是去年12月去的。

下个月，妈妈将去山西看蔼龄，因为蔼龄那时要生了。我给庆龄写了一封长信，要求她陪妈妈一块来回，但她说她想留在上海，并要求我陪妈妈去。如果我是绝对安全的话，我是愿意去的。但如果我去，我仍然希望她和我一起去。我又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我绝对安全我将去但她必须和我们一起去，陪伴我们，让我们放心。如果她愿意就发电报给我，我将乘第一班轮船回国。所以我正在等她的回复。

感谢上帝，我的健康状况日益好转了。但是我的尿中仍有变应原，血压也非常高。

也许这是我从神户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如果我下周得到庆龄的回复，我会从神户写信给你。祝贺你得到了美国学生的最高荣誉奖。

爱你们俩。

爱你们的父亲

C·J·宋

1915年8月6日于神户

三、《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1]收录宋耀如致孙中山书信

1. 1915年7月13日

我尊敬的博士：

您7月9日之赐函我已按时收悉，不胜感谢。我曾致信阿福（Affo）告知我打算前往旧金山一事，但终因无法成行，令他失望了。他说要亲自到码头迎接我，真是友好之至。这一点，与其父颇为相似。

我总感觉您那位在东线战场的朋友一定是遇到了麻烦；那里俄、德两军激战正酣。他像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竭力接近棘手的港口地区——因为那里是战线——就为了亲眼目睹德国人和俄国人如何施展作战策略，而就在这同时，不长眼睛的子弹误伤了不该伤的人。无论如何，我希望他平安归来，与您团聚。

几天前，卫〔音译——译者注〕经过我这里，我与他一同吃了晚饭，还有一位我们都认识的朋友鲍〔音译——译者注〕；鲍生于神户，其母亲是日本人。

我因身体欠佳，不宜远洋旅行，所以今冬之前无法赴美。近日仍有头痛状况。小便略发炎症，血压亦甚高。正遵医嘱服药降压。

关于赴美事宜，若您收到美方回复，请告知。如若可能，我将与您的手下一同前往，并鼎力相助：我从卫处得知，马素已致电《上海每日新闻》报，建议各政治党派团结一致支持袁世凯政府。他精神不正常吗？抑或他已臣服于袁世凯万能的金钱诱惑之下？这是对他仁慈朋

[1] 该书由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编，日本高知市民图书馆2001年3月印刷发行。书中“萱野长知旧藏宫崎世龙笔记保管之孙文关系史料英文编”内，收录了1915年7、8两个月宋耀如致孙中山的四封书信。

友的背信弃义！

祝好！

您的老朋友宋查理

1915年7月13日于神户中国俱乐部

2. 1915年7月15日

我尊敬的博士：

您本月11日之赐函我已收到，不胜感谢；您在信中说您的朋友将于20日离开彼得格勒前往华盛顿。我也将于12月1日或此日前后去往美国。我认为罗莎蒙德^[1]不会去美国，因为她要在家中陪伴她的母亲，帮忙料理家事。但是现在距离12月还有数月之久，计划也有可能改变。

近日天气非常炎热，望您身体健康。

您永远的老朋友

查理·宋敬上

1915年7月15日于神户中国俱乐部

3. 1915年8月3日^[2]

我尊敬的博士：

刚刚收到您7月20日的来函。前几天我不在神户，否则早已收悉。我在垂水^[3]停留了两天，就在舞子^[4]的下一站。

听您说罗莎蒙德允诺嫁人，并期待婚姻的到来，我甚感震惊。此前她曾告诉过您，她一回到上海就会结婚，并同丈夫一起返回东京，找份工作。您从未向我提起过这些。

[1] Rosamonde为宋庆龄的教名。

[2] 宫崎世龙注：寄至灵南坂，头山满收转。这封函件共有四页信纸，两面书写，字迹潦草。信封上写有：神户，山手大街中街三段24号，中国俱乐部，1915年8月3日。

[3] 垂水市是日本鹿儿岛县辖下的一个城市，位于大隅半岛的西北部，面向鹿儿岛湾并与樱岛相接。

[4] 舞子，位于日本神户，是日本有名的海滨胜地，神户孙中山纪念馆——移情阁舞子六角堂，是该地海滨标志。

她也从未向我说起她未来的打算。前些时候,您来函询问罗莎是否会和我去美国,我马上复函奉告,据我所知她会留在家中陪伴其母。现在您却告诉我不一样的消息,让人难以置信。我总觉得这只是一个笑话。这听起来太奇怪了:如此荒唐,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小孩子的玩笑话。

我尊敬的先生,不要相信一个年轻女孩如此新奇之言,她总是喜欢开自己的玩笑。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都是如此地尊敬您,我们不会做任何有损您及您事业的事情。“大叛逆者”是我们大家永远的敌人,罗莎跟您一样憎恨这种人,因此她根本不可能嫁给这样的坏人。此外,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给任何人做妾,无论他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国王、君主抑或总统。也许我们贫于“世俗之物”,但我们既无贪心,也无野心,更不会低贱到去做违背基督教义之事。您似乎担心她想成为皇后,她没有这样的打算。让我再一次重申,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引诱我们以任何方式去伤害您及您所珍视之并近乎全心全意奉献之事业。我不会容许此等事情发生。在这一点上,我说到做到,您可以信赖我。我跟你一样,是直言不讳之人。我不愿意欺骗朋友。我难以想象她会愿意委身于我们共同的敌人。她甚至耻于同妾说话,怎么会考虑成为这种人。您知道,在热海之时,她和张静江的二房没讲过一句话。此外,我们绝不会允许我们的女儿嫁给一个有家室的人,无论他是谁。对我们而言,一个好的名声比一切现世之光环和特权都来得重要。

您说您曾询问我罗莎蒙德何时结婚,但我没有回复,您说没有回复就代表着默认,还说您会祝贺我和C。可是说实话,我对于罗莎蒙德即将结婚之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她要与何人结婚。容[音译——译者注]和庄丹[音译——译者注]二人此前经常约请她,但是据我所知她还未曾表示要嫁给其中的哪一位。您信中所言,我从未听说。我也从未收到您所指的那封信。它从未出现过。一定是在途中丢失了。所以,我如何能知道信的内容?如果我不知道内容我又如何能做出沉默以外的其他表现?因此,沉默并不代表“同意”,您还是暂且保留您的祝贺之词吧。

我尊敬的先生,敬请您牢记,无论情况多么糟糕,我们都是您忠实的朋友。我可以断言,我所知道的中国人中,没有哪一个人比您更高尚、更仁厚、更爱国。一个明事理、有良心之人怎么会与您作对?我们宁愿看到庆龄死去、遭埋葬,也不会让她嫁给我们的敌人做妾,即使是做妻子也不行。我们将竭尽全力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您大可放心。

您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中国,然有些人对此并不领情,但我们绝对是领情之人。您生活在一个超前的世纪,因此鲜有人能理解您,您所珍爱、挚爱的事业也几乎得不到世人感激。现在的中国不配拥有您这样的子民。但是未来人们将还您公平、尊您为神,他们将像尊崇改革先驱孔子一样给您荣耀。他也曾遭到邪恶当权者的驱逐。而您也被驱逐出了您所挚爱的土地。

就在几天前,我去了李国安[音译——译者注]——我想您认识他——的办公室,他说革命者没有给国家或者人民带来任何福祉。没有哪个革命者是好的、诚实的、无私的,或者爱国的。我告诉他有这样的革命者。他说:“你能说出一个吗?”我说:“孙先生。”然后他的脸红了,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接着他问,他为什么不留在中国或者回去?我说:“他是位高尚的绅士,难于同窃贼和凶手为伍。”既然他们(那些掌权之人)不听他的谏言,正如当年孔子也面临不听谏言的当权者一样,所以他选择了和孔子一样的做法。实际上,没有任何事情足以让我热血喷张、怒不可遏,除非有任何人试图诋毁、污蔑您。我对李国安说了这样一通训诫之词,相信他再也不想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我了。那之后,我们在俱乐部见过一次面,但直到今天彼此也没讲过一句话。他曾经是我的朋友,但现在他是我的敌人,因为我站在您这一边,为您辩护。无论对方是何人,只要他或者她在我面前诋毁您,我将为您讨回公道。作为您的朋友,我认为我有责任维护您的清白并支持您的事业,无论结果如何。我告诉李:“如果不是孙先生,你今天的头上仍会挂着那条可耻的尾巴,这就是你今天享有的福祉。”他试图使我相信剪掉辫子(尾巴)是早晚之事。我回答他:“是的,人们曾不知多少次提议剪掉辫子,但都是嘴上功夫,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带头先剪掉自己的辫子。吹牛容易施行难,二者不可等同而语。”我驳倒了他,他

无言以对，面露愧色。

按照您的要求——两封信，您的和容[音译——译者注]的，都已付之一炬。

我不想拍电报叫罗莎来，因为此前我已去信叫她于下月陪母亲去山西，蔼龄将在那时分娩。庆龄不喜欢去北方，她害怕那里的蚊子，但是她母亲要有人陪伴，她不得不去。我正逐渐恢复健康，但是小便仍有炎症，身体仍感虚弱。希望您及您的手下身体健康。我的家人今年夏天都生病了。

您的老朋友查理·宋

1915年8月3日于神户中国俱乐部

4. 1915年8月13日

我尊敬的博士：

来信收悉。刚刚收到罗莎蒙德的信。她说不能陪其母亲前去山西看望姐姐，因为她正在上海的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她和母亲都央求我陪宋夫人去山西，但我无法答应，原因种种，其一是近日来我的身体渐愈不佳。但是，我即使痊愈也不会去，因我艰于行走。实际上，我非常虚弱，根本不可能完全康复。星期日，我将搭乘“法国邮船”号回上海休养。依据中国风俗，宋夫人^[1]必须要去山西，所以我必须尽力找到某人陪她前往。我有可能再回日本，如若回来，我会去拜访您。我离去期间，恕不能奉陪。愿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诸事顺意。

您真诚的查理·宋

1915年8月13日于神户

又及：勿复，除非您再次收到我的信。

[1] 即倪珪贞。

附录

一、The Letters from Charles Jones Soon to Young John Allen Housed in Emory University's Manuscript, Archives, and Rare Book Library

1. June 25th, 1881

United States America,
Durham, North Carolina,
June 25, 1881

Mr. Allen

Dear Sir,

I wish you to do me a favour, I been way from home about six years and I want my father to know where I am and what I doing, they living in South East China in Canton State called Monshow County, they had junks go from Macow to Nanhhigh about 6 days water, my father name is "Hann Hong Jos'k" in Chinese. I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it out where they are, I was converted few months ago in Wilmington, North Carolina, and now the Durham Sunday School and Trinity are helping me, so I am a great hurry to be educated so I can go back to China and tell them about our Saviour, please write to me when you get my letter, I ever so much thank you for it, good by.

Yours respectfully,
Charlie Jones Soon

Address.

Charlie Jones Soon,
Trinity College, N. C.

Enclosure:

Letter, Charles Jones Soon to his father, June 25th, 1881

United States America
Durham, North Carolina,
June 25, 1881

Dear Father,

I will write this letter and let you know where I am. I left Brother in East India in 1878 and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finely I had found Christ our Saviour. God for Christ sake has meet in the way. Now the Durham Sunday School and Trinity

are helping me and I am a great hurry to be educated so I can go back to China and tell you about the kindness of the friends in Durham and the grace of God. He sent his begotten Son to died in this world for all sinners. I am a sinner but save by the grace of God. I remember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you took me to a great temple to worshipped the wooden Gods. oh, Father that is no help from wooden Gods. if you do worships all your life time would help from wooden Gods. If you do worships all your life time would not do a bit goods. in our old times they know nothing about Christ. but now I had found a Saviour he is comforted me where ever I go. please let your ears be open so you can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 and your eyes looks up so you may see the glory of God. I put my trust in God and hope to see you again in this Earth by the will of God. now we have vacation and I stay in Mr. J. S. Carr house at Durham. Soon as you get my letter please answer me and I will be very glad to hear from you. give my loves to mother Brother and Sisters please and also to yourself. I will tell you more when I write again. Mr. and Mrs. Carr they are good Christian family and they had been kind to me before I know them. Will good by Father, write to Trinity College, N. C. Yours Son.

Hann Cardson translate韩教准
Charlie Jones Soon

Address

Charlie Jones Soon,
Trinity College, N. C.

2. Oct. 14th, 1881

Trinity College, North Carolina
Oct. 14th, 1881

Mr. Y. J. Allen

Dear Sir,

I had received your letter few days ago, and was glad to get one from you, you asking me to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 have write some on the paper. I hope you may be able to do the favor that I request you. I hoping to hear from you again. We are all well in Trinity. We all praying for you. We all send our regards to you. I hope to hear from you again.

Very truly C. J. Soon

3. Nov. 4th, 1881

Trinity College, N. C.

Nov. 4, 1881

Dear Dr. Allen:

I had received the Chinese magazine day before yesterday, and was glad to get it. I obliged to you Sir, the weather has been very cold in here now. I supposed you got my letter by this time. I hope you will be able to find my Father. I have no particular news write but we pray us for China. I hope to see the day when all the Chinese will be able to stand for Christ, and worship the living God who are in Heaven, sit on the right hand of God. He is willing to help every one of us. Jesus will help all the missionary in every where to preach he Gospel and his goodness to be tell to every creature, and when our's labor is done in this world he will received us in his own kingdom and have ever lasting joy with many dear once in that happy home for ever and ever. do you know Dr. B. Craven? d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ke any postage to sell? do they have any railroad in Shanghai? I saw some Chinese students in Boston Mass year before last. They all educa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had been back to China last summer. Some of them had learned to worship by Christian faith. I hope they will tell their own people the love of our Saviour. how many our Chinese Brother member Church in Shanghai? do you know any our Methodist missionary in Canton China? I had heard Rev. Jones D. D. in the city of Canton, but I never did write to him yet. I thinks I will write to him and ask him what missionary in Heidnann island where I was born. may be he can tell some things about it. good by. I will close for this time, and hope to hear from you any. God bless you and yours.

Very truly

Charlie J. Soon

Address

Charlie J. Soon,
Trinity College,
North Carolina.

4. Dec. 16th, 1881

Trinity College, N. C.

Dec. 16th, 1881

My Dear Dr. Allen:

I received your kind letter Dec. 3, 1881. which you wrote Oct. 24, 1881. I was very glad to hear from you. it gave me much happy to hear from you every time. I got the Chinese magazines also. well, Dear Dr. you had been so kind to me. I wishes I could do some things for you to pay for your kindness. I went to the North Carolina two weeks ago, and was Rev. M. A. Wilson, he living in Nashville Tennessee. by the way, I unstoods he attended to all missionaries far off land. I suppose you know him

well. I did wrote to Mr. Lee Ting in Texas, but I have not head from him yet. Dr., I had been requested you, the matter of my father, and trouble you so much. I knew you willing to do my requested, but now I do not know whither you can find him or not, because the distance so far. I thanks you Sir for your kindness. I don't think I shall write to him, because I do not know whither the letter could possible to get there or not. The address, which I gave you, that is all I know about the address, can not got any farer. Please give my kinds regards to all Christian friends out there. I hope some day in future that I may be able to come to China and hope I myself will be able to give the experience of Christianity. Can you got Chinese postages in China? I see the letters which you send to me had Japanese postages on. I will send you a likeness of my. do you have any Christian advocate in Shanghai? if you have any papers that is print in China, please let me know how much it cost per a year. I mean the English language's I will close this letter for presence. God bless you & your.

Very truly
C. J. Soon

5. Jan. 3rd, 1883

Vanderbilt University,
Nashville, Tenn., Jan. 3, 1883.

My Dear Dr. Allen:

When I received your last letter, I was at Trinity College, N. C. Dear Dr. I was very glad to hear from you, and also anxious to learn your great success in China. I hope to see the day, when I be able to meet you,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are before me. We all are proud of you, even the whole church. You have placed such a plan before the world that they may know Dr. Young J. Allen is a successful worker the world ever seen. Dr. my desire is to be a servant of God as long as I should live. I think I can be more happy if it could do according to my desire. I am sorry to tell you the Rev. Dr. B. Craven is dead, the cause of heart disease. We were sorry to see him departed from us, which we did not expected, but he knew his work was done. a few days before the death to been placed, he says to one of his friend that his labor was ended, and he was ready for rest. He who trust in the Lord, surely he shall receive his reward. I came to Vanderbilt last September, and I have found two young men who are preparing for China also. I suppose you know them, but if you do not, I will give their names, J. Stephens, Texas and K. A. Dukes, South Carolina who is a medical Doctor, and a theological also. The new year's day we had a entertainment in Wesley Hall, and Dr. Young was called upon to make a missionary speech. He said, "The last letter I got from Dr. Allen, he state that he want four men from our

church, therefore I will select these four brethren at once.” The following brethren were selected, J. Stephens, N. E. Townson, .K. A. Dukes and J. C. Davis. Dr. I would like to take an English newspaper from Shanghai. Please tell me the price of it, and please give me a full description of it, and how to send money for it and so fourth. I shall be very glad to hear from you at any time. Nothing can give me more pleasure than to hear from you. Dr. do you have any railroad in China? I heard some one say they have, and again the other say they have not, which is incorrect? I could not tell who is right and who is wrong. The only way for me to find it out is by asking you. Please tell me if you can do so.

Dr. when do you expect to return to United States again? Dr. I know you have only a little time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Please excuse me for asking you so many. I shall be glad to hear from you at any time. I wish you all a happy new year. God bless you and yours.

Goodbye.

Yours truly,
Charles Jones Soon

Address

C. J. Soon
Wesley Hall, Vanderbilt University
Nashville Tenn.

二、Charles Jones Soong's Letters Collected in Duke University

1. To Miss Mattie (Mar. 31th, 1882)

Trinity College, N. C.
March, 31, 1882

Dear Miss Mattie:

I received your letter few days ago, and was very anxious to hear from you, please excuse me for answer your letter any sooner. Mr. Buie. writes his letter to Miss Sneed. So our letter will send off at the some (same) time. I got a letter from Miss Annie, few days ago. & She said, every things were well, the weather has been very pleasant up here, the Commencement will be here in a short time. We have to study heaps. Mr. Buie, send his kindest (kindness) to you, and thank you for the favor, all the boys are well. We will have speaking some time next-month. Please give my regards to Miss. Liuse [?]. I would be glad to hear from you again. I will enclose this letter with Mr. Buie, good bye it is time to get ready for the Society.

V. R. C. J. Soon.

2. To Miss Annie (Apr. 24th, 1884)

Vanderbilt University,
Nashville, Tennessee,
April 24, 1884

Dear Miss Annie:

It is true that I haven't written to you for some time; but you must remember I have written you a letter before I receive this one. But, you say I ought to write whether received the reply or not. Well yes, but I have 24 hours of recitations every week, and the lessons are exceedingly hard, and long.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studies, 2,000 pages of parallel reading to do, during the session; and will have to stand an examination on them as well as text books. So you see I have a great deal of work to do during the year. I hope this will be a sufficient excuse to my most esteem friend; for my unpromptness.

Our final examination will begin on the 8th of May and close on the 22th.

I wish I have time enough to write you a long letter this very evening, but am not able.

You may look for a long letter from me about 24 or 25 of May.

Yes, I am getting very anxious to see you all, but, my coming to Durham this summer is depend on somebody else, and not myself. I wish I have means to pay my way.

I have to stand on all my examinations before long, so am not able to write to you again until the examination is over. Oh, by the way, I have written a piece of play which I intend to send to you, but don't think you will appreciate because not good thing is come out off "Nazareth", for the piece I have is my own originality. Good to know that you all were well. Please give my kindest regards to all.

Hope you will remember me in your prayer.

I do not know exactly what I will do in this summer. But I had a plan fixed, which I expecting to carry out. (if God wills it) and that plan is—missionary lecture.

We have all kinds of Gods in our reading room, and if I were to come to Durham next May, I will bring them with me; so you may have the pleasure of seeing them or make a new acquaintance with the lifeless Deities, and learn of their characters. Well I have (to) close this letter for the present it is the time for recitation again. Please let me hear from you again.

Yours truly,
Charles J. Soon

3. To Miss Annie (July 18th, 1885)

Plymouth, N. C.

July 18, 1885

It did not take me very long to find out the writer of the letter. The language of a person, is a part of that being; so I did not have any guessing to go through. As soon as I saw the handwriting, I at once recognized who the writer was. It took me three days to go from Durham to Washington, in which time I could have gone to New York, [sin] city and back. I have very pleasant time at Washington, although I know but a few girls as yet. They say there are seven girls to one boy. And some of them are very beautiful, I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Miss Bell. Don't you think that is too bad? For I have to leave my heart in Washington and I go to China?

There isn't any danger of my fall in love with one of Uncle R's-daughters; Miss Jennie is engaging to a young—fellow, he is only seven feet and 9 inches in height, and Miss Ross is too young, for she is only 15 and has gone to her sister's to spend summer. So you see there's no chance for me to fall in love, if I want to. I suppose you are in some where, where ever you may be I hope you are having nice time. Miss Annie, I must confess that I love you better and more than any girls at Durham. Don't you believe I do? I have exhibited my affection by writing to you—through letter. I am spending a few days with Rev. Mr. Ware, who was a schoolmate of mine Vanderbilt. He is a nice young man.

I came here last Wednesday—I shall leave Plymouth next Monday afternoon for Washington, and from thence I will go to Greenville to visit another school-mate of mine. And finally I shall proceed to Kenansville, in Duplin to visit Mrs. Farrior and will deliver a lecture and preach there. Please give my kindest regards to all.

Please let me hear from you again.

Yours ...

Charles

4. To Miss Annie (June 14th, 1886)

Soochow, China, June 14, 1886

My dearest friend:

Your kind and highly appreciated letter of April the 30th came last Saturday (12th) and I was exceedingly pleased and glad to hear from you. This is a second letter I received from you since my arrived in China. Please accept my grateful appreciation for both of them. It is a matter of delight to know those shoes and tea have reached their intended destination and were so highly prized by the receiver.

Yes, the tea was intended for my most excellent friend, Mr. James Southgate of

Durham.

I don't know why I made such awful blunder of his address, but as it was safely received, it is alright. I attributed my blunder to my non- infallibility and you are compelled to pardon me this time at least. Why don't and couldn't I make a mistake in reference to your address, I wonder?

Yes, I am walking once more on the land that gave me birth, but it is far being from a homelike place to me. I felt more homelike in American than I do in China.

No, I haven't been to see my parents at yet. Dr. Allen said I may go during the coming Chinese New Year (Jan. 1887) and not before then. I am very much displeased with this sort of authority; but I must bear it patiently. If I were to take a rash action the people at home might not fail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case, and they (my Durham friends especially) might think that I am an unloyal Methodist and a law breaker; so I have kept as silent as a mouse. But when the fullness of time has come, I will shake off all the assuming authority of the present Supt. in spite of all his protestation, assuming authority, and the detestation of native ministry. The great "mogul" (?) was the man that wanted to dismiss all the native ministers from preaching about a year ago. And he is the man that ignores my privilege and equality which I am entitled to. I don't like to work under him—I will apply for transmission to Japan.

If I go home at all, I want to go sometime in next spring.

For toward and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Chinese are very bad on the coast and on the island of Hainan.

Intelligence reached us last Saturday (12th) that the Board has decided to establish a mission operation in Japan. To which field the following gentlemen have appointed to work viz. Dr. J. W. Lambuth, Dr. W. R. Lambuth (son of J. W. L.) and Dr. Dukes. None of these missionaries could stand the "one man power" at Shanghai.

As I am not feeling well this afternoon, I will this letter before it is half done.

Will write you again and longer in some other time.

Love to all.

Yours ever truly
Charlie

5. To Mr. Southgate (Oct. 7, 1886)

Soochow, China
Oct. 7, 1886

My dear Mr. Southgate:

Your nice letter of Aug. 1st has been received a few days since. Glad to hear from you and please to get such an elegant letter but sorry to learn that your sore

foot and confinement. However, I trust that you are entirely well by this. Bishop Wilson arrived in Shanghai a week ago last Tuesday, and has gone to Peking on a speculating tour. The Bishop may get back to Shanghai toward the last of this month, but our annual meeting will not take place until the middle of November. The weather is quite pleasant in this part of the country now. This is a Thursday and 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our weekly prayer meeting. The Southern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are now have their annual meeting in this city. Dr W.H. Park of our mission has gone to Japan to get marry and will back to his duty on the 20th. By the way, I have succeeded in paying my folks a visit since I wrote you. All the members of my family are well. They were very glad to see me though none could recognized my person. I had a warm reception from them. At present there is a little war going on between the native of Hainan and imperial troops. I thought I could have a taste of gun powder while I on my way to Hainan but the war was too far away from my home to see any fun. The native Roman Catholic Christians in Ichang have given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to the local mandarin(o)ns and people; but alas, they only brought destruction upon themselves.

Please remember me kindly to all. I shall write to you a longer letter when I have more news to give.

Goodbye

Yours truly

Charlie Soon

P. S. I would like to get any news paper that you care to send.

6. To Mr. Southgate (Feb. 4th, 1887)

Kiensan, Feb. 4, 1887

My dear Mr. Southgate:

It is a matter of great sorrow to learn the death of Miss Annie; though on the contrary, do rejoice to know that she is happier in heaven than could possibly be on earth. And no doubt all things work for good to them that love God. May God comfort you all and sustain you with his tender love and grace; and finally when our work is done in this life we may all meet her on that happy shore where there is no parting.

Miss Annie wa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Her Christian example is worthy of attention. When left American I had no idea of such event would have occurred so soon, and that we are not permitted to meet again on this side of Jordan. O, this is sad to think of. The sweetest flower God has plucked off and took away from us; but that very identical flower is blooming in the garden of God in Heaven. Happy are thou who sleeps in the lord. And thrice happy art thou who being translated from earthly sorrow to heavenly joy. May God keep us from sin and weakness and Miss

Annie wa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Her Christian example is worthy of attention. When left American I had no idea of such event would have occurred so soon, and that we are not permitted to meet again on this side of Jordan. O, this is sad to think of. The sweetest flower God has plucked off and took away from us; but that very identical flower is blooming in the garden of God in Heaven. Happy are thou who sleeps in the lord. And thrice happy art thou who being translated from earthly sorrow to heavenly joy. May God keep us from sin and weakness and finally translate us to his home where we will meet all our friends and loved ones and to live with Christ forever.

I have begun to preach in this dialect though not as fluently as I would like to and will be after a while. The Chinese New Year has just passed, But the holiday is not yet over. The Chinese have no Sabbaths during the year, and when they do have it, they extend to two or three weeks. Our school (day) will be opened on the 16th of this moon or Feb. 8th. Last year we had 12 pupils but the coming session we expect to have twice as many.

Kuensan is a wall city of 4 miles in circumference. It has a population of 300,000 including the suburbs. At present, we have three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represented here besides the various sects of heathen religions. We, the Southern Methodist,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 French Catholic, the Buddhist, the Taoist, & the Mohamedan. The Northern Presbyterian used to be here, but as they had no house of their own and the landlord turned them out from the house they did stay in, so they were compelled to remove to another place.

Please pray for me and work. May God give us abundance of success in the coming year and that we may experience more deeply of his love to us-ward.

Give my love to all.

I shall be glad to hear from you at any time.

I beg to remain yours most gratefully,

Charlie.

C.J. Soon,
Cfo. Rev. C. F. Reid,
Shanghai,
China.

7. To T. V. Soong (May 3th, 1915)

Chinese Y. M. C. A.
Tokio, May 3rd, 1915

My dear Son,

I am very sorry to tell you that I cannot come to see you and Mayling as I

expected and decided to do. I have had frequent headache and eye trouble and recently by accident I discovered that my right eye is almost totally blind. I went to see a specialist on eye disease and after examined me for fully an hour he said I had kidney trouble (Bright's disease). I went to see a famous specialist in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io and he too told me that I have the kidney trouble. I again went to see an English doctor at St. Luke's hospital of Tokio and he also said I have chronic kidney trouble and he said I must take good care of myself or the disease may get the upper hand of me.

Please let Mayling see this for I shall not write another similar letter. One will do for you both. I shall remain here two weeks longer and then leave for Kobe where I expect to spend my summer at least.

If you would like to see me you may get a return ticket and come to Japan to spend the summer with me. If Mayling wishes to come along—But you must arrange with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at the port of either San Francisco or Seattle so that when you return to school at next the fall you will have no trouble landing on U.S. soil. I think you had better get your ticket to Kobe and back for it will not cost any more than to Yokohama and back. I think Mayling says during the Panama Exposition the passag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is cheaper than usual and I think you ought to bring Mayling with for I do not know whether I shall able to live long enough until she graduates. The nature of my sickness is not certain. It may carry me away very quickly and I wish to see you both before I die. I shall ask mother, Rosa, John and Joseph to come over to Japan to see you both.

My cable address is "Soong Kobe". So please cable me if you and Mayling are coming you signify:"Coming". But if you are coming alone then say:"Come", and I will understand. Rosa has been in Tokio over a month and Eling came after her and stayed with me for three weeks. I sent them both home today —They will sail for Shanghai on board French mail steamer "Vera" on the 6th and expect to be at home on the 10th. God bless you both. Don't forget the necessary papers from the American immigration officer to felicitate your re-landing on American soil when you return to school.

with love to you both—

I am
Your most
Affectionate father
C. J Soong

8. To T. V. Soong (Aug. 6th, 1915)

Chinese Club

24 Nanayamate Dinsan chome

Kobe, August 6th 1915

My dear son,

Your post card sent from Burlington came with Mayling's letter by the same mail. I am glad to know you both are in good health. Take good care of it. Without a good health an education is practically as worthless to the possession as well as to others. Therefore, always keep your eye on your health above all things.

Shanghai has experienced the greatest storm in her history recently. Mother says she never saw such a storm in Shanghai before. All the trees on the Bund were blown down. All the boats and sampans in the river were blown on shore. Our high galvanized iron screen was blown down and crushed on New's "feapo" tree and broke it. A coasting steamer named "Chintai" was overturned bottomup near Woosung with over 200 passengers on board and over 100 were drown on the spot. There were four girls who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merican college were on board and drown among the passengers. It is so sad to think about such tragedy. They had escaped danger of the ocean and yet were made victims of their native river without ever a glimpse of their parents.

Old Uncle Chang's daughter is about to be married to a man who is earning \$120 PER MONTH. Aunt New is the Match maker. Singdo is about to be married also to a man who earns something like \$200 or \$300 per month. Liu Keng is now a chief clerk of British &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in Tientsin. He gets \$195 per month and is negotiating for a wife. Kway Yung Giang is dead & his wife is a hates to his mother. Yung Giang was a dutiful son before his marriage but after marriage he was a veritable villain, and because he listened to his wife and treated his mother so badly while he was living after his death his wife treats his mother even worse. How ungrateful some people do turned out to be!

Wu Kaim Oh is in Japan. He brought his two daughters with him. One is 12 years old and the other 10. They are staying with their distant relative at Tarumi, a seashore resort. It is about 3/4 hour's ride by train from Kobe. This relative of there is Mr. Y. K. Row assistant comprador of Yokohama Spice Bank of Kobe. I was also know him. Kaimoh called at the club to see me and said Mr. Pow invited me to go down to spend a day with him so I went down with him the same afternoon. Kaimoh is going to Stami & Tokio on Saturday and will return to China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Kaimoh has the stomach trouble.

Yesterday I met Li Tsing Liang on the road with other Chinese students who were introduced to me as doctor so and so both of them. They are going to the U.S.A. to take a special course of study. I understand Li Tsing Meur is also in U.S.A. He went there last December.

Mother is going to Shangsi to see Eiling next month as E. is expected to be

confined then. I wrote Chingling a long letter & request her to accompany mother there & back but she speak to want to remain in Shanghai and asked me to go with mother. I would be willing to go if it is perfectly safe for me to do so. But if I go I still wish her to go along with me. I wrote to her again & said if it is perfectly safe for me to go I will but she must go with us to keep up company and be a comfort to us. And if she is willing to comply with my request then cable me & I will return by first steamer. So I am waiting for a reply from her.

I am improving in health thank god. But there is still allergen in my urine and my blood pressure is very high yet.

Perhaps, this is the last letter I write to you from Kobe and if I get the reply next week I write to you from Kobe. Congratulate you upon the highest honour conferred on you by the student in America.

With love to you both,

Yr. loving father
C. J. Soong

三、The Letters from Charles Jones Soong to Sun Yat-sen Select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Kayano and Sun Yat-sen

1. July 13th, 1915

Chinese Club, Kobe
July, 13th, 1915

My Dear Doctor:

Your kind favor dated July 9th duly received with thanks. I wrote to Affo of my going to San Francisco and sorry I had to disappoint him. It was very kind of him to go to the steamer to meet me. Truly he has inherited the kindness of his father.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friend of yours must have met with an accident on the Eastern battlefield where Russians and Germans have been exhibiting the art of war. He like the most of his race was eager to get as (they would say) near the ticklish port-battle line-as possible in order to see for himself how well the Deutsche and Ruski could fight and in the meantime a blind bullet must have hit the wrong man by mistake. Anyhow I hope he will get turn up and come to see you.

Wei passed through here some days ago and I had supper with him a mutual friend named Pao who was born of Japanese mother in Kobe.

I shall not be able to go to America before this winter as my state of health will not allow me to have a long sea voyage. I still have headache in these few days. There is some albamen in urine yet and my blood pressure is very high. My physician is giving me some medicine to bring it down.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you have received an answer from America in regard to the arrangement for entering U.S.A. I may go with your men if possible and greatly oblige: Wei has told me that Ma Su has cabled to Daily News of Shanghai advising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to unite their effort to support Yuan's Government. Is a screw in his head has become loosed or has he been converted by Yuan's almighty dollar? And gone back on his benevolent friend!

With best wishes
Your old friend
C.J. Soong

2. July 15th, 1915

Chinese Club, Kobe
July, 15th, 1915

My Dear Doctor,

Your kind favor of 11th inst. Conveying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r friend will leave will leave Petrograd for Washington on the 20th received with thanks. I shall like to leave for U.S.A. on or about first of Dec. I don't think Rosamonde will go to America for she must keep her mother company and help her at home. But it is many months between now and December and arrangement may be altered.

It is rather hot for the last few days. I hope you are enjoying good health

I remain
Your old friend
C. J. Soong

【编者注】住所Chinese Club, Kobe

3. Aug. 3rd, 1915

Chinese Club,
24 Nakayamate Dori Sanchome, Kobe,
Aug, 3rd, 1915

My Dear Doctor:

Your dated 20th July just received. Had I not been away from Kobe for a couple of days, I would have your letter sooner, I spent two days at Tarumi next station to Maiko.

I am greatly surprised to learn what you said about Rosamonde's promise and expected marriage you never told me. Before that she told you she would get married as soon as she gets to Shanghai and she would return to Tokyo with her husband to take up certain work.

Neither has she said a word to me about her plan of her future. Some time ago

you wrote and asked me whether Rosa was to go to America with me or not and I immediately wrote you a reply informing you exactly what I actually knew that she was to remain at home to keep her mother company. Now you tell me something quite new and strange to believe. I am inclined to think it is a joke rather than anything else. It sounds so strange: it is so ridiculous, it is a baby talk of her for than anything I can imagine.

My Dear Doctor, do not believe such novel talk of a young girl who likes to make fun of herself.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all have such high esteem of you that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to hurt you or your cause. "The Archtraitor" is an eternal enemy to us all and Rosa hates him as much you yourself do, so there is no earthly danger of her marrying such a bad man. Moreover, we are a Christian family and no daughter of ours will become anybody's concubine, be he a king, an emperor or a president of the greatest on earth. We may be poor in "worldly goods", but we are not covetous nor ambitious and low enough to do anything against Christian principal. Therefore, she is not going to be an empress as you seemed to fear, Let me repeat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this whole earth could induce us to do anything in any way to harm you or the cause which is so dear or near to your unselfish heart. I shall see that nothing of the kind happen. You may depend on me that I will fulfill my promise on this score. I am a straight forward man like yourself. Do not wish to practice deception on my friend. The idea of casting herself at the feet of our common enemy is unthinkable to me, and she detests even to talk with concubine much less she cares to be one. You know she never even spoke at Chang Tsing Kiang's "No. 2" during stay at Atami, Besides, we will never allow our girls to marry a man we do not care who is that has a wife, A good name is better than all glory and honour of this world to us.

You said you asked me when Rosamonde was going to get married and that I had not answered you that if silence means consent then you would congratulate me & C. It [is] true as I am living I know nothing Rosamonde's marriage nor to whom. Both Yung and Dan Chung called on her frequently, but as far as I know she has not signified to whom she is willing to marry. Heard nothing about what you told me by your last letter. I never got your letter which you referred to. It has never made its appearance. It must have been lost on the way. So how do I know the contents of it? And if I do not know how could I be otherwise than silence? So silence does not mean "Consent", and you may keep your congratulations a little longer.

My Dear Doctor, you will kindly remember that we are your true friends if worse comes to the worse. I know no man among the Chinese who is more noble, more kind and patriotic than yourself if I do say so. And how a sensible with a good conscience goes against you? We far rather see Chingling dead and buried than to see her married to our archtraitor as a concubine or even a wife. You may rest assure that we will move heaven and earth to prevent anything of that kind.

Although there are those who do not appreciate your great efforts to aiming for the making a great China, but we are among them that do appreciate your work. You are living a century before your time hence a very few can understand you and appreciate the undertaking which is so dear and near to your heart. China is not worthy of such a son as you are. But the future will do you justice and call you blessed and will honour you as they honoured the former reformer Confucius. He too, had been driven away from the land which you loved so much.

It was a only few days ago when I was in Li Kwoh An's office. (I think you know him) among other things there was not a single benefit done by the revolutionists for the country more people. Not one revolutionist is good, sincere, unselfish or patriotic. I told him there are. But he said "Can you mention me." I said "Dr. Sun". Then his face turned red and for a few minutes he was dumb. Then said he why did not he stay in China or go back? I said "he is too noble a gentleman to keep company with thieves and cutthroats". Since they (those in power) would not listen to him, he did as Confucius had done when those in power would not listen to him. In fact, nothing could arouse my blood and make me as angry as when anyone who tries to run you down or says anything against you. I gave Li Kwoh An such a lecture that I am sure he will never like to see me again in his office. Since then we met in the Club but we do not speak to each other now.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but now he is my enemy because I took up for you and defended you. I don't care who he or she is, if he or the runs you down in my presence, I will do you Justice. As a friend, I feel it is my duty to defend your innocence and uphold the cause, let come what may, I told Li "that if it was not for Dr. Sun's good work, you will still have that disgraceful tail hangs from the top of your head today and that is one of the benefits you enjoy today." He tried to make me believe that queue (tail) was to be cut off anyway. I said "Yes, there were tons of talks about it but that was all for no one dares to set an example by cutting his own off. To talk is cheap and one thing but to do is dear and another things." I got him so he could not argued with reason but he presented a shameful face.

Your request has been carried out—Both of the letters, yours and Yung's consigned to fire.

I do not wish to cable for Rosa as I had already written to her to accompany her mother to Shansi next month as Eiling is expected to be in confinement then. She does not like to go North because she is afraid of mosquitoes there, but she will have to go and come with mother. My health is improving I think but there is still albumen in urine and I am feeling weak physically. Hope you and yours are in good health. The members of my family have been sick this summer,

Your old friend
C. J. Soong

4. Aug. 13th, 1915

Kobe

Aug.13th,1915

My Dear Doctor:

Yours received. Just in receipt of a letter from Rosamonde saying that she is unable to go with her mother to her sister as she has to teach in Shanghai and she and her mother both are asking me to Mrs. Soong to Shansi which I can not comply with for divers reasons, one of which is that my health is growing worse in the last few days. But if I were well I would not go. I can hardly walk. In fact, I am getting so weak that I may not be able to recover at all after all. I am leaving for Shanghai by the French Mail on Sunday from there when I have rested. As Mrs. Soong must to go to Shansi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ustoms then I shall have to try my best to get some one else to go with her. I may come back to Japan again and if I do I shall go up to see you. In the meanwhile I beg to say goodbye. May God bless you and give you good health and success in all your undertakings.

Yours truly,

C. J. Soong

P.S. Please do not send any letter until you hear from me again.

《申报》孙中山奉安史料汇编(中)^[1]

任冉冉 编

孙科抵平迎榑

北平通信 铁道部长孙科,于十二日下午,由浦口搭乘专车北上,今晨(十四日)六时三十分抵津,在津站停留约二十分钟,即开始来平,上午九时二十分抵前门东站,兹记详情如次。

▲ 欢迎情形 北平交通界,如平汉平绥北宁三路员工工友,事前均有欢迎准备,平汉路同人会更在该局门首及前门外搭彩排坊三座,上缀“欢迎铁道部孙部长”字样,全市各处并贴迎孙标语,三路员工预推平汉路局职员梁守一任总指挥,于今晨九时许各执欢迎旗帜,赴站迎迓。交通大学学生亦整队往迎。车站上悬党国旗,并有平汉平绥北宁三路路警各一队警卫,公安局亦派保安警察及乐队各一队站在站欢迎。迎榑专员吴铁城、郑洪年二氏均亲往迎接。政军界到站欢迎者,则有商震代表沈庸、警备司令张荫梧等。孙氏专车共九辆,孙乘十号头等卧车,于九时二十分专车进站,乐声大作,车停后欢迎人员即头□登车,孙在车中略道寒暄,旋即下车出站,与眷属随员等分乘汽车,赴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孙氏及其夫人所乘者为二三六号营业车。

▲ 孙氏谈话 孙氏专车到站时,有新闻记者多人在站欢迎。孙赴北京饭店后,各记者亦随往,孙氏当即接见,并就各记者所问,发表谈话要点如下:① 李济深仍在汤山,但甚安适;② 孙夫人于四月底由德启程归国,计程现在当在西伯利亚途中,大约本月二十日左右可以到平;③ 蒋主席约一星期后来平;④ 汪精卫仍在海外,外传已到香港说不确;⑤ 美国对华投资事,尚在计划商洽中;⑥ 北宁路机车车辆,关外陆续放还者不少,但均须修理后始能应用;⑦ 平汉通车停驶,系因某方面扣留机车二十余架,车皮二百余辆,致路局车辆不敷分配之故;⑧ 平绥路

[1] 《申报》孙中山奉安史料汇编在第一辑刊出(上),原计划在第二辑刊完,因受篇幅限制,本辑刊出(中),至第三辑刊完。

须切实整理,但非一千几百万不办;⑨中美航空合同签订后,并未修改,航空界下级同志对于此事,不明真相,故通电主张取消,实则吸收外资,开发实业,为本党已定之政策,亦为总理建设方针之一种,现在中国政治军事均有办法,惟经济的建设,则非利用外国资本与人才,不易收效,航空合同之签订,亦不过利用外国资本与人才,发展中国航空事业而已。

▲ 同来人员 与孙同来者,为铁道部秘书梁寒操、胡天浚、陈君仆三人,技工谭书奎及戴恩赛夫妇,孙之岳父母、夫人、公子二、女公子一、侄儿孙满暨容海襟及西人克爱等一行住北京饭店。

▲ 午间谒灵 孙在北京饭店略事休憩,旋即偕同眷属暨其岳父母暨妹婿戴恩赛夫妇等,分乘汽车赴西山碧云寺谒灵。平汉路局长刘维炽亦偕往。十一时三十分抵碧云寺,即至灵前瞻谒。行礼毕,在护灵处午餐。至二时余又偕同至玉泉山颐和园等处游览,护灵处主任马湘伴行。游颐和园毕,即行返城。又碧云寺护灵处现正筹备移灵各事,塔院门前院殿内为灵堂,正布置中。殿前已搭有牌楼木架,院之四周,亦搭有木架,预备移灵时悬挂帐幔之用。山门前及弥勒殿前,并均已扎有牌楼木架,至寺门前大道,则正用黄土铺修中。(十四日)

(《申报》1929年5月20日)

宋庆龄再赴碧云寺

北平 宋庆龄昨由香山夜深回平,住鲍贵卿宅。

北平 宋庆龄今日再赴碧云寺。(十九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0日)

总理奉安宣传列车莅蚌记

迎榘宣传列车于本月之十日由浦开行,十一日下午四时抵蚌,各界举行大规模之宣传大会。到民众三万余人,为从来所未有。如斯盛会,乌可无记。

▲ 两台竞坍塌 是日场中共搭高台六座、牌坊一座,主席台与电影台相对,两旁为指挥及演讲台。开会后人极拥挤致将指挥台推到,晚间人数愈众又将演讲台挤倒,并压伤数名,尚无大碍。

▲ 燕语惊啼会场增佳色 是日会场秩序颇行整肃,事先划分各团体席次,井然不紊。予担任大会纠察,但见红男绿女,济济跼跼。女宾席花界到者,亦复不

少，莺啼燕语，月貌花容，益足为大会生色。蚌地娼妓，前曾禁过一次，惟刻下则又蠢蠢而动矣。

▲ 刀枪拳术男儿显英才 游艺会中有武术一项，演时刀光闪闪、杀气腾腾。各尽其长，目为之眩，谁谓中华为病夫之国哉□！

▲ 晚间之游艺 晚八时，中央宣传员抵蚌，表演魔术、新剧。魔术为军官学校教员某君，手腕灵活，观者啧啧称善。另有著名新剧家陈大悲导演“共同奋斗”一剧，至台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时，台下亦群声附和，声达九霄，民气之激昂，可见一斑。是晚本定有北伐电影，以时间匆促，未及开映，未免美中不足。

▲ 迎榉列车之布置 宣传列车除车头外，共计十二节，均系玻璃窗格之机车。车头前绘白底蓝色总理遗像下面交叉党国旗，车身均饰蓝色，上书各种标语。前三节系宣传队；中节为总理纪念堂，陈列关于总理之各种纪念品，布置颇形整肃；次为摄影队，预备各站宣传时摄制影片之用；第五节为中央党部宣传队；后为军乐队；最后则为游艺队。每节车上，均置一留声机，时时放出悠扬之歌声，颇为动听。

▲ 宣传员之谈话 迎榉员某君谓此次宣传列车，经过各大站均有重重之表演，蚌埠亦为预订大站之一，今观蚌市民众均有革命色彩，诚堪欣幸，列车准于十二日上午离蚌北上云。

（《申报》1929年5月20日）

津浦铁路在总理奉安列车开行日期

所有例行上下行客车次数及日期时刻临时变更增减通告

为通告事遵照总理奉安委员会交通组计划第十八条（沪杭津浦各地前来参与总理奉安典礼人员，除乘寻常各列车外，与奉安典礼前后各二日由各该路酌开专车，并先登报声明，但各人均须购票自购饭食，路局均不招待），本路兹因车辆缺乏不敷分配，除每日开行津浦间之一、二次特别快车外，特将临时改期及加开平津浦通车开到日期订定于后：改期平津浦通车（一）五月廿七日星期一由北平例开之平津浦通车改迟一日，于五月二十八日由北平开行，五月卅日到浦口搭客概须一律购票；（二）五月卅日星期四由北平例开之平津浦通车提早一日，于五月二十九日由北平开行，五月卅一日到浦口搭客概须一律购票；（三）五月卅日星期四由浦口例开之平津浦通车改迟一日，于五月卅一日由浦口开行，六月二日到北

平搭客概须一律购票。加开平津浦通车：（一）六月二日星期日加开平津浦通车一列，于下午六时由浦口开行，六月四日到北平搭客概须一律购票；（二）六月三日星期一加开平津浦通车一列，于下午六时由浦口开行六月五日到北平搭客概须一律购票；（三）六月四日星期二加开平津浦通车一列，于下午六时由浦口开行，六月六日到北平搭客概须一律购票，改期一、二次车；（四）五月廿六日由天津下午五点卅分开行之本路一次特别快改于下午十二点；（五）五月廿八日由浦口十时开行之二次本路特别快改于下午二点钟开。

津浦铁路管理局启

3202戊A

（《申报》1929年5月21日）

平各界代表昨赴碧云寺致祭

宋庆龄检视铜棺

北平 今日平各界代表八时赴碧云寺，到二百人，龙云主祭如仪。

北平 宋庆龄在香山检视铜棺，因二十三日为民众团体致祭之第一日，须于事前移遗体于铜棺，德医史蒂芬亦赴香山相度殓盖方法。

北平 宋庆龄定二十五夜在碧云寺家奠。（二十日）

北平 孙科患呕吐经医诊谓伤食，不要紧。（二十日）

北平 孙科在北京饭店征恙不出门，宋庆龄昨歇碧云时下香云旅馆。（二十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1日）

津市奉安宣传大会

天津 二十上午十时、各界在蔡家花园开欢迎宣传大会，到党军政农工商学妇女兵百十余团体，共约五万余人，周仁□主席、宣传主任张廷休报告沿途工作情形，傅作义演说，十二时摄影片散会。下午四时，宣传员在市党部招待新闻记者，到三十余人，张廷休致辞，末由朱晓芙致答辞，六时散会。晚七时在蔡家花园开游艺会，到万余人。定二十一早十时列车赴平，二十二日开宾传大会，二十三日谒灵、休息，二十六早南旋，二十八日抵京。（二十日专电）

北平 各界定二十二在公园开迎榱宣传大会，二十五在天安门开送榱纪念

大会，并立奉安纪念碑。（二十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1日）

迎榑宣传列车由济北开

济南通信 今日为宣传列车到济之第二日，早九点起，仍在津浦站前开会，各界民众到约四五万人。据宣传委员谓，自出发以来，沿路以济南宣传会规模为最大。开会后，一方排演新剧，一方分队出发，游行城关内外商埠一带演讲，济南民众此为第一次得公开接受主义，故到处听者如堵。十一点，宣传列车预备出发，特在车上用广播音机演讲总理与党的历史，民众得随意到车前听讲。最后宣传列车主任张廷体用广播音机演讲，略谓自昨日到济以来，蒙各位同胞同志到此热烈参典大会，足证济南民众之信仰三民主义，则三民主义实现之期必不在远；今为时间所限，将开车北上，此能将济南各位同胞同志信仰主义之热诚，带到北平总理灵前，以谓总理在天之灵，过几日总理灵车过济时，尚望各位到此恭祭云云。时已午后零时二十分，宣传列车遂在党歌悠扬声中，徐徐北开，到会各界民众亦各整队北去，精神奋发，毫无倦容。

（《申报》1929年5月21日）

蒋主席派蒋锄欧北上迎榑

南京 蒋主席因时局关系，赴平已中止，派蒋锄欧代表国府北上迎榑，定二十二日率随员二十余人启程。（二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2日）

奉安日正午京市民静默三分钟

京市政府之通告

南京 市府通告关于奉安大典市民应注意事项，由五月二十六日起，至六月一日止，室内商店住户均下半旗，或在旗顶缠挂黑纱，各戏院各娱乐场，停止营业，市民一律停止喜庆及宴会。奉安日正午十二时，市内一切交通停止三分钟，市民一律停止工作，静默三分钟，路上行人，均驻足肃立，静默三分钟，全市电灯，一律放亮，市民见电灯放亮时，即须准备，至熄灭时停止工作，驻足默念，至电灯再放亮时为止。迎榑日迎回大道，下关至中央党部一带，自灵车到达浦口时起，至行列

经过后止。奉安日迎榱大道，由中央党部至灵嘉一带，自上午午时起，至行列经过时止，暂行断绝车马交通。（二十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2日）

平迎榱处定期演杠

北平 迎榱处定二十五日演杠。与日升杠房王子如商妥，用三十二名共八班，由碧云寺灵堂起，至颐和园东宫门试演三十二名，夹杠，由林森郑洪年亲自压杠。在演杠时，非特准不许拍照。（二十日专电）

北平 明日午前十时，总理遗体殓入铜棺，美医史蒂芬今将应用器具染料，先运赴碧云寺。（二十日专电）

北平 明日迎榱宣传大会在公园举行程序十一条，今宣布全市市民周知。（二十日专电）

北平 顷孙科、宋庆龄赴碧云寺，主持殓入铜棺事务。（二十一日专电）

北平 东北交通委员会电迎榱处云，游艺园专车已散挂各地，抽调配拨较费手续，现勉强凑一列，即日开平云。（二十一日专电）

北平 京葬事处贺电迎榱处云：据杠房王经理云，北平棺罩，恐不合南京杠具之用，请与孟经理接洽，速复；今迎榱处询孟某，孟谓必如何始合南京杠具之用，请详电解复并示□子俾得赶办。（二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2日）

护灵警备分段负责

北平 蒋贺电商震，护灵筹备，北平德州间，归商负责；德韩间归陈调元；韩庄浦口间，方振武未返皖前由毛炳文负责，待方返皖由方负责；平浦铁甲车，均归商陈指挥。今商震复蒋电，贺电祇遵，除电洽济南陈主席外，先电复。（二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2日）

奉安委员会设代表报到处

南京 奉安委员会二十一日已在花牌楼大华饭店，设代表报到处。（二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2日）

犬养毅启程来华

南京 驻日公使汪荣宝二十日电外部报告犬养毅二十晚离东京,二十一日乘长崎丸赴沪。(二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2日)

宋庆龄述来平行程

北平 宋庆龄云: 此来运榑奉安, 对各方欠缺周旋, 甚歉! 予六号离柏林, 购辽宁通票, 每人七百八十元, 沿途仅在莫斯科留一天。苏联最高级人员, 月入不得过五十卢布, 生活极乾枯。十七日到辽, 经张夫人于凤至亲迓陪游北灵, 当夕入关来平。今日李品仙见宋, 宋谓在柏林见君反对白崇禧电, □见乃心主义可佩云。(廿一日)

(《申报》1929年5月22日)

迎榑宣传列车抵平

北平 迎榑宣传列车今日酉刻于欢迎中抵平。(二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2日)

各方派定奉安代表

北平 卫戍部派华世中、张济元、王大命、李芳玉、朱鹤翔为奉安代表。
(二十一日专电)

北平 市党部派定奉安代表, 马维禹、龙云、汪道余、张静山、杨燕□等五人。
(二十一日专电)

青岛 胶路委员会派彭东□代表赴平, 参与迎榑典礼, 彭于二十日晨赴济北上, (二十一日专电)

厦门 省府奉安代表许卓然马自泉抵厦, 定二十二赴港转邮船赴沪,
(二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2日)

总理奉安两路宣传列车筹委会第二次会议

总理奉安沪宁沪杭两路列车筹备委员会于十九日下午二时, 在上海特别市

党部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者江苏省党部代表许闻天等,浙江省党部徐文台等,南京特别市向世南等,上海特别市陶百川等,两路特别党部闵罗炳,主席陶百川,开会如仪,议决案件如下:①南京特别市党部、江苏省党部均因向中央接洽奉安宣传事项,各刻有铃记,请择一为本会铃记案,决议采用江苏省党部刻之长方铃记,并向中央备案;②车辆问题案,决议推闵罗炳再向车站接洽;③沿途宣传程序案,决议宣传列车在二十五日起程,至三十日抵首都,二十五日在杭州,二十六日上午在硖石,下午在嘉兴,二十七日上午在松江,下午在上海南站,二十八日上午在上海北站,下午在昆山,二十九日上午在苏州,下午在无锡,三十日上午在常州,下午在镇江,三十日夜至南京;④宣传列车所过各地,沿途联市党部,应如何筹备民众大会以便本会广大宣传案,决议由本会拟具统一办法,推江苏浙江南京三代表起草,请苏浙两省部采用;⑤各地党部代表寄宿地点案,决议由上海市党部暂借学厅案;⑥编印宣传品案,决议由浙江省各党部负责筹备;⑦统一服装及制定工作人员证章案,决议交总务科办理(服装用藏青色,证章式样,由总务科规定);⑧办公日期案,决议定五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开始办公(地点在北火车站头等客车休息室);⑨各代表车费及旅费,应否由筹备委员会公费内开支案,决议在筹备委员会公费内开支;⑩用本会名义,再请求中央拨款五百案,决议通过;宣传列车应否调派武装同志十人以资保护案,决议函第五师调派。因讨论事项过多,直至七时散会云。

(《申报》1929年5月22日)

无线电管理处之奉安代表

▲李心庄、徐恩会二人

本埠建委会无线电报管理处,昨开处务会议,以总理奉安为期已近,应举代表赴宁参加典礼。当经举出李心庄、徐恩会二人,并预备礼物随带赴宁。

(《申报》1929年5月22日)

日政府赠奉安纪念树

奉安典礼中,日本政府奉赠纪念树植于紫金山总理陵基,计桧、高野植,及樱花各十本,田中首相亦特赠水松一本,均由芳泽带来华云。

(《申报》1929年5月22日)

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通告

为通告事查奉安礼节迎榇秩序公祭秩序奉安秩序业经本会委员会议议决通过案除分函外特此通告。

总理奉安礼节（第十二次委员会议则过）

（甲）奉安礼节通告

（一）国民政府将迎榇奉安日期暨奉安典礼，明令布告全国暨驻外各使领馆、海外各侨胞，并由外交部通告各国。

（二）全国下半旗七日志哀。（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

（三）全国停止宴会娱乐七日。（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

（四）凡党员公务员一律左臂绣黑纱七日军警刀柄并绣黑纱。（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

（五）奉安日（六月一日）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团体一律举行公祭典礼。（礼节单另附）

（六）奉安时（六月一日正午）鸣礼炮一百零一响。

（七）奉安时（六月一日正午十二时）全国民众一律停止工作三分钟静默志哀。

（八）奉安时（六月一日正午十二时）全国交通一律停止三分钟。

（九）参加典礼人员均服礼服或制服用领口手套者一律黑色。

（十）各地方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依照本会规定名额各派代表先期莅京敬谨参预典礼。

（十一）灵榇经过地方，所有党员、公务员、军警、民众于灵榇经过时应一律肃立敬礼。

（乙）奉移礼节。（由北平碧云寺至浦口）

（一）灵榇奉移前 总理家属、迎榇专员、当地最高党政军警机关人员恭诣灵前敬谨行礼。（奏哀乐鸣礼炮一百零一响）

（二）总理家属、迎榇专员恭移灵榇启行（奏哀乐），加入行列执绋。

（三）灵榇至正阳门车站、总理家属迎榇专员恭扶灵榇上车，所有恭送人员敬谨行礼。（奏哀乐鸣礼炮一百零一响）

（四）灵榇由北平西山奉移至浦口，所有经过地方，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

代表一律敬谨致祭恭送。

(丙) 迎榱礼节(由浦口至中央党部)

(一) 中央委员会、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总理亲故,预先到浦口车站恭迎。各地方党政军警机关及民众团体代表,均在下关指定地点恭迎。(由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

(二) 灵车抵站时恭迎人员一律肃立敬谨行礼。(礼节单如左)

迎榱礼节单:(一)肃立;(二)奏哀乐;(三)向灵榱行三鞠躬礼;(四)默哀三分钟;(五)奏哀乐;(六)奉移。

(三) 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会、国府委员、各特任官、迎榱专员、总理亲故恭扶灵榱降车升舰。(奏哀乐由军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

(四) 灵榱抵下关码头,恭迎人员恭扶灵榱登陆升口,加入行列执绋。在下关恭迎人员一律肃立,敬谨行礼后加入行列。(奏哀乐)

(五) 灵车至中央党部,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会、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总理亲故恭扶灵榱暂安礼堂,敬谨行礼。(礼节单如左)

停灵礼节单(中央党部礼堂内):(一)就位;(二)肃立;(三)奏哀乐;(四)向灵榱行三鞠躬礼;(五)默哀三分钟;(六)献花;(七)奏哀乐;(八)行三鞠躬礼——礼成。

(六) 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会、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敬谨分班守灵。

(丁) 公祭礼节(在中央党部)

(一) 五月二十九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中央党部举行公祭三日。

(二) 公祭礼节:(一)就位;(二)肃立;(三)奏哀乐;(四)行三鞠躬礼;(五)默哀三分钟;(六)献花;(七)读祭文;(八)奏哀乐;(九)行三鞠躬礼——礼成。

(戊) 奉安礼节(由中央党部进陵墓)

(一) 灵榱奉移前,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会、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总理亲故、各国专使恭诣灵前敬谨行礼(鸣礼炮一百零一响)。礼节单如左:

移灵礼节(在中央党部内):(一)就位;(二)肃立;(三)奏哀乐;(四)向灵榱前行三鞠躬礼;(五)默哀三分钟;(六)读谕文;(七)奏哀乐;(八)行三鞠躬礼奉移。

(二) 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会、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总理亲故、各国专使,奉

移灵槨上灵车启行,(奏哀乐)加入行列执绋。

(三) 灵槨抵陵门时,各行列按指定地点肃立,执绋人员恭候灵槨降车换杠,□石级执绋人员分左右两行(各行二人平行)前导先行。

(四) 灵槨至祭堂前平台,执绋人员恭扶灵槨换车敬谨行礼。

(五) 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民政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专使领袖恭扶灵槨进墓门,(奏哀乐)全体肃立敬谨奉安。(鸣礼炮一百零一响)

(六) 奉安举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专使领袖出就原位,在祭堂参加典礼人员依次进墓门敬谨瞻仰后退出就原位肃立行礼(礼节单如左):

奉安礼节(祭堂内): (一) 就位; (二) 肃立; (三) 奏哀乐; (四) 行三鞠躬礼; (五) 献花; (六) 读谕文; (七) 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专使领袖恭移灵槨进墓门; (八) 奏哀乐; (九) 全体肃立默哀敬谨奉安 灵槨人员退出墓门各就原位肃立; (十一) 参加典礼人员依次进墓门瞻仰各就原位; (十二) 肃立; (十三) 行三鞠躬礼 (奉安举); (十四) 奏哀乐; (十五) 礼成。

奉安礼节(祭堂外): (一) 肃立; (二) 奏哀乐; (三) 向陵墓行三鞠躬礼; (四) 全体肃立默哀敬谨奉安(正午十二时); (五) 行三鞠躬礼(奉安举); (六) 奏哀乐; (七) 礼成。

(七) 礼成各依次退出祭堂

(巳) 沿途致祭礼节(由北平至浦口)

(一) 总理灵车由北平南下,所经过须停之各大车站,各该地党政军警机关及各民众团体于灵车到达前集合恭候致祭。

(二) 灵车抵站,军警均鸣号三番,有军乐队者奏哀乐,有炮者鸣礼炮廿一响,军警举枪致敬,军官行举手注目礼(佩刀者撤刀),余均一律脱帽肃立,灵车停后举行祭礼。(礼节单如左)

(一) 全体肃立; (二) 奏乐; (三) 献花圈; (四) 读祭文; (五) 行三鞠躬礼; (六) 礼成。

(三) 灵车启行时,军警鸣号行举枪礼(佩刀者撤刀),余均一律脱帽肃立,候灵车出站后各依次退。灵车经过不停之小站,由各该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民众团体集合俟。

(四) 灵车经过时致祭(礼节单如左): (一) 全体肃立; (二) 奏哀乐; (三) 行

三鞠躬礼；（四）礼成。俟灵车经过后依次退。

（五）沿途致祭位次图〔略——编者〕

（庚）专使外宾致祭礼节

一、专使及外宾齐集时，由外交部所派干事按照所定次序或分过或合团，引导入灵堂。各专使及外宾入堂门向总理灵一鞠躬，至堂中再鞠躬，至灵前三鞠躬，肃立，献花圈，既毕；各专使由外交部所派干事领导向灵前一鞠躬，步步后退至堂中，再鞠躬，退至礼堂门口，三鞠躬礼成。（奏乐）

二、各国专使及外宾送殡执绋致祭均着其本国大制服。

迎榱秩序（由浦口至中央党部）（第十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

（一）时间

（1）总理灵榱谨定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到达浦口车站；

（2）总理灵榱于同日上午十时由军舰恭迎过江；

（3）总理灵榱于同日上午十时到达上关码头；

（4）总理灵榱于同日下午时到达中央党部敬谨奉停于中央党部大礼堂。

（二）警戒

（1）浦口车站至码头一带，由首都卫戍司令部派遣卫戍部队二连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时以前到达浦口车站，担任车站内外及码头一带警戒任务。另派卫戍部队一连附军乐队全部同时到达在车站月台内迎接灵车。由首都公安局同时派得力警察协同卫戍部队，在浦口车站内外及码头一带警戒。

（2）下关至中央党部一带，由卫戍司令部及公安局的得力军警担任。由码头至中央党部一带地段警戒任务，须于灵榱到达下关码头一小时前布置完毕。由卫戍司令部派步兵一营附军乐队全部于灵榱到达下关码头一小时前，在码头指定地点恭迎灵榱。

（三）礼炮

（1）总理灵车到达浦口车站一小时以前起（时间由奉安委员会另行通知）由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

（2）总理灵榱上军舰时由军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由海军署指定一军舰鸣礼炮）。

（四）迎榱人员之集合

（1）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于总理灵车到达浦口车站前二小时到

达浦口车站恭迎灵车。

(2) 中央党部职员,南京特别市党部及所属各级党部执监委员会京内各机关历任以上职员,各省市党部代表,海外各总支部各直属支部代表,各特别党部代表,各省市政府、各编遣区、各师旅、各舰队航空队、各学校、各民众团体代表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于下关码头中山路两旁指定地点集合恭迎。

(五) 迎榇行列

(1) 行列之次序如下

第一行列: 一, 骑兵官长一员(乘黑马执旗开道); 二, 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 三, 骑兵二名(乘黑马背枪各执党国旗国旗在左党旗在右); 四, 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 五, 军乐队; 六, 骑兵(执长矛)。

第二行列: 一, 军乐队; 二, 步兵(枪口朝下)。

第三行列: 一, 海军军乐队; 二, 海军陆战队(枪口朝下); 三, 海军官长士兵(枪口朝下);

第四行列: 一, 警察乐队; 二, 警察官长士兵。

第五行列: 一, 军乐队; 二, 农民代表; 三, 工人代表; 四, 商民代表; 五, 学校代表; 六, 学生团体代表; 七, 妇女团体代表。

第六行列: 一, 军乐队; 二, 海外华侨代表; 三, 各编遣区各师旅各舰队航空队代表; 四, 各省市政府代表; 五, 京内机关职员; 六, 各省市党部及特别党部代表; 七, 南京特别市党部及所属各级党部全体执监委员; 八, 中央党部职员。

第七行列: 一, 军乐队; 二, 国府委员及各特任官吏; 三, 中央执监委员; 四, 总理亲故; 五, 总理家族; 六, 灵车; 七, 步兵一连。

第八行列: 一, 骑兵一队殿后(执长矛)。

(2) 奉迎 总理灵榇至中央党部之行列除总理亲故、总理家族、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吏恭迎灵榇至中央党部大礼堂外, 其他行列向高楼门马路方面解散。

公祭秩序(在中央党部)(第十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

(一) 时间

(1) 总理灵榇在中央党部举行公祭三天: (一) 五月二十九日为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党政军警代表公祭之日(时间自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 (二) 五

月三十日为各民众团体公祭之日(时间自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三)五月三十一日为各国专使与其他外宾公祭及总理亲故、总理家属祭奠之日,其时间如左:总理亲故、总理家属祭奠时间下午二时,专使及外宾公祭时间上午九时至十二时。

(二) 礼节 公祭之礼节另定

奉安秩序(由中央党部至陵墓),第十次委员会会议议决通过。

(一) 时间

(1) 总理灵柩谨定于六月一日上午六时由中央党部起灵;(2) 总理灵柩于同日上午十一时前到达陵墓祭堂;(3) 总理灵柩谨定同日正午十二时敬谨奉安陵寝。

(二) 警戒

(1) 总理灵柩奉安日由卫戍司令部公安局派得力军警担任,由中央党部至陵墓一带地段警戒任务须于是日上午五时以前布置完毕;

(2) 总理灵柩起灵后灵柩所经过之路线(由中央党部至陵墓),所有车辆行人交通由公安局酌定时间分段停止。

(三) 礼炮

(1) 总理灵柩由中央党部起灵一小时以前起,由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

(2) 总理灵柩奉安陵寝时(正午十二时),由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

(四) 送殡人员之集合

(1) 送殡人员及代表于六月一日上午六时以前在中山路指定地点,按照行列次序集合恭候送殡。

(五) 送殡行列

(1) 行列次序

第一行列:一、骑兵官长一员(乘黑马执旗开道);二、骑兵二名(乘黑马背枪护旗);三、骑兵二名(乘黑马背枪各执党国旗国旗在左党旗在右);四、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五、军乐队;六、骑兵(执长矛)。

第二行列:一、军乐队;二、步兵(枪口朝下);三、农民代表;四、工人代表。

第三行列:一、海军军乐队;二、海军陆战队(枪口朝下);三、海军官长士兵(枪口朝下);四、商民代表;五、学校代表。

第四行列：一、警察乐队；二、警察官长士兵；三、学生团体代表；四、妇女团体代表。

第五行列：一、军乐队；二、外宾；三、海外华侨代表；四、各编遣区各师旅各舰队航空队代表；五、各省市府代表；六、京内各机关职员；七、各省市党部及特别党部代表；八、首都特别市党部及所属各级党部全体执监委员；九、中央党部职员。

第六行列：一、军乐队；二、步兵（枪口朝下）；三、遗像亭。

第七行列：一、军乐队；二、各国专使；三、国府委员及各特任官长；四、中央执监委员；五、总理亲故；六、总理家族；七、灵车；八、步兵（枪口朝下）。

第八行列：一、骑兵一队殿后（执长矛）；二、所有参加送殡人员及代表，到达陵门前即依照其行列次序在墓前石级两旁指定地点恭候，总理灵柩奉安灵寝时行礼，但总理家属、执紼人员随灵柩恭诣祭堂，举行奉安典礼，其礼节另定之。礼成后，各参与奉安人员及代表分别按照指定路线退去。

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日 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总干事孔祥熙

（《申报》1929年5月23日）

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通告

为通告事准 总理葬事筹备处函开，近查各机关党部团体在总理陵园内赠建纪念碑刻者甚伙，于陵园布置方面颇感困难。当经敝处第六十七次委员会议决停止赠送碑刻，并请贵会迅即通告党政军警各机关及各团体，凡拟在总理陵园内建立纪念碑刻如未决定者，请将所捐款数改捐陵园内纪念建筑之用，现正进行规画者请即停止工作，已制成者请自行保存等因，相应录案函运敬希查照办理为荷等由，到会除报告本会委员会议并分函外特此通告。

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 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总干事孔祥熙 A1858

（《申报》1929年5月23日）

总理遗体昨日重殓

——面目如生——

更换殓衣周身裹白绸

装入铜棺周围施寿棉

北平 今早十点总理遗体奉移铜棺。先由池干事布置灵堂，中祭堂，东房音乐室，西房接待室，灵堂两旁，家族休息室。今晨七点，郑洪年率带兵士八名，先由塔内走出，马湘扶灵，置灵堂。九点半孙科、林森、吴铁城到，与协和医生史蒂芬将遗体施行手术，澆各种贵重药料。嗣孙夫人宋庆龄、儿媳陈淑英，率孙辈及戴恩赛、黄祺祥，均到行礼。将总理举起，更换殓衣，周身裹白绸，外穿蓝缎袍、黑马褂、丝袜、云头朝白鞋、白手套，上冠大礼帽，即由夫人公子等，扶入铜棺，由史蒂芬特制药水棉花球四百个，塘于遗体周围，不使摇动，复在遗容上施以橄榄油，用象牙梳于遗体理发，面目如生前静睡一般。孙夫人哭最哀。十一时殓毕，家奠后退出，旋何成潜代表蒋行三鞠躬礼，十一点半，全体退席，明早六点起公祭。（二十二日专电）

北平 今日总理遗骸由北平协和医校某医士启棺移出，为衣蓝缎长袍、玄缎马褂、白丝袜、手套、黑缎靴，整理既毕，乃安置于特别铜棺内，孙科、宋庆龄及其二弟均在侧监视，诸人后举行家奠，宋哭泣甚哀。（二十日路透社电）

（《申报》1929年5月23日）

奉安委员会议

灵柩一日午前十时到达陵门口

南京 奉安委员会二十二日会议，决议各案如下：

- （一）赈灾委员会主席在第七行列，余在第五行列；
- （二）京市总商会推杜哲嶂等五人，下关商埠商会推戴陷章等五人，苏商联合会推闻兰亭等五人，为参加代表，照准；
- （三）黄埔同学会推伍翔田等五人，为参加代表，照准；
- （四）宁波总商会推袁端甫等五人，为参加代表，照准；
- （五）贫儿第一教养院请推代表一人参加，照准；
- （六）四川省学联会派徐国卿等五人，为参加代表，照准；
- （七）中华海员工众联合会总会派梁德公等五人，为参加代表，照准；
- （八）荷属棉兰支部派叶燕清、张蓝田二人，为参加代表，照准；
- （九）典礼组拟就公祭时间及秩序表，修正通过；
- （十）总理奉安特刊发行，办法五条，通过；
- （十一）奉安日灵柩，准于一日午前十时，到达陵门口；

(十二) 总理遗体由北平至浦口下车上舰,及下关登陆,上汽车至中央党部,以及由党部至陵门,均脚在前,头在后,由陵门上石级过祭堂,均头在前,脚在后;

(十三) 关于葬总理亲属会追随总理革命之侨属同志,准予参加第五行列,并指定杨熙□、周仲良、黄惠龙、萧芹、席灵接洽审查。

(十四) 参加大典之专使,因其代表各本国元首,应予优待使团汽车,应有特通办法,以免发生临时阻碍;

(十五) 护灵团仍须参加迎榇行列,第一行列即乐队后,遗像亭前;

(十六) 关于迎榇奉安两日行列秩序之主持,俱由总指挥负责指挥。(二十二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3日)

奉安委员会接待各国专使计划

南京 奉安委员会接待专车来京,各国专使计划,以外部迎宾馆、下关扬子饭店、国际俱乐部及高楼门梁宇为专使行馆,外部先期派专员赴平迎接。自西北利亚来者,令驻哈尔滨交涉员,赴满洲里迎接,陪往北平。乘迎榇来宾,自海道来者,令外部驻沪办事处,派员迎接,护送来京。专使抵京时,国府派代表一员,外部派部员一员迎迓,致欢迎词。专使在京期内,外部派部员一员,充专使随员,如系全权大使,则国府加派军官一员照□,随同出入。专使团分两班,以全权大使为专使者为第一班,以全权大使为专使者为第二班;特制总理奉安纪念章颁给,为永久纪念。对于以驻华使者充专使之国,我亦派驻该国使者为专使,向该国元首答谢;对于另派专使之国,可就驻扎该国附近使馆,加给使命,充答谢专使。各专使于五月三十日午前九时,分班觐见,呈递图书。是晚全体专使恭请国民政府主席致词,表示谢意,并颁各国元首健康。三十一日各专使及外宾,到中央党部致祭。(二十二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3日)

总理奉安两路宣传列车消息

▲ 二十五日由杭出发

▲ 工作人员今日赴杭

▲ 请派武装同志保护

总理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筹备委员会，定于今日（二十三号）全体赴杭，准备出发宣传，昨已先行委派该会职员熊智、郑震宇、向世南等六人赴杭，接收该项宣传车辆，以便布置一切云。

龙华警备司令部，昨接总理奉安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筹备委员会公函第九号云：迺启者，总理奉安宣传列车，敝会现已筹备妥善，定于本月二十五号，由杭州出发，经硖石、嘉兴、松江、上海、昆山、苏州、无锡等处，于三十一号，达南京为止，兹经敝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应请贵部派武装同志十人，随同本会宣传列车出发，借资保卫在案，特缮同各地宣传时间表，并派熊智同志持函前来，即希查照接洽为荷云云，兹悉熊司令已令江同章副官处长，届时派兵士十名，随车保卫云。（表已见报从略）

（《申报》1929年5月23日）

中外参与奉安典礼

▲ 外部将送通知书 外交部对外交团参与整理奉安典礼事，备有通知书一件，已在上海印就，为大号卡片式，四沿均印黑边，上为青色之青天白日图，下为黑色英字，略谓“中国国民党前总理孙中山先生，定于本年六月一日，举行国葬，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党部，举行公祭，均请外交团参加”等语，闻此项通知书，将送至南京，由外交部直接分发，以资手续之统一，又闻上海外交领袖，将于月之三十日赴宁，以便届时参加礼节云。

▲ 德公使至王外长照会 德国政府前致送总理奉安典礼时，种植陵旁之树木，业已运交奉安委员会。兹悉德国公使卜尔熙，尚有通知之照会一件，寄交德代办华根纳，昨日上午十一时半，由华氏亲自送往外交部驻沪办事处，请为转至王部长，快□外交部矣。

▲ 犬养毅等今日到沪 日本国民参加孙总理奉安大典代表犬养毅，此次挽同总理老友头山满，日名辽远山，及宫崎滔天夫人乘长崎丸来华，该轮今日下午二十，入吴淞口，下午三时，犬氏等准可在汇山码头登陆，国府已电嘱上海特别市张群、交部航政司长殷汝耕代表国府，筹备欢迎。闻张市长已函知警备司令部、海军司令部、交涉署、市党部及各机关各团体主管人员，于今日下午时，在海格路融园，欢迎犬养毅、头山满、宫崎夫人。

▲ 宫崎龙介等今日到沪 前二十六军政治部代理主任黄绍美同志，备日本

社会民众党交际部长宫崎龙介，与其母宫崎姬子（即故宫崎滔天之夫人）、其弟宫崎震作，及印人甘地学生B·sohan Singh 孙君、早稻田大学生黄超同志，并东京市本乡区会议员仓地铃古等，于本月二十日在东京出发，乘车至神户，转乘长崎丸，约有二日，计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可抵上海，在沪约有二三日逗留，即赴南京，参加总理奉安盛典，表示敬意。

▲ 第五师派定代表 第五师司令部因接到总理奉安筹备委员会公函，请派代表一人赴京参加，兹师司令部昨已指定政训处主任伍谨章，前往出席。

▲ 商整会推定代表 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以总理奉安期近，对于参加大典代表，业经第三次谈话会，推定虞洽卿、王延松、王晓籁、叶惠钧、陆文韶等五人为代表，昨已由临时主席虞洽卿，函请市党部介绍，一面分函各代表，请其届时赴京，敬谨参加云。

▲ 招商局派轮参加 本埠招商总局自奉到中央训令后，特派定江安·江顺，二轮，为参加奉安大典之用，日内即须驶京，俟令调遣，闻该二轮之任务，系备灵柩抵浦时，载送迎柩人员过江迎柩，俟灵柩过江时，再由浦口载运迎柩人员还京云。

▲ 海总部之礼品 海军总司令部参加奉安典礼，除派定代表外，又派员采购加大花圈三个，该花圈直径约有八尺左右，四周所缀鲜花，亦极美丽，并另制楚有军舰之模型一具，长约六七尺，均以钢铁制成，于昨日一并装存木箱，附同迎柩棺木套架一只，昨日特向沪杭路局索备铁篷车一辆，于下午三时二十五分，附挂十六号上龙区间车，运至麦根路，转运首都，并派海军陆战队杨排长率领兵士一名护送。

▲ 警备部之礼品 淞沪警备司令部所派参与总理奉安典礼之军乐队及花圈等，业于昨晚由沪乘夜车赴京，届期参加。

（《申报》1929年5月23日）

奉安时节说新都

总理奉安为期已逾，筹备至今，历时数月，刻已次第就绪，爰将京中近况，志其一二，以示读者。

▲ 中山路上点缀品 开全国马路新纪元之中山路，全部工程业已告竣。柏油铺面，光耀电灯，往来车马风驰电掣。吾辈平民步履其间，亦不若昔日尘璞之多

矣。现复兴筑牌楼，国府部院、各省政府分建一幢。总计华侨团体数在五十以上。钩心斗角、富丽堂皇，届期奉安度能一新国人之耳目，而启发其油然敬仰之心焉。

▲ 陵园花木珍品多 中央会议决刘钟由全部为造中山陵园之用，并征求国内各省、环球诸邦奇葩异卉、佳种树苗，以资培植，而壮观瞻。全国各省均已次第运京，其中珍品甚多，尤以滇省出品最为名贵，海外来者以日耳曼为先，其他各国亦在搜集起运来京。惜土壤不同，气候迥殊，深恐因之□异也。

▲ 房屋被预约一空 奉安大典为空前未有之创举，中外人士专诚来京参加者必多，京中机关惟恐届时拥挤，日来预约旅社巨厦以备招待之用，甚至学校私宅，均被约一空。

▲ 裁缝店额外收入 自中央规定简任以上官吏必备蓝地长袍黑色马褂，荐任以上职员须穿白色制服。参加奉安典礼后，缝工生涯因之鼎盛。京中成衣店无不制有是项衣服云。

▲ 黄包车夫开会议 定都以还，黄包车价因之大增，今日公共汽车通行，稍觉低落。日前一般江北车夫感奉安时期旅客众多，有机可乘，遂集会于某处讨论增加价格问题，届时大可施行其敲竹杠之手段矣。

（《申报》1929年5月23日）

孔祥熙电平迎榑处保留碧云寺灵堂

南京 孔祥熙电平迎榑办事处：总理灵榑，停诸碧云寺塔，已历四载，理应保存纪念，熙前在葬事筹备处提议，灵榑南移之后，所有原用木棺及灵堂陈设，均仍其旧，并酌量情形，增补陈设，使后之景仰者，睹具生情，引起神灵如在之感。当经众议通过，奉移在即，即请就近妥为布置。再灵堂上层有树一株，民元时曾经总理亲手扶植，亦宜特加标识，用比甘棠，惟灵左右，通达该上层之阶径，前经临时堵闭，此后应令开通，俾游其地者得以瞻仰手泽，统乞代达夫人及哲生为盼。（二十三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4日）

碧云寺公祭第一日

北平 今日公祭第一天，到各机关代表及数外宾，由祁大鹏、夏诒霆招待，祁云龙司仪，与祭者商震、刘镇华、李品仙、张继、梅屋等，何成濬派唐豸，携祭文致

祭，九时礼毕。（二十三日专电）

北平 又东北陆海空军指挥三队来平，参加奉安，尚有一飞机，火车运来。
（二十三日专电）

北平 送殡代表今日登记截止，计团体四百三十四，代表二千六百十三人。
（二十三日专电）

北平 梅屋昨到平，即赴碧云寺伴宿。（二十三日）

北平 今夕宋庆龄伴灵，明早家属祭奠。（二十三日）

北平 今使团未参碧云寺祭灵，谓奉安决参加，预祭未奉自国训令，不便参预云。（二十三日专电）

北平 今日下午三时，总理生前备用之衣服坟行成立礼，即以石旧馆盛之，总理铜棺外之玻璃罩，在北宁路局机厂内定造，明日运平。（二十三日专电）

天津 东北军海陆空迎榇总指挥张江请，二十三日过津赴平。（二十三日专电）

北平 奉方所派参加移灵典礼之飞机二架，本日上午十一时半抵平，在南苑降下。（二十三日东方社电）

北平 阎锡山前因来平参加移灵祭奠，已行抵太原，忽旧病复发，遂止于太原养病。一说阎现尚在河边村，对时局不甚发表意见。（二十三日东方社电）

（《申报》1929年5月24日）

奉安期内首都添设临时邮局

南京 苏邮务管理局为便利奉安时公众邮寄起见，于下关及城内添设临时邮局六处，自二十四起办公，至奉安后止，凡由该局寄递信件，均盖奉安临时盖局戳以资纪念。（二十三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4日）

参加奉安专使列车定期南下

南京 外部息，参加奉安专使车定二十七午后五时开，二十九晨十时到浦口，三十全国觐见主席，由领袖致词，陆教庭代表同车来京，另班觐见。（二十三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4日）

总理奉安委员会通告

为通告事宜 总理迎榑日首都江面警卫规则业经本会委员会议通过在案，除分行外特此通告。

总理迎榑日首都江面警卫规则

第一条 首都江面警卫，所有警卫及配备事宜，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负责办理之。

第二条 自八卦洲至三叉河面为警备区域，按本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办理之。

第三条 除下关浦口分派军舰驻防外其八卦洲三叉河两处另各派军舰担任警卫事宜。

第四条 除前条地点派舰驻防外另派小轮两只巡还下关浦口一带江面。

第五条 上下游来往商轮帆船及浦口与下关间之各项船只，除军舰及特备迎榑应用之差轮外，均于灵榑到达浦口一小时以前燕子山鸣炮时断绝交通，至迎榑由下关上陆时为止。

第六条 凡筹备作迎榑应用之舰只须由奉安办公处颁发旗帜，该项旗帜样式先期送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备查之。

第七条 本规则登中外各报□布之。

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总干事孔祥熙 戊

A2111

(《申报》1929年5月24日)

奉安电报加急拍发

南京 建委会以总理奉安期迫，各方关于奉安事宜，往来电商之处必多，为尊崇奉安典礼起见，特令无线电管理处，通令各处无线电台，自二十三日起，凡关于奉安各电报，俱照原来等级，加急拍发，报费仍照原定等级收取，并不加价。(二十三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4日)

中央大学筹备迎榑

南京 中大规定，奉安时全体人员一律佩黑纱，是日晨五时，列队前往指定

地点，恭候灵柩，由吴荫琨为总指挥，蔡文之、郑锡庚副。（二十三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4日）

京市马路线测量竣完

南京 京市全城马路线，已由工务局测量完竣，自水西门内之外套城东北墙尖以北一百公尺处，与汉府街至中正街马路之总点，连一直线，直向东延伸，横贯全城，经过仓巷、珠宝廊、中正街、八宝前街、御道街、蓝口街，及洪武东街等处。（二十三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4日）

平社稷坛改中山堂

北平 今日社稷坛改中山堂落成纪念，到商震等全体省委，林森等迎柩专员，孙科未到，派梁寒操代表，各界到者五百人，礼成散会。（二十三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4日）

孙夫人过哈赴平

▲ 在哈停留六小时

十六日哈尔滨通信，孙夫人宋庆龄，于今日下午五时二十五分，万众欢呼声中莅哈。夫人长途仆仆，车行劳顿，故面容似现憔悴，惟精神尚好。是日御米色西装外套，静穆雍容，殊足以代表其革命精神。与夫人同来者，为留德学生黄御行。五月六日夫人由德京柏林登车，沿途未稍停留，于十五晚六时许，抵满洲里站，各界到站欢迎者甚众。夫人下车休息二小时，略进茶点，即晚九时，改搭东铁备置之第十五号专车由满启行，满海警备司令部派少校副官许兴五扈从，特区满站警察总署长张英华，亦偕其夫人护送。沿途经过各站，因均得有官方通知，故备受热烈欢迎。此间各官厅于十五晚得知夫人专车启程确讯，即派长官公署外交科长薛镛、市政局市业科长王亚良夫妇、特教厅第四科长吕常茂、特警管理处翻译主任董天真等，于十六日早车，前往安达站（距哈三百里迎接，哈埠总车站，则由路警处布置一切）。车站内外悬旗结彩，并派临时武装警察，维持内外秩序。五时二十五分，欧亚直通列车进站，专车附于第三节行李车后，一时乐声大作，万众欢呼“欢迎孙夫人”、“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时本埠军政界要人

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教育厅长）、米春霖、赵金麟（参谋长）、丁超等，并持旗欢迎之男女各团体代表，□立车下。车停后，张景惠、吕荣寰上车，由人介绍，与夫人相见，经张引导下车，妇女会代表则趋前献花，夫人含笑接受，旋入贵宾室，张请夫人上座，劝进香槟一杯，夫人起立欲行，嗣徇欢迎诸人请，即室摄一照片，旋即乘车赴莫达儿旅馆休息。中外各报记者亦追随之至该旅馆，拥挤于夫人所居一百三十七号房间外，争欲入见。夫人派黄御行代表谈话，据黄云，夫人于本月六日由德京起程，中途未稍停留，已行十一日，定于十八晚到平，先谒总理灵柩，即参预移灵典礼，拟随柩同行，前往南京，奉安礼竣后，退居上海，因夫人身体孱弱，病犹未痊，欲在沪暂行休养，所有中央委员一职，即拟辞却，夫人此次回国，纯为总理奉安典礼，不谈政治，在欧共居两年，生活颇好，经历法俄德奥瑞士等国，所至系个人行动，故殊鲜人知，在德京居住最久，在俄不过三个月云云。是晚八时，各长官即假莫达儿饭店公宴，十时半散席，即登车赴站，在站未久，仍搭专车南下。

（《申报》1929年5月24日）

昨日犬养毅头山满抵沪

一同行有宫崎龙介等二十九人一

▲ 犬养发表宣言

▲ 张群昨晚欢宴

▲ 二十七日晋京

日本前民党领袖犬养毅、头山满两氏，为故孙总理之老友，亦为与中国国民党之最有历史关系者，此次该二氏以私人资格来华，参加先总理之奉安大典，于二十日晚，由东京首途至神户，由神户乘日本邮船会社之长崎丸来沪，于昨日下午二时许，抵本埠汇山码头，中日军政人员，均往江干迎迓，兹将抵沪情形，分至如下：

▲ 欢迎人员 昨日下午，赴码头欢迎者，我国方面，有中委蒋中正、胡汉民、戴季陶、代表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交通局航政司长殷汝耕、公安局长袁良，及王大桢夫人等；日方有驻沪总领事重光葵、副领事井口及其夫人、财务官宫森、日商会长米里、梅屋夫人、日本海陆军武官及中日新闻记者数十人。

▲ 抵埠情形 昨日下午一时许，赴杨树浦汇山码头欢迎者，已陆续至。二时零五分，长崎丸已由东鼓棹至，待该轮傍岸时，犬养、头山等，均在轮外甲板上，向欢迎者颌首示意，而欢迎者亦均脱帽致敬，船旋傍岸，欢迎者乃鱼贯入舱。

▲ 同行人物 此次来华者，除犬养、头山外，有犬养之哲嗣犬养健，头山之哲嗣头山立功、头山泉、头山秀，宫崎龙介，宫崎民藏夫，宫崎滔天夫人，代议士宫川一贯、左岛一雄，前代议士板野友造等二十九人。

▲ 犬养谈话 众既入仓，一一握手毕，犬养氏即与大中社记者作下列之谈话，大致谓：余和头山两人，与故孙总理之友谊，真可谓很久很久，十八年前，当贵国第一次革命时，余等曾一度来华，协助孙总理革命，此种过去之回忆，诚令人生无限之感想，今孙总理之大事业，已告成功，而其纪念塔（指陵墓）亦已建立，此实使余等生不可名状之快慰。最后并示敬意于党之下之忠实青年，一致致力于伟大的事业之成功。头山满氏语记者：余等此次来华，纯以□人资格，参加孙总理之奉安典礼，拟于二十七日晋京云。

▲ 发表宣言 犬养毅氏曾在抵埠时，发表日文之宣言一纸，译其大意如下：余为日本国之一份子，数十年来，对于中国国民党之主义党纲，皆有深切之认识，与同情之表示。昔孙总理曾几度在日，故余之对于孙总理，更有特殊之关系与尊敬。余此次与头山满翁二人，承国府之招待，列席南京故先总理之奉安大典，诚生平引为最光荣事。中国国民党，在故孙总理时，已创立了确定之基础，而今国民党诸同志，更秉承总理之遗教，而努力发展完成其伟大之事业，余等不禁尊敬□之。孙总理与日本关系之密切，可毋庸赘述。日本国民，对于孙总理及中国国民党，诚有万分之同情，与可能之援助，故孙总理在卸任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大总统渡日时，日本朝野，举国欢迎，此足表示孙总理与日本之友善之密切。今又际兹大典举行之期，中日间之各悬案，亦适于此时圆满解决，此后二国诚意披沥，一致协力于友善之增进，与保持东亚永久之和平，再进一步，而努力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以副先总理之意志。

▲ 抵沪行动 既上陆，犬养氏与古岛等，乘汽车，由张市长等伴往海格路融园小憩，因犬养氏下榻于该处也；头山满氏以不惯居于洋屋，故偕其随员，下榻于虹口曲阳馆；宫崎龙介等，则下榻于西华德路胜田馆；其余宫川一贯等，则下榻于东和洋行，

▲ 昨晚欢宴 上海市长张群及交通部航政司长殷汝耕，于昨晚七时，欢宴犬养头山等于海格路融园，为该氏等洗尘，陪坐者有熊司令、徐交涉员、何院长（世桢）、褚民谊、吴开先、虞洽卿、王一亭、陈炳谦、殷铸夫、齐铁生、陈司令（季良）、袁局长（文□）、日方有日总领事重光葵日本驻华陆战队指挥官松平大佐、陆军指挥官重藤中佐、海军指挥官带沼中佐、船津、波多博、迁铁舟、井口副领事、张市长席

间有演说，

▲ 张群演说 今日头山犬养两先生，及各位老同志，不远千里渡海而来，参加总理奉安，鄙人得于斯时，致欢迎之意，见两先生康健之颜貌，曷胜欣慰。此次奉安大典，乃中华民国空前绝后之盛典，以故列国政府，莫不遣派正式代表前来参列，我国民至感荣幸。但鄙人今日在此欢迎两先生及各位同志，较之欢迎其他使节，则实不禁另有感想也。当总理在三十余年以前，提倡革命之初，不特革命之效果未愿，即我东亚大陆，竟无处觅革命痕迹，在斯时首先与总理共同努力赞助者，即两先生，与各位老同志也。又去今十八年前，我党在中原初举义旗之时，两先生又偕各位老同志，亲来赞助，迄于今日，各位再来之时，前后经过数十年之春秋。此数十年间之沧桑变化，可谓多端，抚今思昔，不胜感慨也。在此数十年变迁之间，革命本身之进展变化，自不待言，而其间所谓“日本老同志”之与革命相始终，对于革命所立功绩，所惠之友谊，以及与我同志所共之甘苦，殆非言语之所能形容，无法可以表示我党感谢之忱者也。今者总理逝世已四年矣，两位先生暨总理各老友，已跻于高□，而国民革命之效果如何，自总理逝世之后，蒋介石同志暨全体党员，共同努力，拼死奋斗，以有今日统一之局面，似可以上慰总理在天之灵，并各位同志矣。然细加思索，则军阀余孽，尚未肃清，不特建设未成，民生未立，进而以三民主义致大同世界之路之理想，凡我总理所抱负，尚未克达□万分之一，国民革命前途之艰难困苦，尤未可乐观。一念及此，我侪后死党员责任之重大，深足悚惧也，尚祈两位先生及各位同志，对于我党革命之事业，仍与总理生前，同样资助，则幸甚矣。今日各先生远来，实觉招待不周，甚为抱歉，仅具薄酌，恭祝两先生及各位同志之健康。

（《申报》1929年5月24日）

芳泽今晚首途来沪

▲ 呈递国书及参加奉安大典

日政府以孙总理奉安之日将届，故特派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来华，参加大典，并呈国书。芳泽氏奉命后，即与今晚（二十四日）由东京首途赴神户，再由神户乘上海丸来沪，预计二十七日下午，可由杨树浦汇山码头登陆。芳泽抵沪后，定于二十八日上午六时，乘日兵舰矢矧号由沪赴京，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到京，三十日正式至国府递早国书，六月一日参加奉安大典。

（《申报》1929年5月24日）

参与奉安消息种种

▲ 宣传列车工作人员今日出发 总理奉安两路宣传列车筹委会,各项筹备手续,业已就绪,于今日上午,乘沪杭路特别快车,全体出发工作,带有宣传品八万份,以及化装宣传材料电影机等,闻将在两路沿途各站,化装演讲,并施放革命电影,以扩大宣传云。

▲ 奉安轮今晨入京 奉安委员会,电致本埠招商三北各轮公司,磋商各调两船至浦口,期以七日。招商局昨已商定,将长江线之头等客船江安、江顺两轮应差,昨已复电南京照派。该二轮定今晨直放浦口,听候派差,约六月二日毕事。闻三北公司亦派两轮。

▲ 海军部装配飞机两架 海军司令部飞机处,业经派定航空官杜安、技正高清树及临时酌派学生一人参加,已装配飞机二架,一为三人座之江鹭号,有一百二十匹马力;一为二人座之江鸥号,有二百八十匹马力,其飞行持久力,可达五小时以上云。

▲ 檀香山党部代表到沪 檀香山总支部及党报奉安代表林日强、余焯南两同志,于昨日到沪,不日入京参加奉安典礼。查林君两广方言专门学校毕业生,历任檀香山总支部执委兼常委及党报主笔,前任总支部党务指导委员,现任中华公报主笔;余君历任执监委员,现任总支部执委兼常委,及中华公报副总理云。

▲ 第九师奉安代表派定 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以总理奉安大典已届,特派该师驻京办事处主任蒋任贤为代表近就,敬谨参加云。

▲ 闽省政府代表到沪 福建省政府,于五月十四日第四十五次会议,议决推定陈楚楠、刘通、许卓然为参加总理奉安典礼代表,昨闻已先抵沪,并定今晚(二十四日)夜车晋京,至刘许两代表,日间亦可到沪云。

▲ 全国商会代表将晋京 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推定苏民生、周伯昂、陈之英等六人为出席代表,定于二十七日上午八时半,乘早快车晋京。

(《申报》1929年5月24日)

中央举行迎榑演戏

南京 二十四日举行迎榑演习,早八时以前,中央以下各机关参加人员,在

指定处所集合恭迎，直至午后二时，始莅，中央假制灵柩，即停于中央大礼堂致祭，情形如次：

（一）参加人数

是日适为国府例会之期，故多数中委国委均出席该会议未克前往参加，到者有戴传贤、于右任、朱培德、丁超五、张道藩、王正廷、赵戴文、孔祥熙、刘纪文、谷正伦、姚琮，及各机关特任文武官员，平各界迎柩代表，中央军校护灵团，骑兵团等，共约万余人。

（二）沿途布置

由浦口车站过江，直至中央党部一带，中山大道，已搭扎牌楼数十座，外沿途各段，设置临时休息室，及卫生治疗所多处，以备不虞。关于全路卫戍事宜，则由公安局卫戍部、国府警卫团，及各校党童子军等负责维持，每隔二丈余，即站士兵二人，均相背而立，并有自行车队随时往来巡视，秩序井然。

（三）移灵情形

晨八时半各迎柩人员到齐，即由迎柩办公处总干事孔祥熙，执总干事旗，偕各中委员特任文武官员，乘已备之盛威军舰过江。莅浦后，移灵下车，举行公祭，旋升灵登舰。稍顷即莅中山码头，致祭后登岸，一时岸上军乐大作，音韵悠扬，极表其哀悼之意，即升灵入运灵汽车，由各委员部长及总理之旧交亲故执绋。十时余启行，总指挥铁甲车二辆及团等前行。直至午后二时许，始抵中央党部。一时万人载道，杂以悠扬之军乐，颇为肃穆。沿途两旁，参观男女老幼，更为踊跃，并于灵柩经过时，均脱帽为礼。

（四）举行公祭

午后二时许，灵柩莅中央党部，所有各迎柩团体队伍，均鹄立党部门外，迨灵柩升入大礼堂，安置妥善后，复举行公祭，礼成始散。

（《申报》1929年5月25日）

平迎柩处严申警备

经过路线断绝交通

北平 迎柩处决自移灵日为警备起见，经过路线，一律禁街，断绝交通，禁止民众观看，各商店闭门，停止营业，并定区属，飭各商店具结。（二十四日专电）

北平 移灵时迎柩总指挥，分配警戒区域，自碧云至万寿山东便门至丰台，

此两段归剿匪司令部担任；自万寿山至东便门车站，归警备司令部担任；张荫梧于城内派四团，分任警戒。蒋令行营，除奉安各列车外，无论何人，不准借口护灵索车辆及开专车。（二十四日专电）

北平 今日各团体学校公祭，到数百名，孙总理家属未到。（二十四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5日）

护灵铁甲车辆北开

济南 下午四点五分，护灵中山一号铁甲车队长沈度、五二号铁甲车队长汪六、护灵司令蒋锄欧，带铁甲车二列，过济赴平。总部今召集军警，会议灵车过济警戒办法。（二十四日专电）

北平 迎榱铁甲车，由蒋锄欧率领，明日可到，迎榱车站，只许发月台票七百张。（二十四日专电）

徐州 蒋锄欧二十三日晚乘中山二号铁车，由京过徐赴平，代表迎榱。（二十四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5日）

移灵杠夫分班承值

北平 迎榱处令承办移榱之日升杠房，将杠夫定三班，每班六十四名，由碧云寺起杠，先用三十二杠，因海淀路较窄，若令商户拆让，恐来不及，俟过云淀市街后，再换六十四人大杠，并将卸下之夹杠，及材罩等，用大型汽车运到前门车站，俟大杠到站，再用夹杠，将灵榱抬入站台上车，因站上过道，不能容大杠进入，故费此手续云。（二十四日专电）

北平 迎榱委员以北平大杠房，向办清皇室贵族移棺安葬，于慎重上极有经验，故今日升杠房选八十名大个子杠夫，随灵南下，充奉安时抬杠之役。（二十四日）

（《申报》1929年5月25日）

奉安委员会规定招待特邀外宾办法

南京 奉安委员会招待组，规定招待特邀各外宾办法，拟以外次唐悦良住宅，及安乐酒店等处，暂为各国外宾寓所，并派员转商卫戍部，对各专使寄居处所，

特别保护，以期周密。闻侯奉安礼毕后，外王尚拟来邀专使团，及其他诸外宾，在五洲公园茶会，并闻蒋主席亦拟设宴款待各国专使。（二十四日专电）

南京 外部奉安委员会招待组，因此次奉安大典备极庄严，各国专使远道来京，系代表其各本国并非私人可比，其使命极为隆重，故对一切招待礼节，如舟车之务期安全，饮食起居之力求舒适，决议均当特别予以周至，借以表示我方与国家，对种种国际礼仪并无忽略，同时并表扬我文明国度之态度。（二十四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5日）

总理灵车试车记

▲ 山平开驶天津当日折回

▲ 孙科郑洪年吴铁城同去

北平通信，总理灵车昨晨（十八日）十时由东车站试行开车，孙科、郑洪年、吴铁城同车赴津，并欢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兹志其详情如下：

▲ 灵车样式 总理灵车系三个月前在汉口车厂就旧钢车改造，长三丈八尺，宽八尺五寸七分，棹位均撤去，铺满青天白日之三寸厚绒毡。中间置灵幄一座，内用木板制成，四围有白铜环，可以拆卸，将来总理遗骸，即置于此中。其上有青天白日之蓝色缎罩，下有螺旋，可以运转。车之两旁，有玻璃窗各六面，内繫以金黄绒帘，窗户外面，用蓝白漆画成党旗。车中间有二立方尺之大窗户一，与车内光线配置适宜，若将窗帘放下，可永久保持室内相当之温度。车上有蓝缎制之旗帜，中心有国旗，四周缀以白绿线扎成之“卐”字花圈，极为庄严美观。车之前后，有玻璃窗门六扇，其外纽为水晶制。距车机接头处，有铜制栏杆，光亮夺目。此车之装设费，共四万余金，此车系旧车改造，外传为逊清造物，确非事实。衔接灵车之蓝铜车六辆，计饭车一辆、电灯车一辆、头二等车三辆、三等车一辆，系新由唐山车厂修理后，于前日运至长辛店，昨晨七时到丰台，八时运来北平，抵站时，由路局特派精于技术之宁姓车手，专司运转，其与岔道不合之处，由副工程司钮吾宝氏妥为修理。孙科等抵站，与段长王振声亲自登车检视，认为满意。

▲ 赴津人物 昨晨八时，孙科与其夫人陈淑英女士同至车站，适时郑洪年、林森、吴铁城各专员，及秘书梁塞操、胡天浚、陈君朴，又戴恩赛夫妇、容海襟均至。林森因须布置北平方面迎柩各事务，未去津。余人均于十时三分汽笛鸣声中赴津，临时又附挂专车八辆于灵车之后。

▲ 返平经过 灵车于上午十时离平，初出站台时，疾徐相称，与普通列车毫无异象。十二时十分过杨村，车稍停换水，郑、吴诸专员下车巡视一周，车启行时，孙科并亲至灵车内试行灵车速度，于震动之度，结果证明将来移运灵车与遗榇绝无妨碍。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接北平电话报告，即通知各机关到站照料。一时二十五分，专车抵站，军乐大作，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市长崔廷献、交涉署长苏体仁、公安局长曾衍裔等，均到站欢迎，孙科等当与之握谈片刻，饭车手开饭，诸人用饭毕，二时二十分接报告，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专车将到，傅等下车预备欢迎，适有记者数人向孙科、郑洪年等摄影。二时三十分过杨村，六时十分抵平，郑洪年、林森又至灵车上检视一周，毫无异态，命宁姓车手，善为照料，并留护灵队卫十四人，在站照料灵车，诸人逐离车各回寓次。（十九日）

（《申报》1929年5月25日）

孙夫人已抵北平

▲ 抵平后即由车站直赴西山谒

十九日北平通信，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昨日（十八）下午六时十分抵平，当赴西山碧云寺瞻谒总理灵榇。兹将其经过情形分志如下：

▲ 过津情形 昨日下午二时余，天津车站得塘沽车站报告，孙夫人专车已向天津开出，各界欢迎代表至南月台欢迎者甚众。车站警戒，由路警维持秩序。站内军警排列：第一列为天津警备司令部军乐队；第二列为公安局警察；第三列为宪兵；第四列为警备队手枪队。欢迎人员均在站台内守候，孙科及林吴郑三专员二时半到南站台，傅作义、崔廷献等均随行，孙科夫人手持鲜花一束，俟约五分钟之久，孙夫人专车即由东方疾驶入站，时已二时三十五分正，军乐大奏，军警一律举枪致敬。孙夫人专车共四节，孙乘二七五六号头等车。与孙夫人同来者，有行营代表陶敦礼，蒋主席代表宋子安、宋子良，孙夫人谨带随员黄其祥〔琪翔〕一员，及仆役二名，张学良派排长陈敬一名，宪兵四名随车保护。车停后孙科偕其夫人陈淑英女士首先登车，傅作义、崔廷献以次登车同候，孙科与陈淑英女士谒孙夫人时，陈女士先将鲜花一束交与夫人，表示尊敬之意，孙科亦问候起居及回国情形许久，并请夫人改乘专车。夫人以长途劳顿，多有不便，仍乘原车。时请谒者纷集车门外，新闻记者亦要求谈话。孙夫人以本人既已抵津，惟恐时间过晚，不能赴西山参谒孙先生灵，遂派随员黄其祥代向欢迎代表致答谢词，略谓各界代表诸君，今天

孙夫人抵津，荷蒙欢迎，不胜感谢，现在因时间关系不能接见，将来夫人或许来津，见面时甚多，敝人代表夫人向各界诸君声明道歉。黄言毕，车即开入北月台内，挂于灵车后，由孙科夫人陪同谈话，至下午二时五十六分开车，一时军乐大作，欢送之声不绝。

▲ 抵平情形 专车离津后，沿途各站未停，抵黄村时，北平即得有报告，纷派代表到车站欢迎，计有省府军乐队一连，市府与公安局各一连，军警数排，此外有刘镇华、何成濬、张笃伦、赵经世、王彭年、沈庸、张荫梧、楚溪春、商震、程一中、王征、赵以宽、戴恩赛夫妇，及广东旅平学校学生，及女生百余人。六时十分，灵车与孙之专车一列到站，孙乘第六百五十三号车内，欢迎诸人谨将名刺送上，由陈淑英女士、孙满左右扶孙夫人下车。孙夫人著灰色织宝呢西服，对襟，黄丝袜，白皮鞋，戴黑缎帽，左手有钻石戒指，系与总理结婚时物，孙夫人面貌较四年前离平时略为丰腴，远涉重洋，颇呈风尘气。孙下车时，泪容满面，除与何成濬为礼外，对于诸人，由孙科接待，并未侧视。陶敦礼随孙夫人后，照拂一切，虽军乐齐作，孙夫人并不一瞬。赵以宽请孙夫人至鲍贵卿宅休憩，孙云先至西山再说，遂于戴恩赛夫人及陈淑英女士乘八百八十八号汽车，即赴西山碧云寺参谒孙总理灵，将由潘阳带来鲜花圈一个，放在车内（上款书“中山先生灵”，下书“妻宋庆龄鞠躬”）。下午七时二十分，抵西站碧云寺，孙夫人下车时，几不能步履，由左右搀扶以上，副官马骧〔湘〕在前引导，随报告遗孀布置情形，孙夫人毫不为意，直奔灵堂。与孙同来者，有孙科等十余人，分乘汽车七辆。孙抵灵前，先行三鞠躬，左右献鲜花圈，夫人大哭失声，左右皆泣不可抑，夫人以手指灵柩，意欲看视，卫士启覆棺之国旗，扶夫人上石龕，夫人一面上龕，一面呼孙总理：“我在此地，你往哪里去了？”一时龕前空气颇为黯淡，左右劝夫人下，夫人不忍，抚棺大号，泪珠直淌在玻璃盖上，珠球满滚，与四年前夫人亲视总理含殓时同一悲哀。戴夫人则扶墙大痛，逾二十分钟。左右请夫人下，夫人又三鞠躬，左右扶夫人至护灵处。休憩片刻，夫人谓将暂住此处，不愿入城，左右谓此间未曾设备，请返城，夫人仍乘原车入城，时为八时二十分。事前赵以宽承何成濬、商震命令，在东半壁街鲍宅设立行馆，派杨科长负责筹备，分庶务招待洋厨房各处，费用由行营支领，并由殷焕然派警士五十人，专司守卫事宜，其门口贴有“孙夫人行馆”字样。夫人汽车于八时五十五分抵行馆，谢见来宾，由行营白副官长照料一切。

（《申报》1929年5月25日）

孔祥熙请将碧云寺灵堂留供纪念

总理奉安委员会总干事孔祥熙氏，日昨致迎榑专员林子超等一电，请将碧云寺灵堂，仍旧陈设保护，以留纪念，兹录原电如下：“急北平迎榑办事处子超、铁城、韶觉诸先生鉴：总理灵榑停诸碧云寺塔，已历四载，理应保存纪念，熙前在葬事录备处提议，灵榑南移之后，所有原用木棺，及灵堂陈设，均仍其旧，并酌景情形，增补陈设，使后之景仰者，睹物生情，引起神灵如在之感。当经众议通过，现奉移在即，即请就近妥为布置，再灵堂上曾有树一株，民元时曾经总理亲手扶植，亦宜特加标识，用比甘棠，惟灵堂左右通达该上层之阶径，前经临时堵闭，此后应令开通，俾游其地者得以瞻仰手泽，统乞代达夫人及哲生为盼，孔祥熙叩养印。”

（《申报》1929年5月25日）

参与奉安典礼消息

▲ 外部派员接待专使 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昨日接外交部训令，指定该处长陈世光、刘云舫、曹树铭等三员随同留沪各专使晋京，参加奉安典礼，闻留沪各专使，定二十八日晚车启行，又指定张国珍、曾照常等四员，陪同其他各外宾，乘轮赴京。

▲ 日本政府馈赠礼物 日公使芳泽代表政府参加奉安典礼，已于昨日启程来沪。闻芳泽携有礼物银器两件，一件直径为四英尺三英寸，计重十六又百分之五十六磅，一件直径为三英尺七英寸，计重约十五磅，为日本最精美之银器。

▲ 法舰开京参加典礼 法兵舰亚尔泰号，其舰长为特维蓝准于二十六日启碇赴京，约二十七日晚或二十八日晨到京。

▲ 添设临时邮局六处 江苏邮务管理局通告第四六四号云：为通告事，兹为便利公众邮寄起见，特于总理奉安时期内，添设下列临时邮局六处：① 下关扬子饭店；② 三牌楼外宾招待处；③ 五洲公园；④ 奉安委员会；⑤ 游府西街东方饭店；⑥ 升平桥西成旅馆。以上各处临时邮局，均自本月二十四日起开办，至奉安典礼完毕之后止。在此时期内，不论星期日与放假日，均每日于上午九时起至下午六时止，发售邮票，并办理公众交寄普通挂号及快递邮件，凡在各该局交寄各项邮件，盖用下开式样之专戳盖销，以资纪念，合行通告，俾众周知，此告。计开专戳式样入左。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邮务长利容福。

▲ 奉安电报加急拍发 上海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台,昨奉首都总电台通令,以奉安期迫,各方关于奉安事宜,往来电商之处必多,现为尊崇奉安典礼起见,自二十四日起,凡关于奉安各电报,俱照原来等级,加急拍发,报费仍照原定等级收取,并不加价。

▲ 点缀两路大小车站 两路管理局事司务,前据总理奉安两路宣传列车筹备会函称,业已通令南京镇江无锡苏州杭州嘉兴上海南北两站等各大站,于二十七日至六月三日,一周内,均装扎彩牌楼一座,其他各小站,亦须悬挂党国旗云。

▲ 闸北各区民众大会 六区党部通函云:为通告事,案奉第六区党部第三十次执行委员会决议,定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召集闸北各区民众大会,以便两路宣传列车来沪宣传总理奉安之意义,等因准此,用特函达贵会,请届时推派代表参加(地点更新舞台),并布先期通知本会参加人数,以便发给入场券,如有更改会场,临时由民国日报公布,诸希注意为盼云云。

▲ 航协代表今晚晋京 中华航空协进会,以总理奉安期近,特推定该会执行委员凌鄂荪为参加代表,并备有礼品,为银制之花圈一座,凌委员入京时携往,凌已定今(二十五)晚入京。

▲ 五师党部代表赴京 五师特别党部,昨日派定该部执行委员熊团华为参加奉安代表,熊即于昨晚夜车晋京。

▲ 广州学生代表抵沪 广州学生奉安代表司徒德、王衍卫、刘长、马齐心四同志,于昨日抵沪,今晚入京参加奉安典礼。

(《申报》1929年5月25日)

蔡子民李石曾中止赴平迎榑

▲ 蔡因夫人生产未出席

▲ 李因患腹泻发热卧病

蔡子民、李石曾两氏,前曾有赴平迎榑之说,近闻均已中止。蔡氏因其夫人生产尚未出院,李氏则因卧病。近询李氏左右,据云,李氏早拟赴平,因其夫人跌伤腿部,展期至上周搭船赴津,李氏已登舟,适接吴稚晖、张静江两氏函瞩缓行,拟改乘火车,惟李氏近患腹泻发热,故二十六日前,无论如何不及到平,而北行亦遂作罢,并闻已电告北平迎榑送榑诸团体,表示歉忱云。

(《申报》1929年5月25日)

宫崎龙介等参观市党部

日本社会民众党领袖宫崎龙介、宫崎震作两君，于昨日下午三时，乘市政府招待汽车，至西门特别市党部拜访，当由执委汤德民接见，徐松亭同志任翻译。宫崎龙介申述两年前曾来沪，蒙市党部同人招待，深为感谢，此次特来参加贵国总理奉安大典，蒙国民政府优为招待，至深感荷，同人甚愿中国政治日趋巩固，建设事业迅速发展，新中国之真目的早日实现云云。汤君答词云：龙介先生与社会民众党与本党历史上有悠久关系，龙介先生者为本党敬佩之一人，吾人深望社会民众党，在国内之政治势力，日益发展，消灭贵国足以妨害新中国实现之一切障碍，使贵党怀负，得以贯澈，吾人深为本党与贵党之切实合作，足以巩固东亚和平，与发扬东方文化，而达共存共荣之企愿也。最后宫崎龙介，表示愿同此目的，共同努力，兴辞而出。

（《申报》1929年5月25日）

总理灵柩今晨奉移

移柩及列车出发序列

北平 今夜西直门道五十步一盞水月电灯，准明晨一点起灵举行，至下午五点到前门车站开车。（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二十六日移柩序列：第一行列骑兵长、护旗骑兵、党国旗骑兵、军乐、长矛队；第二行列军乐总指挥商震及步队；第三行列军乐指挥官、步兵、工界代表；第四行列军乐、海军官长、海军士兵；第五行列军乐指挥官、警察保安队、商界法团代表；第六行列军乐指挥官、警察保安队、学界农界代表；第七行列军乐指挥官、宪兵；第八行列军乐、蒙藏代表、省市党委、省市府各口局、各军事机关代表；第九行列军乐、步队、各师团旗、步队；第十行列军乐、步队、提炉、遗像亭；第十一行列各团代表、各公使及外宾执绋者、总理家族、中央地方高级党政军官员；第十二行列拱卫灵柩左右宪兵、骑兵一连后殿。列车出发序列：第一前导车，明日下午四点一刻由第一月台开，七点十五分到津，七时三刻由津开，翌日九点半到浦；第二列车，为灵车，二十六日下午五时二十分，由第二月台开，八点到津，八点半由津开，翌日十时十五分到浦；第三列车，为随员车，五点四十五分开，八点三刻到津，翌日十一时到浦；第四列车，来宾车，六点半开，翌日十一时三刻到浦，外交

团专车,拟二十七日由第二月台开,因使团嫌早,尚待商定开行日期。(二十四日专电)

北平 李服膺部护灵车已开到香山。(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护灵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率武卫二百余人,于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半抵平。(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明日因送灵,平津快车改迟五口钟,明日来平客票车,不得到站,在丰台停车,又闻北辽通车停开,由辽来平客车,两点半抵津后中止来平,二十七日交通照常。(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 行营昨训令北宁路局,二十六为总理灵车遄发之期,是日不准军车通过,以昭郑重。(二十五日专电)

浦口 奉安专车,增增两列,第一列宣传车,二列前导车,三、四、五三列均铁甲车,五列兵车,六列铁甲车,七列灵柩车,八列铁甲车,九列随员车,十列来宾车,均于二十八日上午二时十五分到浦完毕。(二十五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6日)

北平昨开送榱大会

碧云寺公祭之第三日〈北平〉今日天安门送榱纪念大会到两万余人,政军方面到甚少,由总工会张寅卿任总指挥、钟书衡副,到省市党部及各工会协会代表。(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今日公祭第三日,上午商界及沪记者团及东北代表致祭如仪。下午家祭,孝子及家族举哀如仪。西直门至香山沿途均悬旗、树木间排白花,棺罩午刻抬到碧云寺。(二十五日专电)

〈北平〉碧云寺家祭时,有飞机两架绕寺致吊。

(《申报》1929年5月26日)

中央今日演习奉安

〈南京〉二十六日举行奉安演习,六时前到中央党部举行公祭后,一律步行恭送假灵至陵墓安葬,中央党部全体职员均参加演习,由党童子军张忠仁任总指挥,各科室主任任各该科科长,以便领导排队赴总理陵墓,演习奉安典礼,每四人成一横排,其参加秩序为一秘书处、二组织部、三宣传部、四训练部、五侨务委员会、六

民众训练设计委员会、七财务委员会、八法规编审委员会、九统计处、十党史编纂委员会、十一政治会议。(二十五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6日)

专使行馆之布置

〈南京〉参加奉安大典专使行馆悬专使国旗,但自专使到京日起至六月一日止,该项国旗须下半旗或于旗顶缠黑纱志悼,专使汽车头插中国国旗及专使国旗,该项旗顶均缠黑纱(二十五日专电)

〈南京〉外部派定招待专使人员周龙光、张我华等任该部门前,张铁城等任明陵,陶树模、徐东藩等任中山陵园,徐谟等任陵前。(二十五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6日)

迎榑奉安指挥会议

南京 二十五日开迎榑奉安两任指挥会议,决议事如次:

(一) 办事人员七时半在得胜军舰集中,八时过江,中央及国府委员各特任官,九时渡江,参加团体及代表等,九时到集合地点;

(二) 各行列领队人员,于二十七日出席联席会议,以资接洽;

(三) 指导浦口军警,支配军乐队开道警官步法,训练迎榑人员随从,不许渡江等事宜,由警卫组负责办理;

(四) 下关江边须位置一典礼指挥;

(五) 每行列备脚踏车四辆,以资联络;

(六) 各机关队伍前,须持党国旗,中间须竖各机关旗,以资识辨,旗帜一律横二尺,长四尺;

(七) 自鼓楼至中山路上,迎榑日上午九时起,停止普通车辆交通;

(八) 灵榑将过时,先吹警笛,俟铁甲车驰到,即禁止车辆行人,横过马路。
(二十五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6日)

各地纪念奉安办法

镇江 苏省党部定六月一日晨八时,召集各界举行总理奉安公祭典礼,各界

自二十六日起，一律下半旗七日，党员一律左臂缠黑纱。（二十四日专电）

青岛 专员公署昨布告，第一公园改为中山公园，山东路改为中山路，以示纪念。（二十五日专电）

青岛 本市各团体，昨午后假市指委会□筹备总理奉安公祭典礼大会，到代表百余人，李翼中主席，议决六项，自二十六起，各界一律缠黑纱，以表哀思，今日在齐燕会馆续开筹备会。（二十五日专电）

徐州 奉安纪念会通告各界，二十六日至一日全部下半旗、停娱乐、缚黑纱，二十七晚七时半，齐集东站迎榇，举行公祭。（二十五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6日）

津浦路奉安护卫军队已指定

浦口通讯，津浦局长孙鹤皋以奉安专车极为重要，曾飭所属警察，严密加意巡察。惟警方单薄，尚恐不敷分配，特电铁道部，转请国府，通电驻津浦线各师，协同防范，以策安全。一面迓电河北、安徽、山东三省主席，请令沿线驻军，随时与路方接洽，以期妥密。原电如下：火急北平商主席、济南陈主席、蚌埠方主席动鉴：查奉安各列车，此次经行北宁津浦两路，警卫事项极关重要，当于号日电请铁道部转请国民政府及军政部，通电沿线各驻军护卫，并派军驻定大小桥梁及险要在案。兹奉马日复电开，加号两电已悉，由平至浦迎榇护卫事项，前曾提出会议，业经奉安委员会决定，交总司令部，将驻防军队妥为支配，顷再将号电国府参军处接洽。兹将沿平浦线逐段警备办法列下：①由平至德州，归商主席震负责；②由德州至韩庄，归陈主席调元负责；③由韩庄至浦口，归方主席振武负责，但该路路警在路有年，情形熟悉，仍仰该局严飭所属，迅将沿线内各处大小桥梁及险要地点，与逐段驻军长官详为接洽，负责妥镇布防，互相协助，无稍贻误等因，自当遵照，惟由平至浦，路线极长，桥梁险要，为数甚多，敝路警额枪支均苦不充，与支配上殊嫌单薄，奉电前因，除电飭天津、兖州、浦口三警务总段长，浦口天津保安大队长，分别与津德、德韩、韩浦三段间，贵部各驻军长官详为接洽，并电请北宁路局，飭属与商主席部下商洽平津间布防办法外，务□麾下迅赐电飭以上三段内贵部各驻军长官，就近向该总分段长保安队长谱询敝路各项情形，并请拨队防守各大小桥梁及险要地点，以昭妥慎而期严密，敬乞电复为荷。弟孙鹤皋叩。

（《申报》1929年5月26日）

孙总理遗体殓入铜棺

北平通信，孙总理奉移铜棺日期，自孙宋夫人到平后，业于家族及迎榇专员议定，二十二日上午十时举行，兹将奉移详情，分述于左：

▲ 祭堂布置 事前由迎榇办事处派池博密在西山碧云寺布置迎榇各事宜，由碧云寺大门之各台阶，均用蓝色白底扎成素色牌楼，其上嵌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不死”、“牺牲奋斗”字样。在碧云寺大殿改建祭堂，堂顶用国旗铺成，东西北三面，均绕以白布幔，南端用蓝绫做成帐幔。其上端为“天下为公”四字，左为“浩气长存”，右为“有志竟成”，其内端为“行易知难”。堂内满悬电灯，北端正面，有遗容亭，中悬总理遗像，其下端映以电灯，返照遗容栩栩如生，亭下方有方振武赠送之银盾。祭堂之左右两厢为家属休息室，室内布置极整洁，东配殿为音乐室，西配殿为接待室，接待室内，有高桂滋西郊总商会北平中等学校以上各校赠送之银盾、木铎、造像及各纪念品。

▲ 铜棺形式 总理入殓之铜棺，购自美国，前此由专员运送来平。昨日（二十二）即陈列于祭堂内正中间，铜棺作古色，长六尺，宽二尺。盖上有国徽，前尾两端之底侧，繫以铁制之横栓，为移动时杠抬之用，棺盖之侧，缀以木旋，可以启闭，其上覆以党国旗，其下位置于定制之木橙上，坚固异常，棺之下为金黄色缀幔。

▲ 警戒严重 昨由副官马骧担任警戒责任，由大门各处，皆有护灵队守卫，祭堂前置四位置，荷枪实弹，来宾概不许入祭堂一步，林森并在该处指挥监督，各室皆揭有请勿吸烟之纸条，无音乐，各照相师皆立于一定处所。

▲ 洗涤遗体 前日（二十一日）下午四时，由孙科、郑洪年、吴铁城偕同协和医院定血科主任美国医学博士许文生（美人）与医生郭荣勋、赵德安、吉延卿等至碧云寺，先行礼，次将总理原卧之铜棺移出，揭去上盖，用器械将总理腹内原有之药品取出，注入真空，其外部涂以格司林，总理面貌与生时无少异，两手稍硬，腿部肉软如绵，不知者几疑为生人安寝，除头部外，再缠以白绒布。时已六时，孙科与秘书陈君朴、许文生，同赴甘露旅馆休息，其余诸人则赴香山旅馆。据许医生云，中国保存遗体，以总理为第一人，依前此总理保存遗体（亦系许氏办理）之过去历史，今后最少限度，可保存至千年以上，或者永久不致毁坏，本人将于二十七日赴京，担任一切保存之手续，总理所涂之油为Algobolo，可使光泽如生。

▲ 陈列衣物 昨日午前七时，郑洪年监视卫士，将总理应更易之衣物，抬入祭堂内，计蓝缎白裹夹袍一件，青缎夹马褂一件，白绫襟衣一件，线织袜一双，青缎圆头鞋一双，陈列于案上，又有花缎锦被一副，白绫夹被一床，此外有丝绵制之大小束卷二百二十五个，枕头二个，由各照相师一一摄影，另有铜盘两个，为装置销口之用，亦放置之案上，白绫制之花球一束，亦置于室内。

▲ 移动遗体 午前八时二十分，郑洪年亲至碧云寺最高巖石龕内，向遗榇行三鞠躬礼，奏乐，旋由卫士将玻璃棺在石龕内请出，郑氏亲升至祭堂，置于铜棺之左，其上覆之国旗，鹰埃寸积，诸人均对之行礼如仪。孙科于九时五十分由旅馆至，命人将蓝布幔放下，室内电灯齐明，孙令马骧将总理铜棺启开，徐徐将总理遗体升至木案上，更易衣服，孙科对之大泣不止。由医生为总理更衣，九时四十分，第一层衣竣事，十时林森始来，吴铁城则始终在室外，施行照料一切，十时二十分第二层更完，十时四十分第三层更完。

▲ 孙夫人至 上午九时二十分，行营派委之招待孙夫人专员陶敦礼至。十时十分，孙科夫人陈淑英女士与戴恩赛夫妇孙满等至。十时十五分，孙夫人至，由宋子良为之执伞，障蔽夫人面部，盖夫人雅不欲有人摄影。夫人本日未戴冠，衣青布旗袍，头发向后作结，顶部发略缺，咸系积劳所致，脑际之发较长，覆顶上，苟不细视，不易知也，著青绵丝袜，高跟皮鞋，行动极速，面容愁戚。宋子安扶持，黄琪翔随夫人至，由孙科迎孙夫人至休息室，夫人入室，不作一语，热泪夺眶而出，举室为之黯然。

▲ 家族会议 先是有人主张于入殓之前，向总理遗体“告辞”，文已拟就。大意为某年某月某日，家族等恭请总理入殓等语。此外有其他诸事，亦待商酌，由孙夫人与孙科等在东端休息室内，举行家属会议，佥以诸事办理甚当，告辞可不用，并言总理精神不死，入殓时请勿过事哭泣，遂散会。

▲ 入棺情形 午前十一时，家属均入祭堂，仍放下蓝布幔。郑洪年在内，孙夫人睹总理遗体，大哭不止，声达户外，宋子安请稍保重，夫人不忍，仍号啕不已，且痛不欲生，经郑洪年劝止。孙科与室内诸人，亦各掩泣，未几入殓时间已届，由孙科等升总理遗体至铜棺内，其不平之处，敷以丝绵卷束使安稳，总理贴身盖以白绫被，其上再加棉被，面部仍露，俾将来至京时民众瞻仰。诸事告竣，举行家奠礼，孙夫人哀痛逾恒，大有愿随总理于地下之意，礼成，时正十一时十五分。

▲ 来宾祭奠 十一时半，蒋主席代表何成濬，偕王彭年、陶敦礼、郑洪年、邵

汤、修慧等均至祭堂，行三鞠躬礼。何氏感于总理生前知遇，不胜其悲，由郑洪年招待，旋退至休息室。今日为公祭第一日，外宾先行与祭，届时必有一番盛况。

▲ 设衣物冢 总理家属之意，欲将总理原著之衣物，仍用石龕内之旧棺，置一衣物冢，诸人均表赞同，遂于下午三时在石龕内举行衣物冢成立礼，奏乐行礼如仪。（二十三日）

（《申报》1929年5月26日）

今日起开始举行奉安典礼

上海特别市执委会为纪念总理奉安事件，业经决议办法。自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商店，须下半旗七天，全市民众一律臂缠黑纱七天，并停止一切娱乐及喜庆典礼。六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南市新普育堂，举行盛大公祭典礼。故本埠各界已决定自今日起，一律悬挂半旗七天，以志国哀。

▲ 市宣传部办法通令 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令所属党部云，为令遵事，案奉市执委会议决。关于总理奉安纪念办法：① 自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全市下半旗七日，臂缠黑纱七日，停止一切娱乐及喜庆典礼等七日；② 六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南市新普育堂，举行盛大之公祭典礼，通告各界将挽章画圈等件，先期送市宣传部；③ 略。等因奉此，关于第一项，各区应转令所属，督促执行；第二项，已由本部办理，届时每区党部应派代表四人，每区分部，应派代表二人，前往与祭（是日上午八时至下午八时内，随时可以前往致祭），至于总理安葬宣传大纲，及宣传要点，业经印发，应各遵照宣传，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此令云云。

▲ 外宾定期先后入京 留沪专使只有英国公使蓝浦生及明日抵沪之日本公使芳泽，闻蓝浦生已定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乘商轮晋京，芳泽则定二十七日乘车晋京，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已决定英使由陈处长，日使则由刘科长沿途照料，随同晋京，曹树铭则陪同其他外宾入京，计二十七日赴京者，尚有德参赞华根纳，二十八日有意大利领事，三十一日有美国领事，波兰代办韦登鞑尔、土耳其代办福特培、捷克斯拉夫代表等，二十八日后晋京。

▲ 犬养头山今晚晋京 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头山满两氏，及宫崎龙介等，已定于今晚由沪乘沪宁夜车晋京，业由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向路局预定头等卧车四大间云。

▲ 交署派员招待外宾 江苏交涉公署，以接准外交部总税务司函，派员参加

总理奉安典礼，并协同招待外宾，兹闻该署已派定秘书戴麟藻、交际科长郭德华参加奉安典礼，招待外宾，仅二十八日前抵京云。

▲ 宣传列车明日到沪 两路宣传列车定于二十七日正午到沪，是日下午一时至六时，南市少年宣传团将举行一盛大之演讲会，由一区党部主持筹备，二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在闸北更新舞台举行之，由六区党部主持筹备，以备宣传列车宣传队莅场报告，及举行化装演讲之用云。

▲ 红十字会代表出发 总理奉安委员会前日至本埠中国红十字会总理办事处，两路谓查总理奉安期近，敝组担任卫生暨救护事宜，拟请贵处指派医生护士等，届时莅京，加入工作，所有救护车救护队及一切器具药品等，均由敝组购置完备，无须贵处携带，至来员车众，业由敝组函请铁道部，照顾发给云云。红会据此，已派理事长兼医务长王培元，率领医生护士等于昨日出发。

▲ 滇省铜炉派员运沪 云南省政府献铜香炉一具，该项铜炉，系滇南最著名之东山铜所制，工作精致，形式古雅，与古鼎相似，颇为名贵。业由滇省特派专员运抵沪埠，日内即送往首都。

▲ 沪市政府派定代表 总理奉安，沪市政府代表，业已派定参事孙葆谔、工务局长沈怡、卫生局长胡鸿基、社会局长潘公展、教育局长陈德征等五人，该代表定二十九日晋京参加，

▲ 二师代表昨晚赴京 中央直属整编第二师奉安代表杨愚谷，以奉安期近，日前由闽抵沪，业于昨晚入京。

▲ 黄埔学校代表赴京 黄埔军官学校特别党部出席奉安代表曹世清、黄珍吾、周旋等于前日乘法国邮船抵沪，于昨乘早快车赴京。

▲ 华侨团体代表晋京 北平华侨实业协进总会，公推该会总干事谢仲复为该会参加大典代表，谢代表已于昨日抵沪，今明日搭车晋京云。

▲ 全国商会代表晋京 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推定之总理奉安代表周伯昂、林康侯、陈之英等六代表，定今晨乘早快车晋京。

▲ 新嘉坡派代表晋京 新嘉坡同德会社，特派参加总理奉安代表□统雄、何仲英二氏，业于昨晚乘沪宁夜车晋京。

▲ 奉安日日侨下半旗 驻沪日总领事署，昨日通令居留民会，转令全体日侨公私机关商号住户，于六一孙总理奉安日，一律下半旗一天，以志哀悼。

▲ 南洋职工会派代表 南洋兄弟烟草职工同志会，以总理奉安典礼，特推派

代表江春等三人,定于明日(二十七日)前往南京,以便届时参与。

(《申报》1929年5月26日)

总理灵柩奉移南下

昨晨一时起灵

午后五时开车

北平 今晨一时碧云寺起灵。因坡稍峻、铜棺较重。故照原定杠夫,增加数目。六点半到万寿山,十点后始到西直门,全道铺黄土。(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今晨一时起灵。顺序:一、警马八匹,清道夫十,附以军乐队;二、奉天海军马队四十;三、步兵两团;四、慈幼学生百二十名;五、影亭;六、慈幼学生二百五十名;七、提炉二十二人;八、杠夫百二十,孟傅绶率领;九、卜棺罩;十、孙科、宋庆龄等家族;十一、步兵队;十二、骑兵队;十三、警察队;十四、卫生队。在北新村休息,孙科等先回城休息。五点至万寿山,换大棺罩;八点抵西直门,变更行列;十二点三刻马队甫至西长安街;二时半,棺罩抵天安门,杠夫抬入席棚,下棺罩,由孙科、商震、何成濬,省市指委移棺入站,抬上灵车,由孙科等推入月台;四时半,铁甲车先发压道;五点,灵车开,放炮二百零八响,家族车随行。送殡来宾车六时发。(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今晨准一时,总理遗柩,由碧云寺移至车站,以杠夫三十二人升之,杠夫共八班,轮流替换,沿途有军警保护,并断绝交通,孙夫人宋庆龄、孙科及何成濬等,均随柩同行。并以幼童千人,携灯照耀,由西直门入城,首尾长途一里。道旁观者,人山人海。将抵车站,孙科下车,行于灵柩前,经过特建蓝白色之牌楼而达车站,孙夫人时亦加入,同随灵柩登特备之火车。孙夫人衣黑衫,因经十四小时之行程,状殊委顿,灵柩安置既定,饮泣不已。车站及月台满立执紼之人,一路乐队奏哀乐,观者皆寂静无声,灵柩所在之车,漆蓝色,而缀以银白之国旗,火车全列漆成蓝色,孙夫人在灵车之前一节。午后五时,火车出发,前有压道车,及铁甲车二辆,卫兵车一辆,后亦有铁甲车一辆,殿以送客车,今日外人执紼者,仅前在广州充先总理特别卫队之柯汉氏一人。(二十六日路透社电)

天津 迎柩宣传列车,二十六日午抵津,三十分南下。第一列前导车,下午三时抵津,三十分南下;第二列护灵车,四时抵津,三十分南下;第三列警备车,五时抵津,三十分南下,此系傅作义所派,至德州为止;第四列护灵铁甲车,七时抵

津,三十分南下;第五列灵车,八时抵津,奏哀乐,全体向灵车行三鞠躬,主席周仁齐献花圈,读祭文,再次外宾致祭,礼节同,计有美日德义法瑞士等领事,及义美日等司令,共三十余人,车停三十分,即南下;第六列湖广号铁甲车,九时抵津,三十分南下;第七列来宾车,十时抵津,三十分南下。(二十六日专电)

北平 灵到西直门。正式序列:一、党国旗;二、卫戍马队;三、长矛队;四、军乐;五、总指挥商震及执旗官;六、步兵连;七、步兵连;八、仪仗队;九、张荫梧及执旗官;十、中乐队;十一、步兵连;十二、各团体代表;十三、音乐队;十四、东北陆战队;十五、军乐;十六、赵以宽执旗官;十七、各学校团体;十八、警察及军乐;十九、各校学生;二十、军乐;二十一、楚溪春及执旗官并宪兵队;二十二、军乐;二十三、蒙古代表各机关代表;二十四、骑兵;二十五、各团体代表;二十六、骑兵团;二十七、步兵连;二十八、军乐;二十九、步兵;三十、提炉;三十一、影亭;三十二、灵槨。执绋者林森、省市府委,灵后护宪兵四十六名,及骑兵团、家族马车:一、宋庆龄;二、孙科;三、孙科妻;四、孙满等;五、戴恩赛;六、宋子良、宋子安;七、陈秋光;八、陈铁琼;九、陈少伯。外宾未参加。(二十六日专电)

天津 奉安专车今晚抵此,在总站停半小时,即开往济南,当时有警察特别守卫,不许闲人行近车站,重要人员在月台向灵车行奠礼,外国领事多人亦于礼。(二十六日路透社电)

浦口 平浦通车,二十七日在明光停四小时,让迎榘列车先行,三十下午方始北开,其余军货各行车,暂停一日,以免延误。(二十六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7日)

全国一致纪念奉安

北平 国民党驻法支部奉安代表张忠道抵平。(二十五日专电)

沈阳 二十六日总理奉安纪念,全市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七天。又华北运动会,亦拟该二日起举行,已电国府请示。(二十六日专电)

青岛 总理奉安大典,全市各界一律下半旗,臂缠青纱,并停止宴会舞乐等事,以志哀忱。(二十六日专电)

青岛 胶路委员颜德庆、陆梦熊及职员周钟岐等,二十六晨赴济,参与迎榘典礼。(二十六日专电)

吉林 吉垣今日起,遵照奉安规定,下半旗,停娱乐,志悼。(二十六日专电)

徐州 谭曙乡二十五日由海来徐,参加迎榱。(二十五日专电)

徐州 三师七旗长韩德勤召集军警,会议迎榱警备办法,决由军警分别负责,会同警备。(二十五日专电)

徐州 津浦路警备迎榱路员,一律缚黑纱志哀。(二十五日专电)

徐州 奉安纪念会定二十七迎榱办法:(一)晨八时开迎榱宣传大会,全民参加,由飞机散传单;(二)晚九时半,在站公祭,代表参加,鸣炮二十一响;(三)城站分区由七旅警察警备,郭剑鸣石祖德任总指挥。(二十六日专电)

安庆 省执委邵华、刘真如、金维藩二十六日赴京,参加奉安。(二十六日专电)

南昌 奉安代表周贯虹等,今日赴七本市,今日一律下半旗,并停止娱乐宴会,至六月一日止。(二十六日)

(《申报》1929年5月27日)

使团参加奉安名单

北平 使团参加奉安,除英日捷克波兰等国,由沪经入京,由平南下之名单如次:一、和使欧登科;二、德使卜尔熙,参议飞师闽;三、比使华洛思,参议纪□姆,及西维巨斯;四、古巴代办嘉里嘎;五、丹代办艾克禁;六、西班牙使嘎利德,参赞格爱罗;七、美使马克漠,海军武官鲍维乐,陆军武官马格德,南京领事柏拉司,参赞贝库诺;八、巴西代办苏尔思;九、法使玛德,参赞欧妥乐,陆军武官贾斯维洛;十、英使蓝普森,陆军武官道安过、参赞傅夏礼吉克满叶武灵嘎拉克,随员夏鼎;十一、义使华蕾,参赞查脑,随员,卑使第;十二、日使芳泽,参议重光,参赞天羽,领事岡本,参赞有野杠竹,武官建川杉坡专田,及财务官公森;十三、那威代办欧勒;十四、葡代办费楠德;十五、瑞典代表雷尧武德;十六、教皇代表刚恒毅;十七、波兰代表;十八、捷克代表。(二十六日专电)

浦口 各国公使车,定二十七日由平起程南下。(二十六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7日)

中央举行奉安演习典礼

南京 二十六晨中央举行奉安演习典礼,自上午五时起至十一时礼毕,情形

如次：

▲ 参 加 人 数

晨四时后，参加演礼者，均至中央党部集合，计到有于右任、叶楚伦、王伯群、刘芦口、赵戴文、刘纪文、周启刚、王正廷、朱培德、孔祥熙、焦易堂、张道藩，及谷正伦、陈仪、杨杏佛、姚琮及中央国府职员、军乐队、护灵团、骑兵团等数千人。

▲ 沿 途 戒 备

自晨五时起，由中央党部前中山路，至陵墓止，及禁止各种车辆通行，沿途有国府警卫团、卫戍部、公安局、及党童子军，分段戒备，并由谷司令正伦，亲驾铁甲车二辆，往来梭巡。奉安会卫生组，并将沿途划分为十四救护区，每区组临时救护队，以备救护。

▲ 奉 移 情 形

上午六时，由总干事孔祥熙，宣布起灵，依照秩序：一就位，二肃立，三奏哀乐，四向灵柩行三鞠躬礼，五默哀三分钟，六读谕文，七奏哀乐，八行三鞠躬。礼毕，参加者分左右站立，由杠夫二十人，奉移假灵柩上灵车启行，各参加者，乃趋灵车前，加入行列执绋，行列次序，悉照奉安日规定，沿途秩序井然，市民于假灵柩经过时，悉脱帽致敬。

▲ 奉 安 情 形

十时假灵柩抵陵门，各执绋人员均肃立恭候，灵柩降车升杠，由杠夫三十二人，抬灵柩至祭堂平台前换杠，各执绋人员，乃恭扶灵柩进墓门，全体肃立，敬谨奉安，并照秩序，行礼如仪，由于右任主祭，十一时礼成而返。

（《申报》1929年5月27日）

迎柩奉安之筹备

▲ 迎柩日之海军礼炮

南京 迎柩日海军礼炮，改为二十一响，关于迎柩奉安两日鸣炮，由江宁要塞司令部分配各台担任。（二十六日专电）

▲ 拱卫迎柩之舰艇

南京 海军舰艇奉调来京，拱卫迎柩者，为通济、楚有、豫章、建康、威盛、德胜、武胜、湖鹏、利通、仁胜、正胜各舰，及列字鱼艇，海军部扎大牌楼一座，结构颇有意义，关门三，取“三民主义”，隔极五，取“五权宪法”，上覆地球，中航行，

更上植党徽，取义为海军舰队，奉行党的使命，靳达“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之意。
(二十六日专电)

▲ 海军行列之次序

南京 海军就第三列，酌定次序：① 执旗军士两名；② 护旗军士两名；③ 军乐队官兵一百五十名；④ 各级官兵百余员；⑤ 配花环士兵百名；⑥ 指挥官，建康舰长史国贤；⑦ 舰队士兵两连。(二十六日专电)

▲ 参加迎榱团体之秩序

南京 参加迎榱团体行至距中央党部相当地点，总指挥发令停止，站立路之两边，举行敬礼，俟灵榱通过后，由行列指挥，领至相当地点，交原机关或原团体自行。主管灵榱左右后之护卫队，至中央党部大门前停止，俟灵榱至大礼堂后，始可退回。(二十六日专电)

▲ 推员审查代表资格

南京 奉安会推赵□文、连声海负责审查参与奉安代表资格。(二十六日专电)

▲ 奉安日空中警备

南京 奉安日空军警备事宜，决由航空署派飞机五架，随榱飞行，以资严密保护。(二十六日专电)

▲ 参与奉安人员之服装

南京 参与奉安人员服装，规定军常服用深灰色布，长袂脚，灰色手套，不佩刀，仍配原规定之证章符号。总理陵场，装设播音机，由京电话局办理。关于各大学各专门学校派代表参加奉安之范围，大会决议，由教部审查合格，准予参加。
(二十六日专电)

▲ 参与奉安典礼之名流

南京 奉安会以唐绍仪来京，参与典礼，列为总理亲故，发特别符号。
(二十六日专电)

南京 叶恭绰决来京参与奉安大典。(二十六日专电)

▲ 参与奉安之军界代表

南京 方振武派其驻京通讯处处长吕织桥代表参加奉安典礼。(二十六日专电)

南京 刘珍年派王冲天为参加奉安代表，已报道。(二十六日专电)

▲ 影片公司摄制影片

南京 奉安日大中华公司摄制影片，由中官邸指挥，其余各家，由办公处派

员指挥。(二十六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7日)

参加奉安典礼昨讯

▲ 市府两代表晋京 市政府派定赴京参加奉安典礼之代表,为社会局长潘公展、教育局长陈德征、公务局长沈怡、卫生局长胡鸿基,及参事孙葆谔,兹闻潘陈两局长,已于昨晚乘十一时夜快车晋京,胡沈两局长及孙参事,定今晨乘早车赴都。

▲ 宣传列车今日到沪 总理奉安,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自二十五日由杭出发后,兹悉业于昨日下午驶抵嘉兴,准今日上午开抵松江,下午可到上海南站,同时即举行演讲游艺及映演电影。二十八晨,由南站开至北站,四各项宣传完毕后,即转道开赴苏州,依次而达首都云。

▲ 美制之纪念章 大陆报云,此次奉安处所备之奉安纪念章,系在美国定铸,共一万枚。章作圆形,径长三寸,白铜质,一面镌总理像,一面镌陵殿园,系美国著名雕刻家爱的肯制模,异常精致。由驻美公使伍朝枢于一月间向纽约徽章美艺公司定铸,得上海美领事署与美国国务院之赞助,故竣工非常神速,共分三批装运,于四月二十日全数到沪。至其制型程序,则用爱氏先用软土或石膏制成十八寸直径之模型,经伍使审定后,即制成阴模,模成,始交公司以最精确之机器应用缩图器原理铸成与徽章同大之母模,而开始鼓铸,现闻伍使复命公司就十八寸之原模制成铜碑,俾将来置于陵殿,作永久纪念云。

▲ 宫崎龙介等晋京 参加孙总理奉安大典之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头山满等,改于今晨八时五十分,乘沪宁特快车晋京,同行者有犬养毅公子犬养健、头山满三公子及古岛、萱野、板野、宫川、清水、近藤、高洲佃、水野、尾崎、大久保、本间、大籾、中野、山本、大桥、藤本、辻、长田、荻野、宫崎、巡查,及仕女山本田边,共三十余人。所有犬养氏等恭送花圈提灯等,共装十六大箱,业于昨晚由殷汝耕司长先期送至南京。车座亦已由张市长向路局订定头等车一辆,沿途由戴季陶院长代表陈秘书,及交通部航空司长殷汝耕招待。昨晚先行晋京者为宫崎龙介、宫崎民藏夫人、宫崎电作、宫崎滔天夫人、山田夫人、菊如夫人、仓地及松本共九人。

▲ 菲岛华侨代表抵沪 菲律宾殊口汝省Sorsdgon中华学校校长及救国会主席吴善禧,于昨日(廿六日)乘山东轮抵沪,现寓大东旅馆,定于日内晋京,代表该省华侨,参加总理奉安典礼。

▲ 劳大奉安代表晋京 国立劳动大学熊梦飞等三人,学生方面俞仲口等三人,已先晋京,参加总理奉安大典。

(《申报》1929年5月27日)

本府为总理奉安通告市民

▲ 市民一律停止宴会共七日

▲ 由廿六日起至六月一日止

▲ 全市下半旗旗顶缠挂黑纱

本府奉令通告市民谨遵奉安办法,兹将本府通告照录如下:(上略)关于迎榇奉安日,市民应注意之事项一案,(中略)仰本市民众一体敬谨遵照理,此布,计抄贴原案。迎榇奉安日市民应注意之事项(第十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一)由五月廿六日起,至六月一日止,市内各商店住户,均下半旗或在旗顶缠挂黑纱;(二)由五月廿六日起,至六月一日止,市内各戏院各娱乐场均停止营业;(三)由五月廿六日起,至六月一日止,市民须一律停止喜庆及宴会;(四)奉安日正午十二时起,市内一切交通汽车火车马车平车及他各项车辆,一律停止三分钟;(五)奉安日正午十二时起,市民一律停止工作三分钟,静默志哀;(六)奉安日正午十二时起,路人行人均须驻足肃立,静默三分钟志哀;(七)奉安时以电灯为号,是日正午十二时前三分钟,将全市电灯一律放亮,全体市民见电灯放亮,均须准备,至电灯熄灭时即停止工作,驻足默念,至电灯再放亮为止;(八)迎榇及奉安行列经过时,市民在路旁参谒者须先在迎榇大道两旁行人路上指定地点肃立恭候,灵榇经过时,脱帽肃立致敬;(九)在迎榇大道两旁参谒之市民,须谨守秩序,并须绝对受警戒,纠察者之指导;(十)迎榇日迎榇大道下关至中央党部一带,由灵车到达浦口时起,至行列经过后止,迎榇日迎榇大道由中央党部至陵墓一带,由上午五时起,至行列经过后止,暂行断绝车马交通,届时各项车辆,均须绕道行驶,推交叉点除行列经过时外,仍准来往。

(《申报》1929年5月27日)

灵车今晨可抵达浦口

车站四周警备森严

威盛军舰指定运榇

济南 八点半灵车抵济,党政军各界领袖代表,均到站恭迎公祭,英、美、德、

日各领均到。车进站时，鸣礼炮廿一响，张金鉴主祭，陈调元读祭文，军警戒备甚严，九点十分车南开，宋庆龄、孙科、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张继、史蒂芬，均随车南下。（二十七日专电）

济南 今早七点半，各界在津浦站前开迎榑纪念大会，到五百余团体，十万余人，同时举行迎榑纪念碑奠基典礼。（二十七日专电）

济南 今日过济南下车，共七列，一宣传，二前导，三铁甲，四步兵，五铁甲，六灵车，七铁甲，八随员。（二十七日专电）

徐州 奉安十列车，变更顺序，第三列铁甲车抵徐停开，第四列铁甲车取消，第九列随员车第十列来宾车，合并今日共七列车，由徐南开，另加公使车一列，定明晚过徐南下。（二十七日专电）

徐州 奉安车十列，均按规定时刻开行，二十七午一时十八分，宣传列车已首先过徐南下，灵榑车准晚九时十八分过徐，来宾车最晚可于晚十一时三十三分过毕，徐站警卫极严，定由每团体派代表二人到站公祭。（二十七日专电）

徐州 二十七晨八时，各界在东站开迎榑宣传大会，到两万余人，赖家铎主席报告，韩德勤等有演词，当场提案，通电讨冯，一致通过，十时闭会，是日由飞机翔空散传单，普通宣传。（二十七日专电）

徐州 六路军派兵一营，二十六晚由南过徐，北上迎灵。（二十七日专电）

浦口 威盛军舰指定为运总理灵榑渡江，靠第一码头，德胜军舰为中央各委员要人，及高级长官乘坐，靠第二码头，招商沪平两轮，备为代表及外宾等用，其余各小轮，各拖木驳一只，备作装军队等之用，每半小时，各开一次。（二十七日专电）

浦口 津浦路奉安委员会灵车抵站时，行仪如下：① 肃立；② 奏哀乐；③ 默哀；④ 向灵榑行三鞠躬礼；⑤ 奏哀乐；⑥ 奉移卫戍司令部在浦口四周架设大炮，及机关枪，以资警备，今日五时戒严，其余各要口，俱站有岗位。（二十七日专电）

滁州 灵车第一列前导车，将于二十八日零时五分最先到，灵榑车在第七列，八时零五分到滁县，各界迎榑大会通知各界，二十七日下午十二时齐集车站，准备迎榑，并公祭。（二十七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8日）

首都人士准备迎榑

▲ 中府各委今晨渡江

南京 中央党部秘书处，二十七日通知执监委员，谓中央委员及国府委员等特任官，准予二十八日九时，渡江迎榑。（二十七日专电）

▲ 灵榑到浦口之时刻

南京 孙科二十七日电京报告，总理灵榑准予二十八晨十时十五分到浦口。（二十七日专电）

▲ 卫戍部下令戒严

南京 卫戍部二十七晚下令戒严，并派队在各处彻夜巡查，十一时起，中山大道挹江门禁止通行。（二十七日专电）

▲ 发引时刻拟提前两小时

南京 奉安会拟将总理灵榑自中央党部发引时刻，提前二小时，仍俟总理家属迎榑专员到京后决定。（二十七日专电）

▲ 中央秘书处之通告

南京 中央党部秘书处二十七日通告：① 关于总理奉安中央党部全体职员参加行列事宜，现经常务委员决定，推褚委员民谊，为本部全体职员总指挥，并定于本日下午四时，在本部运动场排队演习，所有各部处工作同志，务须准时参加；② 顷准总理奉安委员会函知，该会第四次指挥会议议决，京内各机关参加迎榑团体代表等，规定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到达集合地点，十时集合完毕，在案请查照办理等由，特此通告；③ 在奉安公祭期间，本党部大门以内，祭堂前后左右四方空地，及二门阳台上，一概不得逗留徘徊，又沿祭堂楼上周口，除军乐队外，无论何人，不得入内。（二十七日专电）

▲ 迎榑行列之指挥

南京 奉安会总干事通知总指挥，行列两旁，须有官长数人，骑马往来指挥，俾资整齐，迎榑日派三十一团长刘汉会，在下关江边，负责指挥。（二十七日专电）

▲ 中央党校定期公祭

南京 中央党校全体，定三十日下午一时举行公祭。（二十七日专电）

▲ 外部派员招待各国使团

南京 外部派定负责人员，招待各国专使，刘迺藩招待荷兰专使，刁敏谦招

待英国专使，于煊吉招待美国专使，刘锡昌招待法国专使，黄中苏招待义国专使，周泽春招待德国专使，王延熙招待比国专使，许念会招待波兰专使，冯玉陨招待古巴专使，谢冠生招待教廷专使，沈维新招待丹麦专使，楼光来招待那（挪）威专使，刘家□招待葡萄牙专使，胡文炳招待巴西专使，何秉□招待捷克专使。（二十七日专电）

▲ 参与奉安人员

南京 蔡元培二十七日返京，因沿途劳顿，对往访者，概未接见。据蔡左右云，蔡此来系参加奉安典礼，对监察院长职，函愿早日卸责，仅负中央研究院责任，拟奉安后仍赴沪。（二十七日专电）

南京 何香凝二十七日来京，参加奉安典礼。（二十七日专电）

南京 张之江二十七来京参加奉安大典。（二十七日专电）

南京 唐绍仪二十七日到京，参加奉安大典，定六月二日返沪，放洋赴美。（二十七日专电）

▲ 被压迫民族之代表

南京 东方被压迫民族推派代表二人，大韩民国政府推派代表一人，准加入第五行列。（二十七日）

▲ 中央党部演习仪节

南京 中常委决定，以褚民谊为中央党部职员参加奉安行列总指挥，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并召集全体职员，在本部运动场排队演习。（二十七日专电）

▲ 市卫生局组救护队

南京 京市卫生局担任奉安卫生组，由沪购来救护车，已预先演习。（二十七日专电）

南京 市卫生局长胡定安，任奉安卫生组副主任，兼救护队主任干事，派定该局职员二十余人，担任巡回救护，其救护队之组织，为医师二人，护士一人，卫生警士三人，义务四人，关于中山路清道事项，自二十七日起，至奉安日止，已派定相当夫役人等，分段扫除。（二十七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8日）

国府公祭总理文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王

宠惠、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暨各委员及文官处参军处职员祭文：

于戏！揽金陵之形胜兮，实建国之良基；仰钟山之岩峤兮，奉神灵而永绥。弘惟总理兮，先觉先知□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首倡国民革命兮，醒万众之恬嬉。创行三民五权兮，范千古而不遗。故夫颠覆满洲政府兮，举天下而公之。苟一夫之不获兮，由已溺而已饥。□涤军阀之割据兮，抗帝国主义之陵摧。四十载如一日兮，曷备历程败利钝而不疑。俛尧帝而薄汤武兮，固将□斯民于雍熙。中华民族其自由平等兮，亦大同之可期。地坼兮天崩，山枯兮海泣；日惨惨兮画冥冥，风泠泠兮云幂幂；悲当年兮鼎湖，攀龙髯兮莫及；惟党人之继迹兮，逾五岭而北征。荷在天之威灵兮，振大军之天声。三年战伐兮，壹朔南以告武成。懔威棱于全国兮，已鲁离而宏汉京。其有或侵或畔之人兮，亦必大刑而用甲兵。持奋门之精神兮，维世界之和平。弓剑犹新兮，山河益壮。列强来盟兮，四方会葬。瞻遗容兮如生，迎灵□兮凄怆。卜山陵兮穹崇，岂明祖兮敢况。相虎踞兮，伫马归兮牛放。吉日兮辰良，灵之来兮洋洋。萃万国兮冠裳，执圭璧兮馨香。功烈炳然兮久长，与日月兮齐光。千祀万岁兮，祚轩辕苗裔于无疆。尚飨！

（《申报》1929年5月28日）

公使专车昨晚南开

北平 十七国公使及教皇代表，今日下午五点专车南下，参预奉安。内波提两代表，已由沪迳赴京，故未在列车。（二十七日专电）

天津 参加奉安典礼之各国公使二十六人，由平专车，二十七晚九时过津南下。（二十七日专电）

南京 平保管档案处长祁大鹏，电告外部，各使参预奉安事，均经接洽名单已宣布，使团车二十七日开行。（二十七日专电）

济南 公使车定勘早八点四十抵济，九点十分南开。（二十七日专电）

北平 电载外交员赴京参与奉安大典之专车，今晚五时出发，除荷使德使比使西班牙使美使法使意使挪瑞典代使外，尚有各使署之秘书与随员若干人。（二十七日路透社电）

北平 参列奉安典礼之外交团随员等一行，本日午后五时乘专车赴南京，接伴委员沈颢鼎等同行。（二十七日东方社电）

（《申报》1929年5月28日）

苏省会各界筹备奉安公祭

江苏省党部昨日(二十六)下午二时,召集省会各界,开总理奉安公祭典礼筹备委员会,共到代表五十五人,由省党部代表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后,即通过委员会简则,推定省党部、省政府、赣汇县党部、省会公安局、镇江商会为主席团,又推定省党部为宣传部股主任,财政厅为会计股主任,镇江商会为庶务股主任,交涉公署为交际股主任,每日在省党部办公,至总理奉安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到镇时,应行筹备事项,亦由该会办理,议毕散会。

(《申报》1929年5月28日)

宣传列车昨日抵沪

▲ 昨日抵沪情形 总理奉安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于昨日下午二时,由松江开到南站。本市市党部已先期派员到站欢迎,列车演讲队一到,即坐市党部所备汽车,到西门少年宣讲团,时一区党部已召集市民,开奉安宣传大会,到会者六百余人,楼上、下座坐均满。二时二十分开会,由朱□清主席主席报告后,即由列车演讲队演讲,先后演讲者有黄濬、刘百川、郑震宇、程子敏、陈侃、孙乐陶等,听众大受感动,台下鼓掌声不绝。演说毕,复由少年宣讲团表演“总理伦敦被难记”,观众称善不绝,至六时始散。

▲ 今日预定程序 两路宣传列车,今日上午,在闸北更新舞台举行宣传,闻市府前已由六区党部奉市部命令,筹备市民大会,即假闸北更新舞台为会场,场内布置异常庄严,该区党部已推定江季子、姜怀素、黄金灿、陈宣人、周永年为主席团,下午该列车即向沪宁路上,开赴昆山工作云。

(《申报》1929年5月28日)

中外参加奉安代表

▲ 纷纷晋京

▲ 外宾今昨联袂入京 英公使□溥森,定今晨乘英国兵舰入京,土代表福德培、捷克代表倪慈都、波兰代表魏登什尔均定于今日夜车入京,德代表华根纳则已于昨日入京矣。

▲ 外报代表今晚赴都 美哈司脱代表魏甘特、英赫伯爵夫人及美国联合社

经理高尔德三氏均于今晚起程赴都，参观六月一日举行之总理奉安典礼。

▲ 犬养毅等昨晨晋京 日本犬养毅、头山满等特于昨日上午，乘路局特备之花车，附挂于七点三十分特快车赴京。临行时，送者有陈世光、重光葵等十三人。

▲ 梅乐和定期晋京 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氏，将于本月三十一日赴京，参与总理奉安大典。

▲ 驻日总支部代表林振雄赴京 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部代表林振雄，于昨下午四时，乘上海丸抵申，即晚夜车赴京。

▲ 何东昨晚晋京 何东由英转温哥华来沪，拟入京参加奉安大典，经上海商整会常务虞洽卿，代电蒋主席请示，昨日得复，略谓：敬电悉，何东君拟来京参加奉安，极表欢迎，蒋中正云云。何氏得电后，昨已乘车入京矣。

▲ 商整会代表晋京 上海特别市团体整理委员会所推之参加总理奉安代表叶惠钧君，于昨日（二十七日）上午乘头班快车赴京，虞洽卿等乘夜间快车动身，在京已包定旅社，俾便集齐后，同往致祭，所有祭文挽联，由虞君带往。

▲ 地方法院停公一天 上海地方法院定于六月一日（星期六）停止办公一日，以示哀思。

▲ 粤省花木由沪运京 粤省建设厅长马俊超，选择该省出产花木一百零九件，均系精奇特产，于本月十八日，派员赴塔广利轮运沪，昨日始抵埠，当晚即由沪运往首都矣。

▲ 交易所停市一天 交易所联合会，因六月一日，为先总理灵柩奉安之期，特于前日开会决议，各交易所于是日停市一日，借仰哀感云。

（《申报》1929年5月28日）

日使芳泽昨日抵沪

▲ 昨晚乘兵舰入京参加奉安

▲ 订约会议定六月下浣举行

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氏，为参加奉安典礼、呈递国书，及进行订立中日商约事宜，已于昨日下午三时，偕一等书记官天羽，乘上海丸抵沪，即晚乘日本兵舰赴京，参与奉安典礼。昨在虹口汇山码头迎迓者，有驻沪日总领事重光葵、日使馆参赞有野、正领事上村、副领事田中，及日领馆人员、驻沪日本海陆军军官等人，外交部长王正廷，亦派驻沪办事处主任陈世光、科长刘云舫，于芳泽抵沪及上兵舰

离沪入京时,代为迎送。

▲ 参加奉安 芳泽公使,昨日抵沪时,与本报记者谈话云:渠此来专诚参与奉安大典,晚间即乘兵舰赴京,此次中国奉安典礼,日本政府已训令在华日使馆及领事馆,于五月二十八日及六月一日下半旗两天,表示哀思。

▲ 呈递国书 关于早递国书问题,芳泽公使亦云:渠于二十九日晨,即可抵京,预定于三十日向国民政府蒋主席呈递国书,此则表示日本政府之正式承认国民政府。

▲ 订约会议 芳泽公使于前次在京签订中日宁汉两案时,外交部长王正廷即与之举行首次订约会议,并将我方所拟就之新约草案提出,已由芳泽携带回国,呈交日政府参观,日方之新约草案,闻尚在拟议中。芳泽昨为订约问题声明云:中日订立商约会议,决定于六月下旬举行,会议地点,在京在沪,尚未决定,大致在沪会议居多。日本政府订约前途如何,虽未敢预测,惟甚愿诚心诚意进行谈判,并希望在最短期间,圆满解决,至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亦将在订约会议中协商。日政府对此问题之态度及方针,恕未能先事宣布。

▲ 使馆升格 外传日本驻华公使馆,已决定升格为大使馆,有芳泽公使升任驻华大使。芳泽昨云使馆升格问题,日本政府正在预备中,惟在半个月内,恐难实行。

▲ 芳泽行程 芳泽公使此次在华行程,业已决定如下:昨晚上船,今晨启碇离沪,明晨即可抵京,午后拜访王外长,三十日向国府蒋主席呈递国书,六月一日,参加奉安典礼,六月二日,蒋主席欢宴,六月四日或五日离京来沪,勾留一二日离沪,赴北平一行,六月二十日左右,再来沪,即与王外长举行订约会议。经日使馆参赞有野已于上星期六抵沪,堀内参赞尚留东京。日政府之新约草案拟妥后,携带来沪,提出订约会议。

(《申报》1929年5月28日)

总理灵柩昨日奉迎到京

南京 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平时,因国事蜩螗,停灵西山,四年未得安葬,兹者北伐完成,全国统一,爰由中央决议,于六月一日,奉迎安葬于首都之钟山总理陵墓,并特派林森、吴铁城、郑鸿年三专员,赴平恭迎,总理家属亦先后到平,料理一切。灵柩于

五月二十五午夜，由西山奉移，二十六日下午二时抵平，五时由平登车启行，沿途各大站，均略停片刻，以受各该地民众之公祭典礼，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五十分，灵车乃安抵浦口，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员、各地迎榘代表，以及中外来宾，均至浦口车站恭迎。兹将详细情形，分别记录如下：

灵榘自车站至江干

▲ 灵车到站情形

灵车抵站，赞礼员呼脱帽致敬，并奏哀乐，车站各随榘人员下车，复由赞礼员呼：① 奏哀乐，并行三鞠躬礼；② 默哀三分钟；③ 中委国委各特任官、总理亲故家属上车，恭迎灵榘下车换杠。此时蒋中正、孙科、宋子文、宋庆龄、宋美龄、谭延闿、胡汉民、戴传贤、孔祥熙、杨树庄、吴铁城、郑鸿年、林森及总理亲故等，均登车，另由杠夫十余名，将灵榘由车上扶下，蒋孙等均扶榘而行，宋庆龄随榘后，并用手扶榘前进，泣不止，灵榘至杠旁，由孔祥熙指挥将灵榘外盖除去，另覆红绶，正中为青天白日旗，布置毕，蒋等仍回原立处肃立，并由赞礼呼奏哀乐，全体脱帽致敬，乃由杠夫三十二人，恭奉陵员榘，就道直趋威胜军舰，灵榘前由军乐队奏哀乐，蒋等均随行，灵榘上军舰时，哀乐齐作，蒋等于乐声中，分左右排立，俟灵榘安放毕，全体致敬礼，礼毕，蒋等至停灵处侍立，旋开舰，十二时十分抵下关。

▲ 灵车月台之布置

总理灵榘专车，停靠于浦口五号月台，月台口搭有牌楼一座，前面为“总理奉安典礼”六字，后面为“总理精神不死”，下车右行为浦口站新关马路，两旁团以青白色相间之布，高可四尺，路中共树牌楼三座，颜曰“总理奉安典礼”，此路直达灵榘渡江之一号码头。

▲ 车站四周之布置

浦口站之布置，颇极悲壮肃穆，站之四周，遍悬党国旗及标语，月台前之标语正中为“安葬我们的总理”，左旁为“打到荡意阻挠总理安葬的冯玉祥”，右旁为谨以至诚恭迎总理的灵榘南下”，其余为“行政开始要贯彻以党治国的主张”、“发展交通事业，是实行民生主义”等标语，鲜艳夺目，颇为观众所注意，

▲ 迎榘舰之布置

迎榘渡江之威胜舰，于二十八日晨五时，即山下关海军总司令部码头开至浦口第一码头停泊，舰之布置，已志昨日本报，颇为庄严，码头两旁，站有卫兵二排，精神抖擞。

▲ 车站之戒备

自浦口车站至迎榑码头,由首都卫戍部派队两连,并由公安局派得力钦察,协同在车站内外及码头一带警戒,同时由党童子军部,派童子军多人,在车站内外,担任维持,自九时后,凡非迎榑人员,咸未佩带证章者,均不予通过,戒备极严,此外浦口公安局方面,派警协助,并派遣救火车一具,驻扎站旁,以备不虞。

▲ 空中之戒备

是日除浦口车站,由得力军警戒备外,航空口并派飞机数架,于奉安专车未到竣前,在浦口空中飞行,以资警戒。

▲ 渡江迎榑人员

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均与九时渡江至浦口,恭迎总理灵榑,计到有中委、国委、各特任官、外宾、各团体代表等,名单如下:陈嘉佑、焦易堂、恩克巴图、刘文岛、方觉慧、王正廷、魏道明、易培基、宋渊源、蒋梦麟、戴季陶、李文范、赵戴文、陈耀垣、桂崇基、谭延闿、胡汉民、陈果夫、刘庐隐、陈肇英、杨杏佛、吴稚晖、蔡元培、王宠惠、王柏龄、克兴额、叶楚伦、孔祥熙、林翔、邵元冲、邵力子、王伯群、于右任、丁超五、宫崎震作、杨树庄、宫崎龙介、头山满、犬养毅、国府顾问宝道,及梅屋庄吉、许世英、陈仪、陈绍宽、葛敬恩、陈立夫、陈之英、张道藩、曾养甫,及亲故黄铎书夫人、孙满夫人、容当夫人、简吉堂小姐等。

▲ 招待地点之布置

站之左侧为临时搭盖之招待处,系专招待各团体代表中外新闻记者,内部布置,共置方桌十五,四周围一长桌,备有茶点,由沈卓吾、郑安国等任招待,站前正中,亦为一临时搭盖之招待处,系专以招待各机关人员各侨宾者,内部布置大致相同。站内楼上津浦路局之办公室,为中央委员、国府委员、高级长官及外宾招待处。孙部长休息室,孙夫人休息室,蒋主席休息室,均另开一室,布置均整洁。

▲ 各车到站时间

此次由平随同奉安专车南下者,计有宣传列车(上午二时到浦),第一列前导车(上午五时到),第二列铁甲车(五时四十五分到),第三列铁甲车(七时四十五分到),第四列步兵车(上午八时三十分到),计十二辆,系方振武部四十五师第一百三十五旅二百六十九团第一营全营兵士,第五列铁甲车(九时十五分到)。十时五分,有一专车到站,本系蒋乘座,原拟仍乘该车来京,嗣因在蚌随灵车来京,故该车先开载总部职员来京。第六列为灵榑车,原定上午十时到,嗣因在蚌停

留约二十分钟，故迟至十一时到站。第七列铁甲车、第八列随员车、第九列来宾车，均于灵柩车到站后一小时后，陆续抵站。

▲ 炮台海军鸣礼炮

总理灵车到达浦口车站一小时以前起，由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总理灵柩上军舰时，我国军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迫宁各外舰各鸣礼炮二十一响。

十二时十分威胜舰抵下关

▲ 入 城 情 形

威胜舰于十二时十分抵下关，中山码头宋太夫人及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均在□船上恭迎，舰抵岸后，宋等乃上舰谒灵，并与宋庆龄及总理亲故，一一晤面，旋由杠夫二十余名率移灵柩上岸，抬入灵车，即向中央党部前进，蒋中正、孙科、胡汉民、戴传贤、王宠惠、杨树庄、陈果夫、陈立夫、宋子文、邵力子、叶楚伦，及中央国府各委员特任官等，均随灵车前后，执绋步行，谭延闿、蔡元培，及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总理亲故等，分乘马车多辆，随灵柩至中央党部。沿途两旁，参谒民众，约十万余人，当灵车经过时，均脱帽肃立致敬。

▲ 城内之戒备

自上午七时起下关至中央党部一带即由卫戍部及公安局，派设部队警察，分任警戒，八时后，即禁止通行，各兵警均武装上刺刀，站立两旁，戒备极严，灵柩经过时，并由兵警多名，沿途背立举枪，作欲□状，以防危险，此外并由航空署派飞机多架，翱翔天空，除散发各项奉安传单外，并担任空中戒备，至灵柩过后半小时，即恢复原状。

（《申报》1929年5月29日）

盛大之迎柩典礼

▲ 迎柩行列之秩序

本日参加迎柩之各机关职员，各团体代表等，不下六七万人，均于上午八时后，齐集中山大道、中山码头附近指定地点，排成行列，恭候灵柩渡江，灵车由码头出发后，各迎柩人员，乃照行列次序，徐向中央党部前进，沿途步伐整齐，秩序井然，哀乐幽越，充满悲壮严肃之气象。

迎柩行列计八列，第一列前，导以铁甲车二辆，车后孔祥熙乘马，执总干事

旂,及传达员军官一先导,次照规定次序,排列如下:

第一行列 ① 骑兵官员一员(乘黑马执黑地白边旗开道上书总理奉安开道六字);② 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③ 骑兵二名(乘黑马背枪各执党国旗,党旗在右,国旗在左);④ 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⑤ 军乐队;⑥ 骑兵连执长矛;⑦ 总指挥朱培德,前一兵执口指挥旗,后二兵随行,均乘马。

第二行列 ① 军乐队(淞沪警备司令部);② 步兵一团(枪口朝下)(陆军教导队)。

第三行列 ① 海军军乐队;② 海军陆战队(枪口朝下);③ 海军军官长士兵(枪口朝下)。

第四行列 ① 警察乐队;② 员警官长士兵均背枪(枪口朝下)。

第五行列 ① 军乐队;② 行列指挥姚琮;③ 农民代表;④ 工人代表;⑤ 商民代表;⑥ 学校代表;⑦ 学生团体代表;⑧ 妇女团体代表;⑨ 其它团体有遗族学校、回教代表。

第六行列 ① 军乐队;② 行列指挥谷正伦;③ 海外华侨代表;④ 蒙藏代表;⑤ 各编遣区各师旅各舰队各航空代表计为编遣会职员、第一编遣区经理分处职员、江宁要塞司令部职员、军政部职员、参谋本部职员;⑥ 各省市府代表;⑦ 各机关职员计有建委会、军官学校训练总部、公安局、中大教育行政院、审计院、国术馆、禁烟委员会、中央研究院、京市府、蒙藏委员会、赈灾委员会、卫生部、江宁县政府、交通部、电政管理局、外交部、邮务管理局、财政部、工商部、教育部、司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检察署、法官惩戒委员会、农矿部江宁地方法院、赈务处、内政部、铁道部、陵墓拱卫处、考试院、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行政院、国府等职员;⑧ 各省市党部及特党部代表、计京市党部及各级党部执监委员军校特党部;⑨ 中央党部全体职员、迎榑宣传列车委员会等。

第七行列 ① 军乐队;② 行列指挥刘纪文;③ 军校全体;④ 总理遗像亭,亭前有黑地白边旗二面,上书“肃立敬礼”四字、亭内有遗像一,像前置纸花甚多;⑤ 国委及各特任官;⑥ 中央执监委员;⑦ 总理亲故;⑧ 总理家属;⑨ 灵车车前有肃立敬礼旗两面;⑩ 步兵一连;⑪ 马车。

第八行列 骑兵一队殿后(执长矛)

以上迎榑人员除国委、中执监委、总理亲故、家属均随灵至中央党部外,余均于到达中央党部后向高门楼一带解散。

▲ 亲族人数 亲族参加者有孙夫人宋庆龄、孔夫人宋霭龄、孙科、宋子文、孙科夫人及两公子、孙小姐、戴思贤夫妇、宋子良、宋子安、陈秉光、陈夫人、陈铁珊等二十余人。

▲ 参加迎柩外人 本日参加迎柩外人除国府顾问宾道及头山满、犬养毅、梅屋等外尚有日人多名(名单已见报载),各国专使则因尚未到京故未参加,此外随灵来京者为前总理卫队之柯汉。

▲ 执紼人员之服装 是日中央国府委员各特任长官均着蓝袍黑马褂,孔祥熙着白色公务员装,杨树庄陈绍宽均着海军服,蒋中正着黑马褂淡色长衫,孙科着黑马褂黑袍黑帽,宋霭龄、宋美龄均着黑布旗袍,总理亲故亦均着黑服并各缠黑纱。

▲ 孙夫人泣不成声 宋庆龄身穿黑布单旗袍足登黑皮鞋,发髻后随,精神尚佳,惟气色稍见憔悴,自浦口移灵至中央党部停灵均泣不成声。

(《申报》1929年5月29日)

午后三时停灵中央党部

▲ 灵柩抵中央党部情形 下午二时五十分,灵车至中央党部,军乐队在大门内阳台下奏乐恭迎,参加之各行列并不停留,向高楼门马路方面解散,只有总理亲故、总理家属、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入内恭候,迎柩之军警除护灵队恭随灵柩入中央党部外,余均前进至高楼门马路,车队散去,此时由奉安委员会总干事指挥□□夫敬谨移灵下车,恭扶入内,奉停于大礼堂之中央。

▲ 停灵礼情形 灵车于二时五十分到中央党部二进大门前,中央执监委员国府委员及家属等,分列两旁,当由总干事孔祥熙指挥扛夫二十名将灵柩由灵车内扶出在哀乐声中徐徐入大礼堂,各中委及家属随灵齐进三时五分扶至灵位停灵,扛夫分左右退出,即行停灵礼:(一)就位,家属在第一列,中委及特任官在第二列;(二)肃立;(三)奏哀乐;(四)向灵柩行三鞠躬礼;(五)默哀三分钟;(六)孙科献花;(七)奏哀乐;(八)行三鞠躬礼,礼成。当奏哀乐时宋庆龄泣甚久,何香凝哭泣成声。分班守灵,停灵礼行毕后各中委及特任官及家属均由右首边门退出,留孙科、胡汉民、孔祥熙、谭延闿等分班守灵。

▲ 灵堂内外之布置 中央党部相距中山路之交叉地点设大照楼一座,路口前后左右军警密布,有男女童子军分布岗位,并乘自行车往来巡查,维持秩序。由交叉地点至中央党部路亦满布军警、遍悬党旗,大门外由布置股设摄影处扎成精

密之短□□，二门洋台上高扎松坊、悬总理遗像于极巅，缀以各种素色之花球，门楣上并进口处，右边一门为出口处，灵堂外设各界候祭室，并设奉安公祭上方环以光耀夺目之铜□□，上方额以“精神不死”四字，旁有花塔二座，及各种花圈，灵案上有右鼎一座，盖以名香、银花瓶二只，供以□□花，四壁悬总理年表与花圈，灵案前设主祭席，左右为与祭席、祭文案、纠仪席、宜赞席、陈设席，上设军乐席，地板上满铺彩色线毯，一切陈设井然有序极成庄严肃穆之象。

（《申报》1929年5月29日）

公祭时间之规定

公祭时间已由奉安会定自二十九起至三十一止，已于灵堂附近特设候祭室五所，以原中央第二会议□□为第一候祭室、职员饭厅为第二候祭室、中央通讯社为第三候祭室、交际科为第四候祭室、原第十区党部为第五候祭室。

二十九日晨七时，中央党部委员及职员国府主席委员及职员。八时，编委会各省各特市党部代表。晨九时（甲）各省各市府代表首都特别市党部及所属执委。晨十时行政院及各委员会、立法院。十一时，司法院及所属各部会考试院。十二时，财政部及所属机关、军政部及所属机关、工商部所属各机关。下午三时，教育部及所属各机关、铁道部及所属各机关、卫生部及所属各机关。下午四时，海军部及所属各机关、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下午五时，首都卫戍部、首都特市府及所属各局、各编遣区及各师旅各司令部、各舰队、各航空代表（集团祭）。

三十晨八时，华侨代表（集团祭）；九时农民代表（集团祭）；十时工人代表（集团祭）；十一时商民代表（集团祭）；十二时学校及学生团体代表（集团祭）；下午一时，妇女团体代表（集团祭）；二时至三时，其它团体代表（集团祭）；三十一日晨九时至十一时，各国专使；十二时外宾；下午一时至二时总理亲故及奉安委员会葬事筹备会；下午二时至三时，总理家属。（二十八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9日）

孙夫人等谒陵

孙夫人宋庆龄及总理家属于停灵后，赴陵墓谒陵，宋霭龄、美龄均偕往。宋庆龄所乘汽车，为铁部在沪所购之最新式福特车，系专供宋庆龄乘坐之用，抵陵墓后，并备轿八乘，乘车上山，庆龄视察陵墓工程后颇满意，当即暂住陵园内之别墅。

(二十八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9日)

蒋主席抵蚌情形

南京 蒋主席二十七晨偕唐生智等赴蚌迎榑,沿途各站,均有民众团体欢迎,蒋均下车,与民众会晤。抵蚌后,当召集岳维峻及新编第一三两师训话,旋在车上休息,至二十八晨三时半,灵车抵蚌,蒋偕宋美龄、唐生智等,上车谒灵。约停二十分,即随灵车返京,毛炳文马登瀛均同来。(二十八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9日)

徐州站之公祭

礼毕由吴铁城演说

徐州 总理灵车二十七晚九时抵徐,各界团体到站恭迎,车站一带,由三师七旅及公安警察队警备,石祖德、郭剑魑任总指挥,在站行公祭礼,韩德勤主祭,县党委潘建民、徐西明、县府代表罗博平、省监段木贞等祭:①全体肃立;②奏哀乐;③献花圈;④读祭文;⑤行三鞠躬礼;⑥礼成。旋由迎榑专员吴铁城演说,谓总理逝世四年,俟全国统一而后奉安,现在桂系叛变之后而冯玉祥继叛,我人应一致努力,肃清叛逆,完成真正统一,实现三民主义,以安总理之灵。嗣由主陪祭人,登车视灵毕,九时三十分灵车南开,同车尚有林森、郑鸿年、宋庆龄、孙科、张继、陈少伯、梅屋、山田、菊池、黄琪翔等,蒋锄欧已先乘铁甲车南下。(二十七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9日)

英政府赠陵园嘉树

伦敦 英国应中国国民政府之请,现以□桦树苗各一株,运送南京,以便种于孙陵。(二十七日路透社电)

(《申报》1929年5月29日)

专车过滁情形

滁州 奉安专车过滁共九列:第一列宣传车,二十八日零时十分到;二列前导车,二时五十分到;三列卫兵车,六时三十分到;四列中山二号铁甲车,七

时三十分到；五列蒋主席专车，八时二十五分到；六列灵柩车，八时五十分到；七八九列，铁甲车随员来宾车，至十二时以次开竣。灵车到站时，滁地各界参加迎送者，数千人，并由代表举行公祭，祭仪，肃立，奏哀乐，献花圈银盾，行敬礼，读祭文，呼口号。（二十九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9日）

奉安间期明令禁止轨外行动

南京 国府二十八日令：现值总理奉安，典礼至为隆重。凡属国民，致敬尽哀，自应严守秩序，共保安宁，冀慰陟降之灵，用昭恪恭之实。惟军阀余孽、共党分子，与夫阴谋捣乱之徒，无时不蠢蠢欲动，伺间妄逞。当此四海遏密之时，难保不利用时机，造谣生事，希图煽惑民众，扰乱治安。各地方军警长官，职责有关，对于所辖区域内，务须一体严密防范，毋有疏虞。在此奉安期间，如有假借名义，自由开会，或聚众游行，均著切实制止，倘敢故违，立即逮捕，照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严行惩治。至各地民众，同员爱国热忱，应知尊亲，谣闻灵柩奉移，山陵永闕，痛怆思慕，能无同情，尚其恪遵遗教，共守纪律，时局严重，幸忽有越轨行动，自触行动，自触刑纲，慎之。此令。

（《申报》1929年5月29日）

武汉筹备奉安纪念

汉口 各界纪念奉安筹委会昨开第一次常会，决定奉安日武汉同举行公祭，武昌在首义公园，汉口在民众俱乐部，并定阅马厂举行群众大会，又预推何应钦刘峙祭团，何为总主席，武汉市面，二十六起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各职员学生臂缠黑纱，状极悲怛。（二十八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29日）

奉安典礼中之接待各国专使礼节

此次总理奉安，各国均派专使参列大典，外部方面已订定接待礼节如下：

（甲）迎接各国专使礼节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各国专使乘坐专车抵浦口，由卫戍司令部选派精壮军队一队，由团长指挥，于九时三十分站列浦口车站等候迎接。于专使出站时，举枪致敬，并公安局选派精壮警士二队，分列于浦口及下

关码头,维持秩序,以免闲人拥塞,并于专使经过时,恭行军礼致敬。国府代表并派外交部交际科长或副科长,偕同招待专使之人员,随带汽车前往迎接。于各国专使下车时,国府代表以国民政府名义,交际科长以外交部名义,至欢迎词毕,即介绍招待员,旋陪专使出站台,至码头下小轮船,抵下关码头。各招待员分别导引专使上汽车,招待员居左,与专使同坐,送至行馆;如各国专使有自沪来京者,本部当先期以来京日期时刻,通知卫戍司令部及公安局,以便派遣军队警队,赴沪宁车站站列致敬,并维持秩序,所有迎接礼节,与上列者同;如各国专使有乘本国军舰来京者,本部当先期以该专使之资格(公使或代办),并其所乘军舰之名称,及离京之日期,通知海军部,海军部于该军舰进港时,除饬令照例放炮致敬外,即以电话告知本部,届时本部一面通知卫戍司令部及公安局,派军警站列码头迎接,一面由国府派代表偕同招待员,随带汽车往接;如该舰停泊江中,则乘小轮船赴军舰,见专使时,以国府名义至欢迎词,并介绍招待员毕,即陪专使上小轮抵码头,军警举枪致敬,国府代表引导专使上汽车,国府代表居左,与专使同坐,而招待员则与专使之最高级随从同车,送至行馆,凡往迎接专使之人员,一律著午礼服。

(乙) 外交部长接见各国专使礼节 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外交部长在萨家口官舍,接见各国专使,接见时刻之先后,按照各国专使之班次而定,每国约计十分钟。接见时刻,先期由招待员分别告知各专使,各招待员须算定时刻,陪专使及其参随前往部长官舍引专使入客厅,本部交际科长或副科长在客堂招待,并引专使入部长办公室。部长对于以代办资格为专使者,可立于办公桌前以迎之,会晤毕,只送至办公室中堂;至对于以公使资格为专使者,则应立于办公室中堂以迎之,会晤时各专使将各国国电,面交外交部长,请代递,会晤毕,部长送至办公室门口。各专使谒见毕,由招待员陪旋行馆,部长即将所有国电转呈主席。凡接见及谒见者,暨招待员,一律著午礼服,接见时不用茶点,部长当于三十日下午,著午礼服赴专使行馆答候。

(丙) 各国专使觐见呈递国书礼节 三十日上午十一时,觐见国府派典礼局高级职员,偕同外交部招待员,随带大汽车、副汽车,于午前十时由国府出发,赴专使行馆迎迓。大汽车上国府迎接员居左,与专使同坐;副汽车上外交招待员居左,与专使最高级随员同坐。前赴国府觐见毕,仍由国府迎接员及外交部招待员陪坐原车,送回行馆。国府大门内驰道两旁,应派步兵数棚,由团长指挥,俟外宾出入时,举枪致敬。国府派典礼局局长,并国府接待专使专员李向谿、偕同外交部

交际科胡世泽、奉安委员会典礼组干事李世中新志，在接待室招待，并派参军二员，立于各专使下车处迎接，引入接待室休息，俟专使团全体到齐，由国府接待专使专员，并奉安委员会典礼组李靳两干事、外交部交际科长引入礼堂。各专使依其班次，自右至左，成半月形，环绕而立，参随各员□次立于各国使者之后。典礼局长启主席，莅临礼堂，至半月形之交口处，主席正中立，外交部长立于主席右侧，典礼局长并国府招待专使等员，外交部交际科长，及奉安委员会典礼组李靳两干事，在于主席之后。各国专使率参随行鞠躬礼，主席答礼，专使团领袖代表全体，进陈颂词，由国府接待专使专员出行列于主席左侧翻译，主席致答词，表示谢意，并颂各国元首健康，答词毕，仍由国府接待专使专员出行列于主席左侧翻译后，主席进行前，外交部长等随行，自半月形右端起，开始行至专使团领袖前，由外交部长唱领袖之官职姓名为介绍，唱毕，主席与领袖握手，略下寒暄，由外交部交际科长翻译，领袖引见参随各员，主席与各员一一握手毕，向领袖致意后，移向第二专使之前，依次向下递推，递于团体，最后回到半月形之交口处正中立，全体专使率随员肃立，向主席鞠躬，主席答礼，随即同外交部长先退出礼堂，各国专使由典礼局长国府接待专使专员，外交部交际科长，奉安委员会典礼组李靳两干事，引出礼堂，上车回馆。是日自国府至各专使行馆，沿途加派特别警岗，各专使汽车过时，均应致敬，并妥为保护。觐见时各国专使暨随员均著本国大礼服，凡参与觐见者，文职均著燕尾服白领结外，须戴高帽，武职著军服。欢迎专使定于是日上午十二时觐见，其觐见仪仗，与各专使觐见者同，觐见后，主席派国府接待专使专员持主席名刺，代表前往各专使行馆迎候，三十日下午，各招待员分别陪专使乘汽车到客邸，客单由外交部交际科开具。（附拜客单）

（丁）各国专使在中央党部公祭礼节 三十一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外交部各招待员分别陪各专使及其参随，乘坐汽车自行馆出发，迳赴中央党部，由典礼组干事靳志、李世忠，偕同外交部交际科长胡世泽招待引入接待室。至公祭之时刻，各专使率参随随其后，按其班次，分国入祭，由李干世中引入灵堂。入堂门向总理灵一鞠躬，至堂中再鞠躬，至灵前三鞠躬，肃立就主祭位，其参随就祭位。靳干事志就花圈案前之陈设员位，李干事世忠就纠仪员位，届时靳干事志将该专使所送花圈授专使，专使恭捧花圈陈诸案上，既毕，专使向总理灵一鞠躬，步步后退至堂中，再鞠躬，退至礼堂门口，三鞠躬，礼成。由李干事世忠领导出灵堂，旋由招待员引至签字处，签字毕，仍由招待员陪坐原车回馆。致祭者著本国大礼服，典礼组干事

著典礼组服务员礼服,招待员均著燕尾服,白领结。是日自各专使行馆至中央党部,沿途加派警局,妥为保护,于专使过时,行礼致敬。

(戊) 各国专使送殡执绋并参与奉安时公祭礼节 六月一日晨五时,各国专使率其参随,由招待员陪坐汽车,自行馆出发,迳赴中央党部参与移灵礼节,届时由典礼组靳干事志李干事世忠招待。其移灵礼节如左:①就位;②肃立;③奏哀乐;④向灵柩行三鞠躬礼;⑤哀默三分钟;⑥读谕文;⑦奏哀乐;⑧行三鞠躬礼。奉移参与既毕,专使团领袖会同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总理亲故,恭移灵柩上灵车后,加入第七行列(即与国民政府主席同列)执绋步行,至保泰街离出行列,改坐汽车出太平门,直抵中山陵附近彩棚休息。如是日天雨,所有移灵礼节,则免参与,即可于上午八时,自行馆乘坐汽车出发太平门,直达陵园等候。俟灵车过彩棚时,加入第七行列,执绋步行至陵门,恭候灵柩降车换杠升石级。执绋人员分左右两行(各行二人手行)前导先行,及灵柩至祭堂平台,执绋人员恭扶灵柩换车,各国专使随灵柩入祭堂,由典礼组干事靳志李世忠招待。专使领袖会同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民政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恭扶灵柩进基门,(奏哀乐)全体肃立,敬谨奉安,(鸣炮一百零一响)奉安毕,专使团领袖随同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民政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退出祭堂,就原位。各专使会同在祭堂参加典礼人员,依次进墓门,敬谨瞻仰后,退出就原位,肃立行礼。其礼节如左:①就位;②肃立;③奏哀乐;④行三鞠躬礼;⑤献花圈;⑥读谕文;⑦奏哀乐;⑧全体肃立默哀,敬谨奉安,礼成。各专使依次退出祭堂,会同其随参步行至外交部所设之彩棚休息,由本部参事接待,茶点毕,即由招待员陪坐汽车回馆。六月二日下午四时至七时,外交部长夫人在第一公园请专使暨随员,并其眷属茶会。下午八时三十分,各国专使赴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公宴。三日下午一时,各国专使赴首都特别市政府午餐,下午十时离京。离京时,卫戍司令部暨公安局派军队警队站列车站及码头,行礼致敬,并为保护,国府派员代表欢送,外交部长亲到车站或码头送行。

(《申报》1929年5月29日)

中外参加奉安昨讯

▲ 昨日入京之外宾 英公使蓝溥森于昨晨六时许,乘英军舰萨斐克号晋京。土耳其代表福德培、捷克代表倪慈都、波兰代表魏台什尔及美哈司脱报团代表魏

甘特、英栋伯爵夫人、美国联合社经理高尔德等，均于昨晚夜快车赴京，并由外交部办事处派员陪同前往。今日赴京者，尚有铁道部顾问拿门氏Norman。

▲ 日代表昨晨赴京 日公使芳泽，于前日下午，乘上海丸抵沪后，因行期紧迫，当晚七时，应船津理事长之宴会后，即于十一时半，至海关码头，乘小轮上日军舰矢矧安宿。昨日上午四时三十分，军舰即拔锚驶赴首都，参加奉安典礼。同舰赴京之日政府奉安代表，计有重光总领事、横竹篙务官、公森财务官、天羽书记官，有野通译官、杉坂海军大佐、津田海军大佐等七员。日皇致赠奉安礼物纪念树二十枝，田中首相致赠之银华轮，及军政各界致赠之挽联等祭品，则由饭山书记官，于昨日上午六时，乘襄阳丸携京。芳泽等预定今日上午九时抵京，下午与王外长会晤，三十日与德意两国公使，同时呈递国书，三十一日，参与公祭，一日参与奉安典礼，二日蒋主席招待会，三日晚或四日晨回沪。

▲ 美军政界明晚晋京 驻沪美国海军总司令华斯德，及沪美正领事赫思、副领事福西，定于三十一晚乘沪宁夜车晋京，参加孙总理奉安大典。

▲ 名流联袂赴京 何东乘昨晚九时沪宁路奉安来宾专车赴京。叶恭绰定今晨八时五十分，沪宁特别快车晋京。

▲ 宣传列车昨日离沪 总理奉安两路宣传列车自前晚抵沪后，于昨日上午在开封路假座更新舞台作盛大之演讲并附以各项游艺，旋即于下午一时四十五分，仍乘原车开赴昆山，预定三十一日晨驶抵首都云。

▲ 海军舰队代表晋京 海军方面参加奉安，现已派定代表，其余舰队亦各派代表赴京参加。第一舰队派定参□张日章，练习舰队派定参谋郑耀恭，激□舰队派定参谋刘焕乾，除郑耀恭为随陈训泳司令航行粤港外，余均于昨日赴京。代理海军总司令陈季良，届时如能公务稍闲，亦当赴京参加。

▲ 暹总商会委员晋京 暹京中华总商会因总理在京奉安，特推该会委员林笄如君为代表回国参加，简君抵沪后会寓于大马路大东旅社，昨日乘快车赴京，俟大典毕后，尚须回沪调查商业。

▲ 市学整会派员参加 上海特别市学生团体整理委员会，参加总理奉安典礼代表业经上次会议决定，派张中樞洪钧培田和卿陈贯吾杨绍志等五人前往，昨由市党部发给介绍书一通，故该代表等已准备一切，即将首途晋京参加。

▲ 会计师公会推定代表 上海会计师公会以总理奉安，理应公推代表参与祭典，昨由常务委员会议定，公推委员周增奎、李祖桐、李祖荃等三人，在京就近

代表参加,已由该会书记处,分电首都周委员等查照矣。

▲ 青年会赴京参观 青年会以六月一日为总理奉安之期,因定本星期五即三十一号,乘上午十时二十分车至京,参观奉安典礼,并游览首都名胜与建筑,准二日夜车回申。车资膳宿费计会员每人十二元,非会员十五元,妇孺概不招待,报名以三十日晚九时截止云。

(《申报》1929年5月29日)

闸北宣传大会纪

总理奉安闸北宣传大会,于昨日上午九时,在更新舞台举行,由本市第六区党部主持,并由总理奉安两路宣传列车同志化装讲演,纪其情形如后:

▲ 会场布置 更新舞台门前,悬“总理奉安宣传大会”布额,台上悬党国旗及总理遗像,左右悬布联两副。① 六区党部联云:“革命尚未完,幸留救国精神,昭垂万古”,“叛徒方继起,但愿在天灵爽,呵护中央”;② 六区八分部联云:“四周来帝孽犹存,军阀犹存,不平等条约犹存,努力进行,责任在后死”,“数月间桂系捣乱,冯逆捣乱,一切反动派捣乱,抚心自问,何以慰先灵”。词极沉痛,其他标语图书,布置井然,极庄严肃穆。

▲ 到会人数 到六区党部全体执监委员,市宣传部代表陶百川,奉安宣传列车郑震宇、袁学易、刘百川、范天蕉等,及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等五千余人,由公安局四区。

(《申报》1929年5月29日)

中央党部总理灵前第一日公祭情形

南京 二十九日为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党政军警代表公祭之日,自上午七时起,依照分配次序,敬谨行礼。关于公祭情形,分志于次:

▲ 公祭之礼节

① 就位;② 肃立;③ 奏哀乐;④ 行三鞠躬礼;⑤ 默哀三分钟;⑥ 献花;⑦ 读祭文;⑧ 奏哀乐;⑨ 行三鞠躬礼;⑩ 礼成。

▲ 公祭之规则

① 各机关团体之主祭者,应立于与祭者之前方,与祭者不得越过与祭标识;

② 凡无祭文者,须在致祭前向典礼组说明;③ 凡集团致祭,须先推定主祭一人,并因时间问题,应由各团体自择祭文之一,交典礼组恭读;④ 各机关团体致祭以前,在候祭室,有典礼组指定干事备询问一切秩序。

▲ 公祭之位次

正中为灵位,灵几,花圈案,主祭席;左方为陈花圈案,陈设员,宣赞员,纠仪员;右方为祭文案,陈设员,宣传员,纠仪员。

▲ 公祭时间及候祭室之分配

上午七时,(甲)中央党部委员及职员 ① 委员在第四候祭室候祭,② 职员在指定地点列队候祭;

(乙)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职员 ① 主席委员在第五候祭室候祭,② 职员在指定地点列队候祭。

上午八时(甲)国军编遣委员会,中央第一编遣区,在第一候祭室候祭,(乙)各省各特别市党部代表,(集团祭)在第二候祭室候祭;

上午九时(甲)各省各特别市党部代表,(集团祭)在第三候祭室候祭,(乙)首都特别市党部,及所属执监委员,在第一候祭室候祭;

上午十时,(甲)行政院及建设蒙藏赈灾财政禁烟等委员会,在第二候祭室候祭,(乙)立法院在第四候祭室候祭;

上午十一时(甲)司法院,及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在第三候祭室候祭,(乙)考试院在第五候祭室候祭;

上午十二时,(甲)监察院及审计部在第一候祭室候祭,(乙)内政部首都公安局,在第二候祭室候祭;

下午一时,(甲)外交部及所属机关在第四五候祭室候祭,(乙)军政部及所属各机关,第三候祭室候祭;

下午二时,(甲)财政部及所属机关,在第一候祭室候祭,(乙)交通部及所属机关,在第二候祭室候祭,(丙)工商部及所属机关在第四五候祭室候祭;

下午三时,(甲)教育部及所属机关,在第三候祭室候祭,(乙)铁道部及所属机关,在第一候祭室候祭,(丙)卫生部及所属机关,在第二候祭室候祭;

下午四时,(甲)海军部及所属机关,在第四候祭室候祭,(乙)参谋本部在第三候祭室候祭,(丙)训练总监部,在第一候祭室候祭;

下午五时,(甲)首都卫戍司令部,在第二候祭室候祭,(乙)首都特别市政

府及所属各局,第四五候祭室候祭,(丙)各编遣区、及各师旅、各司令部、各舰队、各航空队代表,(集团祭)在第三候祭室候祭。

▲ 中央国府以次公祭之主祭人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特任官吏参加公祭者,有蒋中正、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王宠惠、戴传贤、陈果夫、邵力子、赵戴文、于右任、吴敬恒、王正廷、王伯群、褚民谊、叶楚伦、吴铁城、焦易堂、邵元冲、刘纪文、孔祥熙、唐生智、范熙绩、刘文岛、周启刚、张道藩、桂崇基、黄宝、曾养甫、王柏龄、李文范、陈嘉祐、陈肇英、陈立夫、余井塘、樊钟秀、刘守中、恩克巴图、程天放、克兴额、朱家骅、赵丕廉、方觉慧等。中央党部由胡汉民主祭,国民政府由蒋中正主祭,中央第一编遣区,由蒋中正主祭,各省市党部,由江苏省党部代表叶楚伦主祭,其余各机关,各由本机关主管长官主祭。

▲ 遗容之景仰

参加公祭人与礼成后,依次行进至灵榇旁一睹遗容。榇之外罩完全揭起,铜棺口面嵌以通常之玻璃,面目须眉亦然如生,衣冠亦毕现。景仰毕,循序退。

▲ 中央党部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华民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率全体党员,至敬至诚,以祭告于总理之灵,曰:呜呼!国之父,人之师。至德大道莫能名,天覆地载而无遗,高明悠久,思无穷期,鞠躬尽瘁,乃报所知。于此临穴之一恸,更何取乎为辞!所以抚膺雪涕,不敢不告者,缘鉴四方之多难,奉安迟至于今兹。忆昔之日,既驾以秣,大勇大仁,谋皮入穴。浩气霭横,灵旗露浥,和平奋斗,以救中国。扶枕叮咛,张目而绝,爰奉遗教,以起义师。鼓行而南,于江之涯,以靖肘腋,以抚疮痍。盘根错节,克奠京畿。其间风云谲幻,出入险夷者,不知其几。每览紫金之丘树,辄望碧云而涕洟,淮徐既晏,青兗既收,长蛇起陆,扰我东甌。困心卫虑裂皆埋头,抚饮痛之。士卒以直指夫燕幽,还矢入庙,免胄献酬,方谓狐兔已尽,甲兵可休,而许昌、郾坞之间,囚首垢面之酋,冒天下所不韪,塞轘轲以捷走,于攀悬乌号之时,遗绪未竟,来日大难,魔随道长,事与愿违,陟彼峻坂,策此驽驂,夙夜恐惧,跬步讥口,会不难奋身于一瞑念,孰承夫振世之宏规。呜呼!旦月易迈,遂远昔容,永矢勿援,勒勇信忠,历艰危而不反,誓贯彻于始终。尚飨!

▲ 国军编遣区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率全体职

员，谨以清酌香花之奠，恭祭于总理孙公之灵，曰：呜呼！民族沉沦，玄黄隐闵，天生我公，国以党治，革命军兴，青白易帜，揭□三民，贯彻主义，共同奋斗，我武维扬，裁兵计划，遗训皇皇，编遣伊始，一弛一张，肯销金革，民其小康，茫茫宇宙，公实奠之，巍巍首都，公实眷之，统一成功，惟公呵护，七□无惊，苞桑永固，千秋□豆，黍稷匪馨，请继公志，以告公灵，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 各省府各特别市政府代表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各省府各特别市政府代表等，谨荐馨香致祭于总理之灵，曰：呜呼！天丧国父，四易星霜，碧云迢递，萧寺凄惶，式憑灵爽，党国用昌，灵輶载御，乃莅南疆，及兹执紼，哀动万方，岂惟功业，民莫能忘，岂惟盛德，聿发麟光，维公度量，包举八荒，维公学说，震□玄黄，三民真谛，五权引咭，垂示方略，遗训煌煌，大同盛治，实具梯航，呜呼，闵宫漱漱，钟山苍苍，千秋万礼，山高水长，国都手定，攸□宗邦，愧膺市政，建设未遑，所望群力，萃于中央，发扬踔厉，宏振纪纲，巍巍正气，昭昭明堂，临之在上，鉴之在旁。哀哉尚飨！

▲ 总理家属祭文

惟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六月一日，国府奉安总理遗体于首都之紫金山。男科媳淑英，率孙男治平、治强、孙女穗华、穗英谨致祭于我考总理之灵而言曰：呜呼！总理以匹夫摧四千年帝王之制，以片言而立四万万民族之命。至于今日，主义之深入于人心，政策之适合于团体，如挟风雷而揭日月也。钟摄之嵯峨，江流之萦绕，八代文物之生华，万国衣冠之瞻拜，魂魄所乐，遗言所命，全国心力之所注，而奉安窀穸于兹土也，在天之灵，盖可以无余憾矣。木坏山颓，星霜四易，吾党承奉谟烈，遂以完成北伐，统一寰区。虽其间错迕纠纷，屡蹶再起。外侮内忧，此煎彼迫，卒以本党所归，民心所向，而底于成功，今日吾党恭奠灵阶，盖亦可以告无罪矣。惟尔子科，重念先应创造之多艰，与夫后此措施之不易，追惟庭训，益怀水渊，不自知其涕泗之横集也。综总理之生平，无时不负有觉世□民之责，即无时不在艰贞蒙难之中。远之伦敦之困，近期白鹅潭之役，盖出死入生，天下志士之所共愤。而病榻憩惘之音，遗嘱丁宁之意，尤吾党同志所没齿不敢或忘者。建设万端，贻谋咸备。不肖之孤，猥党专部，政府付托之重，国人属望之殷，敢不勉竭心里以承先志□愿提撕教诲之无闻，弥达孝机述之是愧。此则玄堂安奠，瞻对彷徨之余，所哀慕而不能自己者也。呜呼！天不懋遗我国父，使世界同情，民族皆怀先觉，云亡后死谁嗣之悲，岂独科一人一家之失其凭依，与一党一国之无所指挥耶□英灵

不昧，丹旌匪通，舒悃陈词，来恪来歆。尚飨！（二十九日专电）

▲京沪记者今日公祭

南京 首都新闻记者联合会与上海各报驻京记者联合会定于三十日午后二时，公祭总理，全体会员于十一时三十分齐集中央大学图书馆，一时整队出发，二时在中央党部致祭，过时不候。（二十九日专电）

中委及特任官前晚起分班守灵

南京 中央委员及特任官，自二十八日夜间起，分班守灵，每三人为一组，四小时一更易，兹将分配时间之名单录后：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至八时，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八时至十二时，刘庐隐、戴季陶、程天放；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至四时，李文、范林翔、陈肇英；四时至八时，陈耀垣、刘纪文、张静江；八时至十二时，林焕廷、古应芬、林云陔；下午十二时至四时，孔祥熙、王正廷、王伯群；四时至八时，邵力子、何香凝、杨杏佛；八时至十二时，张道藩、余井塘、邓贵阳；三十日上午十一时至四时，陈果夫、宋子文、叶楚伦；四时至八时，朱家骅、陈立夫、张静江；四时至十二时，朱培德、黄宝、谷正伦；下午十二时至四时，方觉慧、刘文岛、唐生智；四时至八时，林森、张机、吴铁城；八时至十二时，何应钦、王柏龄、繆斌；三十一日上午十二时至四时，吴稚晖、蒋梦麟、褚民谊；四时至八时，蔡元培、王宠惠、魏道明；八时至十二时，邵元冲、桂崇基、陈绍宽；十二时至四时，杨树庄、周启刚、丁超五；四时至八时，恩克巴图、克兴额、郑鸿年；八时至十二时，于右任、丁维汾、曾养甫；十二时至四时，陈嘉祐、贺耀祖、李石会。（二十九日专电）

各国专使分别抵京

南京 参加总理奉安各国专使，均于二十九日上午分别抵京，兹将情形录下：

专使抵京情形

晨七时，捷克、波兰、土耳其三专使，由沪乘沪宁车抵京。九时，日本专使团，由沪乘兵舰抵京。上午九时，其他各国专使团及教廷代表，由北平乘专车抵浦口，即由外部招待人员招待，上德胜兵舰渡江，至下关上岸。各专使团中，除日英美三国专使团，均住其本国领事馆内，其他分住下关外交宾馆及扬子饭店二处。外王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至六时，在萨家湾官舍接见各专使，嗣以种种不便，已改定日期。

▲专使在京日期

外部此次因各专使来京，参加奉安典礼，特拟定各专使在京日程如下：① 五月三十日为五卅纪念休息；② 五月三十一日晨八时，蒋主席在国府接见各专使，

晨九时至十一时,各专使至中央党部致祭,下午,各专使拜访国府各要人;③六月一日晨五时卅分,各专使至中央党部参与移灵执绋,及安灵礼节;④六月二日下午五时至七时,王正廷及王夫人在五洲公园,请各专使茶会;⑤六月三日下午四时,励志社请各专使茶会;⑥六月四日午,京市长刘纪文,请各专使在市府午餐;⑦六月五日下午八时三十分,蒋主席及蒋宋美龄,在中央党部正式宴请各专使;⑧六月六日,日意德三公使,呈递国书。

▲ 来京专使名单

德公使卜尔熙、美公使马克漠、比公使华络恩、巴西代办苏尔思、古巴代办嘉利嘎、丹麦代办爱可弗、西班牙公使嘎利德、法公使玛德、英公使蓝普森、意大利公使华书、日公使芳泽、挪威代办欧勒、荷兰公使欧登科、葡萄牙代办费楠德、瑞典代办尧武德、土耳其代办福阿特、波兰代办魏登太尔、捷克代办里士度、教庭代表康斯登太尼。

▲ 外部招待各使

外部在陵前明陵及外部后,各盖棚一处,为招待各使之需,并指定人员,分配职务如下:①陵前棚(专使),杨光□、徐谟、钱泰、陈世光、嵇镜、张歆海、李世忠、徐东藩、吴昆吾、陶树模、金间泗、②明陵(外宾),朱敏尧、徐鼎、胡襄、沈维新、江华本、李通求、曹树铭、唐士煊、黄启枢、许沅、谢维麟、张国珍、梁肇明、杨理恒、③外部后往(普通来宾),张我华、樊光、张继城、应尚德、刘云舫、糜世功、刘师舜、于能郊、周龙光、张衡、李骏罗、杨少伯、曾昭常、郭尧民、方文政、楼桐、蒋徐、养秋、李向恒、戴麟藻、郭德华、周易通。

▲ 蒋昨访犬养头山

南京 蒋介石今晨十时,亲访犬养毅、头山满两氏于其客邸,对于彼等以衰老之年,远道跋涉来京,参加奉安典礼之事,深表谢忱,并谢年来所受之照拂。犬养毅、头山满两氏,亦以蒋氏能继孙总理遗志,完成革命,使全国统一之事业,将见于目前,深为嘉许,并谓不但吾人愉快,及总理亦将含笑泉下云云。犬养头山两氏下午拟历访各要人,并至蒋处答拜。(二十九日东方社电)

起灵时间提早

南京 奉安会对于奉安日原定之“齐集”、“起灵”两项时间业已提早,现定上午三时三十分齐集中央党部,四时起灵,俾能如规定时间,到达祭堂与奉安。(二十九日专电)

总理遗像之雕刻

南京 总理遗像之雕刻家高祺氏，二十九晨来京，其所制之总理遗像，系受中山陵墓建筑委员会之委托，用北平白色大理石为原料，以一年零三个月之时间，制造完成，其重量为一吨半。（二十九日专电）

（《申报》1929年5月30日）

总理灵柩奉移南下情形

▲ 灵车过济情形

济南通信 此次总理奉安移柩，首都全国各地，均举行隆重之纪念哀悼大会。济南以奉安途经之地，各界对于纪念及哀悼，两星期前即开始筹备，故布置颇称完妥。津浦车站内之天桥，两面皆扎有松柏牌坊，交悬党国旗，东面挂有白布横联一方，上书“总理精神不死”六字，西面亦挂有白布横联一方，上书“天下为公”四字。车站外北面有高台一座，相对之南面有指挥台一座，为各界开会演说之地（此两台均为济南各界举行迎柩宣传纪念大会时所扎）。车站内外及城埠各地，均遍贴各种标语，自二十六日起，各界一律下半旗志哀，左臂缠黑纱，并停止一切宴会娱乐。今（二十七）日为总理灵柩过济之日，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工厂、各报馆均一律放假一日。各界民众十余万人，整队到津浦车站大会场参与迎柩纪念大会，实为山东空前未有之盛举。兹将详情分述如下：

▲ 参加之人数 今日到津浦车站参加迎柩纪念大会者，外宾方面，有英国领事雅裴乐、德国领事希古贤、美国领事蒲来思、日本领事西田□一及外侨代表新闻记者等约五十余人；我国民众，自上午六时起，即纷纷列队赴站，各持花圈□罩等物，计共五百余团体，约十万余人；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及各委员，皆亲到车站；警察、保安队、宪兵、四十六师军队，亦到站自列，并负维持秩序之责，均臂缠黑纱，枪口向下，以志哀悼。

▲ 总理灵车抵济 上午六点二十五分，第一列前导车到济，六点五十五分开驶南下。七点十分，第二列护灵车到济，七点四十分开驶南下。七点五十五分，第三列护灵团车到济，八点二十五分开驶南下。八点四十分，第四列灵柩车到济，九点十分开驶南下。九点二十五分，第五列护灵团车到济，九点五十分开驶南下。十点十分，第六列护灵团车到济，十点四十分开驶南下。十点五十五分，第七列随员车到济，十一点二十五分开驶南下。十一点四十分，第八列来宾车到济，正午

十二点十分开驶南下。平均每列车在济皆停半小时,随灵之要人,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孙科、孙科夫人,及孙之岳父母陈少伯夫妇、郑鸿年、吴铁城、林森、张继、戴恩赛、叶寿仪、司梯芬、马永保、宋子安、宋子良、陈□□、李定中、孙汉璞,梁寿操等。

▲ 各界公祭情形 上午七点四十分,各界先在车站外会场开迎榇纪念大会,及总理纪念碑奠基典礼。事毕,时已八点四十分,总理灵车进站,各界代表均至站内,举行公祭礼。由张金鉴主祭,献花圈,继由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代表各界读祭文,黄萼楼代表济南全体党员读祭文,强光治代表山东监务稽核所读祭文,又次各界代表向总理灵榇行三鞠躬,并默哀三分钟,最后奏哀乐,全体肃立,候送灵车。九点十分灵车由济南开,各界代表仍行礼如仪,陈调元及各委员当车未开行时,会登车请谒孙宋夫人及孙科,均辞未见。(二十七日)

▲ 灵车过蚌情形 蚌埠通信 总理灵榇列车于二十八日晨三时十五分,由北平过蚌。此间军政农工商学各界,于车到前,开迎榇大会。车到时全体在车站公祭,悲壮热烈,为以前所未有,且蒋主席由京来蚌迎榇,各界尤为慎重。兹将详情分志于下。

▲ 各界事前筹备 本月二十三日,蚌埠即成立各界迎榇大会筹备委员会,由各机关团体分别担任,积极筹备。布置股先在二马路铁路西,搭盖主席台牌楼各一座,在车站搭盖牌楼三座,扎松结彩,甚为美观。宣传科印制大批图书标语,张贴街衢,并通知全市,自五月二十六日起至六月一日止,一星期内,各机关商店,一律下半旗,并停止娱乐宴会,以志哀思。

▲ 蒋主席来蚌迎榇 蒋主席于二十七日上午十时,由京乘专车来蚌,迎迓灵榇。昨午方振武、徐源泉、毛炳文等事先得讯,乘车迎至临淮,下午五时十五分,蒋氏同至,军警乐队、民众团体、在站欢迎者,不下二千余人。蒋氏下车后,即集合方振武之特务团,及一百三十五旅四十八师第三师新编第一师之一部分,在小山市大操场检阅,并向官长训话。至八时始阅毕,仍回驻车上。

▲ 举行迎榇大会 二十七日晚七时许,全埠军警部队各机关团体代表,各界民众陆续而至。铁路西会场,计到七十余团体,不下三千余人。会场内外,由纠察队维持秩序,六路总指挥部参谋长杨思熙为总指挥,四十五师副师长鲍刚、公安局保安大队队长王佐为副指挥。八时三十分,开会如仪,主席为六路总指挥部政训处代表耿廷杠。耿先报告迎榇之意义,次市政筹备处长裴益祥、第三师政训处常

健、新编第一师政训处赵斌生、四十八师政训处杨素园等相继演说，最后六路总指挥部演放电影。旋因天桥南贫民草房失火，乃辍演散会。

▲ 灵柩列车莅站 今晨（二十八日）上午二时，军警各部队各机关团体各界民众纷纷到站，方振武、岳维峻、徐源泉、毛炳文、鲍刚等，亦乘汽车联翩而至，齐集站台内，军警乐队，分立站台东西两端，民众及与祭代表，立于中间，公推方振武主席。灵车将到时，蒋主席亦佇立站台，恭迎灵柩。三时三十五分，灵车由一股道进站，军警鸣号三番，奏哀乐，鸣礼炮二十一响，军警举枪致敬，军官行举手注目礼（佩刀者撤刀），余均一律脱帽，肃立灵车之左侧。

▲ 各界举行公祭 车停后，举行公祭，礼节如下：① 全体肃立；② 奏乐；③ 献花圈；④ 读祭文；⑤ 行三鞠躬礼；⑥ 礼成。公祭毕，方振武、徐源泉等上车，与迎柩专员吴铁城、郑洪年等晤谈良久，始下车。列车计十五节，蓝色钢车六辆，饭车一辆，电灯车一辆，包车一辆，头二等车三辆，三等车二辆，灵车一辆。灵车上有蓝缎制之旗帜，中心有国旗，四围缀以白丝线扎成之卍字花圈，下垂丝络，甚为庄严美观。车之前后，有玻璃门六扇，其外纽为水晶制，距车机衔接处，有钢制栏杆，光亮耀目。灵车之后，为蓝色钢车，孙夫人孙科等在此车上。至四时零五分，蒋主席乘专车返京。四时十五分，灵车开驶，军警各界，恭送如仪，迨灵车离站，始各纷纷而回。

▲ 列车陆续过蚌 二十七日下午七点三十五分，迎柩宣传列车由平抵蚌，七点四十五分南下。是夜陆续过蚌者，第一列前导车，第二列铁甲车，第三列铁甲车，第四列步兵车，第五列铁甲车，第六列灵柩车，第七列铁甲车，第八列来宾车，第九列外交团车。自韩庄以迄浦口，津浦沿路，由方振武派队布岗警备。（五月二十八日）

（《申报》1929年5月30日）

北平举行移灵公祭

北平通信，昨日（二十三日）为公祭总理之第一日，上午十时起下午一时止。兹将详情分志于下：

▲ 祭堂部署 碧云寺附近迎柩大道，住宅均一律下半旗志哀，沿途警卫森严。寺内布置如前，祭堂内素坊上亦下半旗，堂前加铺地毯，堂内祭桌上置景泰蓝香炉一，花瓶二，银樽一，瓶内插鲜花一束，并无香炉之品。堂阶上左端设白漆小桌，为读祭文之所，东侧高悬公祭礼节牌一。其秩序：① 齐集；② 奏哀乐；③ 行三鞠躬礼；④ 献花；⑤ 奏哀乐；⑥ 礼毕。祭堂阶下站立警士二十余名，阶左为五路

军军乐队，河北省府军乐队在音乐室内。其他最使人注目者，即为摄影记者之活动，来宾□集于堂前者有之，在接待室内者有之。接待室内，除前日已陈列之银亭一、银盾二、铜铎一，及瓷屏外，又加置梅屋庄吉制赠之总理铜像一尊。此外尚有银环一个，壁上悬碧云寺全图一副，上有张继题字，文曰“先生卧此间，人类藉有生气”。□坊外有公安局第一消防队。

▲ 团体祭奠 团体祭奠者，先后计有迎榑宣传列车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该会分三排站立祭堂阶下，前横白布，大书“迎榑宣传列车”字样。第一排为职员，男著黑色学生制服，女著黑色旗衫；第二排为军乐队，着黄色军服；三为卫士，着灰色军服。全体向遗榑肃立，一二排行三鞠躬礼，三排卫士则举枪致敬。礼毕，即退入东侧门。次陆军大学全体学员，由校长黄慕松、教育长周彬率行礼。河北省执行委员会及天津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北平特别市指导委员会代表，及十一区指导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训政学院全体学员、青海二十九旗代表、胶济路代表、辽宁指委代表、津市党部谒灵团先后行礼如仪。

▲ 军政祭奠 军政界计到司法副院长张继，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何成濬，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委员温寿泉、吕咸、孙奂仑、李鸿文、严智怡、李觅容、李培基，秘书长王次甫，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镇华，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三十八师师长李服膺、参谋长刘香九，第五路军参谋长晏勋甫、十八师师长井岳秀、十四师副师长李祖荫、五十一师参谋长陈勉，剿匪司令部参谋长方贤，宪兵司令楚溪春及其部属仇宝沱，警务司令张荫梧，五路军副官长宋英仲，经理处长赵崇恺，军法处长程一中，北平市府八局局长赵以宽、华南圭、李光汉等，外交部特派迎榑专员靳志，东北代表危道丰、胡若愚、葛光庭，青岛英领署代表赵鹤亭，外交部驻平档案保管处处长祁大鹏，及其他代表，先后行礼如仪。

▲ 祭文一束 祭文计三十余件，兹录三件于下：

（一）何成濬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国国民党将奉总理孙中山先生之灵榑，妥于首都之紫金山，国民政府参军长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谨为文以祭之。其词曰，“呜呼，自先生之殁谢，盖四载而有奇，黄农虞夏之裔，圆趾之伦，莫不歆歆感慨而追惟，矧浚亲承色笑，患难与共者廿余年，其能毋凄然而悲耶。昔先生之生也，言有法则，动有仪表，创三民与五权，主易行而难知，既天民之先觉，亦救国之神医，覆清社于反掌，奠共和之始基，集尧舜汤武而为一，薄秦汉唐宋而不为，其

封于中国以平等自由为鹄，而对于世界，则发为和平大同之思。及先生之逝也，人类失其主宰，中国失其慈母，而吾党失其导师，遂令江淮河汉之间，依然横虎豹而走蛟龙。幸后死之同志，奉先生之遗规，振久□之士气，率革命之健儿，长驱江表，直捣河朔，而茫茫禹甸，遂偏悬青白之旗，此盖吾总理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也。今者大□□灭，小丑清滋，横城府于胸臆，实残忍之枭鸱，去庆父以已难，诛少正而何疑。芟萑稗，披荆棘，除害马，斩毒蛇，当亦吾总理在天之灵，所心悦而神怡者也。呜呼，天生圣哲，无事弗奇，诞于粤疆，殁于河域，而营葬地于大江之湄。叹龙葬之去早，愧马□之封迟，登碧云之古寺，望翠村之□□，与紫金之巍巍，路虽隔而神通，灵庶几其在兹，护盥手而奉爵，爰竭诚以致辞。尚飨！

（二）商震祭文

民国十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总理遗榇将自北平故都奉移南下，期前三日，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暨全体委员，谨率和平所属，为文奠之曰，于休国父，道澈地天，旷往绝来，轶圣超贤，功不自有，爰在众先，旷亲赤县，惻然兴怜，恤孱扶弱，复我民权。帝国主义，流毒八□，釜鱼幕燕，一息苟延，振袂奋越，宏颐无边。有众林林，马首尽瞻，混一区宇，□戢戈□，积劳成瘤，中道身捐，寄厝兰寺，寒暑四迁，爰营兆域，金山之□，觚梭高□，□栋云连。人时日吉，引輶南邁，玄灵式妥，遗泽永绵，报功崇德，万羞惟鲜，追攀莫及，涕泗涟涟，灵爽匪遥，尚其鉴旃。

（三）津市执委会祭文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工作同志及各区党部代表，谨致祭于总理之灵曰，于维国父，缔造国魂，宏猷济世，冠绝古今，历尽艰险，厥志不泯，为国为民，既勇且勤。昊天不服，竟降鞠凶，革命未成，人生所宗，勉我死后，主义是从，夙夜匪□，期竟全功。吁嗟群丑，罔念遗言，纵横捭阖，邪说相炫，争权夺利，不恤民艰。追思先哲，涕泪潸然，仰瞻容范，想象精诚，气充天地，俨若神明，号为同志，何谓英灵，谨此致祭，敬抒幽情，伏维灵鉴。

（《申报》1929年5月30日）

奉安期内秩序

▲ 国府文官处之勘电

▲ 警备司令部之布告

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云：为布告事，案准国民政府文官处勘电。称：“各省政

府、各特别市政府、各卫戍司令、各警备司令、各编遣区特派编遣员鉴：顷奉国民政府令闻，此次总理奉安典礼，至为隆重。凡属国民致敬尽哀，自应严守秩序，共保安宁，冀慰陟降之灵，用昭恪恭之宝。惟军阀余孽，共党分子，与夫阴谋捣乱之徒，无时不蠢蠢欲动，伺闻妄逞，当此四海遏密之时，难保不利用时机，造谣生事，希图煽惑民众，扰乱治安。各地方军警长官，职责有关，对于所辖区域内，务须一体严密防范，毋有疏虞。在此奉安期间，如有假借名义，自由开会，或聚众游行者，均着切实制止，倘敢故违，立即逮捕，照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严行惩治。至各地民众，同具爱国热忱，应知尊亲，遥闻灵柩奉移山陵，永为痛悼思慕，能无同情，尚其恪遵遗教，共守纪律，时局严重，幸勿有越轨行动，自触刑纲，慎之，此令。”等因奉此，合即电达，遵照办理，并转饬遵照，等由准此。除分行外，合函布告，仰各界一体凛遵，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日兼司令熊式辉

（《申报》1929年5月30日）

中外参加奉安消息

▲ 古应芬过沪赴京 国府文官长请假回粤，现以总理奉安期近，特于本月二十八日，由香港乘轮来沪，准今日抵沪，今夜即转车赴京。

▲ 凌霄奉召赴京 海军编遣区委员副主任凌霄，日前奉到第一编遣区军事局长葛敬恩来电，邀其赴京，商洽海军各项重要问题，凌又以总理奉安，须往参加，故已于昨日赴京。

▲ 滇代表赴京 滇省第十路总指挥部代表卢谟、云南交涉员张维翰、奉滇省府令代表参加总理奉安典礼，卢张两氏，以奉安在即，特于前晚，由沪搭乘沪宁夜快车赴京参加。

▲ 法军政界明晚晋京 法总领事甘格霖偕麦总司令，定于三十一日夜车联袂晋京参加孙总理奉安大典，已由外部驻沪办事处代定车位矣。

▲ 日报公会代表赴都 上海日报公会，为总理奉安典礼，特推吴树人代表致祭，吴君已于昨夜快车赴都。

▲ 法租界商界代表晋京 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常务委员及商业联合会常务主任李维良等，由该会推举为总理奉安代表，兹悉李君等，已于昨晚乘夜快车赴京，参与奉安典礼矣。

▲ 临时法院奉安日停讯一天 临时法院因六月一日，为总理奉安之期，应停止办公，以志哀悼，业由何院长谕知全体职员遵照外，并通知各捕房，于是日停解案件。

▲ 道教会之通告 中华道教会，昨通告道教各庙云，本会本月执监常会决议，六月一日，为总理奉安之期，我教各庙，除悬挂半旗外，应于各本庙大殿，一律谨敬设位致祭，并于是日邀集道众，在总办事处，虔诚礼叩，以表哀思而伸祈祷，为此两达云云。

（《申报》1929年5月30日）

孙夫人定期来沪

▲ 六月二日出京

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已定于六月二日上午十时许出京来沪休养。铁道部孙部长特令沪宁路局，备就花车一辆，头二等车一辆，届时特开专车来沪云。

（《申报》1929年5月30日）

6月

国内要闻 各国专使觐见国府主席

南京 来京参加总理奉安之各国专使，于三十一日上午八时，在国民政府觐见蒋主席，礼节至为隆重，兹将觐见情形分志于下：

▲ 礼 堂 布 置

觐见礼堂即系以国府礼堂充用，事先由国府派员布置一新，正中悬党国旗，作交叉形，中悬总理遗像，四周遍植花树及党国旗，情形极为壮观。

▲ 礼 堂 位 置

礼堂正中为主席位，主席位左旁为翻译人员位、典礼人员位，右旁为外长王正廷位，下为专使位置，成一半月形，专使位置后为参随位置。礼堂两旁，左为文官处参加人员，右为参军处参加人员，均以礼堂柱为界。

▲ 招 待 情 形

午前七时，国府派典礼局高级职员，偕同外部招待，随带大汽车、副汽车出发，赴专使行馆迎迓。大汽车上国府迎接员居左，与专使同坐；副车上外部招待员居左，与专使最高级人员同坐。各招待员服装，国府方面者均着军政部规定之灰

布军服帽军。外部方面者，均着黑色大礼服，极整齐一致。将各使迎至国府时，由国府派步兵数棚，由团长指挥，于专使步入二堂时鸣号，并举枪致敬。各使即于号声中，由国府各招待专员及外部交际科长胡世泽及各招待员，分别引专使至接待室休息。七时五十分后，各专使即纷纷到府。八时后，即全体到齐。八时二十分，由接待专员引入礼堂。

▲ 觐 见 礼 节

各专员至礼堂后依其班次，自右至左，成半月形，环绕而立，参随各员，鳞次立于各专使之后。此时乃由典礼局长入启主席，莅临礼堂，至半月形之交口处，主席正中立（着蓝袍黑马褂礼服），外长立主席右侧（着大礼服），典礼局长、外部交际科长均立主席后。立定后，各专使遂率参随人员，向主席行一鞠躬礼，主席答礼后致词，略谓各国专使远道来华，参加总理奉安典礼，本国政府极表感谢之意，并祝各国元首健康。次由荷使代表各使答词，略谓敝国等元首对贵国国民党总理，素所敬仰此次奉安大典，敝国政府特派专使等来华致祭执紼，以志哀悼，现在贵国已经统一，前途正自无量，敝使于觐见贵主席之余，敬祝贵国发达，并祝贵主席之健康。致词及答词时，均由外部吴科长出行列于主席左侧，用法文翻译，荷使答词时，亦用法文译毕，主席前行，外长等随行，自半月形右端起，开始行至专使团领袖前，由外长唱领袖之官衔姓名，一一介绍。唱毕，主席与领袖握手为礼，次与参随人员握手，旋回至半月形之交口处正中立，全体专使及率随员肃立，向主席鞠躬，主席答礼，至八时四十分礼毕，即与外长先退出祠堂，各专使由招待人员，复引入接待室，略进茶点后，仍由迎送专员，伴各使出府，迳往中央党部。

▲ 觐 见 名 单

三十一日上午，各国公使专使随员，到府觐见者，为（德国）卜尔熙公使、飞师尔参议、华根纳参议；（美国）马克谟公使、白海军总司令、鲍维乐海军参赞上校、马格德陆军参赞少校、蒲莱恩驻京领事、贝广诺三等参赞；（比国）华客恩男爵公使、纪佑穆男爵参议、西维医司参赞；（巴西）苏尔恩公使；（古巴）嘉利嘎公使；（丹麦）艾尔夫代办；（西班牙）嘎利德公使、（因病派秘书代表）嘉乐斯参赞；（法国）玛德公使、欧安乐大使馆三等参赞、白瑯度驻京总领事、贾斯维洛陆军随员少校、罗荫第海军随员中校；（英国）蓝溥森公使、魏海军总司令、杜海军副司令、达安里陆军参赞上校、傅夏礼大使馆商务参赞、许立法驻京总领事、生克满参议汉务参赞、华梅海军上校、亚兰会计主任、颜文恩海军上尉、谷来克书记；（义国）华

雷公使、查脑参赞；（日本）芳泽谦吉公使、横竹平太郎商务参赞、重光葵驻沪总领事、公森太郎使馆附财务官、天汨英二头等参赞、岡本一策驻京领事、有野学头等汉文参赞、重川美次陆军少将、专田威寿骑兵大尉、杉坂悌二郎海军大佐、藤东善代间海军大尉、米内光政少将司令官、津田静枝海军大佐、岩村清一参谋中佐；（挪威）欧勒代办；（荷兰）欧登科公使；（葡国）费楠德代办；（瑞典）雷克武代办；（土耳其）福德代办；（波兰）魏登道代表、顾兴琪参议；（教皇）刚总主教；（捷克）倪慈都代表。

▲ 主席欢迎词

主席接见专使团致词如下：

顷以总理奉安大典，承贵国元首及政府，各派专使代表，前来参加，此非特总理在天之灵，哀荣备至，深及九原，而中国全国国民，亦同此感荷。用敢代表全国，谨致欢迎，并答谢忱。

▲ 专使团颂词

专使团领袖觐见时代表全国之颂词如下：

兹值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奉安之期，本专使团膺命前来，参加大典，以伸致意。得此机会，与贵主席在此相叙，诚为中华民国统一告成以来第一次之亲见，不胜荣幸之至。本公使代表公使团，敬祝中华民国国运昌盛，并贵主席福体康健。

▲ 服制一斑

是日各专使暨随员均着其本国大礼服，凡参与觐见者，外部方面均着燕尾服，国府文职均着蓝袍黑马褂礼服，武职着军服。

▲ 教廷专使觐见

教廷专使于五专使觐见后，九时抵国府，觐见主席。

蒋先致欢迎辞，略云，兹承教皇派贵使前来，参加总理奉安大典，不胜荣幸，谨代表中国国民，对贵专使虔诚欢迎，并致谢忱。由谢冠生译法文。刚用法文致答，略谓欢迎，此次得来京参与大典至为荣幸，并承贵主席优予招待，益深感荷，谨代表教皇陛下，恭祝贵国和平统一，国运昌隆，贵国孙总理所遗嘉谟，今已卓著成效，此后必当益臻盛云。由随员陆伯鸿译成华语。继由外王介绍，行握手礼后，礼毕。

▲ 主席派代表回候

觐见后，主席派国府接待专员，持主席名刺，代表往各使行馆回候。

▲沿途保护

自国府至各专使行馆,事先由军警沿途加派警岗,并于各使汽车经过时,行礼致敬,卫戍郎并遣铁甲车两架,由谷正伦指挥,在沿途巡视以资保护。(三十一日专电)

三专使团递国书日期

南京 日意德三专使因奉安毕即返平,特请提前于六月三日呈返国书,已由外王转呈蒋鉴核。(三十一日本电)

(《申报》1929年6月1日)

各国专使公祭总理

荷使欧登科主祭

用华语恭读祭文

南京 三十一日上午八时各国参与奉安专使及参随人员,在国府觐见主席后,九时由外交部各招待员,分别陪往中央党部,公祭总理。领袖专使,荷使欧登科,先行致祭行礼如仪,其余各专使,即依次致祭。灵堂守灵人员赵戴文等,均在礼堂肃立,外部又派礼官数人,临时在礼堂内,襄赞一切。礼成后,退出大门时,各赠以英文总理历史,及奉安须知各一本,情形如次。

▲专使公祭礼节

上午九时,外交部各招待员分别陪各专使及其参从,到中央党部,先延入接待室,俟齐集后,由典礼组干事,分别由左右两门,列入灵堂,按其班次而行,分别肃立,奏哀乐。领袖专使率其随从出班,进前一鞠躬,前三步,又鞠躬,至主祭位又鞠躬,就主祭位,其随从就祭位左右。陈设员将花圈授与领袖专使,恭献花圈,左方陈设员收受花圈,陈列案上既毕,领袖专使用华语恭读祭文既毕,向灵位一鞠躬,步步后退,通三步又鞠躬,至门口又鞠躬,礼成。由外交部招待员引导右转,安步绕至灵台上,瞻仰总理遗体,由左方退出大门外,至签字处签字,仍由招待员陪回行馆。其余各专使致祭礼节,与领袖专使同,惟不读祭文。致祭者着本国制服,招待员着燕尾服,白领结,典礼组干事着礼组礼服。教庭代表致祭礼节,适用上项专使规定。其余典外宝致祭礼节,适用华人普通礼节,不另定。

▲各专使之祭文

兹逢中华民国第一次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奉安之期,本专使谨代表各友邦元

首特派之专使，略致数言于下：中山先生葬礼，不但中华全国人民视为极尊崇、极隆重之大典，即全世界各国，亦皆表示其尊重之意。所以国民政府函请各友邦，遴派专使参加奉安典礼，各友邦元首立即简派专使，代表各友邦元首参与盛典。此倾动全球之盛典，所以表明中国统一，再历数千百年，绝无不巩固之理。安如磐石之中国，即第一次大总统之期望，亦即各友邦元首及各国人民之期望，今皆圆满实现矣。自此以往，中国永久统一，永久和平，国民幸福，永久增进，且与各友邦共同维持人道之公益。中山先生之功之德，专使等极所钦佩，爰致敬礼于灵柩之前，藉表诚意焉。

▲ 教皇代表致祭

教皇代表刚恒毅十时半到候祭室稍憩，即入祭堂行礼，刚外披紫红大披风，是该教最尊礼服，教皇下有十二红衣主教，刚即十二红衣主教之一。

（《申报》1929年6月1日）

第二日公祭情形

南京 三十日为公祭总理之第二日，上午七时奉安委员会典礼指挥赵戴文、副指挥席楚霖，即在总理公祭祭堂指示，宣赞陈设纠仪，各干事准备一切，轮值守灵之中委朱家骅、陈立夫，亦在堂上敬谨鹄立。

▲ 海外各总支部

上午七时四十分，海外各总支部各直辖支部代表黄吉宸、郑螺生、黄壬戌、陈清机、张永福、古加见、林度生等一百余人，公祭总理，并无主祭与祭之分。宣赞杜维涛、熊成煦、陈设、李达五、阎继璈纠仪，马文、尉续俭等分司所职，鹄立惟谨。杜维涛赞：一、就位；二、肃立；三、奏哀乐；四、行三鞠躬礼；五、默哀三分钟；六、献花，系由朱家骅、陈立夫两中委敬恭代献；七、宣赞员熊成章读祭文；八、奏哀乐；九、行三鞠躬礼；十、礼成。由纠仪员马文尉引导公祭人员瞻仰，总理遗体而出礼堂。

▲ 海外华侨代表

上午八时，海外各地华侨代表林金殿、张仁南、蔡辉生、刘戍灿、方之贞、萧眉瑜、王泽芬、刘剑元、陈清机、徐统雄、罗润泉、尤文炳、周永志、张忠道、谢仲复、林远梯、王辟尘等三百余人公祭总理，不作主祭与祭之别。宣赞员依次赞礼，各代表公祭如仪。惟献花系由中央委员朱培德黄宝敬谨代献，祭文则循例由宣赞干事

恭读。

▲ 蒙 藏 代 表

上午八时二十分，蒙藏代表戴清廉等六十余人公祭总理。由蒙古代表推戴清廉、西藏代表推格桑泽仁同为主祭人，宣赞员祈云龙赞礼，各代表敬谨行礼。惟献花时系由两主祭人分别敬献，至蒙文祭文，系吴鹤龄恭读，藏文祭文系夏洛松曲□恭读其祭文。

▲ 各省农民代表

上午八时五十分，全国各省市农民代表何人豪等九十余人公祭总理。由江苏省农民协会代表朱承杰主祭，其余黄昌年等分列后行，行公祭礼如仪。

▲ 各地工人代表

上午九时，全国各地工人代表公祭总理，主祭王宪章，与祭人张耀明、谭焕祥、张映澄等五十余，依次分列三行。

▲ 全国商人代表

上午十时，全国各地商人代表王晓籁、叶惠钧、陆文韶、冯耿光、叶琢堂、周芷湘、霍炯堂、张万有等二百余人公祭总理。由李应南、苏民生两人敬同主祭林康侯等，全体代表为与祭人，依宣赞礼节如仪公祭。

▲ 全国学生团体

上午十一时全国各学校及学生团体公祭总理，由中央研究院代表周仁及中央大学代表洪达恭同主祭，与祭者有广州中山大学代表戴传贤、朱家骅，及全国各地学校代表杨理恒、王惟英、杨书勋、李飞鹏、王治安等三百余人，行礼如仪。

▲ 中央军校团体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全体校务委员及学生六百余人，公祭总理，主祭者为教育长张治中，与祭者汤恩伯、陈良、俞遇期等，依祭堂形式列成弧形分行肃立，敬循赞礼次序，公祭如仪。

▲ 教导队筹备处

上午十二时，陆军教导队筹备处长及全体官佐士兵公祭总理，主祭者处长冯轶裴，与祭者白兆琮、廖士翘、王毅强等四百余人，行礼如仪。

▲ 首 都 女 校

午后一时，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长吴木兰，率领该校教职员学生约二十余人公祭总理。金陵女子大学及汇文女子中学代表亦与祭。主祭者吴木兰与祭者分

列其后，敬谨行礼如仪。

▲ 全国妇女团体

午后一时半，全国妇女团体代表唐国桢等公祭。主祭者唐国桢，与祭者各市妇女团体代表六十余人宣赞员赞礼如仪，瞻仰鞠躬而退。

▲ 中央党校全体

下午二时，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戴传贤、总务主任陈果夫，率领该校教职员学生二百余人公祭。主祭戴传贤，与祭者陈果夫、罗家伦及教员全体学生等，行礼如仪，宣读祭文甚哀。

▲ 国术馆青年会

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及青年会团体代表约百余人，于下午二时半公祭。主祭者张之江，与祭者刘崇峻等及各团体代表行礼如仪，肃清瞻仰后，退出礼堂。

▲ 新闻记者团体

下午二时四十五分首都新闻记者联合会上海各报驻京记者联合会全体会员暨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南昌重庆成都各报驻京记者一百五十余人公祭总理。事先在第二候祭室集合列队入祭堂，由余维一主祭，与祭者分列于后，宣赞员宣赞行礼如仪，循序京津瞻仰总理遗体，鞠躬后退。

▲ 陈张两中委家属

午后三时十分，中央委员陈果夫家属约十余人，张静江家属约二十余人，先后致祭，均行三鞠躬礼，由宣赞员引导瞻仰总理遗容。张氏病足，由二人携扶伛偻而上，过总理灵前，瞻仰时泪落满面，形极悲痛。

▲ 党童子军团体

午后三时半为党童子军约三百人公祭。由中央训练部党童子军司令张忠仁主祭，与祭者有该司令直辖各团。分列行礼，敬谨瞻仰后，整队退后。

▲ 全国铁道协会

午后三时五十分全国铁道协会代表约百余人，公祭总理。主祭者为关赓麟，行礼如仪，肃静退出。

▲ 中央党部工友

午后四时十分中央党部全体工友三百三十余人公祭。由工友夜校校务主任宋淑石主祭，行礼如仪。各工友久居党部耳濡目染，对总理敬仰极深瞻仰遗容后，均现悲戚之色。

▲ 于右任家属

四时四十分于右任家属近十人入祭,继又有中央党部各职员家属多人致祭,均行三鞠躬礼,肃静安步瞻仰遗容后退。

▲ 其他团体瞻仰遗容

继为徐州民众团体代表、首都电厂代表、汇文女校全体学生及国防问题研究会、广州同学会、中国佛学会等团体陆续到堂敬谨公祭,至三时后尚络绎不绝。闻中央各委及奉安委员会方面以公祭限制较严,恐民众方面未能普通瞻仰,现正拟议于奉移入陵墓后,公开若干时间,任人瞻仰,以慰众望云。

(《申报》1929年6月1日)

第三日公祭情形

▲ 外 宾

卅一日上午十时二十分,各国驻华新闻界公祭总理,由泰晤士报记者米士卫兹主祭,计与祭者有拍拉蒙丁等七十余人。十时四十分至十二时,外宾公祭总理者,共有数起:① 南京各教会学校外侨女士褒斯等四十余人,由楚脱林主祭;② 美侨五十余人,由美国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康斯多尔孟主祭;③ 欧洲各国侨民三十余人,由德人万利特主祭;④ 南京各教会外侨五十余人,由饶合理主祭;⑤ 日侨七十余人,由高洲太郎主祭。

▲ 总理葬事筹备处

下午一时,总理葬事筹备处委员林森、蒋中正、谭延闿、张人杰、蔡元培、戴传贤、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杨杏佛等六十余人,公祭总理。由林森主祭,赞礼徐大权,行礼如仪。

▲ 京 沪 学 校

一时,金陵女子大学、中华女子中学、南京女子中学全体学生,及上海暨南、复旦两大学学生军,国府卫队航空署职员,第一师军乐队共约十余人,先后公祭。历一小时,行三鞠躬礼,瞻仰总理遗容而出。

▲ 总理奉安委员会

一时二十分,总理奉安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中正暨委员职员谭延闿、蔡元培、王宠惠、杨树庄、胡汉民、孔祥熙、王正廷、王伯群、宋子文、吴铁城、杨杏佛等二百余人,公祭各委员立于中,职员分列左右。主祭蒋中正,行礼如仪后,由蒋率领全

体，瞻仰总理遗容而出。

一时四十分，总理奉安委员会典礼组全体职员，公祭总理。由赵戴文主祭，行三鞠躬礼，由赵氏领导，瞻仰总理遗容。

▲ 总 理 亲 故

二时，总理亲故陈少白、唐绍仪等七十余人公祭总理。由陈少白主祭，行礼如仪，每人过灵，瞻仰遗容，均悲哀。

▲ 总理日人故友

二时十五分，总理日人故友头山满、犬养毅等率领其家属约三十余人公祭总理。由头山满、犬养毅二人主祭，行礼如仪。此二老均年逾六十，而精神矍铄。瞻仰总理遗容时，深深行鞠躬礼，复徘徊悲戚颇久。其祭文曰：维大日本帝国昭和四年五月卅一日，旧友头山满、犬养毅等，敬以香花之奠，致祭于中山先生之灵。曰：嗟嗟中土，笃生哲人。彪炳主义，庸觉全民。智仁兼勇，孰与媲伦。瀛寰周历，险阻艰辛。辅车唇齿，契结东邻。云雨多士，如拱北辰。民国肇造，日月重新。胡天不吊，栋折山崩。扶桑旧雨，悲悼同深。灵爽奕奕，统一告成。万邦会葬，震古烁今。精神不死，千载机湮。敬致微忱，来格来歆。尚飨！

继有日本众议院议员有志代表宫川一贯等致祭，祭文曰：维大日本帝国昭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敬以香花之奠，致祭于中山先生之灵。曰天生英哲，黄族灵光。揭乐主义，光被遐荒。多士云从，莅我扶桑。交成倾盖，共仰清芳。共和奠定，民治发皇。动业彪炳，源远流长。昊天不吊，丧元良。缅怀旧交，德音不口。瞻仰遗体，毋任凄恻。千秋万礼，山高水长。尚飨！

▲ 总 理 家 族

二时三十分，总理家属公祭，主祭者为孙夫人宋庆龄氏。与祭者，有孙科及其夫人子女，总理女婿戴恩赛及妇，宋子文夫妇、孔祥熙夫妇、蒋中正夫妇等，约五十余人。行礼如仪后，由孙夫人率领，鱼贯安步，瞻仰总理遗体而出。

（《申报》1929年6月1日）

昨日下午四时举行封棺礼

南京 午后四时四十分，中央党部各界公祭完毕后，即举行总理封棺典礼，到场者，有总理夫人、孙科及其夫人、蒋中正夫妇，暨总理家属亲族、中央委员，及国府特任官胡汉民、谭延闿、戴传贤、张人杰、陈果夫、林森、叶楚傖、宋子文、吴铁

城、郑洪年等约百余人。第一列为总理夫人，第二列为孙科，第三列为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叶楚伦、戴传贤等，其余成行，立于后。行礼秩序如次：一、肃立；二、奏哀乐；三、行三鞠躬礼；四、封棺。同时奏哀乐，即由总理夫人率孙科、蒋中正、胡汉民、孔祥熙偕同协和医院医生，安步至总理灵前，先将灵槨上玻璃棺盖，敬谨移开。次由蒋中正、孙科、胡汉民、孔祥熙等亲手拂拭灵槨周围，旋将铜棺顶盖上，各人亲以螺旋钉封棺，棺盖上又覆以党国旗，周围加护铜栏。经过约四十分钟始竣事，各委员及特任官，总理家族均肃立堂内，总理夫人及蒋中正、孙科、胡汉民、孔祥熙等下，仍就原位，行三鞠躬礼，礼成。

（《申报》1929年6月1日）

首都戒备加严

南京 奉安会警卫组及卫戍部公安局于三十一午后起，对城厢内外治安加紧戒备，并派铁甲车沿路巡视。（三十一日专电）

南京 总理陵墓自午后三时起即禁止参观者登石级。（三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1日）

各国专使今日参与移灵奉安

南京 一日晨四时，各国专使率其参随，由招待员陪坐汽车，自行馆出发，迳赴中央党部参与移灵礼节：①就位；②肃立；③奏哀乐；④向灵槨行三鞠躬；⑤哀默三分钟；⑥读祭文；⑦奏哀乐；⑧行三鞠躬礼。奉移参与既毕，专使团领袖，会同中央委员、国府中各特任官、总理亲故，参移灵槨上灵车后，加入第七行列（即与国府主席同列），执绋步行，至保泰街离出行列，改坐汽车，出太平门，直抵中山陵附近彩棚休息恭候。灵槨降车，换杠升石级，执绋人员分左右两行（各行二人平行）前导先行。及灵槨至祭堂平台，执绋人员恭迎灵槨换车，各国专使随灵槨入祭堂，由典礼组干事靳志、李世忠招待专使领袖，会同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恭扶灵槨进墓门，奏哀乐，全体肃立，敬谨奉安，鸣炮一百零一响。奉安毕，专使团领袖随同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退出祭堂就原位。各专使会同在祭堂参加典礼人员，依次进墓门，敬谨瞻仰后，退出原位，肃立行礼，其礼节如左：①就位；②肃立；③奏哀乐；④向灵槨行三鞠躬；⑤献花；⑥读谕文；⑦奏哀乐；⑧全体肃立默哀，敬谨奉安。礼

成，各专使依次退出祭堂，会同其随参步行至外交部所设之彩棚休息，由本部参事接待，茶点毕，专使由招待员陪坐，乘汽车回馆。（三十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1日）

奉安日诔文^[1]

南京 总理奉安日中央诔文业已拟就，兹录原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本党总理孙先生逝徽于北京。十八年六月一日奉安于南京紫金山。星陨柱折，云黯日凄，万方崩号，三光易度，呜呼哀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暨全体党员，仰止遗徽，摧心失国仰。素旌而前驱，咽悲笳以启路，痛攀号之莫及，企音尘而长慕。闷宫既恤，令闻孔明。巍巍丕显，荡荡无名。爰宣光烈，载被旆旌。摘藻飞轮，谨诔德音。辞曰：炎德中微，朱明解纽。东胡凭陵，海族蹂躏。虔刘华胄，痛毒区宇。玄黄黜，黎元纆。于铄先生，奋厥桓武。雄图大略，旷今迈古。覆彼君统，此民治。义声既张，豪英毕会。十盪十沫，凌厉无对。树党申约，屹若岩城。履险若夷，弘济群生。荆棘初刈，豹虎未格。挾伐屡伸，蒙难扞阨。闻载艰勤，谋国匪躬。戡夷大难，四方来同。煦如春日，惠满薰风。纤衡玄漠，允执厥中。三民大义，先生之。五权学说，先生张之。行易知难，先生昌之。建国方略，先生光之。漂摇神州，先生匡之。憔悴黎庆，先生康之。遂兹民生，以进大同。成而不有，天下为公。薄海喁喁，云合是从。自南至北，咸集厥功。天下遗，大疾莫瘳。赍志长谢，国病民愁。呜呼哀哉！祇奉遗志，岁历四更。区夏既奠，建中南京。虔创玄宫，以妥神灵。白日昭昭，青天明明。先生精神，万方长新。呜呼哀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紫清，佳城是固。赫戏炎辰，招摇指已。大隧既闢，封丘岌峨。骏烈休德，民无能名。继往开来，久集大成。有典有则，先觉先知。千秋国父，百代人师。呜呼哀哉！（三十一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1日）

国府哀仰总理诔辞

南京 国府哀仰总理诔辞，如下：

[1] 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暨全体党员诔文。

本党总理孙先生，于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殒落殡于西山碧云寺。吾党恪遵遗命，营葬南京紫金山之阳。迨至中华民国十八年，襄就底定，车书式同，而陵墓工程亦已告竣。五月二十六日迎榇南来，二十八日抵南京，在中央党部公祭三日。六月一日，敬谨举行奉安典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暨各委员，率同文官处、参军处全体职员，敦援古者黜述功德之义，以志哀仰。护作诔曰：天生总理，辅相裁成。范围百世，覆育群生，海人淳淳，知难行易。此理既明，俎功不泯。人伦道德，陵夷至今，发挥光大，拔人于禽。异学争鸣，诞敷文教，国之华兮，赖夫振导。国民革命，扶危定倾，后来者，前无古人。建设国家，三民主义，独先创行，聪明睿知，岂第君子。博爱和平，神武不杀，此其至仁。睥睨群雄，锄除非种，夷险芟荒，是为大勇。于乎总理，乃圣乃神，巍巍荡荡，民莫能名。吾党慎旃，齐心继述，旧德前功，庶几无失。石城虎踞，钟阜龙蟠，山陵习吉，窀穸屈安。惟此间宫，千秋万岁，国以永宁，生民乐利。（三十一日）

（《申报》1929年6月1日）

两路宣传列车抵京

南京 总理奉安沪宁沪杭宣传列车三十号抵京，各机关代表到站欢迎者甚众，京市党部三十一日上午十时，召集各界在大礼堂开会慰劳。（三十日专电）

（《申报》1929年6月1日）

今日各界举行奉安公祭大典

今日为总理奉安纪念，市执委会召集各界，在新普育堂举行公祭典礼，中外各机关各团体各商埠均停止办公一天。兹将昨日所得消息，兹志如次：

市党部 上海特别市党部，除于日前派代表赴京参加外，并于今日上午九时在南市国货路新普育堂内召集全市民众，举行总理奉安纪念公祭大会。届时全市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等，均须一律参见。市党部并于事前，在新普育堂内外，搭盖牌楼，及筹备一切公祭所用之花圈挽联等，预备举行一极大之公祭大会，并规定举行秩序：一、开会；二、全体肃立；三、唱党歌；四、奏哀乐；五、向党旗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六、静默三分钟；致哀；七、献花圈；八、读祭文；九、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十、主席报告；十一、演说；十二、奏哀乐；十三、呼口号；

十四、摄影；十五、散会。并发表告同志、告民众二书，因文长从略。

海军司令部及特别党部 海军司令部今日上午十时在司令部举行公祭。代理总司令陈季良主祭，海军特别党部及政治训练部全体人员均参加，秩序如下：①全体就位；②肃立；③奏哀乐；④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⑤默哀三分钟；⑥献花；⑦宣读祭文；⑧奏哀乐；⑨行三鞠躬礼；⑩礼成。并录祭文如下：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为总理奉安之辰，海军部部长杨树庄、护车全军官佐士兵，致祭于总理之灵曰：巍巍大仪，曰顾与黄。革命先导，民权滥觞。维我总理，与之颉颃。致力册载，艰险备尝。襄遭阳九，清政不纲。亲贵贪暴，国蝗民疮。总理愤之，蹈火赴汤。呼号奔走，苍骗虎痕。志士飏起，汉帜斯张。铲除帝嗣，民治乃昌。中更军阀，横肆披猖。互争雄长，元气断伤。总理恫之，悯念□觴。救民水火，义旗载扬。析而长寿，愿宏待偿。天胡此醉，夺民之望。攀号何及，举国彷徨。一咎云汉，四周星霜。盘兮呵护，剪灭疆梁。东南底定，威响朔方。首都磐固，庶政允咸。五权宪法，遗教勿忘。靡寿而久，青史有芳。靡爵而荣，黄胄有光。紫金陵墓，□乎苍苍。精魂来往，灵旗□飏。瞻拜宰树，今之甘霖。薄海哀思，山高水长。尚飨！

又海军特别党部祭文如下：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总理奉安之辰，海军特别党部执监委员会，谨率全体党员，致祭于我总理之灵曰：呜呼！总理万世之师，努力革命，艰苦不辞。三民五权，大同所基。丰功伟烈，有口皆碑。方之尧舜，彼乃无为。方之汤武，公而不私。音容□渺，世间同悲。精神长在，事理奚疑。望风过奠，不禁泪垂。扶维尚飨！

市政府 上海特别市张市长祭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恭逢总理奉安吉期，上海特别市长张群率市政府全体职员等，谨献香水鲜花，并为文以告，曰：惟我总理，天挺圣哲，全民获再造之机。时会艰难，举世勤革新之乐，游观环宇，□万法以朝宗。奋斗四十年，树三民之宏旨，智超象外，读礼运而慕大同，功盖天荒。昌民权而臻志治，集与中之会，志切富强，同敌忾之盟，力排帝国，迨夫义师飏举，则元首群推，诸道风从，则洁身先退，其后权奸穷国，贼吾党之干桢，悍将骄横，陷华胄于鼎镬，于是兴师护法，整南国之军容，转□诛奸，扫东江之叛逆，党基再立，主义重光，国本先□大纲聿著，誓清军阀之根株，爰揭国民之会议，群瞻北上，期环宇兮澄清，迟痛西归，伤天地兮闭塞，碧云古寺，长□国父之灵，黄海春潮，画作导师之泪，今者肃清反侧，建遗

命之上都，永妥幽宫，择名山之大体，群等投身党籍，夙间遗教之殷，布政海隅，益切汉墙之想，值大典之恭逢，宜微忱之上献，惟愿紫金作砺，互万古而常新，白日扬辉，历千秋而永照，归藏则吉，佑启民治之隆，大道为公，早完吾党之责。敬告。

邮政总局及邮务管理局 交通部邮政总局及上海邮务管理局全体职员，今日上午八时，均臂缠黑纱，在局公祭。兹录其祭文如下：呜呼！巍巍我公，华夏之光。生有自来，领海之劳。骑箕天上，民众悼伤。殷殷遗教，语重心长。勗我同志，努力趋跲。继志述事，愿道其详。昔公初逝，士气益扬。义军奋起，挾伐大张。时未三载，绥定国疆。统一南北，公愿差偿。□武垂成，训政有方。如何团结，民族以强。如何提倡，民权以昌。如何休养，民生以康。百端建设，悉见党纲。维公主义，博大发皇。呜呼！公之遗泽，湛湛汪洋。金陵形式，备乎苍苍。领然陵壑，佳城在望。公之正气，弥漫八荒。亿万斯年，莫之咸忘。尚飨！

两路党部及工整会 沪宁沪杭甬两路特别党部及两路工整会，定于今日上午十时，假座福生路俭德储蓄会举行孙总理奉安纪念。业已通告全路党员及员工一律参加盛典，主席团已推定为闵维炳、彭学文、何礼文云。

中华道教会 中华道教会为六月一日总理奉安，决议凡道教庙宇一律于是日就各本庙正殿，恭设总理灵位，召集道众，虔诚礼懺一天，以志哀忱，而申□□。其散处道友，亦须一律就近各庙，参加致祭，业早分面各庙，敬谨预备云。

▲ 本市各长官赴京 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兼司令熊式辉，于昨日正午十二时四十分乘沪宁中快车赴京，参加孙总理安灵大典。驻荷公使金刚泗夫妇、江苏交涉员徐谟夫妇，亦于昨晨晋京，参加奉安。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特派军需处处长邓青浦、参议朱□华代表参加典礼。邓朱两氏，业于昨晚搭沪宁路夜快车晋京。惟李石曾氏，前晚因患腹泻发热至四十一度之高，现在医院，施行注射，并曾电达南京云云：

南京中央党部奉安委员会暨迎榇守灵送葬各机关同志钧鉴：煜瀛原定于本月中旬复赴平迎榇，并参加工作。惟以卧病沪上，临时电平请假在案，然其时犹冀于六月一日前可病愈，到京追随大典。乃日来微恙转剧，热度增高，不克田院，歉仄何如。惟有俟病稍痊，当再补行公祭。除先委托代表致敬外，谨此电请续假。李煜瀛叩卅。

▲ 外国官商停工一日 驻沪各国领事署、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各银行交易所、各洋行及两租借公共性质之处所，均停止办公。

▲ 租界停止娱乐一日 交涉公署于前日三十日为总理奉安事,致函本部领袖领事,请转令租界当局,于奉安日停止娱乐一日。该函去后,交署复于昨日上午用电话向克银汉领事讯问,当由克领在电话内答复,谓三十日下午,曾为此事召集各领事会商,当即议决,令巡捕房令各游戏场各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一律停止一日云云。兹将公共租界工部局通告译志如下:略谓案率领袖领事美总领事克银汉公函内开,本署顷准江苏特派交涉员五月二十九日函称,本年六月一日为中国国民党先总理奉安之日,应请饬知公共租界内各娱乐场所,一律休业一天,以志哀悼,而表敬礼等情。经本总领事与各国总领事会商之下,对于江苏特派交涉员要求租界内各娱乐场所,应于六月一日照界外娱乐场所同样休业一节,会表赞同,相应卫远,即希转饬各娱乐场所经理人遵照为盼,等因到局,除分别饬知外,相应刻函公布,仰即遵照云云。

▲ 教会代表晋京 上海公教进行会会长陆伯鸿君于昨晚晋京,充任罗马教廷钦使刚恒毅秘书之职,参与奉安大典云。又本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前接国府方面来函,准其派代表五人参与总理奉安典礼,当推该会会长朱成章、总干事余日章两人为代表,于昨日早车晋京,与首都青年会代表,联合致祭,并参与奉安云。

(《申报》1929年6月1日)

后 记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学术丛刊2010年1月创刊出版后,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勉励与支持,在此我们要表示由衷的谢意!

今年国内两岸三地很多学者给我们投来了学术文稿,有些学者还曾数易其稿,这种热情和支持令我们非常感动。可惜的是,我们每辑的版面有限,且有些学术论文的内容并不十分贴合我们刊物的需要,因此一部分学术文稿在本刊学术委员会审稿时未获通过,在此我们也要表示诚挚的歉意!希望这些作者今后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我们的刊物。

今年文献资料的编辑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她为我们提供了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7次谈话的俄文档案中译件,在国内属于首次系统译介。中国福利会将其珍藏的宋庆龄与爱泼斯坦等人往来书信21件提供本刊公布,系首次披露。2011年是宋氏家族开创者、孙中山重要助手宋耀如诞辰150周年,本刊将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近年来在海外搜集到的宋耀如档案进行了整理,首批编译了17封宋耀如海外书信,经美国爱墨蕾大学、杜克大学和宋子文之孙冯英翰先生、宋子安儿媳宋曹珮璇女士和日本女子大学久保田文次先生等著作权人或保管单位同意后公开刊布,属国内首次完整发表的宋耀如海外书信原文及中文译稿。对上述单位和有关人士对我们的竭诚支持和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这本刊物主要是为孙中山、宋庆龄及其相关人物、事件的学术研究工作服务的,希望大家进一步支持我们,积极为本刊撰稿或提供相关的文献资料。编辑工作难免会存在一些缺陷,敬希读者不吝指正。